

#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军队 通信教育史

朱仕朴 主编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 10 章，详细讲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各根据地、解放区，各大战略区和一、二级军区及有关军、师等部队创办过很多通信学校和无线电培训班，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通信战士，建起了纵横交错的通信联络系统。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还是在运筹帷幄的战略、战役、战术指挥中，无论是在针锋相对的谈判桌上，还是在隐蔽战线与敌人残酷的较量中，正是这些通信战士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通信保障。

本书是亲历者回归档案的一份历史实录，以参与者身份讲述历史事实，其资料弥足珍贵。当年亲身经历革命战争的诸多老同志口述的许多细节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可信、可贵的依据。口述中有很多陌生的姓名，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先辈同心协力、殊死斗争，谱写了革命战争的光辉一页，为后世树立了开创美好未来的榜样。

本书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培养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好教材，也是学习和研究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的珍贵史料和参考书。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军队通信教育史/朱仕朴主编.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121 - 17099 - 7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军事通信 - 教育史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E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3005 号

责任编辑: 杨 波 特约编辑: 宋兆武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87×980 1/16 印张: 23 字数: 408 千字 彩插: 4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图书, 如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mailto:zltz@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mailto: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 序 言

盛世修史。

198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抓紧时间抢救历史资料，要求各部门、各地方整理编写党史、军史、行业史、厂史、校史、地方志等。时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刘寅同志（我军通信兵种创建人之一）在杭州召开会议安排落实此项任务，决定由西电（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电，后改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负责搜集、编写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通信教育史。

刘寅同志说，西电是我军最早建立的一所通信学校，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创建的，从红军时期起一直发展到今天，见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毕业生遍布各根据地解放区，西电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编写军队通信教育史的工作。

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解放区创办过很多个通信学校和无线电培训班，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通信战士，建起了纵横交错的通信联络系统。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还是在运筹帷幄的战略、战役、战术指挥中，无论是在针锋相对的谈判桌上，还是在隐蔽战线与敌人残酷的较量中，正是这些通信战士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通信保障。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通信战士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193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延安通信学校师生时说，如果没有你们这些通信战士的工作，我们党中央就无法了解国内外大事，无法指挥各解放区的战争。1941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为《通信战士》杂志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刘寅同志说，革命战争留下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每走一位老同志就会带走一段珍贵的史料，我们不抓紧时间就会愧对历史，愧对这些无名英雄。

刘寅同志在给西电布置编写军队通信教育史的任务时，特别指明要朱仕朴同志主持这项工作。朱仕朴同志是老红军，一直在军队通信部门工作，搞过多年的通信教育，熟悉历史，认识通信兵里的许多老同志，

又是西电的党委书记，是合适的主编。

随后，朱仕朴同志立即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开始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工作。因为许多历史事实没有文字档案可查，只有逐个地去访问当年亲身经历的老同志。老同志都非常支持，热情接待，有的老同志卧病在床仍一字一句地回忆口述当年的亲见亲闻，堪称“绝版”史料。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把材料汇集起来，整理编辑，历近 20 载，六易其稿，终于成书。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幸先睹初稿，这不是一本综述的历史著作，而是亲历者回归档案的一份历史实录，以参与者身份讲述历史事实，其资料弥足珍贵。口述的许多细节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可信、可贵的依据。口述中有很多陌生的姓名，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先辈同心协力、殊死斗争，谱写了革命战争的光辉一页，为后辈树立了开创美好未来的榜样。这是一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好书。

201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谨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军队通信教育史》奉献给党。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毅' and '健', followed by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2012 年 5 月



# 目 录

<b>第一章 我党我军早期的通信工作</b> .....	1
第一节 早期的党内交通 .....	2
第二节 南昌起义时的通信保障工作 .....	10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及红军中的通信联络 .....	11
第四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邮政简况 .....	15
<b>第二章 我党早期的无线电人员培养工作</b> .....	21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为我党代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	22
第二节 我党在上海筹划建立电台 .....	30
第三节 建立南方局电台，向苏区派遣无线电通信人员 .....	33
第四节 同共产国际建立无线电联络 .....	41
第五节 我党最早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 .....	45
第六节 地下党坚持继续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	56
<b>第三章 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b> .....	61
第一节 红一方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我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的 诞生 .....	63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	74
第三节 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无线电通信 人员培养工作 .....	102
第四节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培养工作及新疆新兵营 电训队 .....	112
<b>第四章 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延安通信学校）、电讯工程专科         学校</b> .....	125
第一节 陕北红军无线电通信教育工作 .....	125
第二节 军委通信学校（延安通信学校） .....	129
第三节 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	155
第四节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心通信学校工作 .....	157
第五节 通信学校的文体与物质生活 .....	158

第六节	延安通信材料厂 .....	162
第七节	红中社、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延安新华 广播电台 .....	167
<b>第五章</b>	<b>一二〇师、晋绥、西北地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b>	<b>173</b>
第一节	一二〇师师部报训班、新军无线电报训班、晋西北地 区党委报训班、晋绥军区电训班、绥蒙军区 通信队 .....	175
第二节	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报训班 .....	182
第三节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训练队、西北电讯 学校 .....	184
第四节	联司通信队第四区队、军委三局气象台 .....	189
第五节	晋绥军区通信学校、西北通信学校、第一通信 学校 .....	196
第六节	军委三局通信队 .....	199
<b>第六章</b>	<b>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b>	<b>201</b>
第一节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班 .....	203
第二节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组（班） .....	213
第三节	冀热辽、冀热察地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227
第四节	冀中地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229
第五节	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华北军区电讯工程 专科学校、军委工程学校 .....	237
第六节	晋察冀军区通信材料厂、广播电台 .....	244
<b>第七章</b>	<b>八路军前总、一二九师无线电教导队，晋冀鲁豫军区通信     学校，边区广播电台 .....</b>	<b>251</b>
第一节	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无线电教导队 .....	252
第二节	一二九师无线电教导队 .....	257
第三节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 .....	260
第四节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参谋训练队、机务训练队 .....	263
第五节	晋冀鲁豫边区广播电台 .....	264
<b>第八章</b>	<b>新四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b>	<b>269</b>
第一节	新四军军部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271
第二节	新四军一师、苏北指挥部、苏中军区、苏浙军区 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279
第三节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二师、淮南军区无线电通信	

人员培养工作 .....	287
第四节 八路军五纵一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 三师、苏北军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291
第五节 新四军六支队、八路军第四纵队、新四军第四师无线电 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293
第六节 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鄂豫皖湘赣 军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296
第七节 新四军第七师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301
第八节 中原军区电讯专科学校、二野军事政治大学电讯支队、 西南通信学校、第二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通信 学院 .....	302
第九章 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华东军区无线电通信人员 培养工作 .....	307
第一节 山东纵队无线电训练队 .....	311
第二节 山东通信学校、华东通信学校、第三通信学校 .....	315
第三节 一一五师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322
第四节 华东军区三局通信材料厂 .....	323
第十章 东北地区及广东东江纵队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325
第一节 东北地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简况 .....	325
第二节 东北民主联军电讯专门学校、东北通信学校、第四通信 学校、汉口机务学校 .....	330
第三节 关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大连大学电讯工程专修科 ...	332
第四节 东江纵队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335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粤赣湘边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337
附录 A 旧中国无线电史话（节录） .....	339
附录 B 1928—1949 年军队通信人员培养情况统计 .....	347
后记 .....	357

# 第一章

## 我党我军早期的通信工作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之间，各革命根据地之间，各红色武装之间，都需要加强联系，党中央对星罗棋布于各地的革命力量，如何沟通信息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及时准确地沟通信息，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党的事业的发展，没有党的通信系统，革命事业就无法前进。而邮电和各种交通事业，多为敌人所掌控。

早在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建立之前，党内的信息都是派人传送。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自1925年起，各级组织配置了专职交通员，形成了交通网。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党遭到了巨大损失，城市的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建立党的全国“地下”交通网。自此以后，我党我军的通信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的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无线电通信事业，由小到大，成为革命队伍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

## 第一节 早期的党内交通

早在1924年5月，为了加强党内交通，党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曾研究党内交通问题。会议的决议《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案》中指出：“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

1925年1月，中央在《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中，又再次强调上述议案的内容，并于1925年1月《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中更明确了交通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中央组织部需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1）指导出版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的销路；（2）筹划向各地秘密地输送本党的宣传品及函件；（3）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的交通。”

1925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党独立支部以上单位发出了《关于建立与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二十八号通告。“通告”强调指出：“……大会（指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本党在秘密行动之下，使本党的印刷物传布到党内群众以及深入党外的群众中，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的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所以大会在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特别在第八条内规定交通的职务，……”，“通告”还指出了当时交通工作的主要困难：①本党一切印刷物，受邮局严查，完全不能邮寄；②各地没有尽早拟定妥当地址及办理交通负责人，致使党的印刷品，不但不能深入群众，并且与各级



党部断绝关系或发生障碍。

依据中央一系列决议、通告的精神，党内的交通网逐步形成。因为是在白区中活动，所以纪律也十分严明。

党的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由中央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交通工作又分为内交与外交两部分。负责中央各机关内部联系的叫“内交”；负责与外省各组织联系的叫“外交”。当时内交主任是张宝泉同志，后被捕牺牲，由张人亚同志接替。以后顾建业、高文华同志相继负责领导。外交工作第一任主任是吴德峰同志，后来是方英、刘作抚等同志。

由上海通往外省共有三条线，即北方线——由上海至天津、北京，与北方局联络；长江线——由上海至汉口，与长江局联络；南方线——由上海至广州，与南方局联络；另外，与满州省委还建立直接联络。

内交、外交的联络方法，一是自上而下；二是自下而上。交通员按组织分配的任务，独立完成，互相不能联系也不了解情况。内、外交主任了解全面情况。

除党中央外，各中央局、各省委、县委都有自己的交通系统与交通路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使北伐革命遭到失败，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已建立起来的交通网也受到极大破坏。

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建立全国党的交通系统，并指定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负责。

8月21日，党中央向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立即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并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全国交通网的组成。通告指出：“‘八七会议’决定，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

（2）交通网的任务。通告规定“此交通网的责任有二：1. 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2. 兼探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



信息。”

(3) 对交通工作做了一些规定和要求。通告规定“中央因经费困难，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方局及江浙间交通的总枢纽。暂时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南方局办理，江浙则由上海分处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

(4) 对交通工作和交通员的具体要求：“交通员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两日以上，以免妨碍交通。如因当地党部特别缘故不得已延至两日以上，须由当地党部给予证明书，并供其延留期间的费用。各地党部接到交通员带到之物件时，应立即给予回条，所有交给交通员递送的文件，必须尽可能使之轻便易带，望特别注意为妥。”

为了加强对党内交通的领导，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交通局，专门领导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由吴德峰任局长，陈刚同志任副局长。全党交通分为南方、北方两大系统，同时注意加强同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地下交通是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在敌特、敌军的监视下进行工作的，工作十分艰难，一般都选择优秀、英勇、机智的共产党员担任，这些交通员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行之有效的传递文件的办法。

党的地下交通，来往于白区或白区与根据地之间，环境十分残酷，执行任务稍有不慎，就会使党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失。因此，除在选择交通员时要求对党忠实，政治坚定，严守纪律，不怕困难，在对敌斗争中除了要胆大心细，机警灵活，随机应变外，还规定有严格的纪律。

如湖北省英山县交通局在1931—1932年规定以下5条纪律：

(1) 交通员要保管好自己的护身武器，人在枪在不能失落。

(2) 交通员送文件时，途中若被敌人打死，活着的人要继续把文件送到目的地，并带回死者武器。

(3) 失落文件者，依情况不同给予不同处理。如因寡不敌众，文件被敌人搞去，抢救而未成功者，不予处罚，或从轻处罚；如果是粗心失落文件，或向敌人泄露机密，要拘捕治罪，甚至处死。

(4) 交通员不得擅自拆阅公文信件。

(5) 服从指挥，听从组织分配，不得擅自行动。

李子键同志在《忆三十年代初中央交通局在上海的地下活动片段》中，提到当时的“秘密工作条例”。内容为：

(1) 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联系的关系。同志之间，各组织之间，在同一时期只有上下垂直的单线联系，不准有左右前后的联系。

(2) 机关(同志们的住处)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一级,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的兄弟机关。

(3) 在党内不该自己了解的人和事,不过问、不打听。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自己说的话不说,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

(4) 坚守岗位,不允许到群众斗争场合,不允许照相,不去公共场所,不允许进舞厅或酒吧之类的场所。

(5) 不乱抛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或载有机密文件的纸屑,要及时把它们烧掉。

王凯同志在回忆中说道:“1926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我在上海党中央机关见到了党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对我说,目前全国各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力量正在迅速发展,中央为了加强同各地的联系,决定调我到中央专搞地下交通工作。”

“当时,从中央到大区,有三条交通线:一条由上海到北方局(北京),一条到南方局(广州),一条到长江局(汉口)。除了北方局的交通是由上而下之外,其余两条都是由下而上。这样,中央专职的长途交通员就我一个人。”

“首先,我必须找一门社会职业掩护自己。我伪装的社会身份是商人。我是绣花工人出身,生意经一窍不通,为了掌握上海和北京两地相互经商的手续和行情,我化装成市民,每天到市场上来回转。经过一周的时间,我对日用百货的花色品种、批发价和零售价等行情,特别是对上海五马路的‘鸿兴洋货店’老板的姓名及经营范围,都摸得烂熟。”

“其次,必须摸熟上海到北京这条交通线,熟悉北京的商业行情。4月间,我化装成商人,去了一趟北方局。这一趟,不仅了解了北京市场的情况,而且和崇文门外‘祥生小洋货店’也拉上了生意。同时对北方局的秘密接头站,接头暗号,都作了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沿途敌人盘查规律,发现敌人特别注意检查旅客携带的箱子。”

“搞秘密交通要有个稳妥的落脚处,当时在上海,租房子必须有家眷,不然租不到房子。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为了便于工作,便在4月底去南京和李素英结了婚,婚后即带着素英赶回上海,住在闸北区宝山路正兴里的一座独院里。从此,这里既是我和市内交通的秘密接头站,又是中央一些同志谈话的地点。”

“一天,党中央秘书处任作民处长要我给北方局送几本《向导周刊》和中央给北方局的重要指示。我接过他递给的文件,只见是一部《三国演义》,原来中央的指示就抄写在书页反面的行间里。”



“隔了一天，我把六本《向导周刊》塞进裤腿，扎好腿带，将《三国演义》夹在算盘和账簿的中间，穿上黑长褂，背上洋货包就出发了。到了北京，是个麻阴阴的早晨。走到崇文门外下头条口一看，不妙！北方交通局周振东的住房窗台上没有接头暗记——花盆，我想一定出事了，未敢停脚就拐向崇外大街。走了一阵儿，听到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装做让路的样子回头看了一眼，噢！有个身穿黑马褂的包打听（侦探）跟上我了。”

“‘你是哪来的？’那家伙厉声厉色地问我。

‘从上海来做生意的。’我指着搭在肩上的洋货包说。

‘胡说！’他一把揪下我的洋货包就检查，把《三国演义》也打开了，又搜查了我的身上，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这家伙不死心，接着就盘问我在上海哪个店办货，到北京哪个店卖货，店老板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得很干脆。他没查出什么证据，只好放我走了，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想起上次来时，周振东同志向我说过，如果他的窗台上没有花盆，就到大栅栏或到东安市场去找他。于是我拐了方向直奔大栅栏。在大栅栏转了半天，没有找到周振东，又折回东安市场，这时已是后半晌了。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接头要紧呀，哪能顾得上肚子，我注视着东安市场里来往的人流，直到黄昏，仍没见周振东的影子。正想往外走，不料和一个公寓打杂模样儿的人撞了个满怀，他就是周振东。我们打了照面，他前我后，两人装做不相识的样子走进了公共厕所，幸喜里边没有人，我们就趁解手的时刻放低嗓门说了两句话。”

“当晚9时，我和周振东在御河桥接了头。他把我带到原苏联大使馆相隔的东方贸易公司，这就是我党北方局机关。我马上将《三国演义》——中央的指示和《向导周刊》亲手交给了李大钊同志，任务完成了。见到大钊同志那种坚定、乐观、严肃、热情的神态，我真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第3天晚上，我带着李大钊同志给中央的两封信回到了上海，任处长又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他说，最近中央要开会研究对时局的主张，要我协助市内交通掩护开会。开会的房子是租赁的，地点在闸北区横滨桥附近的一个弄堂里。掩护办法是装成亲戚朋友庆贺主人‘乔迁之喜’。”

“市内交通张宝泉负责通知开会的时间、地点，我专管购买打掩护用的东西。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把大嫂——党中央王荷波同志的爱

人和素英领到会场，见任处长和其他几个同志已到了。任处长和大家商议一番，我们就化装成市民，按上海风俗分头准备。”

“第二天早晨，会议开幕了。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中央负责人，我当时认识的有项英、王若飞、王荷波、李维汉等同志。他们围坐在楼上的正房内，每人跟前摆了盒火柴，准备一遇到坏情况，就急速焚毁文件。”

“楼梯上的亭子间由张宝泉放哨，楼下边的正门半敞开，大嫂在那里当‘姨娘’，后门有素英步哨，我在院里当‘机动’。客厅正壁上高挂着的玻璃镜框内写着‘乔迁之喜’四个大字，往下是一张玲珑的长桌，桌上端端正正地供着个财神龕，龕前摆设着各式糕点、糖果等祭品，厅中央放一张八仙桌，市内交通石琮和白戴昆等四位同志面对面坐着，假装打麻将，以掩护开会。”

“这次会议要进行5天，已经平安过了4天。然而，就在最后一天，使人吃惊的事发生了。”

“下午3点钟，大嫂突然跑来对我说：‘老王，不妙，有两个身穿巡捕服装的家伙朝正门来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眨眼的工夫，只见那两人一声不吭，直往里冲。我稳了稳神，三步并一步地朝他们迎去，大声笑说：‘来客啦！’这声暗号惊醒了楼上楼下的人们。”

“会场内被寂静笼罩着，在客厅打麻将的几个市内交通人人心情紧张，但又很从容地走出来把两个家伙迎进客厅。这时，我和石琮同志急忙取烟倒茶，笑着探问来意。”

“原来他们俩是工部局派来查电表的。因为着装和巡捕的服装差不多，所以造成了一场虚惊。”

“天黑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散了。我们收拾了祭品走出来，回首一望，热闹了五天的那座小楼沉睡在黑咕隆咚的夏夜里。”

赵志刚同志在回忆中说：

“1930年冬季，我离开中共东满特委，到了中共满洲省委。当时书记是陈潭秋同志，他指定我负责市内交通工作，与外地来人接头，从秘密通信点取信等，另外，还协助搞些油印和密印工作。以后党中央又派张应龙为省委书记。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同志叫我负责与党中央两个直达交通员接头，两人都姓王，每半个月来一个人。他们都化装为商人身份，把党中央给满洲省委的秘密文件，用墨水写在极为普通常见的旧小说或其他常见书刊中，与其他古书混在一起，公开携带着。有的密件，藏在各种旅行用具（如提包、箱子等）中。他们每次来沈阳后，就按

照预先约定的暗号，在约定的地点张贴符号，我看到符号，就知道党中央秘密交通已到沈阳。所住旅馆，也是事先约定的，有时住在‘盛京旅馆’，有时住在‘中东旅馆’。我按照约定的日期，经常到约定的地点，去查看有无贴出的暗号。如住‘盛京旅馆’，他们到后，即在胡同口的墙上或电杆上贴上一个红色纸条，上写：‘天荒荒，地荒荒，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在下边再写上日期，如‘2月15日’，‘2月’为代表住几楼；‘15日’就是他所住的旅馆房号。我一见此条，到旅馆，即可不向账房查询，直接到党中央交通所住房间接头。他把文件从伪装用具内取出交给我后，我再转交秘书处，由于佩贞、王鸾两位女同志用药水洗出、抄好，再交给我转递省委负责同志。省委给中央的文件，也由她们密写后，交给我进行伪装，送给党中央交通带回上海。由于同志们严格遵守地下秘密通信纪律，并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机动灵活，大胆细致，从未发生过失密问题。”

“有一次，党中央有个交通员王大个，山东青岛人，把中央交给他带给满洲省委共产党员一个月的生活费2500元（银元），全部携款潜逃，致使省委脱产同志生活无着，遇到极大困难。省委便指定我立即赶赴大连，坐船去上海找党中央要经费。由于任务在身，行动迅速、小心，一路顺利到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这样大的城市。当晚住在一个旅馆中，并按照省委开给我的通信地址给党中央写信联系。过了两天，来了一个小青年和我接头，他报名小申（即申守义）。我一看，原来是位熟人。今天，与小申同志在上海相见，觉得格外亲切，我估计他当时可能是在中央交通局工作。”

“过了几天，小申同志把一张中国银行2500元的支票交给我，我马上赶到中国银行把现款支出，坐电车赶回旅馆。当时，我身穿大褂，钱放在衣袋里，唯恐丢失，总是手插在衣袋里，手不离钱，钱不离手，想不到我这种小心翼翼的神情，竟被一个小偷发觉，当我到站即将下车，刚刚走到电车门口时，小偷的手已偷偷摸摸插入我的衣袋，幸好当即被我觉察，小偷未能得逞，我才平安携款回到旅馆。为了迅速返回满洲省委，当即订好返回大连的船票，一路平安地回到沈阳，将款分文不差地交给了省委，解脱了省委的经济困难。”

交通部的这种职能，在抗日战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马省三同志在回忆中说：“1944年当时我在冀鲁豫军区第一办事处（也叫沙区办事处）担任交通科科长。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敌占区和太行办事处联系，传递党的机密文件，护送从山东、苏北、冀中、冀南来的



爱国青年和党的干部，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让我马上赶到太行办事处去接受任务，我心里直纳闷，过去都是在这边接受任务，从来没有点名要我到那边去接受任务，这是怎么回事？然而命令就是命令，不容我有考虑的余地。我马上收拾一下，向西出发了。”

“我走了一天一夜，赶到了太行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接待我吃过饭，便说：‘这次任务，主要是护送几位负责同志过铁路线到冀鲁豫去。因为时间紧，就不能让你多休息了。’说完，便领我到一個驻地，我站在房门口。办事处同志进去说了几句话，便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说：‘快请进来！’门开处，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已经站了起来，他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办事处的同志对我说：‘这次任务非同一般。一定要仔细安排好，把各种情况都要估计到，千万不能出问题。’”

“当时我想，近一个时期，我护送过不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从这里到延安去，其中有邓小平同志、陈毅同志，还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和新四军的后勤部长周骏鸣同志，这次要护送两位首长。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净是些高级干部来往过路呢？当时秘密工作规定，接受任务时，不应自己知道的事，不准乱问。所以我只好说：‘到路上怎么称呼呢？’”

“办事处的同志说：‘随你的便，爱叫老张、老李都行。过了敌占区，给我们发个电报来。记住了！’我说：‘记住了。’”

“繁星满天，微风阵阵。虽然已是初夏，骑马在山间小道上慢行，身上还是凉飕飕的，赶了大半夜路我骑在马上实在瞌睡得抬不起头来，上眼皮和下眼皮就像黏住了一样。我好像听到了自己轻微的鼾声。可是，我马上用拳头狠狠地敲自己的脑袋。”

“这时我辨认了一下地形，知道离前沿已经不远了。我勒了一下马嚼口，让后边的人赶上来。当东方发出熹微亮光时，在一个山脚下的小村庄里，我们找到了前沿抗日民主政府，他们安排我睡下，一直到夜灯初上时，才被叫醒。”

“第二天一早，我、李庭柱和两位首长都化了装，表面都是一色上等商人打扮。我头戴一顶深黑色的大礼帽，身穿浅花素白色的绸子大褂，戴一副金丝腿茶色大眼镜，骑自行车在前头走。身后跟着一位首长，再后是李庭柱，最后又是一位首长。一排四辆自行车，如飞似的向县城驰去。”

“眼看就到敌人炮楼底下了。我的心弦绷得紧紧的，脸上却丝毫不

露声色。碉堡旁站着两个持枪的伪军，其中一个正盘查过往的老百姓。我眼角扫一眼，几个乌黑发亮的枪口，像凶神恶煞似的直瞪瞪地对着公路。我挺直胸脯，用力蹬车，轻蔑地瞟了伪军一眼，就直冲过去了。”

“伪军好像被我的神气镇唬住了，一时弄不清我是什么人，或许把我们当成了日本人的特工人员。因此，我后面的人通过炮楼时，那两个伪军还恭恭敬敬给他们行了个举手礼，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岗哨。”

“过了铁路，绕了一个弯到了南关街上。过去，这里是个很兴旺的小集镇，这几年被日伪汉奸糟塌得不成样子，既荒凉，又肮脏，破败不堪，加上不到吃早饭的时候，行人很少，所以我们一到这里便显得十分刺眼。刚到街口上，便被两个伪军盯住了。我抬头看了看，南门外岗哨林立，防守更加严密。我想，得赶快摆脱这两个家伙的纠缠，不能再到南门跟前去了，最好在这里先停一下，观察一下动静。”

“我们拐到一家饭馆，在靠窗口的一张桌子前坐下，一边和饭馆掌柜搭讪，交代多做几样好菜；一边始终盯着门外那两个家伙。”

“刚坐下，那俩家伙便跟了进来，装模作样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又到后院转了一圈，几只贼眼睛始终在我们身上溜来溜去。我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理睬他们。掌柜的给我们冲了一壶茶，我们安闲地喝着。那两个家伙见无隙可乘，站了一会，出门走了。”

“从饭铺出来，没敢进南门大道，顺东城墙根，绕段庄、黄孔村，直奔五陵镇。快到五陵镇时，我让李庭柱同志先拐回去，按第二步计划行动。我领着首长在坎坷的田间小道上缓缓行进。”

“我们很快赶上船，渡过河，太阳还有一竿高的时候，到了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主任王乐亭同志，这时我才知道，接来的这两位首长，一位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同志，一位是山东分局书记舒同同志。”

## 第二节 南昌起义时的通信保障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临时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周恩来同志被委任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在南昌大旅社成立前敌委员会。

当时起义部队没有无线电通信手段，为了把参加起义的贺龙同志所

属的二十军、叶挺同志所属的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导团、蔡廷锴所属的十师等3万余人联系起来，叶挺命令二十四师的电话兵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湃等同志住处安装电话。电话总机设在叶挺同志的指挥部内，保证了起义准备期间的通信联络。

起义之前，为保证起义部队的行动一致，作战时便于识别，规定统一的起义信号、识别标志及口令。信号是三声枪响，夜间识别信号是在左臂缠白毛巾，电筒马灯玻璃上贴红十字，口令为“山河统一”。这就是南昌起义时的主要通信手段，这些简易的通信方法，保证了起义的发起和顺利进行。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及红军中的通信联络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后，我党开始建立革命武装，到1929年，在南方各省建立大量根据地，建立了红军。这时在根据地与红军之间，联系十分频繁，因为当时没有无线电通信，联系方法主要靠人力交通及少量有线电话。

#### 一、根据地与红军之间的交通

井冈山是我党最早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当时为了同湖南、江西省委取得联系，1928年春开始，先后开辟了两条交通线。一条自井冈山出发，经永新县、莲花县的坊楼到湖南省委所在地萍乡。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四军向上级的请示、报告，均经过这条交通线进行传递。1928年8月，这条交通线被破坏而停止使用。另一条是从井冈山永新县北乡、吉安县梅花村、吉安县城南至南昌。毛泽东同志给江西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以及党中央给边区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均经此交通线传递。由于敌人的包围，这些交通线在传递文件中都十分困难，花费很长时间。

1929年3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信两件：一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月间在井冈山收到；二是六次大会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六件），今年一月在永新收到。”

中央很重视红四军前委的来信，在给三军、四军及有关省委的信中，多次提到加强地方党组织同红军的交通联系问题。1929年12月，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指示：“你们与中央及闽、粤、赣三省游击

队之密电码联络，是非常必要的。中央认为：你们与福建的联系应设总交通处，分交通处于漳州、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等处。关于这一交通网的设立，与设立之技术问题——如递步方法，秘密装置，交通人员职业和职责与经费等，你们应该与闽、粤、赣三省定出更切实周密计划，且要迅速地建立起来。”

中央给红军去信的同时，给闽、粤、赣等省委的信中，对如何建立红军的交通联系，也都作了具体布置。1929年12月19日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指出：“广东省委认为，这两部分红军（指朱毛红军和东江红军）设总交通处于潮汕……”

1929年12月22日，中央在给福建省委并转军委的信中指出：“红军与红军的联系，此省与彼省的联系、红军与你们及中央的联系问题，无论在扩大红军问题和解决红军目前许多问题上，都是必须要解决的。”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根据地的交通联系得到改善。例如，江西：1930年7月，赣南根据地扩大，并成立江西苏维埃政府，分散活动的红军组成一、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1930年9月，中央开辟了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上杭—汀州—古城—瑞金的交通线，在大埔开设了秘密交通站。这条交通线非常严密，汕头、大埔、虎市设有秘密接头地点，有旅店、药店、饭店，还有自己的大小船只，从而保证中央根据地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在红军长征以前，这条线一直畅通无阻，从未受到敌人破坏。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从白区购买的主要物资，都是从这条交通线进入根据地的。交通线上还专门设有武装交通，负责保护过往人员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何叔衡、毛泽民、李富春、蔡畅、邓颖超、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张闻天、胡耀邦、肖劲光、张爱萍、李克农等，都是经由此线进入苏区的。

1931年12月21日，周恩来同志到达长汀时，将这条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命名为“工农通讯社”。以后“工农通讯社”下设交通大队和大、中、小交通站等。在边界地区的永定设有大站，对外称“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以作掩护。各交通站的武装交通员是从红军中抽调一些班长来担任，或者抽调彭杨学校毕业的学员担任。

1931年月11月，在江西瑞金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色区域稳定发展，交通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湖北：**湖北自黄麻起义以后到1930年逐步形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0年3月成立了红一军。为了建立红一军的交通网，同年4月，中央给湖北省委的信中说：“目前第一军成立了没有？成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中央近来未接到报告，你们应该与他们打通联系。建立直接交通网，经常得到他们的报告和给予他们指导。”

1931年5月，在湖北新集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11月成立红四方面军。在此期间，由新集到上海开辟了3条交通线：第一条是新集—宣化店—信阳—郑州—徐州—南京—上海；第二条是新集—金家寨—麻埠—霍丘—正阳关—蚌埠—南京—上海；第三条是新集—汉口—上海。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12月进入通、南、巴地区，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的十七路军驻陕南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订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中共陕南党组织经地下党员武志平同志的努力，开辟了由陕南进入川陕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1933—1934年共开辟三条：一是南郑（今汉中）—大河坎—牟家坝—羊圈关—川陕根据地；二是南郑—西乡县全中家沟—大河坝—楼房坪；三是南郑—镇巴县涣渡坝—万原县滚龙坡。

**湘鄂西：**1930年建起了上海—武汉—沙市—宜昌—洪湖交通线，后来中央在汉口设交通处。1931年5月，湘鄂西分局给中央的报告说：“请中央快速设立汉口交通处，我们也在设法建立。中央与此间交通线，我们可建设三四路，现正在进行中。”

从以上江西、湖北、湘鄂西三个根据地的党的交通建立情况，可以看出交通命脉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子文同志在回忆中说：“1928年8月左右，我从河南出狱后，被调到上海中央交通科工作。我在中央搞交通工作共一年时间，于1930年7月底离开交通科到北方局工作。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传递中央的文件和传达口头命令；带送党的干部；交接关系；为中央提款。走的主要路线是从上海到武汉、沙市、宜昌和洪湖根据地（到新堤接头）。”

李文采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年秋我从上海交大毕业，大概在10月份左右就走了。离开上海时带了一些通信器材和一本密码，小魏同志与我同行。有人把我们从小上海送到汉口，到了汉口又换了一个人，把我们送上一条小船，船驶了两天的时间，才到了洪湖苏区总部驻地——瞿家湾。”

## 二、红军部队早期的通信工作

1927年秋收暴动后，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上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在红军中为了保持统一指挥，保持上下联系，通信工作就提到了日程上来。在早期，没有无线电通信，有线通信也很少，主要是靠徒步传递和某些规定的信号等通信方式进行联络。

现在从历史档案中最早见到的文字记载有：

- 1928年1月30日湖南省委通过的“工农革命军的任务与组织决议案”中的“（二）每大队均须斟酌情形，成立侦察组、通信组、运输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受正副大队长指挥”。
- 1928年12月16日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四、军事决议案（二）团部传令排定枪八支。”说明此时在团部已设传令排。
- 1929年6月19日红军的“军部报告”中说：“当时决定的组织法是，中央军部下设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科及军事委员会，实际经常专事在军事部工作的只有秘书及交通各一人”。
- 1930年3月1日红三军团政治部“关于地方武装问题”的通告中，编制了连、营、团、师的编制序列表。连的管理排下设司号1人；营的管理排下设传令班及司号1人；团设交通班12人，司号班3人，传令班10人；师设传令排。
-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明确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作了如下规定：“连部设打旗2人，司号2人，交通2人。营部设交通班，打旗2人，司号3人。团参谋处下设交通科，（甲）交通科设参谋2人，一为科长即交通队长，一为科员即交通队副队长；（乙）交通队两排，一为电话排，一为传达排。（丙）电话排设置5个电话机，3个在营部，1个在团部与上下联络，1个为团的电话总机；（丁）每电话机以3人组成一班管理之；（戊）传达排以9人组成步行班，5架自行车组成自行车班，两架摩托组成摩托车班，或骑兵5人组成骑兵交通班。师参谋处下设交通科。”
- 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电话队，队长谭汉卿，电话技师姜彬。这些电话是安源煤矿工人参加红军时带来的。
- 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下设交通科。
-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成立电话队，共80多人。

从以上资料看，在1930年以前，在根据地及红军中，主要的通信方法没有无线电通信，但是，建立无线电通信已提出到议程上来。

## 第四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邮政简况

在我党未建立根据地之前，因为没有自己管辖的地区，不可能有邮政事业，党内文件主要靠地下交通传送。自1927年12月，毛泽东同志率湘赣边秋收暴动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以后，至1930年秋，全国相继建立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数块革命根据地，在300多个县成立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

国民党为了扼杀红色革命政权，1930年10月中原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掉转枪口，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严密封锁根据地的对外交流。

1931年年初，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1931年2月10日，军政部长兼“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亲自召见了中华邮政江西省管理处处长，何应钦说：“现在大军剿伐‘共匪’期间，军事行动至关机密，所有在匪区内邮局及邮班一律暂行停办，断绝‘共匪’交通，以免泄露军情。”并严令对革命根据地发出的邮件，一律送南昌行营检查，检查后一律没收，以断绝根据地的一切对外联系。

1931年8月29日，蒋介石又亲自签发一个“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在赣、粤、闽、湘、鄂五省普遍设置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直接管理，对一切寄往革命根据地的药物、汇款、货物、包裹，无论经过什么渠道，一律扣留，违者处决。

在国民党“交通围剿”的环境下，给革命根据地的内外联系造成很大困难。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在根据地创办了赤色邮政。

### 一、赤色邮政的创办与发展

1928年在湘赣苏区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时，即开办了赤色邮政机构，至1932年1月，湘赣苏维埃政府在永新正式成立“中华赤色邮政湘赣省总局”，由陈介福任局长。总局下设路站，路站下设代办或信柜。

1930年赣南苏区建立赤色邮政局，闽西苏区建立赤色交通总局，闽浙赣苏区建立了赤色邮政机构，并且都发行了赤色邮政邮票。

1931年湘鄂西苏区开办了赤色邮政，省、县、区分别成立了总局、分局、支局。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内务部下设共和国邮务总局，统管全国的邮政工作。在邮务总局领导下，在粤赣、江西、湘赣、福建、闽赣、闽浙赣、鄂豫皖等省区，分别成立了邮务管理局。各根据地内依据具体情况，开辟了邮路，发行了邮票。

由于根据地被分割，各地的邮政规章及实施办法不尽相同，致使邮路不畅通。为此，1932年4月24日，邮政总局召开闽赣两省邮政局以上负责人会议，制定了《赤色邮政管理章程》，决定发行4种邮票。会后，内务部就“整理苏维埃邮政，统一组织，统一办法”发布了训令。

《训令》首先明确邮政组织系统。指出：“中央邮政总局之下，各省设邮务管理局，各县则按其是否是交通要道与军事重心地点，设甲乙两种邮局，各重要市镇及交通区域，则设立邮务分局，或邮政代办所。”

《训令》规定了邮务人员的条件，要求：“各级邮务工作人员，如系当地招来，必定要有当地政府或群众团体担保，才能录用。各局的递信员，应是体力强健，没有恶劣嗜好的忠实革命工农，凡属富农、流氓、豪绅家属，以及有各种危险病症的（如肺病、黄肿病）一律不用。”

会议通过的《赤色邮政暂行章程》分为15章共52条。

会议研究确定以瑞金为起点，按军事重心与交通要道，分设六条邮路干线。即：

1. 瑞金—宁都—广昌
2. 瑞金—胜利—兴国—万泰
3. 瑞金—会昌—寻邬—安远
4. 瑞金—长汀
5. 长汀—上杭—永定
6. 长汀—新泉—龙岩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专门开办了特别快信。1932年7月，中央临时政府发布《内务人民委员会命令》，指出：“特别快信是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而特别设立，是代替有线电报与长途电话的，只有几个主要干线上和军事交通线上，才有特别快递班次，除临时设立军事干线外，其他各线上，一律只有普通快信，没有特别快递。”

当时开辟了15条快递干线，《命令》还具体规定了特别快递邮寄的方法。除中央革命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也成立了赤色邮政组织。

**鄂豫皖苏区：**1931年10月，苏维埃政府在《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

说明》中，关于交通问题，规定为：“交通委员会——办理鄂豫皖交通事项，下设赤色邮政局（计划另定）、电报局（计划另定）、交通站（特别注意驿站的建立，计划另定）、水上交通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2月进入川陕地区，在通（江）、南（江）、巴（中）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初，川陕苏维埃政府建立时，在《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中就规定：“县交通局：办理赤色邮政、电报。”赤色邮政的组织是省交通委员会下设的赤色邮政局，各县设立交通局，管理邮电业务。区乡设代办所，负责各级机关、部队和民间的邮件、电报的传递工作，省邮政总局先后设在通江、巴中，并发行了邮票。

**湘鄂西：**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在《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开办了一个湘鄂西赤色邮政，各县有分局，各区有一支局；每支局3人，分局5人，区支局7人，总局11人；每人生活费10元，邮差每月津贴草鞋钱每天五角。每天上午8点钟才收信，下午4点钟就不收了。”省邮政总局设在瞿家湾。

**陕北：**1935年上半年，在延川县永坪镇设立陕北第一个苏维埃邮局。开始时没有邮票，免费投递。后来印了有3种面值的邮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此后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到1936年，先后在马兰、庄里、绥德开设了苏维埃邮局，开辟了4条邮路干线。

## 二、根据地内外通邮问题

当时我国大部分国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根据地内的邮政只能解决内部问题，当时曾积极设法沟通内外邮政。

1932年5月，为了保护通邮，中央军委发出了《不得随意扣留邮件的通令》，全文如下：

“近据调查及各方面报告，由白色区域邮政寄来赤区的邮件，常被边区地方武装赤卫队等所扣留，这种现象是非常不许可的。固然在军事紧张时期，为了搜集各种情报起见，是可以检查信件的，但在检查以后所有未达到目的地信件，还必须把信件封好并盖章，仍交邮局递送收信地，绝不能随意扣留。至于包裹、报纸等件，更是绝对不能任意拆看或扣留（地方武装绝无权扣留）。望各地政府转令赤色武装，以后切实注意，希勿再有任意扣留邮件（尤其寄汀州邮件）弊事发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后，为了便于向外界联系，中

中央军委于1936年2月7日发出《关于处理邮政电报局的决定》。

通过制定保护邮政的政策，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沟通了内外联系，使红军能获得根据地外的一些情况。

章新远同志在回忆中说：“‘递步哨’这种通信组织，是由党在各个农村挑选忠实可靠的贫雇农若干人做通信联络工作。他们的通信方法是一村传一村，一站传一站，把各个大小村落都相互联系起来，只要红军和人民群众有信，就马上传送。”

“为了更好地监视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群众性的‘递步哨’又发展为‘传山哨’。这种通信组织主要以农村青年赤卫队员为骨干组成。每个哨员都有一定的岗位，平时在各村的大小山头上，一面放哨，一面劳动，发现敌情，就用暗号把敌人的人数、武器、行动方向等，一个传一个地很快传给邻近各村。例如，哨员发出‘牛在田里吃禾苗啦，看牛的注意，现在向东边跑去啦！’就表示敌人向东行动。如果距离较远，或遇到逆风，传音不便，就用一些简单动作为暗号，通知对方。例如，向空中扬土表示敌人出动；拿棵小树立在山头，东倒表示敌人向东行进，西倒表示敌人向西行进。这就使当地红军、赤卫队、群众能很快了解敌情，做好迎击准备。”

“但是，光靠这种‘递步哨’、‘传山哨’传递信息是不够的。当时苏区、白区犬牙交错，许多地方有时控制在红军手里，有时又暂时放弃；也许几小块革命根据地，中间夹杂着几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地区。当时，党和红军的交通任务，主要是传送文件，同时也负责运送重要物资和药品、食盐等必需品，以及护送革命干部。这就产生了强行通过苏区、白区边界的‘武装交通’和远达千百里之外的‘秘密交通’。武装交通是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人员，化装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秘密交通多半在白区我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设立‘秘密交通站’。交通员则化装为小商贩、旅客、家庭妇女等，来往通信。”

“从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之时起，到1931年9月底，党和红军就是依靠递步哨、传山哨、武装交通、秘密交通等通信方式掌握敌情，加强通信联络，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起到了很大作用。”

“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区特委在宁冈茅坪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出第一届特委委员23人，毛泽东同志为书记。不久，在江西永新县城建立了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并正式设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中华赤色邮政湘赣省总局’。用红缎子做底、黑丝绒绣字的湘赣省

邮政总局的旗子，至今还珍藏在江西省莲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中。”

“《赤色邮政暂行章程》规定，赤色邮政是为适应工农斗争的需要，在苏维埃领导之下而设立的。总局隶属省政府。总局之下，各县设立支局，支局之下设立路站，路站之下设立代办所或信柜。赤色邮政各种人员均受赤色邮政总局指挥，不受当地政府、群众团体的干涉。”

“湘赣边界赤色邮政总局约于1929年发行了人民邮政的第一套邮票。这套邮票共3枚，图案为斧头、镰刀，外围五角星，象征党领导工农大众进行革命。”

“《赤色邮政暂行章程》第五章第十六条规定：‘为预防被人揭取邮件上之邮票起见，特准寄件人粘贴邮票后，将自用图章加盖少许于邮票之角端，以免流弊’。这是赤色邮票的一大特点。”

“赤色邮政为解决邮件欠资需要，另外还发行了1分、2分、5分欠资邮票。”

“赤色邮政的信函分为：剪角信（限于印刷物），纳费1分；便信，纳费3分；单挂号，纳费8分；双挂号，纳费16分。凡信套上画有3个‘十’字者，均按‘双挂号’寄送。赤色邮政章程中设有关于汇兑的规定，‘凡有金钱性质者，如纸票、花边票据及其他物件，除寄邮费之外，须按照价值，缴纳保险费，每元纳费2分’。此外，还有关于印刷品、包裹等项邮资规定。”

“赤色邮政规定各局站每日开班两次，上午6时半，下午12时半。如有军事信件，则随到随送。”

“赤色邮政对现役红军指挥员、战斗员及其家属，无论寄信或寄包裹，给予免费优待。凡现役红军本人寄信或包裹到本人家乡的，都由红军所在部队政治部在邮件上加盖‘红军信件，免贴邮票’图章，其家属寄信或包裹给红军的，须由当地政府加盖‘红军家属信件，免贴邮票’图章。但红军各部队、各机关相互寄发的邮件，仍须照章缴纳邮费。”

“1930年10月又称：‘龙岩的共产党已经发行了两种面值的邮票，一种是为本埠信用的，另一种是为国内信用的，各为铜元2枚及4枚，两种邮票都用一种特定的红色印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战争与地域的特殊条件，并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对行政区域作了重新划分。后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内务部领导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章程》规定，总局是在内务部领导下‘直属的全国交通机关，在全国各地是一垂直的独立系统组织，总局局长受中央内务部的任命与撤换，其他一切工作人员由总局局长任免，各下级苏维埃政府不得干预其一切行政与工作。’‘在中央邮政总局之下，各省设立省邮务管理局，各县按地域的宽窄，军事交通的需要与否，分设甲、乙两种邮局，县以下的较大市镇或交通要道则设邮政分局或邮政代办所’。当时，在总局之下，分别设立了粤赣、江西、湘赣、福建、闽赣、闽浙赣、鄂豫皖等省邮务管理局。”

“中华苏维埃邮政，是为党、政、军服务的通信事业，其一切经费，统归中央政府内务部发给，所有邮票及其他一切收入，一律上缴总局。”

“中华苏维埃邮政发行了‘苏维埃邮政邮票’，计有：1/2分、1分、2分、3分、8分、1角、3角和欠资票8种。”

“苏维埃邮政业务分为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递邮件、红军信件、包裹等几大类，同赤色邮政一样，设有专门汇兑业务。”

“普通邮件分为普通信函、剪角信件、新闻报纸、书籍印刷等项。普通信函规定，每件不超过6钱，就地投递者，贴邮票1分；各局互寄者，贴邮票3分；超过6钱到1倍者，邮资加倍。剪角信件，只限于政府、军队、群众团体、革命机关之印刷文件，就地投递贴邮票1/2分，各局寄贴邮票1分。”

## 第二章

### 我党早期的无线电人员培养工作

1927年4月12日后，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政策，对革命人民实行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群众斗争又逐步发展起来，根据地逐步扩大，被破坏的组织迅速恢复。

1927年9月，党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因为我党已转入地下，公开利用敌人的通信系统传递信息已十分困难，仅靠地下交通员往返传递信息，非常耗费时间。在党组织急需恢复发展的情况下，各地党组织急待中央的指示，为了适应发展的情况，建立无线电通信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建立无线电通信，不仅是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而且从客观上看，条件也已具备。在国内，从1928年起，全国已安装了27个短波电台，南京2个台，上海6个台，汉口3个台，北平、天津、福州、厦门、青岛、济南、南昌、宁波、安庆、杭州、吴淞、芜湖、蚌埠、屯溪、汕头、



广州各 1 台。在国民党军队里，早期也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但在 1928 年以后，在旅以上机关配备了短波电台。

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我国不少城市开设电器行，出售无线电元件，在许多大城市可以买到装配收发报机的零件。

1921—1923 年，由于科技、教育和工业界的重视，无线电理论、技术、工艺得到广泛传播。1921 年下半年，上海交大开设无线电实验课。除大学外，国民党在不少地区举办了邮电传习所、无线电训练班、交通学校等单位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这一期间无线电工业也开始兴起，1924 年上海建立亚美电器厂，生产五管超外差收音机，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也办起了有关工厂，生产重锤式韦斯登收发报机。

这样，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建立无线电通信的条件均已成熟。从主观上看，从中央到各基层，都十分迫切要求设立无线电通信机构；从客观上看，我们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买到器材甚至整机，同时还可以从敌人手中缴获大量通信设备，用以武装自己。所以党中央从 1927 年起开始筹建无线电通信队伍。

##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为我党代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1928 年 6 月，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曾向共产国际提出代培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建议，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我党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员中，抽调学员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在党的“六大”上，除做了若干重要决议外，在《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指出：“不实行

军事政治工作与纯粹带着军事性质的许多重要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那么，仅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是不能保证革命胜利的”。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军事报告，刘伯承同志作了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周恩来同志在军事报告中强调党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军事工作决议案中指出的技术工作，当然包括无线电通信技术。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同志接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8年7月，周恩来同志到东方大学向留学生传达“六大”精神，他见到毛齐华同志时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迫切需要无线电通信。”

### 一、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线电训练班

1928年夏，共产国际同志为我党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我党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同志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训练班地点：莫斯科市。党代表兼支部书记：依克那托夫。军事教官：孔节枝。学习内容：除收发报技术外，还用很多时间学习装配收发报机。

1930年秋末学习结业，除陈昌浩同志中途调做其他工作外，其余均于1930年10月回到上海。有的到党的地下电台工作，有的到无线电训练班工作。

毛齐华同志在回忆中说：“1928年初夏的一天，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中大、东大或劳大）的秘书长阿勃拉莫索夫（他曾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会说中国话）交给我一份名单，要我（当时，我是该校支部组织委员）和这些人去见他。名单上有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和我六人。我们到他办公室见他时，他对我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及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个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在中大上课，晚上去学习。”

毛齐华同志接着回忆说：“无线电训练班设在一条冷僻的街道上，周围以木板做墙，门内还有苏联红军站岗。我们每星期到那里去学习两次，都是在晚上，每次两小时左右。在‘中大’的学习和工作一如往常。”

“训练班是由苏联人教课。开始阶段是学习收发报技术，教员用电键“滴滴答答”地拍发，我们几个人围桌而坐，头戴耳机，边听边抄，抄完后当场校对是否准确。暑假过后，开始学习无线电原理和制作机器

零件的技术。教员讲课用的是俄语，我和沈侃夫听不懂，由方廷桢等人辅导。课堂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一架发报机，我们的隔壁还有一个小工厂。教员说：‘你们应当到小工厂里去看看，争取时间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线圈等无线电元器件。回国后有些元器件可能买不到，要自己动手做。’”

“我们去工厂时，工人们对我们很热情，需要工具或提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我和沈侃夫都是工人出身，对于机械制作较有兴趣，所以常到那个小工厂去。”

“1928年夏，党代表兼支部书记依克那托夫指定我和另一位二年级同志，由军事教官孔节枝（北伐战争时在中国当过军事顾问）带领去东方大学野营参观学习。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正巧赶上周恩来同志来‘东大’传达中共‘六大’精神。我们听了报告后，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起进饭厅吃饭。他看到我（在国内时见过面）就问了我的情况，对我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信。当时因旁边进来的同学很多，只说了这两句话。就这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约到了1928年年底，陈昌浩因组织上调他去搞青年团工作，中途退学，我和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坚持了下来。1929年年底，我们完全离开了‘中大’（即前述的东大，下同），搬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去住，只有当学校有重要报告时才去听一听。”

“1930年起，我们常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离莫斯科几十公里远的郊外去实习。实习时是和业余电台‘CQ’联络，顺利时一晚可和十几个西欧国家业余爱好者的电台通报，有时还到莫斯科郊外国际电台去参观学习。”

“1930年秋末，无线电训练班负责人晓克找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和我四个人谈话，他说，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你们在这里的学习毕业了，要送你们回去工作。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按他交代的路线和方法，秘密地从莫斯科到了海参崴。几天之后，又从海参崴乘车到一个秘密交通站，改换行装，由苏联交通员带路，翻山越岭，回到祖国的东北。一入国境，我们四个人就分散行动，相约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附近马路上会面。”

方仲如同志在回忆中说：“1928年夏，党在苏联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向第三国际提了个议案，大意是，中国成立了工农红军，各省都需要无线电工作人员，要求共产国际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1928年夏到1930年秋，共产国际办了一个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除我（当时

叫方廷楨)以外,还有陈昌浩、毛齐华、陈宝礼(又叫沈侃夫)、李元杰和程祖怡。学习地点在苏联莫斯科‘克格勃’的一所院子里。我们白天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晚上去那里学习无线电。”

“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大约在1929年年底,我们又转到另外一个地点。去的除我们几个(陈昌浩中途调走了)中国人外,还有保加利亚4人,东德3人和捷克1人。那里只住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婆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去。老婆婆给我们做饭,老汉负责打扫卫生。到1930年夏,又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电台实习。”

“经过2年的培训,我们都学会了无线电理论,会收、发电报,会装收发报机,还会制作简单零件。”

“1930年秋末,组织上通知毛齐华、陈宝礼、李元杰和我回国,当时谨慎得很,只允许自己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

“回国途中我们都是商人打扮。4个人互不打招呼。白天在车上睡觉,晚上到达沈阳(当时叫奉天),后来又乘车去大连。几经周折才于1930年10月初到达上海。党派顾顺章同志去接我们,顾顺章当时是我党特科的负责人之一(后叛变),特科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同志。”

## 二、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

1929年1月,党组织又调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员涂作潮、宋濂、刘希吉、谭献犹(留法学生)4同志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

学习内容为无线电、有线电通信技术,还学习军鸽、军犬通信等。1929年下半年,涂作潮和宋濂调往刘伯承在伯力由金矿华工组织的中国部队(游击队)里做无线电通信工作,不久被送到海参崴电台实习。1930年4月,涂作潮、宋濂两同志回国工作。

涂作潮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24年年初经同乡介绍到上海谋生,开始在恒丰纱厂打零工。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夜校的招生广告,便去报名。在夜校认识了蔡和森同志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蔡林蒸同志。因为我们是同乡,经常交谈,他逐渐了解我的经历及家庭情况,后来我亦向他表示,要找共产党。1924年春,李立三同志得知我有入党要求后,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向我讲解共产党性质等党的基本知识,审查了我的历史和家庭情况,后经蔡林蒸、林仲丹两同志介绍,在1924年4月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的一天,支部林仲丹同志叫我带上洗脸用具,跟随

他到杨树浦自来水厂与恒丰纱厂附近的黄浦江边，在这里由一只小舢板把我送上停靠在浦东的苏联轮船。在船上，林仲丹同志和一位苏联同志说了几句话后，便转身来向我传达派我去莫斯科学习的组织决定。对于这一决定，我当然是高兴的，特别是能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更是我毕生的愿望。林仲丹同志和我谈完后，又亲切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和我握握手，坐上送我上船的那只小舢板上岸去了。”

“上船之后，才知道同去莫斯科学习的大约有 20 人，胡子厚同志被指定为党的临时负责人。开船后约一两天，经过日本海峡时，碰上了日本检查船，它命令我们的船停住，我们便冒充船员在甲板上站队，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番。又过了一两天到了海参崴，来迎接我们的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海参崴，我们住在‘五一’俱乐部。过了 10 多天，接到从莫斯科打来允许我们入学通知的电报后，还简单检查了一下身体，主要看有没有沙眼，便坐上烧木柴的火车向莫斯科奔去。只记得车过赤塔时，沿途都挂满了红旗，原来是苏联人正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约经过 15 天左右的时间，我们才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到‘东大’教务处报到。‘东大’校址在莫斯科特热格亚·布里瓦尔 15 号。校长苏曼斯基，教务主任布拉克。俄文翻译先是王仁达、孙纪常，后来增加了宗孚、马干诺夫（中国人俄国名字）、曾涌泉、武戈、刘鼎等。……在这里学到 1928 年 5 月毕业。”

“早在‘东大’快毕业时，我曾向组织要求继续留在莫斯科学爆破技术。党的六大期间，张国焘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说：‘现在国内红军急需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战斗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爆破技术，你改学无线电通信吧！我同意了组织的决定，于是我进入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这已经是 1929 年 1 月的事情了。”

“在通信学校里我们主要学习放狗、放鸽、有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钳工等。校长斯瑞基，政委康斯坦丁洛夫，数学教员聂里多夫，初级无线电教员雅可夫烈夫，高级无线电教员乌拉索夫，技术员梅也尔、索培尔（这两位是德国人）。同学有刘希喜（四川人），谭显犹（广西人，留法学生），此外还有宋濂（四川人）。”

“第二期开学不久，也就是 1929 年下半年，刘伯承同志在伯力组织金矿的华工成立中国（游击队）部队（亦称共产国际组织的远东支

队),准备打回中国去。我和宋濂先后奉命到这支部队里搞无线电通信工作。”

“1930年3月组织上通知我和宋濂回到上海,仍住在四马路新鹿鸣旅馆。第二天上午在旅馆里碰到一个‘东大’军事班的同学,他帮我带信给中央有关部门。第二天下午李强同志来了,把我带到大世界附近九星大戏院西面的一家裁缝店三楼的楼上。李强问我这些年在苏联干了些什么,我一一向他做了汇报,并着重说明我虽然学过无线电通信但搞报务不行,只能搞机务。接着李强同志出了几个题目简单地检查了我的业务水平,我便留在这里住下。这里是党领导的无线电修理所,从此我便开始直接在李强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 三、1929年以后共产国际与苏联为我党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

1932年4月,党组织又选调林嶝(原名谢洪台,俄文名劳果夫)等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林嶝同志是1927年5月在东方大学军政班学习,1928年9月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8月调苏联远东58支队当翻译,后任科员。1932年4月调莫斯科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兼翻译。这所学校对外称第八体育训练基地,在莫斯科莫林斯大街18号。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于1933年10月结业与龚荣生同志一起回国,11月到达上海。

1932年6月,党组织从上海等地选调周子祯等5同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收发报机装置修理及密码编制等技术。1933年冬党组织去电需要两名学习好的同志回国,周子祯等两名同志回国,1933年12月到上海,1934年1月到苏区(到苏区后未从事通信工作)。

1933年2~3月,从莫斯科的列宁学校等处抽调段子俊(段玉明)、王东(谢剑)、李春田、加夫、子清等同志,到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学校学习。段子俊、王东、李春田3同志先到,他们为一期;加夫、子清二同志后到,为另一期。此校与莫斯科工学院关系比较密切,专门为外国培养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在此学校学习的同志,凡是有发展前途的,还进一步学习工程理论和制作收发报机。段子俊同志连学两期,先学报务,后学无线电工程,以后又专攻天线。

1934年11月,党组织从吉林、哈尔滨、宁波等地选送一批青年到莫斯科郊外斯密斯火车站附近,在共产国际领导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去的较早的有上海的玛丽和柔莎两位女同志。玛丽的俄语比较好,她是

学员兼翻译。以后去的是万内（于保合）和米桑（苏钦臣），他们从哈尔滨到莫斯科，还有从吉林职业学校调去的巴沙和郭力亚，还有从宁波去的一女同志，以及从东方大学转去的谢尼（陈维哲，他原是哈尔滨一个中学的学生）。训练班不分期，先来先学，后来后学，先学会的就分配工作。学习的内容有收发报技术、国际用语，在机务方面学习电学、收发报机原理，装配制作收发报机，政治课主要讲中国革命情况。于保合同志因学习优秀，1934年9月提前毕业，被派回上海，因未接上组织关系，回到东北抗联做通信工作。

于保合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年春，我考入长春私立自强中学三年级，在中四班念书。在这里我结识了郭峰、纪坚博、李兆祥、关继武、刘志贤（陆平）等同志，他们经常在《自强》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我当时虽对理科感兴趣，但我很喜欢读这个刊物，因为它使同学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大学停办，我只好又回到吉林一中高班学习。在此期间通过傅景谦同志介绍，结识了吉林女师教员李世超同志（中共党员）。她对我很热情，经常向我宣传革命道理，这是我后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1933年11月，组织上派我和苏钦臣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1934年1月，我们经过绥芬河到了莫斯科。按在绥芬河时一个苏联大尉营长的介绍，我去找弗列满娜（女），她派人送我和苏钦臣一起到了莫斯科北郊约70公里斯密斯火车站附近的桦树林子里。这里有一幢二层小楼，后来又建成了一个新二层楼，楼下是宿舍，这就是我们的无线电学校。学校教官叫则普鲁，是德国人，曾在上海做过三年秘密电台工作，他会说俄语、英语和德语，给我们讲课是用英语，翻译叫玛丽（女），是中国人，在上海工作过，她是来学无线电的。此外，学员柔莎（女），20岁，是和玛丽一起来的，她们比我们到得早。后来陆续来了巴莎（18岁）和郭力亚（17岁）。1934年还有一个从宁波来的很黑很壮的女同学，还有谢尼等同学。我们的课程表是，上午讲电学、无线电收发报机原理、练习电码和国际电语。下午自制收发报机或收发报练习，星期天是政治课，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活动情况，还讲马列的书，如什么是列宁主义等。我在这里学到9月份已有半年多时间，因为我的成绩优秀，故先分配工作，派我到上海做秘密电台工作，交代我到上海后和英国人贝内接关系的方法，生活费每月60元美金（合现洋180元左右），给予路费100美金。还规定了电台联络的对象是苏联海参崴电台，波长44米同频联络。”

“1934年10月下旬，我到上海，按照规定接关系日期，于10月5、10、15、20日分四次去接关系均未接上。我看没有希望了，这时路费也不多了，于是我决定回哈尔滨满洲省委去。回哈尔滨后，给王立德写了信，李世超来找我，我把去上海的情况说明后，她说帮我查查。过了半个月他来对我说，已查明此人失去联络。这时让我留下来，说准备成立秘密电台，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叫我找房子做筹备工作。我们谈了两次，他最后一次谈话说中共满洲省委有变动（地下组织遭受破坏），打算把电台建在农村游击区去。后装配电台因无法搞到手摇发电机，故未能建立起来。1936年春，我到了依兰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1934年11月，我党派安得利（周百州）、列克宁（肖希明）、柏莎（女）和华里亚（柏、华两人是夫妻）、沃罗加、苏拉、华莎（女）、谢尔基、丹娜到莫斯科郊外的克拉斯克沃一所“外语学校”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及收发报的装修技术。学习时间为一年，1934年11月底开学。1935年底陆续分配工作。安得利、谢尔基以华侨矿工的身份，1936年1月派往北平工作。

1936年党组织派秦鸿枢同志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回到上海工作，负责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

1936年秋，党组织又一次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抽调十几名同学到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学校学习。这批学员有：黄志才（关常有）、毛诚（女）、张有衡、王全禄、张培诚、白川、甘凤琴（女）、于振东、刘顺和王庆才、孙福生等同志。

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报务，也学一些机务。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于1937年12月结业回国，由党中央分配工作。1936年12月，在莫斯科郊外斯库成纳训练了一些通信人员。参加学习的中国同志有叶莲娜（女）、日呢拉（肖项平的儿子）、安得利（周百州，他已在克拉斯克沃学了一期，这次又跟随着复习）等同志，此外还有德国人、阿拉伯人。肖项平同志曾担任过教学工作。1937年9月，叶莲娜、安得利、肖项平等同志被派回国工作。

1936年10月，党组织又派刘子汉、周同、韩肖义3同志到苏联工农红军中央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学制三年。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急需无线电技术人员，经我党与苏联协商，将刘子汉3同志改学无线电通信专业。从1937年7月开始，苏联工农红军中央军官学校调来无线电通信教官，专门教刘子汉等3同志学习收发报和无线电修理技术。经过半年的学习，1937年年底结业回国。



## 第二节 我党在上海筹划建立电台

在我党建立初期，急需无线电通信人才，当时苏联共产党为我党培养了数十名技术人才，为建立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信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关于中央特科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至上海。过去北洋军阀不了解我党的秘密工作，而国民党则知道我们秘密活动的方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白区建立中央机关是很困难的。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藏。此外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易找，便于设立机关。加之上海过去工作基础好，有群众基础，便于党组织活动，这是有利的一面。

但是，旧上海敌情复杂，一方面有外国的海军、陆军，有英、法、印度等国的巡捕；另一方面，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力量很强的地方，有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军阀，还有黄金荣、杜月笙等黑帮势力。所以上海是一座闻名的畸形城市，是帝国主义统治、压榨、奴役中国人民的基地，是著名的“冒险家乐园”，这里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外国冒险家及附属他们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纠合利用的帮会、地痞、流氓分子，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政治信仰不同的各阶层人士。

当时党中央设在法租界，国民党的特务、警探，会同法租界的巡捕房，互相勾结，共同破坏我党组织，每星期几乎都有革命者被捕。

在这种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如果没有秘密的保卫工作，就很难立足。1927年11月间，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创立了一个与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保卫工作组织——“中央特科”。它在中央特委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党组织，依靠群众，深入敌人警察特务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的革命活动的安全。它是党中央的侦察兵，是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突击队。

关于特科组织，1927年5月党中央在武汉时，为了应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形势，在中央军委下成立“特殊工作处”。当时军委主席是周恩来，秘书长王若飞，参谋长聂荣臻。党中央迁上海后，将从事这些秘密工作的同志组织起来，组成中央特科，下面设立4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第二科情报科，第三科行动科，第四科交通科。

第一科建立最早。党中央迁上海，需采购物品，布置机关，租房子。当时一科叫“总部”，特科成立后改为一科。它的任务还有布置会场，营救被捕同志，打铺保，做生意，收殓牺牲同志，料理家属生活等。

第二科是专门搜集敌人情报，掌握敌情，由陈赓同志负责。

第三科主要是带领“红队”打击特务，镇压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保障会议的安全，又叫“打狗队”。

第四科交通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台工作。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革命形势有了发展，红色区域和工农民主政府逐渐巩固和发展，在白区的党组织也逐步恢复和发展，党中央急需冲破敌人的封锁阻挠，加强对各地红色区域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因此，1928年秋即开始筹建电台工作。建立电台本来不是中央特科原定的职责范围，但是当时其他部门无力进行，于是交给特科办理。特科为了完成此项任务，专门成立第四科，由李强同志负责。

陈养山同志在回忆中说：“1927年8月以后，党中央机关陆续搬到上海。11月间周恩来同志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春，中央军委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白区的斗争，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讲课。在武汉期间，中央军委曾设立‘特殊工作处’惩处了一些内奸、叛徒。周恩来同志回到上海不久，就筹建了中央特殊工作科，为保卫党中央和上海的党组织作出贡献。”

“党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各种领导机关，需要有一个专门组织来负责采购布置机关的用具。这个组织开始叫‘总部’，而后成为特科的一个科。找房子、办家具、建立联络点等统一由一科办理。为了租房子、打铺保的方便，还开设了些店铺，如木器店等。”

“为了掌握敌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1928年4月间建立了情报组织，即特科的第二科，科长陈赓。没有深入敌人内部的工作，就不了解敌人的动向，什么都保卫不了，二科建立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发展比较快，也比较顺利。”

“镇压特务、叛徒是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28年4月，罗亦农由于叛徒的出卖而牺牲，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特科设立了三科（较早成立的‘红队’在中央特科成立后作为特科的第三科），专门搞‘打狗’镇压叛徒、特务的工作。”

“1929年以后，由于红军的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展，原来

的交通往来时间太长，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央迫切需要和各苏区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于是特科又设立了四科，由李强负责。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时，无线电通信工作初步搞了起来。这样中央特科根据工作的需要逐步建立了4个科。”

## 二、党中央在上海秘密组建电台

我党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倡议筹划下建立起来的。1928年10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回上海不久，就开始抓此项工作。建立电台一是要有设备，二是要有技术人员，周恩来同志就是从这两方面抓起的。

1928年秋，中央特科就指派李强同志制造收发报机，并筹建第四科。李强同志是上海东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地下党员，曾任上海曹家渡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后在中央军委工作。李强同志曾在大学里学习三年，数、理、化、英文基础较好，他本来不是学电讯工程的，但他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后，首先找到一些教材、资料自学起来。他又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身份，同各无线电行交朋友，并和苏氏兄弟开办的“亚美无线电公司”、“大华无线电公司”等商店来往，从那里购买器材、工具及制造收发报机的图纸，然后和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涂作潮同志及张沈川同志试制收发报机，在蔡叔厚同志开设的“绍敦电机公司”的掩护下，在该公司的二楼上开设地下工厂。蔡叔厚同志1924年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科毕业回国，1927年加入共产党。绍敦公司在福煦路（现延安中路）369号。李强和涂作潮一边翻阅无线电书籍，寻找新式收发报机图样，同时用从市上买来的零件，多方琢磨，经历许多日夜苦干，经过失败和反复试验，用了半年的时间，于1929年春末，装成了第一批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1928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三马路惠中旅馆，亲自同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同志谈话，让他设法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张沈川原是青岛大学的学生，1926年11月在南昌加入共产党。张沈川同志接受任务后，化名张燕铭，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该校设在市内蓬莱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代号XH6）内，台长刘鹤年兼校长，该校是为捞外快而办的。张沈川入校后学到1929年5月毕业。刘鹤年于1925年在青岛参加“青沪惨案后援会”时认识张沈川，所以得到刘鹤年的同意张沈川到了第六军用电台实习。由于他的收发报技术好，电台人员让他值夜班。张沈川利用值班机

会，抄了两本密码交给党组织。同年7月，国民党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生张健等3人调到电台，他们发现张沈川的可疑之处，张沈川借口外出寻找工作，离开电台隐藏起来。

这是我党自己安排的最早的无线电工程人员和第一名报务员，从此我党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开展起来。

### 三、我党的第一部电台的建立

在培训通信技术人员和制作通信设备的基础上，党中央于1929年秋在上海沪西极斯斐尔路（现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租赁了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作为台址，安排张沈川同志建台，蒲秋潮同志（女）“住机关”做掩护工作。为了应付环境，他们衣着华丽，房内摆着桌椅沙发，墙上挂着字画，好像是很富裕的家庭以做掩护。初冬时装成收发报机，功率为50W。开始因我党在外地没有电台，张沈川同志利用业余无线电台的频率、呼号，与其他业余电台联络。经过多次试验，证明自装电台是成功的，我党的第一部电台从此建立起来。

## 第三节 建立南方局电台，向苏区派遣无线电通信人员

党中央第一部电台建立后，因外地没有电台，不能发挥作用，仅作为练习之用。为了早日发挥无线电通信的作用，党中央筹划建立外地电台。

### 一、南方局电台

1929年12月，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同志，带领黄尚英同志及一部电台到香港，建立南方局电台。1930年1月，南方局电台与上海党中央电台沟通联络，这是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我党第一次无线电通信联络。沟通联络的上海台报务员是张沈川，香港台报务员是黄尚英。

南方局电台建立后，所有中央派到苏区的同志从上海起程时，通过电台将人数、姓名、性别、政治情况，到香港住何旅馆，接头暗语等，都由上海电台通知香港，以便迎接并派人送往苏区。

1930年8月，在上海台的张沈川同志患恶性伤寒，组织上派伍云甫、曾华伦同志接替张沈川的工作。1930年10月，广东省委委员江惠芳被捕叛变，将卢永炽出卖，广州电台遭到破坏，邱德同志被捕。从此上海台与香港台联络中断，以后才又恢复起来。

## 二、长江局电台

1930年4月，党中央派李强、王有才、张华（女）建立长江北方局电台，因遇到极大困难，未能建成。

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为使秘密电台能安全工作，组织上对电台人员进行严格要求，基本上断绝与外界的往来，有时一两年才通一次家信，电台地址也经常转移。1930年5月，电台由福康里9号转到赫德路福德坊一弄32号。由于昆（于益之）夫妇“住机关”掩护。10月又在慕尔鸣路（现茂名北路）建立电台，由曾三同志任报务员，吴克坚、毛齐华夫妇先后做掩护人。发报时间一般在零点至两三点。天线随用随挂，平时在晒台上多竖晒衣长杆，以做掩护。

李强同志在回忆中说：“我党无线电通信工作是1930年1月诞生的。在此之前，党内上下左右的联系主要靠机要交通传送信件，既费时，又不安全，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来回要两个月，很不方便。无线电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党内军内的联系大大加强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建立，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1928年秋，我在中央军委工作，中央军委派我学习无线电技术，准备建立无线电台。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决定，就学起无线电来。这时张沈川同志也在学无线电技术。共产国际也培养了一些无线电人员，我党曾派毛齐华、方仲如等同志去莫斯科学习过。”

“我们学习无线电技术，完全靠自学，没有老师教，环境险恶，只能偷偷地学。参加革命前，我在大学学习了三年，我的各门基础课学得比较扎实，数、理、化的成绩都比较好。中学里的自然科学都有用英文课本，所以接受制造无线电的任务后，就到街上买美国大学用的有关教科书，进行有系统的自学。因为基础好，学起来并不困难。除了在理论上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秘密地到上海无线电厂偷着学习。在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发报机，但因厂子管得很严，我不能进他们厂子去学，便把他们的产品搞出来，一面解剖，一面学习。当时的上海比较复杂，什么人都有，卖什么东西的都有，一般的零件比较好买。但是发报机的重要零件在街头上是买不到

的。可是到了外国人的洋行里，就能搞到，只要先付定金，规定好型号，准三个月到货。记得当时最难做的是用紫铜管绕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另外，我有一个朋友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就这样一边学，一边制作零件（有的零件制作不了，就买），一边组装。用了半年时间，第一批收发报机装置做成了，这时是1929年春末。此后，我还认识大华公司的一位职员，我们两个在大华公司工厂里的人帮助下做零件，并对外做起买卖来了。从小路来的零件，做成发报机卖到轮船公司的船上，给工作带来不少方便。在此之前，我党还没有电台。1929年夏天，张沈川同志从国民党第六军用电台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了，我就装了套电台给他，先从抄收国际新闻和气象预报开始练习，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电台相互通报做练习。”

“1929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我去香港建立电台。为了在香港建电台，我先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我一人去的，目的是看地方，选房子，我把房子租好，并从广东派了会说当地话的卢彪同志夫妇住下做掩护，便回上海了。”

“年底我们第二次去香港……我们到香港后，把密码交给了王梦兰同志，是王梦兰同志自己译报，还是由她再交给别人译，我们就不大清楚了。我们把电台安装好以后，按照预先约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先收听上海党中央的声音。对方都听到对方的声音以后，就开始通报了。正式通报的时间，大约是1930年1月，香港台是黄尚英同志，上海台是张沈川同志。”

“大约是1930年10月，香港电台遭到破坏。当时在上海电台当报务员的，是张沈川同志培训出来的曾三同志。香港电台被当局破坏后，电台及联络办法他们全部掌握，第一天英国人还给我们通了报，第二天他们发了一份报我们，是用英文发来的，内容是‘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英文‘监狱’（Jail）这个词，曾三同志不认识，就拿来问我，我一看大吃一惊，说：‘不好了，他们在监狱里了。’我们知道对方遭到破坏后，就暂时停止了联络。”

“1931年春天，为了沟通上海和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络，我们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同志从上海去中央苏区，他们用脑子记熟双方联络的办法，是取道香港到苏区的。他们到苏区以后，一直与上海党中央联系不上，主要原因是电台功率太小。后来，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队公秉蕃师的一部100瓦电台。有了这部

电台以后，便在 1931 年与上海党中央联系上了，从此，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沟通了。”

张沈川同志在回忆中说：“在上海，1928 年，党组织决定调上海东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李强（原名曾培鸿）改学无线电机务。由于李强的英文、数理化的基础好，他接受新的任务后，即积极攻读《无线电基础原理》、《无线电业余手册》等英文书籍，边学习、边实践，自己动手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零件。同时，还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利用社会关系，向美国 RCA 公司买进收发报机的灯泡等。”

“1928 年 10 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到三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说是中央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去后，周恩来同志很详细地问了我的情况，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哪些政治活动，什么时候入的党，由谁介绍的。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周恩来同志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说，从明天起，你就归他领导（指坐在一旁的顾顺章）。第二天顾顺章即派李强找到了我。以后，李强就经常帮助我学习，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他带给我的。”

“1928 年冬，我用张燕铭的化名考进了‘上海无线电学校’。该校设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内。门口还有士兵站岗。开学时，发现台长兼校长是刘鹤年。刘鹤年原在青岛测候所任报务员，1925 年在青岛和我一起参加‘青沪惨案后援会’，支持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互相认识。我向他声称家中生活困难无法再上大学，来上海学无线电技术，好找个生活出路。而他们之所以要办无线电学校，是为了收学费，赚钱，供挥霍。”

“1929 年 5 月毕业后，得到刘鹤年的同意，住进电台学习。刘鹤年等看我能完成收发报任务，便要我常值夜班，他们好在外边吃喝玩乐。经过一段时间，摸到了他们的生活规律，深夜我一人值班时，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码，交给了党组织。”

“一次，我值夜班时，收到广西柳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是广西省政府负责人之一的李明瑞师长发给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要宋子文拨款 3 000 元给我代购图书（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姜丕承和我熟悉，因此托我）。我到中央银行找宋子文批拨时，宋子文详细问我和李明瑞的关系。我应付一阵后，宋子文批拨 3000 元。我取得现款后，交党中央宣传部，购置了较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运往广

西，为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柏等起义反蒋介石制造了革命舆论。”

“1929年7月初，国民党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张健等三人被分配到第六军用电台实习。他们是受过特务训练的，一来就注意到我这个‘实习生’。过两天，他们在收发报机上贴上纸条：‘谁昨天值班？收报有错误。’值班簿上清楚地记着是我代班。显然，这是在找我的麻烦。我立即对刘鹤年说：‘实习生多，练习的机会少了，我决定搬出去，找工作。’刘鹤年同意，我立即卷起行李，迅速离开了电台。不久，听说张健等在检查收发报的底稿中，查出一份李明瑞电宋子文拨款3000元给我买图书的报底，即向总司令密告刘鹤年‘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刘鹤年被撤职了。”

“1930年1月初，沪、港两台首次通报时，蒲秋潮和我欢喜得跳了起来，黄尚英和我也在电报上相互祝贺通报成功。通报的第一张报底，我留着做纪念。同年底我被捕后，遗失了。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的。曾三同志1931年2月由上海带往江西苏区去的密码就是最后一种。”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国民党反动政府同租界巡捕房勾结起来，将定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听说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我们的电台之所以有能够保存下来，主要是党的保密教育和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社会关系，一两年才通一次家信。我们的工作时间，都在左邻右舍入睡以后的深夜，电台功率只有50瓦，和另一台通报，声音很轻。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想试用100瓦发报机，但一按电键，电灯就闪动，隔壁的邻居就叫喊：‘今晚电灯怎么这样闪动啊？’只好停止试验。

“1930年4月，组织上派李强、王有才（报务员）和张华（女，‘住机关’）到汉口建立地下电台，因当地供应直流电，一时难以改装机器，未能建成。”

“1930年5月，为了安全起见，又将福康里电台迁移到静安寺路福德坊1弄30号，继续与香港通报。”

“这时，组织上派王子纲、喻杰生、刘光慧（女）、翁瑛到天津，在顺直（现今河北省）省委领导下，在墙子河畔建立电台。三中全会



后，顺直省委遭到敌人破坏，损失很大。上海党中央命王子纲、喻杰生、翁瑛等将电台撤回上海。后来，党组织派翁瑛到江西苏区工作。1934年秋，党派翁瑛携巨款到上海建立‘地下’电台。翁瑛一到上海就叛变投敌，不久即被我‘行动队’处决了。”

“1930年10月，组织上在慕尔鸣路（现茂名北路）租得房屋建立‘地下’电台。领导人为顾顺章，实际负责人为李强（兼机务员），报务员曾三，掩护人员吴克坚，后由毛齐华兼，继续与香港通报。不久撤销，机器安全转移。”

伍云甫同志在记述福德坊工作时的情况说：“屋里布置得大方得体，既不寒碜，也不浮华。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陈设着两张软椅和一个茶几，靠壁立着一张漆光闪闪的衣柜，屋角的电源，茶几下面放着一只电炉和一把熬咖啡的壶。可是一到深夜，这些布景就全变了，掀开软椅，撬开地板，那里是收发报用的一箱子蓄电池。打开衣柜，掀起那套烫得平平整整的西装，那里是自己制造的一套笨重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电炉放一边去了，发报机上的电源线插进屋角的电源插口里，一到深夜，稍加改装，它就为无线电通信联络服务了。”“我在电台上见习了很短的时间以后，就正式上机工作了。当我第一次收到来自远方的联络信号，并从手法上听出对方又是我的亲密战友——从训练班分别调到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等党组织电台上工作的同志，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 三、同根据地建立无线电通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到1930年夏，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建立了一、二、三军团，创建了遍及11个省的10多块根据地，其中较大的有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是在敌人包围之中生存的，互相不通信息，同时各根据地也急需党中央的指示，所以迫切要求建立无线电通信。

1929年3月30日，红四军给中央的信中反映通信及交通不便的问题：“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信文件两次：一次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月间在井冈山接到；一次是六次大会决议案，今年一月在永新接到的。”诺大的红四军，两年中只得到两次指示，而且每封信都相隔几个月才收到，可见交通之不便。

1929年12月4日，六安县委向中央报告，反映在麻埠作战时，因交通不便而导致战斗失败。通过报告中的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第五条 指挥部交通不灵敏，致使游击队失去联络，各路进退不能一致；

第六条 与红军没有取得密切联络。红军三十二师驻金寨一带，本来有约定同他们夹攻麻埠，但是，我们在发动时因交通隔绝，致友军没有同时来麻埠实行夹击……；

第八条 游击队与赤卫队没有联络，进退不能一致。”

1930年8月27日，长江局江钧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写道：“我们与红军的交通成问题，在目前许多信不能送到，无线电问题要设法解决！”9月3日长江局又向中央写报告反映这一困难。“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与各军交通问题，派了好几个人到五军、八军及一军均无法过去，而且做交通的人也少，将来形势越紧张则这问题越严重。无线电问题，要迅速设法解决。”到了10月6日，长江局又向中央报告攻打长沙未攻下而撤退的情况，也讲到通信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无线电问题的解决，各军不断地来要求，实际上现在交通办法在军事上是太不便利，贻误之事太多了。”

湖北一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1930年湘鄂西特委书记邓中夏同志，多次要求中央派电台。10月19日的信中写道：“无线电台成为我们火烧燃眉的热切要求，希望派人并购买机器送来。”

1931年3月16日，鄂东特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关于湘赣边与我们这里打通关系，组织了武装交通大队（枪70支）专门输送文件……不过都是武装交通，一两个月才能来往一次。”“在目前环境严重时期，我们交通外出非常困难。”“16军及湘赣两方需要中央指导万分迫切，他们四面被包围，比我们还困难，对外消息找不着，工作上发生许多困难。”

1931年4月，滕代远给鄂东南特委写信，要求建立无线通信：“去年要李溪石同志赴中央办无线电，不论如何，你们须速设法去中央找无线电人才来，边区还有数台无线电，无人会用，若能赶紧建立起来，我们今后工作与消息那就灵便多了。”

1931年8月20日，鄂豫皖苏区红四军军长徐向前同志、政委曾中生同志给中央军委并转中央报告中写道：“干部人才要求很大的补充，我们具体的意见是要军事的政治的最高级指挥员各在4~10人……我们认为这些请求都是中国革命发展来逼着我们的。我们要重复一句：中央不要忘记这一苏区的红军。”

1931年10月26日，湘赣苏区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无线

电机以及人才，此次请求你们必须兑现带代表来的承诺，以便打开湘赣省、湘鄂赣省到中央苏区的交通，这是与建立全苏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打通各省苏区有重大关系的问题，请你们帮助我们实现交通上的计划。”

从以上的引证：“火烧燃眉的迫切要求”、“万分迫切”、“要设法立即解决！”、“必须兑现”等恳切的言辞里，完全可以想象到建立无线电通信，沟通联系，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根据以上情况，党中央着手往苏区派遣电台人员。1931年1月底，党中央派报务员喻杰生带50瓦电台一部到洪湖根据地，建立湘鄂西根据地第一部电台，并与上海沟通联络，不久喻杰生同志病逝，党中央又先后派刘进、胡白天、李文采去工作，1932年二三月与上海恢复联络。

1931年3月，中央派曾三、伍云甫、涂作潮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他们经香港、汕头、闽西到达宁都青塘。这时第一次反“围剿”已取得胜利，缴获一部半电台，王净等同志等参加了红军，组织了无线电队，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当时缴获的电台功率只有15瓦，不能与上海沟通联络。第二次反“围剿”时，缴获公秉蕃二十八师的一部100瓦电台，经过长时间的调试、呼叫，终于在1931年9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与上海联络上了。

1931年10月，党中央派沈侃夫、徐以新、王子纲、蔡威4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他们到达安徽新集以后，使用红四方面军在贡县战役和商（城）潢（川）战役中缴获的两部电台。1932年年初，在新集城外小潢河南面的钟家畔，建立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台，以后与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沟通了联络。因电台功率小，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络，都由中央苏区代转。

邓颖超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们第一次与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任弼时同志译的，上海方面是我和周恩来同志译的，……第一份正式电报的内容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电报可以发出去，都很顺利，通报成功了。”

李质忠同志回忆中说：“1931年10月，苏区中央局向上海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是向党中央请示，苏区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等。中央答复同意，大会便于1931年11月7—20日在瑞金召开。”



#### 第四节 同共产国际建立无线电联络

1931年秋，党中央在上海建立国际台，由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程祖怡任报务员，负责同共产国际通报。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党中央率红军长征，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向中共传达七大精神，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派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张浩与报务员赵玉珍，带着电报密码一起由苏联回国。11月张浩化装成商人，赶着骆驼经外蒙（蒙古国）到陕北。李维汉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们11月7日到了瓦窑堡，因为这天是十月革命节，所以我印象很深”，“不久定边打来电报，说来了一个可疑的人，说张浩回来了，中央让他到瓦窑堡来的。”李维汉在《初到陕北》一文中还提到：“瓦窑堡会议前夕，张浩（林育英）于11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奉共产国际之命，装扮成商人，经蒙古国、内蒙古到达瓦窑堡。”

张浩回到陕北以后，立即把与共产国际联络问题提到日程。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无线电11分队，由赵玉珍任分队长，殷金荣任报务员，廖辉在电台学机务。以后又调邓光洪任机务员，于占鳌任报务员。使用在崂山战役中歼敌一一〇师缴获的50瓦收发报机。电台架在瓦窑堡韭沟台山顶上，能听到共产国际的呼叫，但回答不通。以后把天线升高，调整方向，终于和共产国际沟通联络上了。廖辉同志在回忆中说：“大约在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之间，沟通联络后，收到共产国际一份来报，电文五个小码为一组，我们立即把电报送到中央机要局去翻译。第二天，负责机要局的邓颖超同志要赵玉珍同志和我到她的住处去。我们去后，邓颖超同志详细地询问了和国际台联络的情况，她听了我们的汇报，非常高兴，留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并叮嘱我们要十分注意保密。”

1936年6月，刘长胜同志也从苏联回到瓦窑堡，他是1935年4月受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的派遣带密码回国的，以便恢复联系。他到后，党中央已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

1937年年初，在苏联学习的秦鸿枢回到上海，不久建立起上海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无线电联系。

毛齐华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1931年，党在上海设立了几处电

台，自从曾三同志调苏区以后，上海只留下两个电台。一个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苏区通报；另一个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程祖怡是我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同学，他1931年秋才回国，回国不久，就在国际台工作。这年冬天，组织上要他带着机器搬到我家来，继续与国际台通报。他除了通报外，还和我共同合作研究机器的改装。我住在楼下，是二房东身份。还有一个从苏区来的小青年住在楼上，作为培训对象，我教他学报务，后来此人去了鄂豫皖苏区。”

“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虹口区、杨树浦区的居民纷纷涌向白渡桥，南逃投亲避难。我们也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电台伪装成行李，同程祖怡一起到浙江南路住进旅馆。这时，在旅馆里管理电台和搞掩护工作的同志会集在一起了，有乐少华、王平、蔡和森同志的爱人李一纯和她的女儿阿珠，以及孙洁芳、夏明（邓中夏同志爱人）等。不久程祖怡带电台转移到沪西继续进行通报工作，其他人陆续到沪西、沪中区分散居住。乐少华同志调赣东北苏区工作后，我在新闻路温州路一家楼上租了一大间统厢房住下。这时，由于敌人对我革命根据地的严密封锁，根据地内迫切需要电池，我打算从上海买原料输送到各根据地自己制造。为制造干电池，我先买书学理论，又买原料试制，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基本上取得成功。”

“乐少华同志临走时，调给我一对夫妇，男的叫李志超（四川人），住在南京西路徐重道药房楼上，他是上海无线电学校毕业的，初步懂得一些无线电知识。他的爱人叫朱霞君（江西人），在‘大世界’对面的伯庸医院当护士。另外还有一位同住的女同志，后来调程祖怡电台去担任掩护工作。我常去李志超家帮助他学习实际知识，如制造零件，装配机器，掌握各种零件的性能等。他帮助我采购电讯器材，以减少我的外出。以后李家搬了几个地方，最后于1933年迁到华德路（现长阳路）。”

“时隔不久，程祖怡碰到‘剥猪罗’，是过去在莫斯科‘中大’的同学，一路上和他纠缠，把他身上穿的长袍、短褂、手表等全剥走了。但程祖怡还警惕着，过了一个多月，那个‘同学’带着三个同伙，突然冲到程祖怡住址敲竹杠，提出向组织要500元大洋。程祖怡就同他们周旋。一边让‘女佣人’出去借钱，另一方面自己到厨房为他们做饭。乘叛徒们在客堂里兴高采烈地打麻将之际，程祖怡登楼越墙而去。这几个家伙听着室内毫无动静，惊慌起来，害怕我组织派‘打狗队’去收拾他们，就将楼上楼下除木器家具和收发

报机外的所有衣箱、床单、厨房用具等抢劫一空，逃之夭夭。我情报人员经夜间侦察后，雇了一辆出租汽车，破门而入，将收发报机运出，另找新址设台。”

“从此，组织上再不让程祖怡出外租房，由我出面在大沽路437弄20号找到一所房子。此房地点适中，质量较好，而且只有两幢房子互相连接，环境很适合我们的工作，程祖怡一家三口，也搬来与我家同住。我当二房东，程祖怡当三房客，他住在楼上发报，电报密码是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爱人沈谷兰前来联系时送来的。在这里，我们安全地过了春节。”

“为了避免电台暴露，我们都使用了室内天线，随用随挂，用完卸下。但是在发报时，电键一按，隔壁居民家的电灯泡，不论白天和深夜都会闪闪发红光，若被邻居发现，必将引起麻烦。因而我每设一台，必须先一边按电键调整波长，一边设法偷看邻居家的电灯泡是否闪红光，调整到不发红光为止。所以，选择安置电台的房子，在当时是一件极大的难事。大沽路这栋房子，通过以上办法达到了这样的条件。可是，在这里只住了一个月，沈谷兰同志就紧张地来通知我说：‘这栋房打保单的地方出了问题，为了安全起见，应立即搬家。’”

“我又在老闸桥堍下找到一间破房，当了三房客。因为急待通报，我就冒雨到处奔走，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终于在高朗桥广场找到了新房子，我就改用姓周的名义租下这栋新房，当我整修好搬进去不久，程祖怡一家三口带着电台又到我这里开始工作了。”

“到了10月，不幸的消息传来，刘仲华告诉我：‘两个电台相继遭到破坏，要我抓紧时间重建电台。’原来当我搬出电台不久，程祖怡也搬了新居，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先供出高朗桥电台旧址，敌人去搜查，见只有少数家具，看上去不像住人的，继续逼供，他又供出家属地址和电台设备。第二天带着敌人到新址，这时巧遇送报的女交通员正在和程祖怡的妻子商量事，敌人进来连人带电台机器一并带走。后来又听说，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被捕叛变，也供出程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情况。这样，活动近四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

“时隔不到两个月，领导从北方阎锡山和西北军队中调来两位党内的报务员，一个陕西人（我们叫他‘老陕’），一个河南人（名字忘了）。他们来沪时，我去接头，两个都是青年人。这时，浦化人同志（英语翻译）也准备调给我当电台二房东。同时，刘仲华

又将张瑞华同志（聂荣臻同志的爱人）和她的女儿聂丽（当时4岁）调来。第三天的早晨，我去和浦化人碰头时，浦在路上急急忙忙地来回找我，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说，约我们碰头的那位女交通员昨晚被捕了，而且涉及我们所租房子的铺保，为了安全起见，要我们即刻搬家。我急忙安排老陕和张瑞华母女搬走。这就是在1935年2月上海机关遭到的又一次破坏。接着刘仲华告诉我，浦化人另有任务不调来了。”

“吃一堑，长一智。租房铺保自己设法解决，这是我早已想过的问题，现在非解决不可了。平时我已注意开什么铺子为好，这次我使用了几天时间，到木器家具铺较多的地方去观察，找油漆工人聊天。最后在北江路托两家木器铺的工人，帮助我找油漆工。并在他们对面北江路406号开了个木器铺子。我又从乡下找来了一位可靠的亲戚当学徒，叫老郭当我的合伙老板，共3人，管理店务。开张不到一个月，生意兴隆，除开支外，略有盈余。”

“这时，我带着报务员（河南老乡）在康定路一个里弄（现康定路563弄21号）里找到一栋独立的房子，租定后，叫原计划在爆破训练班做掩护的老太太（福建人）和一个小女儿住进去。继而张瑞华把女儿聂丽交给我老伴潘林珍同志抚养，住进了电台前楼，由报务员教张瑞华学报务技术。我就在后楼装配收发报机，日以继夜地干了一星期，终于装成一套收发报机，经试验性能良好。电报呼号，由刘仲华转送领导，后一直没有联系上。后来当我到达瓦窑堡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时，我问他是否接到电报局呼号？他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上这些。’”

“到了1935年7月，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我们所处的环境更恶劣了。这时我出门就更少了，梁广同志仍在熟悉马路，有一天忽然碰见曾三同志。梁广告诉我：‘江西苏维埃主席曾三同志来上海找党组织很久了，生活很困难。’我立即将此情况转告组织，后由组织决定送曾三同志去苏联。据后来曾三同志告诉我：‘他离开上海去苏联时，在船上遇见陈云同志，一起到达苏联。’”

“我们一直坚持到1935年9月（中秋节），组织上决定我们撤走，要我将两个电台的设备和木器店全部交给梁广同志。张瑞华带着孩子（聂丽）撤走不方便，决定将她的孩子交给我的老伴潘林珍同志，我要老伴和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我自己的）回到上海市郊嘉定县老家暂住。并告诉她以后组织即派人来接（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曾派

人去上海看望过她们)。当时,我们撤走的路线有两条:一是去苏联,二是去陕北苏区。因情况紧急,先撤到天津再说。”

## 第五节 我党最早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

在李强、张沈川同志制造了电台,学会了收发报技术以后,党中央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无线电工作人员。

### 一、第一批培训的通信技术人员

我党自己培养的第一批通信人员,是在上海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的。1930年3月,党中央首先从各地苏区抽调一些学员,到上海后,分散居住在租用的小亭子间内,由张沈川同志上门教学。这些学员到上海后,以各种身份进行掩护,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学员的水平不同、经历不同、进度也不同,但是他们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刻苦学习,于1930年上半年相继结业,走上工作岗位。

这一批学员有:康和生(曾三)、吴晋生(伍云甫)、黄尚英、王有才、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喻杰生等同志。后来,1930年4月到年底,王子纲等同志又采用这种方法培养了徐萍、周德元、朱帮英、蔡威、杨兰史、刘进、胡白天、罗贵昆、王逸群、翁瑛等。

张沈川同志在回忆中说:“组织上从各地方抽调了近十名青年学习收发报,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做准备,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and 李强。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上海,怎样培养党的报务员,我们没有经验。那时,上海常见这样的情况,有的失学青年,请了家庭教师上门教课。我们就以这种形式做掩护,分散居住,单线联系,一个一个地上门去教。第一个参加学习的是黄尚英,当时他只有十八九岁。1929年下半年分别学习的有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

伍云甫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年3月间,长江局要调我到上海党中央创办一个秘密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过去我一直做武装工作,现在突然要改做一项新工作,而且又是从头学起,心里免不了有些踌躇。党的领导同志对我说:‘一个革命者要像江南柳那样,党需要他在哪里,他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党给予的这个任务,



从汉口搭乘招商局的轮船，沿江东下，在船上一位水手的照料下，顺利地到达上海，住进三马路亚洲旅馆。后来与李强同志接上联系，由他安排我住进一个亭子间内。训练班其实只有几个学员，分散住在几家亭子间内，教员只有张沈川同志一人，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到我亭子间来一次，教我收报和发报。那时教学设备只有一只电键，一个蜂鸣器，两支铅笔和几个拍纸簿。有时由我敲打电键，他在旁边纠正姿势；有时他发报，我听着蜂鸣器发出的‘嘀嗒’声音抄报。我学无线电，对房东一家是公开的，房东夫妇知道，他的房客吴竞生，一边学商业上用的报务技术，一边着手找职业。以后因为张沈川引起了房东的怀疑，改由比他早学几个月的王子纲同志来辅导。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后来曾三同志要和我一起学习，我就不得不搬家了……搬家以后，学习环境比较安全了。教员见我比曾三同志早学了些时候，就由我辅导他，我也正好需要他在发报时练习抄报，因此彼此技术都提高得很快。我们弄了简单的振荡器，只有戴上耳机才能听到发报的声音。这样房门一关就不必再担心外面知道我们干什么了。该是在收发报机上进行练习的时候了，但哪有条件这样做呢？即使给我们一套机器，放在亭子间，和我们的身份也不相称。我们只好装一部矿石收音机，抄收船舶和海岸电台的新闻电报作为收报实习。上海的夏天相当炎热，亭子间被太阳一晒，更热得像蒸笼似的，打着赤膊练习，浑身也都湿淋淋的。曾三同志本来比我更怕热，可是一戴上耳机好像什么都忘了，汗水常常把拍纸簿都浸湿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抄收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电码。”“我们在亭子间内的学习告一段落了，党叫我搬到福德巷我‘哥哥’那里去住。我知道这是调我到电台工作了。”

曾三同志回忆说：“我原来在汉口，没有职业，1930年4月，汉口的党组织派我到上海学无线电，我非常高兴。组织上因为经济困难只给我15元钱路费。当时我在一个小旅馆里已经住了很久，欠了十几元的房钱和饭钱，这15元钱就是全部交了也不够，只好把蚊帐拿去当了二元八角钱，又在两个穷同乡处挤出了10元钱，与旅馆结账后，剩下的钱还不够买船票。由于水手的帮助，用了‘看黄鱼’的办法，我才坐上了到上海的轮船离开了武昌。到上海时我只有一角多钱了，下船后人生地不熟，一家饭店接客的过来提我的行李，要我去他那里住下。到了饭店一看，每天房钱竟高达2元9角7分，我怎能住得起！只好拿出一件夹袍子当了4元钱，第二天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了。又过了10天，李强（化名张振声）找到我，给了我5元钱，让

我安心住着休息，等他派人来接我。后来是王子纲把我接到静安寺路西摩路的一处小阁楼中，同伍云甫住在一起。因为这间阁楼住两个人实在太挤，又搬到赫德路一个稍大的亭子间住下，从此我就安下心来开始学习。”

“教我们的老师是张沈川（化名沈哲）。因为伍云甫比我先来，他也能帮助我。我们的学习用具只有一个电键、一个蜂鸣器和一块干电池，再加上几张纸和两支铅笔。我们俩轮流着一个人发，一个收，‘嘀嘀嗒’、‘嗒嗒嘀’，天天都是这样训练，真是够单调的。两个月以后，买来了两副耳机和一个矿石收音机。可以收听到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资料，才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兴趣。学习了4个月以后，我们的抄收能力已达到每分钟110~120字，这时就可以上机工作了。”

“在学习期间，二房东听到我们整天在家里‘嘀嘀嗒’、‘嗒嗒嘀’忙个不停，感到有些奇怪或不放心。有一次他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因为没有找到事情做，想学无线电这门技术，以后也好找个职业。他又问我们在哪个学校学习，我们说没上学校，只是请一个朋友教我们，每月给他一些车钱。当时上海这类情况很多，所以二房东就相信了。学习期间，组织上给我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除了吃饭剩下不多，还能订一份报纸，买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就挤伙食费，长期每天都买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副食。如果买两角钱肉，就一定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到我们也能吃到肉。我还记得端午节那天，正好没有米了，八九点钟还未举火。二房东来到我们屋里，问我们：‘吴先生，今天过节，你们吃什么呀？’这一问把我们问愣了。伍云甫很机灵，即很随便地回答说：‘今天我们不做饭，有个朋友约我们到他家里过节。’我在一旁听了觉得好笑，又补了一句：‘到时候了，咱们该去了吧！’就这样把二房东催走。我们出门在马路上转了一圈，中午回家时，送钱的同志还没来，只好找了一件衣服当了一元钱，跑到远一点的小面馆里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和一个烧饼。剩下的钱买了一些米面回家做晚饭。那时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想到我们是为革命学技术，就觉得这种生活非常有意义，也不觉得苦了。”

“学习期间，我们一般不外出，也很少和别人通信，为了保密，对外写信总要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里找不到收信人，

就把信插在厅门的信袋里，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我们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来往的信件，就不注意了。”“当时我们参加学习的有好几个，除王子纲、伍云甫外，其他同志我都没有见过面，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在上海，党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了绝对保守地下通信的秘密，电台的同志终年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

沈侃夫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30年4—5月，党中央了解到我在浙江工业专科学校学过电气专业，就通过江南省委把我从上海市法南区委调到中央特科学无线电。陈寿昌同志找我谈的话，他直接领导我们。到特科工作后，我们自己租房子住，陈寿昌还介绍了两个青年（从湘鄂西根据地派来的），同我们住在一起，学习、生活都由我负责。我们在沪东华德路一带租了一个小阁楼住了下来。由陈寿昌介绍翁瑛给我们讲无线电技术。主要讲两本书：一本是电器工程的普通课本；另一本是袖珍英语无线电课本。他从电器的一般常识讲起，讲无线电的原理和电子管、变压器、电阻等原件的作用；然后讲收音机、发报机的装配、线路与应用。讲完课以后，就让我们学着安装收音机，先装了3个电子管的，后装4个电子管的、5个电子管的。那时年纪轻，手也巧，眼睛也亮，学得也快。另外还派伍云甫、王子纲两位同志教我们学报务，练习收发电报。后来，我们发现住房的老板是个流氓，排场很大，来往人员很复杂，就开始有所戒备。有时他看到我们装收音机也问一问，我们就说：‘装个收音机听无线电。’不久又搬了个地方，继续学习无线电报务，同时还学装15瓦功率的电台。我们对付房主流氓的办法，主要采取：一是保密，一切活动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二是房内不放任何材料，经常领房东小孩到房子里玩；三是外出时把钥匙交给老板娘。过一段时间，我又和徐以新住在一起，我们买了一架煤油炉子，自己做饭吃。这时与我们联系的是吴永康同志，他在四川北路开了一个电器行，公开身份是电器行老板。我们需要什么电器设备都找他，由他供给。（吴永康后来派到川陕省委工作，在西路石窝战斗中牺牲了）。这以后，我们又搬到沪西康脑坨路同小沙沟路交界的地方，租两间房，住3个人。一个是湘鄂赣来的姓王，另一个记不清。一天，陈寿昌突然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说：‘小宋啊，外面很紧张，你们不要随便出去，可在旅馆包饭送到家里吃。’他又说：‘这些钱给你们用，今后可能有相当长的时间不会有人来找你们。’我追问：‘发生了什么事？’

陈寿昌告诉我们：‘顾顺章叛变了，他是我们特科的主要负责人，对上海党中央的情况很熟悉，你们住的地方他不知道，但也要提高警惕。’还说：‘翁瑛不来了，你们自己学，自己练习，自己安排生活，留下的钞票，除房费、水电费外，每人每月还有 15 ~ 20 元的生活费。’”“后来，我同陈寿昌、王子纲同志恢复了联系。我们学报务，也学机务，我还教蔡威和杨兰史同志。不长时间，陈寿昌不管我们了，组织上又派乐少华（机械工人出身）与我们联系。乐少华对无线电是外行，主要管思想政治和行政生活。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又搬到沪东华德路那个流氓家的亭子间，我一个人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徐以新又来同我住在一起，我们经常深夜试发电报。”

## 二、我党举办最早的集中学习的无线电训练班

经过分散培训通信人员以后，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1930 年上半年，党中央决定在上海为各省及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党中央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顾顺章、李强、张沈川，由李强、张沈川同志负责组织实施。根据过去的经验，李强、张沈川建议仍然采取分散教学的方法比较安全，或者开设两处电器商店做掩护。但是顾顺章没有接受这一正确的建议，主张集中办学，于是以工厂做掩护，集中办起训练班。

训练班地址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盛里 10 号一座三层楼内，门外挂着“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的招牌。三层楼的一层作为车间，二、三层作为教室及寝室。总负责人为顾顺章，实际负责人为李强。这时，在莫斯科由第三国际为我党培训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及在列宁格勒学习的同志已相继回国，他们也调到训练班工作。方仲如住在厂内，负责学生的思想、生活及行政管理，吴克坚、涂作潮负责教学组织及实习工作，教员有张沈川、方仲如、毛齐华、陈宝礼、李元杰等，李强有时也上课，学员有 16 人。广东省委派来的麦建平、陈垣、温明、吴适芬、何世夫、李景美、冯一平、杨枝水 8 人；江苏省委派来苏刚达、石光、李国玺、张庆福、朱晨光 5 人；湖南省委派来高杭松、谢小康 2 人；福建省委派来王西雄 1 人；此外，曾三、伍云甫、曾华伦、宋濂等同志，一边工作一边在学习班学习无线电理论及机务方面的知识。

1930 年 10 月中旬，训练班正式开学，教学阵容比较强，他们又有实践经验。学员都是有文化的青年党员，政治坚定，学习积极。

训练班虽然大门上挂着工厂的牌子，但是既不进原料，也不出产品，出入的人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有的像工人，有的像学生，于是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些特务先后闯进训练班捣乱，训练班的同志建议立即分散，但顾顺章不同意，结果造成重大损失。

1930年12月17日上午，大家正上课时，突然有四五名侦探闯进工厂，经过搜查，带走了收发报机及器材，然后将训练班的同志推上囚车，押往法租界捕房，这就是“福利公司事件”。有20人被捕，教工人员有：张沈川、方仲如（方廷桢）、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曾华伦5人。学员有陈垣、石光、苏刚达、麦建平、谢小康、张庆福、李国玺、温明、王西维、吴适芬、高杭松、何世夫、李景美、朱光晨、冯一平15人。学员杨枝水因外出看病，教员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吴克坚等同志，有的在外居住，有的因事不在现场，得以幸免。我党刚刚创建的训练班被敌人破坏。

1930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这一案件的新闻。

“巨籁达路破获反动机关，抄出无线电，获男女二十余人。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盛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图谋不轨，请速飭员往捕等情。据袁局长报，立即飭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缉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三楼层内搜出无线电听筒及电线等，当场获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讯办。”

这些同志被捕后，在狱中表现英勇，虽经敌人严刑拷打，无一人暴露身份。他们被转送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和东江门外中央军人监狱。1931年4月，敌人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对17人判处有期徒刑9年10个月，对3人判6年6个月，直至1936年8月，经组织营救才获出狱，但已有4位同志在敌人折磨下死在狱中，其他同志出狱后，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福利公司事件之后，中央派陈寿昌同志负责电台工作，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毛齐华等同志，除在电台工作以外，又以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办法，培训了一些技术人员。不久，许多同志派往苏区。王子纲、蔡威、徐以新、沈侃夫到了鄂豫皖苏区，曾三、涂作潮、杨兰史、伍云甫、翁瑛、朱帮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王逸群、石痕（安若恒）、罗若遐等同志先后到了中央苏区。李强、吴克坚同志先后去苏联，毛齐华等同志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

张沈川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30年6月，党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培训20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要我拟个计划。我当时考虑到法租界住户中，中外资本家、官僚地主多，难以应付，而公共租界商店多，居民多，易于隐蔽，因此建议在公共租界内开电料行，出售电线、灯泡、开关等电器用具，经营装修水电、修理收音机等业务，并向商业局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取得合法身份。参加训练班的同志，隐蔽在电料行内，白天当工人、学徒，晚上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个计划没有被批准……最后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盛里10号租了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大门口挂历着‘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的招牌，作为无线电训练班的秘密机关。”

“训练班的学员有16人，是上海、广东、湖南等省市委选派来的。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是李强，他兼管教机务，吴克坚管组织和财务，我管教机务。我们都住在厂外。当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回国的方仲如、毛齐华、陈宝礼、李元杰等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工作。方仲如教电学，住在厂内，学员们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以及轮流买菜烧饭等，都由他负责管理。”

“训练班开办不久，一天下午，一个穿工人服装的人进厂，自称是自来水公司检修水管的，每层楼他都看过。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又有4个‘白相人’闯进工厂里，送一张观音菩萨像，说是开了新工厂，特来贺喜，讨酒钱。他们东张西望，满口流氓帮话。李强接待后，给了4块大洋，他们才离开。我们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些可疑现象，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免生意外。听说第二天顾顺章到厂里，看了以后说不要紧，要大家安心学习。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学员带进厂内来的进步报刊和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等搜集起来，藏在古拔路（今富民路）我住的地方。”

“1930年12月17日，李强、吴克坚、毛齐华、伍云甫、曾三、宋濂等先在一楼开会，涂作潮在干油漆活，我正在二楼教报务，未参加会议。散会后，他们都离开工厂，厂里只有方仲如、陈宝礼、曾华伦、李元杰和我及15个学员（学员杨枝水当时去医院看病未回）。这时六七个侦探（其中一个外国人）忽然推门进来，掏出手枪，不许我们行动。全厂被仔细搜查后，把我们20人押到法租界巡捕房，旋即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虽然敌人没有拿到任何证据，我们也都未承认是共产党，但不久我们还是被押到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1931年1月中旬，

伪军事法庭严刑拷问一次，仍未得到口供，2月转押到东江门外中央军人监狱。4月，伪军事法庭强称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规定，判处我们17人有期徒刑9年10个月，另外3人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均不发判决书。后来我们20人中，有4人病死在狱中。”

方仲如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30年9月底10月初从苏联回到上海，我们分别住在几间亭子间里，分散到各点去教课。以后10月份，党中央在上海开办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有人说这是第二期，前边张沈川还办过一期。其实张沈川是一个一个去教的，并没有办训练班集中学习。参加学习的有曾三、伍云甫同志，后来他们都被派到苏区红军中去工作了。张沈川是周恩来同志叫他到上海国民党无线电学校去学习的，学会了以后，再来教我们自己人。所以，在上海集中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只有一期，以后再没有办过第二期。训练班的地点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现叫巨鹿路）四盛里一幢三层楼房里。”

“这一期训练班有16名学员和我一名干部住在那里，李强、张沈川、李元杰、陈宝礼等同志都住在外边。学习内容是无线电机务和无线电报务。对外名义上叫‘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刚开学大约两个星期，李强同志正在给学员讲无线电机务知识。突然，有几个特务闯进门来，鬼头鬼脑地到处乱看。这时，外边有几个同志正在打扫卫生，看他们进来，赶快跑去报告了李强同志。李强同志很机警，马上停止讲课，走到外屋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准备盖庙来‘化缘’的！’那两个家伙回答。李强同志乘机说：‘人家是‘化缘’的。大家出几个钱吧！’就这样把两个特务打发走了。”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我们发出了警告。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就让每个人事先编了一套假口供，如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是谁介绍到工厂里来的……如果一旦出了问题，就准备用这些去应付敌人。同时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定要坚持口供；关于无线电训练班的情况，不准告诉任何人；党的文件书籍一律不准个人保存等。”

“1930年12月17日，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和15名学员被敌人逮捕（有一名学员因请假外出看病未回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张沈川（沈哲生）、李元杰、陈宝礼等几个教员，共20人。”

“被捕之后大家表现都很好，坚持了假口供，所以敌人没有弄清我们的底细。”

“1931年4月29日下午，敌人到狱中对我们进行宣判，判得比较轻，都判为二等有期徒刑。3个人判处6年半，17个人判处9年零10个月。判刑后，由于敌人对陈宝礼用刑太多，被折磨致死，相继病逝的还有三位同志。”

“1936年8月，我和张沈川同志一同出狱。”

毛齐华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年初冬，我和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回国，如约在上海碰头之后，住在组织规定的三马路一家旅馆里，等待组织上派人来接头。第一个来的是顾顺章，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建无线电台，很需要你们学到的无线电技术，以便开展党内的通信工作。’临走时我顺便问他：‘你可知道有个叫曾培鸿的？1927年曾在武汉搞过情报工作。现在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你们的领导，工程师，明天来同你们见面。’”

“第二天，李强同志来了。见面后我们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后，他首先要我们安排好住处。于是我按照要求租了个小亭子间，并把我妻子潘林珍同志从乡下接过来，在上海安了家。以后，李强同志经常到我家来聊天，谈工作，谈我们分别以后的情况。过了两个星期左右，他叫我把家搬进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今茂名北路111弄17号）。这里是新建的党的地下电台所在地。房子的二房东是吴克坚同志，住在楼下，我们称他‘账房先生’。曾三（老康同志）是报务员，住在小亭子间。我家是三房客，住在楼上。收发报机放在我的衣橱里，每夜在我的房间里工作。吴克坚同志去苏联后，我家从楼上搬下来顶替吴克坚当二房东。”

“‘家’基本安顿好以后，我们按照李强同志的通知经常到巨籁达路四盛里10号（今巨鹿路391弄12号）去碰头，研究工作。这里是党中央特科办的一个秘密无线电学校（也称“训练班”），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三楼是学员宿舍，二楼是宿舍兼教室，楼下客堂放着一张写字台、几个凳子及一些电器材料，还有一些工具和一台进口小发电机。门上挂了一块牌子——‘福利电器公司工厂’。”我们一般称它为‘福利公司’。”

“过去由张沈川同志负责的无线电训练班是两三个人一班，分散在市内好几个地方，采取单线联系、‘家庭补习’的方式进行教学。现在是集中起来教学，共有16个学员，仍以张沈川同志为主，给学员们讲



报务课。教职员工都是些曾参加过上海三次起义、香港罢工、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经过党的多年教育和革命斗争考验的党员、团员。‘福利公司’的招牌上写着‘工厂’，但进进出出的人员中，有的穿长袍，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学生装，有的穿工人装，毛衣短套形形色色，而且大都是些青壮年。对外又没有业务关系，也没有具体的产品，因此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有一次，李强同志来到电台，向我传达昨天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说你们对无线电机摸得很熟，但对政治思想工作注意得不够，今后要特别重视才对。”

“在四盛里，我们同看管弄堂的人相处较好，进出见面总打招呼。一天上班时，他告诉我说：‘弄堂里有个教师，说是共产党，昨夜被巡捕房抓去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被捕的是吴亮平同志，现在中央党校）。我们应付说：‘今后你也留点意。’从此后，他每晚刚过10点钟便把弄堂门关上。为了使晚上出弄堂门的人方便，他在门口搭了一间小木房子。他要装电灯，我们就免费给他提供一些材料，并由沈侃夫同志替他装好。因此，他对我们很感激。同他搞好关系，我们晚上进出很方便。”

“不久，这个‘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发生了两起怪事。一天，有个穿着一身蓝布工人服装的人突然冲上楼来，自称是查电表的，但很快又转身走了。对这件事我们当时没有警觉。几天后，在李强同志主持下，我们在楼下讨论整个训练班的教学计划时，突然有4个流氓模样的人闯进门来，先是东张西望，接着拿出一张印有观音菩萨像的纸来，满口帮话，叫道：‘老板，你们在这里办工厂，特来贺喜，请给点酒钱’。李强同志懂得一点上海白相人的行话，就和他们接谈。他们产生了错觉，说：‘噢！原来都是自己人，那么你们在这里办工厂为什么不向老头子打招呼？’李当场拿出4块银元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本是出事的预兆，但当时只当做通常的流氓敲竹杠，没有引起重视。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把这么多人长时间地集中起来办训练班，是秘密工作所不允许的。我们曾向顾顺章谈过，他却说：‘我在法租界里做情报工作，巡捕房里都有眼线，发现问题很快就知道，如果敌人发现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转移’。他持这种态度，我们也无可奈何！”

“又过了几天，12月17日上午，李强、方廷楨、沈侃夫、李元杰、曾三、宋濂和我几个人在楼下讨论制作变压器问题，张沈川同志在楼上

教报务课，未参加我们的讨论。等方案确定下来已经 11 点多钟，吃饭时间到了。我家离工厂不远，我妻子烧的江南饭菜很合李强口味，以前他经常在我家吃饭。这天他照常和曾三、宋濂到我家吃午饭。饭后，我和李强、曾三闲聊。宋濂要给香港写信，因为手头没有信纸要到四盛里去取。不久，宋濂慌慌张张地回来说：“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后门警号变了。”这时，那个看管弄堂的人在外面等着，见我们的人就说：“不要进去了，刚才，你们工厂的 20 个人全部被巡捕房抓去了。”当时李强同志马上赶到四马路振华旅馆找吴克坚同志，吴克坚还在等候中央来送钱的同志，李强将“福利公司”被敌人破坏之事通知了吴克坚。当时涂作潮同志也险些被捕，他穿了件工作服去买油漆，当他提着油漆桶到训练班敲门时，已经有法国巡捕守候在那里，巡捕开门一看，见他像个油漆工人，就把他赶走了。”

“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由李强同志到张沈川同志住处，将党内文件全部处理，同时转移住地。由我到方廷桢、李元杰的住处，将他们的东西全部搬出。再一个是设法把四盛里训练班的重要设备运出，行动前，特科派人先去侦察，发现守卫在那里的巡捕已撤走，门上贴了封条。又过了几天，就组织了一些人，租了一辆汽车开到弄堂口，进去把封条揭下，把里面的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他物资装上车运走，然后再把封条原样贴好，并给了看弄堂的那位老人 5 块银元，以感谢他的帮助。”

“敌人为什么对我们的活动了解得那么准确？是个疑团。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天，组织上在福建路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开会，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搞无线电工作没有被捕的同志几乎全都到会了。顾顺章讲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没有从主观上检查，反而说是训练班里一个姓杨的告密。因为当时训练班共有 21 人，其他人都被捕了，唯独他没有。此人平时生活散漫，昨夜开小组会还批评过他，在会上大家还信以为真。但是，这个说法后来被被捕的同志否定了。因为，第一，姓杨的那天出去看病不在工厂；第二，如果他告密，就当然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但在敌人审讯时，从未拿出任何证据来说明被捕的人是共产党员。”

涂作潮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30 年秋，党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培训 20 多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地点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盛里 10 号一栋三层楼房里，大门口挂着“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这是在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第一所地下无线电学

校。”“一个星期天上午，突然来了六七个巡捕，把张沈川、毛齐华、方仲如、陈坦等 20 多名教学员全部抓去。出事的当天，中午饭后，我手提一桶油漆，头戴童子帽，身穿一件很脏的棉袍，按照李强同志的吩咐，到‘公司’去油漆砂钢片。一敲工厂后门，屋子里半天没有回音，顿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在我脑海中闪现，但是要跑又不好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神色，如果被埋伏在四周的暗探发现，那就要糟糕。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半天出来一个外国巡捕，他先对我叽哩哇啦说了一通外国语，我听不懂，也不敢走，这个外国人拿出一本工作证样的东西给我看，意思是这里已不是原来的‘工厂’了。但是我仍装着要进去，并且口里说着半不通的英语‘打拉士’，表示是来要账的。这个外国人看我是在这里纠缠，便狠踢了我一脚，把我推到门外，气冲冲地关上了门，进去了。这时我立即乘机离开这里，看了一会卖膏药耍把戏的，确信后面没有盯梢的，便接连换乘了二次电车，来到了西摩路‘国际电台’。在这里，我见李强同志正躺在床上发愁，我把‘公司’被破坏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知道了。”

## 第六节 地下党坚持继续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自福利公司事件以后，有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有的到苏区去，有的在上海坚持继续培养人才。伍云甫、王子纲分几个地方，又培训了沈侃夫、徐萍、周德元、朱帮英、蔡威、杨兰史、刘进、胡白天、王逸群等。

1931 年春，陈寿昌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让毛齐华同志继续培养报务员和发电机维修人员。关于报务员的培训，仍用分散居住、登门教课的办法进行。这一时期内又训练了报务员 5 名，分别在两处进行。一批在虹口，2 人；一批在同孚路，3 人。

关于发电机维修人员的培训工作，不能采取分散教学的办法，必须有一定的场地和器材，就在虹口地区我找到一家修理发电机的小工厂。这个工厂有破旧的发电机十多部，有一间店门，一个老板带几个徒弟做修理生意。经过与老板商议达成协议，由我党付给一部分费用，由他代培修理人员。先后办了 2 期，每期 2 个月，每期 2~3 人。这些同志学会修理技术后，均派往苏区。

1931 年 1 月，党中央派喻杰生到洪湖根据地，不久病故，又派刘进、胡白天到洪湖苏区。

1931年，派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到中央苏区。5~9月，又派翁瑛、杨兰史、朱帮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王逸群到中央苏区。1933年3月，又派罗若遐（岳夏）、安若恒（石痕）到中央苏区。

1931年10月，党中央派沈侃夫、徐以新、王子纲、蔡威到鄂豫皖根据地。

这些同志到达苏区后，对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伍云甫同志在回忆中说：“1931年春，我与曾三和一个机务员奉命到一个指定点去接受一位负责同志的指示……不多一会我们到了指定地点，接见我们的原来就是我们熟悉的聂荣臻同志……最后他说：‘为了保证今后党中央与江西中央苏区能及时联系，党中央决定立即派无线电技术人员到江西苏区去。建立无线电联络’。”“我们化装成华侨商人搭乘一艘法国邮船抵到香港，从香港又改乘日本轮船到汕头，而后沿韩江北上。那天傍晚，远远看到一只小船向我们搭乘的轮船划来。小船越来越近了，从船夫的穿着看，我们知道这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我们叫轮船停下来，跳上小船。小船把我们送到大埔，让我们住在地下联络站——一个酒店里……我和同行的同志微微一笑，小声开句玩笑说：‘到了朱贵的酒店，不愁上不了梁山啦！’睡到半夜，‘老板’叫我们起来，说：‘走吧！’他随即派了几个伙计送了我们一段路程。在皎洁的月色中，我们安全地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梁，天快亮时，猛听到前面的地方传来一声：‘口令！站住！’我们着实一惊。那个交通员不知回了对方一句什么，转身对我们说：‘到家了！’我们一到闽西根据地，受到乡苏维埃同志的热情接待。多少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地彼此称呼‘同志’——这个最亲切的尊称，我们一个个热泪盈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几天以后我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本来党中央决定，我们到达苏区再运送电台来，可是我们到了不久，红军就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敌公秉蕃二十八师的一部功率相当大的电台被我们缴获。于是我们就利用这部电台沟通了苏区之间、红军同上海党中央的联络。”

王子纲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我和沈侃夫是从上海分两批去鄂豫皖苏区的，大约在1931年10月出发，我和蔡威先走，经上海、南京、蚌埠、正阳关、霍丘、麻埠、金家寨这一路到达新集。我们到达新集时，沈侃夫、徐以新两位同志已经到了。”

王逸群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29年，我在上海考入大厦大学本科后，常去上海艺术大学听茅盾、王学文、沈从文这些老师讲课，有时也

听鲁迅先生的演讲……随着思想觉悟的逐步提高，1929年夏，我加入了共青团，同年秋季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求我学习发报技术，并征求我的意见。由于树立了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中断大学学习，改学无线电通信技术。当时中央特科派伍云甫同志来教我，发给我一台练习机和一套英文字母的电码符号，我每天背记、练习，从不间断，直到把26个英文字电码背得烂熟。后来伍云甫同志每周来一次，我们一同练习，有时由我拍发，他纠正我的动作；有时他拍发，给我示范；有时他发我收，还和我交谈思想，给我传达党的指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组织上还按月发给我生活费，对我非常关心。1931年春天，上级派一位姓王的同志来教我，由于当时处在白区环境，没有详细问他的名字，以后据曾三同志介绍，伍云甫同志走后是委托王子纲同志来教我的。1931年4月，由于领导特科的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决定在特科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都要离开原地址。可能是5月份，通知我到江西苏区去。从上海出发前，给我买好去汕头轮船票，并告诉我去汕头找一个小商店，这个小商店是我们党的特科交通站，专门为护送去苏区的同志而设立。我带上介绍信，到汕头后按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交通站。第二天，有一个同志陪我去大浦县，晚上五六点到了大浦。这个同志带我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一个大山的边沿，这里设有我们的武装交通站，然后由交通站的同志又介绍到另一个交通站，最后送我到了长汀。又走了一天多到达瑞金中央局无线电队，这时见到了曾三、涂作潮同志，不久又见到伍云甫同志。从上海到苏区，为了避免家庭受牵连，当时托一个朋友，写一封信告诉我家里，说我已经跳黄浦江死了。”

沈侃夫同志回忆中写道：“1931年10月，组织上派乐少华同志找我谈话。乐少华说：‘无线电技术你们已经掌握了，准备派你到鄂豫皖苏区去。’他还说：‘徐以新同志也去，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过了一段时间，乐少华交代我与徐以新带4个密码本子到鄂豫皖苏区去。不是一本本那样的本子，而是把4个密码本全记在脑子里。那是用英文字母编写的密码本，徐以新记一本，同上海党中央联系的；我记3本，同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湘鄂赣苏区联系的各1本。那时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黄平，我们背的密码本就是黄平主持制定的。密码全记熟以后，乐少华又找我们谈话，交代了启程日期和注意事项，送来了路费。我和徐以新一路，我们俩同岁，从外貌看，我比他长得

老相一些，所以对外称我们是兄弟俩。我们从上海坐火车经南京、徐州转陇海路到开封下火车，途中用什么姓名、坐什么车、在哪吃饭、住什么旅馆，都是党组织派内部交通秘密安排的。我们到开封下火车后，来人说：‘给你们买好了到信阳的火车票，到郑州吃午饭，有人暗中保护你们。’并告诉到信阳住什么旅馆，到什么地方接头。在信阳一个旅馆住了一天，徐以新就到木板房买香烟的地方去接头。卖香烟的关门了，没有联系上，我们很着急，就商量万一接不上头，就再返回上海。当时在旅馆警察查得紧，为了应付查房，我们说到信阳去看病，徐以新装病。警察盘问时我说：‘我们兄弟俩到汉口去，弟弟生了病’。警察看见桌上放着几个药瓶子，就信以为真，放过了我们。第三天又到那个木板房去买烟，这回顺利地接上了头，他让我们立刻去天主堂医院看病。有人看我们手上拿着药，马上带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化装衣服。我记得我穿的是蓝布大褂，束着布腰带，头戴瓜形毡帽，打扮成商人模样。我们马上出发，交通员挑着担子给我们带路。出了信阳城门，交通员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国民党岗哨，不要怕。路过哨兵岗哨时，交通员打了个招呼，也没盘问我们。可是我们走过以后，就听哨兵指指戳戳地说：‘老共，老共。’走着走着，天下雨了，田间小路很滑，我们这些走惯城市马路的人，一步一滑，跌得浑身成了泥巴猴儿。快天黑时，走到一个老百姓家里才发现我们一路同行的有6人，经过互相介绍知道有成仿吾同志、任炳煌同志，还有一个姓戴的。交通说，这里是苏区的游击区。老乡待我们很热情，晚上为我们预备饭菜和酒，成仿吾兴致很高，好好喝了几杯，这一夜睡在稻草铺上，很新鲜，很舒服。”

“第二天，继续赶路，交通说，目的地宣化店。天还在下雨，路越来越不好走，腿越来越酸疼，我过去没有走过这么远的乡间小路，很不习惯，就拄了个棍子走。到了宣化店，罗山县苏维埃照顾得很好。住了一个晚上，我腿痛得很厉害，实在不能走了，让我骑马，我不敢骑，坚持着走到郭家河，又住了一夜，乡苏维埃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当时决定他们5个人先走，留我在郭家河休息两天再派人送我。徐以新他们走后，我活动了一下，思想上也不甘落后，于是就追了上去。自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后，就感觉到气氛不一样，到处是红旗、红缨枪、少先队、共青团、妇女会，很活跃。我刚爬上一个山梁，遇到3个青年妇女放哨，她们身边插着两支红缨枪。‘同志弟，歇一会！’（这是苏区最亲切的称呼，年龄大的称同志哥，年龄小的称同志弟）



没等我回话，她们就围上来问长问短，我给她们看路条，她们发现我的鞋子大，提不上，就抢过去缝了鞋带。我顺手掏了一些铜板给她们，她们哈哈笑着问：‘同志弟，你是哪里来的，咱们苏区可不兴这一套。’这时我不得不对她们说了实话。她们听说我是从上海党中央来的，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有的跑回家拿吃的，有的倒水，发现我衣服上一只纽扣要掉，立即穿针引线给缝牢。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阶级姐妹的温暖，心情非常激动，说了些感谢的话，就按她们指定的方向赶路了。”

## 第三章

# 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湘赣边界爆发了秋收起义。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部队进行了改编，由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茨坪。1928年1月，朱德、陈毅同志带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队伍，进入湖南，4月在宁冈砦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5月4日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以后，全国红军及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到1930年6月，全国红军扩大到十几个军，约10万人，分布在江西等十多个省，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等根据地。1930年2月，赣南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当地武装编成红三军。3月，闽西工农政府成立，当地武装组成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和前委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1930年6月，红五军与湘赣的红八军、湘鄂赣的红十六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1930年夏，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独立团合并为



红十军。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鄂豫皖根据地：1927年11月，吴光浩等同志在湖北黄安、麻城领导农民起义。1930年3月，建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红一军，以后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

洪湖及湘鄂西根据地：1927年12月，贺龙、周逸群、卢冬生在湘鄂西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红二军。1930年3月，洪湖游击队编为红六军，同年7月合并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

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广西百色武装起义，成立红七军，建立右江根据地。1930年2月，又建立左江根据地，成立红八军（后编入红七军）。

这个时期红军很快有了大发展，根据地日益扩大，白区工作也逐渐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及时可靠的通信联络，将会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建立无线电通信的任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红军中早期没有无线电通信。1929年底，邓小平同志从上海到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党中央准备同百色起义部队建立无线电联系，并在香港与李强约好呼号、波长及联络时间。但由于广西电台功率小，未能沟通。以后红七军在榕江，1930年7月，红三军团在长沙及鄂豫皖红四军都先后缴获过敌人电台，有的战士因不懂而破坏了机器，又无通信技术人员，所以无线电通信一直没建立起来。

1930年10月，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在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十分注意搜集电台，争取敌人的技术人员，1930年12月30日缴获了第一部电台，从此在红军中开始建立无线电通信。

## 第一节 红一方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 我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的诞生

### 一、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的诞生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这时红一方面军与上海党中央、武汉长江局的联系，只能靠地下交通传递信件。内部通信除少量有线电话外，主要靠司号、旗语等进行联络或派通信员传递命令。

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9月20日，三军团军委书记彭德怀同志在《关于夺取岳州、长沙经过及经验教训，平江会议及今后的方针》中提道：“攻长沙曾缴获无线电9部。”8月18日，红一军团在湖南文家市歼灭戴斗垣旅时，也曾缴获电台一部。当时对缴获的这些电台，未能很好利用，有的因不知何物，在缴获时就砸坏了。

针对以上情况，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多次下令要求凡缴获之战利品，一律上交。1930年8月24日，在指示部队的命令中指出：“……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路、桥梁、火车、汽车、汽船、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1930年10月3日，在总攻吉安的命令中又指出：“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之无线电机、电话、电灯、汽车等交通工具，一概不准毁掉。”

1930年12月29日，在《红一方面军攻击进占龙冈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中，还特地加了附注：“各部队需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冈全歼敌张辉瓒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的战斗中，缴获电台一部，其发报机虽破坏，但保存了一部完整的收报机。该台台长李三毛（李仁忠）和报务员王诤（吴人鉴）、吴如生（罗世榕）、韦文官（韩依冠）、随台学习报务的刘寅（刘达端）、机务员刘盛炳、文书李家驹、架线班长李国梁等10人，除李三毛外，都参加了红军。

1931年1月1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又在进攻谭道源师的命令中进一步指出：“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搜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1月3



日，在东韶歼敌谭道源五十师的战斗中，缴获一部电台。这一次战士们很注意，完好无损地把电台送到总部。

王诤等同志参加红军后，当天，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亲自到当地了解情况，让他们和战士一起度过除夕。1931年1月3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在红军总司令部（君埠一个祠堂里），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总政委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行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总司令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会有人从白军中陆续地来，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要看目前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都是人民的。”

1月6日，在参谋处的安排下，王诤等同志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村总部参谋处一所院子里，架起了天线，建起电台。因为当时只有一部半电台（一部发报机，两部收报机和两套电源），不能组织通信联络。当时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供领导参阅；二是侦听敌台，搜集敌军情报。

为了迅速建立无线电通信组织，1931年1月，总部决定成立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全队除技术人员外，还有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共100余人。朱德总司令、参谋处长郭化若、副官长杨立三、秘书长李井泉等同志经常到无线电队看望大家。杨立三看见王诤睡在稻草上，就把自己的一床大红毛毯给了他们，还专门为每人做了一套棉衣。当时红军战士每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为了照顾技术人员，给王诤每月50块银元的津贴，其他40元、30元不等。为了便于携带，组织上把银元换成金戒指发给他们，在第二次反“围剿”前夕，电台人员给总部写信，要求减免津贴。左权同志表扬了他们的风格，后来把技术津贴稍减了一些。

1931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到中央苏区。5—9月，又派翁瑛、杨兰史、朱邦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王逸群等到中央苏区。

## 二、红军第一次无线电通信联络

1931年4月1日，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因为只有一

部半电台，采取一方发信，一方收信的办法传达信息。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带一部电台随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在前方；由曾三、刘寅带一收报机在后方。前方有情况就架线发报，后方坚持24小时守听，这样构成单方向的通信联络。这就是有名的我军第一次用一部半电台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的情况。

5月15日黄昏，王诤同志侦听到富田的公秉蕃二十八师电台与该师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通报，得知16日晨，敌人将从富田出发进攻东固（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他立即与冯文彬同志一起，向总部报告此情况。总部首长依据敌情，事先占领有利地形。16日晨6时，果然敌人进入包围圈，我军发起进攻，歼敌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缴获二十八师功率为100瓦的电台一部。徐锦荣、林卓生、黄庆元、沈毅力、杨景春等同志参加了红军。

战后，无线队人员扩大，由于增加了100瓦电台，可以构成通信联络，决定由伍云甫、曹丹辉、涂作潮等同志带15瓦电台到前方，王诤、刘寅、曾三等带100瓦电台在后方。6月2日，前方总部在建宁收到从总部后方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这是我军通信史上第一次完整的无线电通信。

5月22日，在中村歼敌高树勋之二十七师近一个旅，缴获电台一部。5月31日，在建宁歼敌刘和鼎之五十六师3个多团，缴获电台一部，朱虚之、陈宗泰、朱道松等同志参加了红军。到第二次反“围剿”结束时，红一方面军已有4部电台。

1931年5月31日夜9时，总前委召开第5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参加。会议讨论了建立方面军无线电队的问题，决定：“方面军的无线电队，为了要使人员器材便于调剂，训练方面能够一致，应有它的独立系统，决定成立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下设4个分队，人员、电报机等一律照分，但第一是总部电台，其次是三军团的，再次是后方，最后分一个给河西七军。”这时部队在建宁休整，总前委决定方面军成立4个电台队，分别配属三军团、三军、四军和后方总部。红三军团电台队长吴汝生，政委杨光池；红三军电台队长朱虚之，政委杜平；红四军电台队长陈宗泰，政委肖华；后方总部电台由曾三负责。另外组成一纠察台，纠察通报中违犯通报纪律的现象。

经过第三次反“围剿”，又缴获6部电台，电台分队发展到6个，分别配属在苏区中央局、一方面军总部、三军团、三军、四军、十二军。中央局为100瓦电台，其余均为15瓦。

为了加强领导，成立无线电总队，1931年12月，任命王诤为无线电总队长，翁瑛、宋裕和、伍云甫先后为政委。

1931年12月14日，原西北军的一部改编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约17000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的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随26路军起义的有一无线电管理处，8部电台，40余名技术人员，如刘光甫（刘景炎）、海风阁、张国栋、荆振昌、李华亭、杨笑是、李启明、王有为、张有年、阎侃斋、卫明道、范文谦、闻述尧、汪名震、陈士吾、黄乐天、殷金荣、靳子云、陈英琦、张文瀚、余雅鲁、陈太和、李龙彪、李谦仕、李世俊、尤静轩、刘玉亭、黄凤梧等。

### 三、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沟通联络

1931年3月，伍云甫等到中央苏区后，当即与上海党中央沟通联络，因功率小，未能实现。自缴获100瓦电台后，9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系，由曾三同志给上海发了一密电，这是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通报。

曾三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年5月，受党的派遣，我和伍云甫在上海的小亭子间，跟张沈川同志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当年10月学成后，分配到香港南方局的电台工作。不久香港电台遭到破坏。1931年1月，组织上决定要我筹建新的电台，准备直接向江西苏区通报。后来，中央又决定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我3人到江西苏区去。在这前后，中央还派喻杰生同志到湘鄂西根据地，派沈侃夫、王子纲、蔡威等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大约在1931年春节，我们3人从上海出发，由党内交通员护送，绕道香港、汕头、福建，走了一个月，于1931年3月到达江西苏区宁都青塘。”

“这时，红军通过第一次反‘围剿’缴获张辉瓒师电台，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并且成立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到苏区后，我们就想方设法与上海党中央进行电台联络。离开上海时，李强同志告诉了我们联络的方法，双方规定好联络的波长、呼号和时间。然而，这些全靠脑子记，身上不能带任何书面的东西。但是因为原来缴获的电台功率太小，一直同上海联络不上。”

“1931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中央的电台和我们第一次沟通了。首先听到上海信号的是刘寅同志，他高兴地立即把消息告诉了我，我马上发了一个密码电报出去。这是江西根据地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

无线电通报。这一晚是我们全台同志最快活的一个夜晚，大家互相祝贺，忘记一切疲劳。记得当时有同志问我，和我们通报的上海台报务员是谁？为了保密，我自然只能以微笑作答。”

#### 四、协助各根据地建立无线电通信队，沟通无线电联络

1932年下半年，苏区中央局陆续向各边区派遣电台。向湘赣军区派过两次电台。第一次是1932年9月，将五军的电台调到湘赣军区。1932年10月，肖克同志任红八军军长，该台由阎知非、周德元带领，随肖克到湘赣军区，10月底到达。阎知非到达后，很快设台，与中央根据地沟通联络。第二次是在1933年6月，派江文同志带50瓦电台一部，随任弼时同志到湘赣军区。到达后，在湘赣军区建立无线电中队。

1932年6月，一方面军总部派肖英（队长）、徐萍（政委）带50瓦电台一部，到湘鄂赣军区。1932年9月，向赣东北红十军派去电台。1933年4月向闽西红军派出3部电台。

从以上情况看，1931—1932年仅仅两年时间，就建立了多部无线电电台，并与各地沟通联络，形成无线电通信网。

1931年11月7日，王诤、刘寅同志代表通信战士，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3年7月，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亲自向项英主席提议，授给直属队创立了无线电的王诤二等红星奖章。会议期间，将抄收的国内外新闻油印发给代表，这是最早的《参考消息》。还首次用电台以“CSR”呼号向全国播发大会新闻，上海和一些根据地收到了大会发出的消息。后来正式成立“红色中华通信社”（简称红中社），这是我党最早的新闻广播通信。

从此以后，红军通信网逐步扩大，自1931年年底由一部半电台发展到19部。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通信队伍（含有线电通信）已发展到1500余人。1944年《通信工作历史总结》中记载：“随二方面军来的电台6个，新闻台1个，报务员21名；随四方面军来的有联络台5个，新闻台1个，报务员22名，机务员5名。不久又来了报务员11人，机务员2人，共计联络台29部，总机9~11部，单机100部，通信兵1500余人（干部30余人）。”

冯文彬同志在红一方面军部分通信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上说：“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发展的历史，最早是1930年8月，我们打长沙的路上，攻打驻文家市的敌戴斗垣旅，他那时有个无线电台，由于我们红军战士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缴获时把它砸了。据说消灭这个旅时，电台

的充电机还在那里工作，战士们好奇，把它砸掉了。”“红军打下吉安以后，蒋介石觉得对他有威胁，开始策划反革命‘围剿’。1930年年底的第一次‘围剿’集中了10万兵力，在龙冈被一方面军消灭了1个师，师长张辉瓒被活捉，在那次战役中缴获一部电台，但发报机破坏了，只留下一个收报机，发电机还在。”

“1931年春，经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研究，要成立一个无线电队。当时朱云卿是参谋长，郭化若当参谋处长，我在总司令部警卫团当副政委。领导上说我从上海来，社会经验多一点，所以把我调来当无线电队政委。电台上除我外，还有龙冈战斗过来的王诤、刘寅等同志，任命王诤同志当队长。我们无线电队一成立，决定首先训练一批学生。记得一共招了12人，10个男的，2个女的。有胡立教、曹丹辉、温亮彰、李建华（女）、李赤华（女）等同志。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无线电报务，还有几个学机务的，有时还用收报机进行实际练习。”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王诤同志有很大功劳。由于他了解敌军电台的呼号，对公秉蕃、郝梦龄那些部队的电台都很熟悉，他先收听敌人到达的地点，接着收听他们的来往电报，分析电报的内容。那时何应钦是总指挥，他发给前方那几个师的电报我们都可以收到。有一次从敌人的电报中获得公秉蕃的行动计划，结果把公秉蕃部消灭了，电台也缴获了，是100瓦的，后来由曾三同志负责送到后方。第二次反‘围剿’能打得那么好，与收敌人的电报很有关系。这样，一直打到建宁、黎川，横扫八百里，几乎每打一仗，敌人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第二次反‘围剿’时虽然仅一部电台，但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第一个宣传和记载下来的。”

“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第四次反‘围剿’之前，我到团中央当巡视员去了。”

王诤同志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写道：“1931年3月，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苏区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把毛委员的话加以发挥，他说：‘你们先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现在红军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继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听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句句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1930年除夕，红军在江西苏区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张辉瓒部的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损地把它送到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十几名优秀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了解敌军的动向。”

“1931年5月15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蕃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吉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电台说：‘我们现在在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电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的山腰。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蕃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束，公秉蕃师全部和王金钰的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这支无线电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中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1931年6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5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了公秉蕃师部那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1931年秋，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局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通信。”



刘寅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年12月30日，著名的龙冈战役在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亲自指挥下，红军全歼了国民党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敌前线总指挥、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无一漏网。我所在的电台是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一大队第五分队（番号为KF5），当时配属到十八师工作。该台通信技术人员除沈定一人外都成了红军的俘虏。记得在小布集中时共有10位电台人员，他们是队长李仁忠（改名李三毛），报务员王净（吴人鉴）、吴如生（罗世榕）、韦文官（韩依冠），机务员刘盛炳，文书李家驹，架线班长李国梁，还有两个班的人员，名字记不清了。我原名叫刘达端，当时并非军人。我是因为失学失业，经罗世榕介绍在第五分队临时‘借读’无线电的。随电台才两个半月，就幸运地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红军的军装。”

“1931年1月3日下午，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地点是去小布路上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当时见到的有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朱云卿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之后，毛总政委非常和蔼地对我们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那天很高兴，讲话也比较多，他说，你们要好好地干，你们在外谋生，是干事，到红军里也是干事，但红军是为工人、农民干事，为无产阶级打天下，你们还是一样的干。你们在外面有较高的待遇，我们也一样给。外面有的东西，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有人会给我们送来的。比如无线电，你们来了，这不就有了！你们要很好地干，这个事情（指无线电通信）就归你们管。将来全中国、全世界都要胜利的，全国胜利了，这件事还是归你们管。”

“我们开始工作以后，朱总司令几乎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电台来。他到电台一是来听听新闻，再就是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他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来时还要带上一包麻雀牌香烟给电台上吸烟的同志。朱总司令对我们这些刚刚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这样的关怀，循循善诱，使我们深受感动，大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

“当时红军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管我们的业务工作，副官长杨立三同志帮助解决物资生活问题，还有秘书长李井泉同志，他们对我们都很关心。刚过来时我们什么也没有，晚上睡在稻草上，杨立三同志看到了，立即把他的大红毯子给了我们，后来还专门给我们每人做一套新棉衣。”

“为了照顾电台人员的生活，还专为电台规定了一些制度，如津贴制、夜餐制等。技术津贴是红军时期专为技术人员规定的，医生、修理技师、无线电通信人员等都有，这也是党关怀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一个体现。那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生活费，而对我们这些人却给了很高的生活待遇。王诤同志当时每月50块银元，其他人每月40元、30元不等。第二次反‘围剿’前夕，大家都在紧张备战，我们对组织上给我们这样的待遇很过意不去，就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后来左权同志亲笔复函，表扬了我们这种精神，同时说明对待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应有所照顾。后来只把津贴减少了一些，50元减为30元，30元减为20元。供给部的同志考虑得也很周到，把我们携带的银元换成了金戒指。”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部队中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信，我们被俘时，电台的发报机被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可用，所以说是‘半部电台’。1931年1月3日在东韶打国民党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技术人员都跑了，这也是国民党交通兵团的一个分队，机器型号和第五分队的一样，它叫第六分队，番号是KF6。这样红军就有了一部半电台。我们在方面军总部用一部收报机办了两件事：一是抄收新闻和进行技术侦察；二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1931年1月6日在总部驻地江西兴国的小布，按照参谋处的指示，在参谋处的院子里架起天线。主要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翻译出来供领导参阅。因为在苏区看报纸很困难，消息很闭塞，有了电台以后，一下子把闭塞的局面打开了，因此每天抄收新闻便形成了一个制度。由于国民党军队电台在通报中用简语谈话，每到驻地就要互相询问‘QRC?’（你部驻在何地？）和回答‘QRC……’（我部驻在……）。部队在出发时，也拍发‘我台奉命立即出发。’‘请即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X小时后再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敌军电台的通报中了解到敌军的行止动向。所以，电台除抄收新闻外还收到敌台的通报对话，了解敌人的动向，准确地向领导和作战部门提供情报，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就是从电台侦察中准确地掌握了敌军的动向而打了很多的胜仗。后来，侦察工作从通信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技术侦察台，最早是伍云甫同志，后来由曾希圣、曹祥仁等同志专门负责，成立了二局。”

“在用一个收报机开始工作后不久，就以电台为基础开办无线电训

练班。这也是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亲自决定的，当时还签发了一个招生命令，这是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从那时起自己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成为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随军办训练班，办学校，有的电台还自己带‘徒弟’，即使在长征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从未中断过。”

“1931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战斗打响以前，我们无线电队住东固附近的坳上，每天用收报机侦听正面敌军公秉蕃的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的第五军路军指挥部电台的通报情况。这两部电台呼号和报务员的手法我们是很熟悉的。王金钰部的电台是由国民党交通兵团派出的15瓦电台，公秉蕃部则是自备的100瓦大电台。由于和敌人的距离较近，所以听到敌台的信号很强。我们天天听，很快地就掌握了他们的联络对象、联络时间、工作规律和报务人员的特点。5月中旬，我们从一次侦听中了解到敌军二十八师要在第二天向东固进发。我们红军正在准备以伏击手段来寻机歼敌，所以我们立即把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总部按照敌军的行动方向进行了战斗部署。第二天只经过半天的激战，全歼敌军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的一部分，取得了有名的富田大捷。”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无线电通信人员最关心是得到敌人的这部电台。伍云甫、曾三同志由上海来到江西苏区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苏区中央局电台，沟通江西苏区与上海党中央及其他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他们来时没有携带电台，而红军当时也没有可与上海沟通联络的机器。两个多月过去了，大家都很着急。如今了解到公秉蕃有这么一个100瓦的大家伙，就天天盼望能把它完整地缴获过来。战斗打响不久，很快就听到该台焦急地发出‘SOS、SOS’（求救信号），大家屏住呼吸静听，很快就没有声音了。电台是否到手呢？大家非常关心。战斗结束后这部100瓦大电台已被红三军缴获，还俘虏若干技术人员。不久，连人带机器都送到了总部，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当我们只有一部半电台时，不能建立互相间的通信，但我们采取过单向通信的方法，即伍云甫、王净、曹丹辉等同志带一部完整的机器随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在前方；其他人由曾三同志带领在后方，带上那部收报机，密码和一切联络规定都事先约定好。前方台有电报就架台发报，后方台是24小时不间断的守听，这样，后方也可以很快地得到前方的消息。缴获那部大电台以后，我们就在后方调整它，准备和前方正式通信。”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在朱总司令、毛总政委直接指挥下半个月的时间，横扫七百里，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胜利，于5月底打到了福建的建宁。部队到建宁后，于1931年6月2日下午，后方总部用100瓦电台同在前方的红三军团第一次沟通了联络，彼此发了一份短报，从此开始了红军自己利用无线电通信的新局面。”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缴获了几部电台，又有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参加了红军，如沈毅力、朱虚之、陈宗泰、朱道松等同志都是这个时期参加红军的。随后，三军、四军等单位也都配备了电台。”

“江西苏区红军用上了无线电通信之后，各苏区之间开始着手建立无线电通信，而首要的是建立江西苏区同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自从有了那部100瓦电台以后，我们就按照伍云甫、曾三同志从上海带来的联络规定进行呼叫，守听对方的问答。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结果。上海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坚持收听，一点不懈怠，终于在1931年中秋节前后的一个晚上，听到了对方微小而清晰的呼叫声音，与规定的呼号完全一样。当时正是我值班，听到这声音之后，立即喊起了入睡的曾三同志，他马上来到电台，高兴地用电键进行了回答，双方沟通了联络。从此江西苏区与上海之间用无线电波架起了桥梁，党中央的指示随时可以通过这座桥梁迅速地传到苏区，大大缩短了过去利用地下交通送信件所需的时间。过了不久，江西苏区又与湘赣西、鄂豫皖苏区建立起无线电通信，通过无线电波把各革命根据地联结在一起。”

“红军自从有了一部半电台开始，到同各个方向沟通无线电通信联络，前后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速度之快是事先未预料到的。今天来回顾过去的历史，其所以能够顺利地发展，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正确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另一条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的迅速发展，正是适应了当时革命的形势。”

### 五、红军中的通信战士，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线电通信工作建立以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下面举几例。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就发挥了作用。当时不能互相组织联络，采取一方发报，一方收报的方法进行联络。由伍云甫、王净带一部电台随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在前方，由曾三、刘寅带半部电台（收报机）在后方，前方发报，后方坚持24小时收听，使前方消息很快传到后方。前面已例举了歼灭二十八师全部及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大部的经过。

1931年7月1日，在第三次反“围剿”前，红一方面军电台侦听到敌军情报，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致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杰同志及边界工作委员会三十五军军委信》中记载了这一情况。“今日无线电消息：何应钦由南昌迁到杭州，称其为前敌总司令……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总前委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配合下，阻击敌人，主力从闽西出发，经安远、宁化、长汀、瑞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结果六战六捷（一仗打成对峙），彻底粉碎敌人“围剿”。

在三次反“围剿”开始，曹丹辉同志奉命带一部电台随红三军军部行动，7月23日下午4时，收到何应钦发给各路白军的十万火急电报，“限十天扑灭共匪”等内容的命令，共32个字，用我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的敌密码译出。这份电报全部暴露了敌人对我“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及敌人兵力部署。总部根据这一情报决定突击方向，打了三仗，三战三捷。

## 第二节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自1931年中央红军有了无线电台以后，要建立通信网，必须培养人才，因此首先在红一方面军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以后二、四方面军也相继办起训练班。

### 一、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红一方面军在缴获了一部半电台以后，1931年1月1日中旬成立了无线电队，紧接着在2月10日举办了第一次无线电训练班，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培养无线电通信人员的训练单位，从此人民军队的通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31年1月28日，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签发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全文如下：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一月二十八日于总部

（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

我们成立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

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更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使各军团各军都有，以应下列需要。

（一）使我们中央区与其他特区，一、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军团的通信灵便。

（二）使我们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

（三）使我们各军间的通信更加密切。

（四）使我们更能封锁敌军的电台，侦察其行动。

因此，我们要各部照下列人数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一）总司令部二人

（二）中央军委秘书处二人

（三）第三军团三人

（四）三、四、十二军各二人

以上共十四人（各部能多送者更好）

学习无线电学生的条件如下：

（一）年龄：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

（二）出身：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

（三）性别：不分男女都收。

（四）学历：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者，最低限度须粗识文字及有些常识者。

（五）性格：聪明、活泼、忠实、好学、无流氓习气者。

（六）学习期间：暂定四个月。

（七）学习课程：机务报务兼学。

各部接到此命令，须即按照上列条件和人数，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并且要在二月一日内送来本部考察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仍旧驳回，望各部体会这种工作的重要，在现工作干部或技术人员当中，勉抽出来，以应急需是为重要。

此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这是我军第一个抽调学习无线电学员的命令，在这份命令中讲述了无线电通信的地位、意义、作用及学员的条件，其中还特别提出性格条件。在以后我军早期举办训练班时，都参照这些条件选调学员。

命令下达后，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村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与无线电队编在一个大的单位内，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均兼训练班的负责人，电台工作人员兼任教员，兼任教员的有：王诤、刘寅、吴汝生、韦文宫等。上海党中央培训的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到达中央苏区，充实了教员队伍。

报务学员 12 人：胡立教 曹丹辉（曹登穗） 钟贞一 温亮彰（温诤） 李立田 骆炳怀、吴慕林 周 森 肖 英 钟佩兰（女） 李健华（女） 李赤华（女）

机务学员 5 人：李长春 罗卓英 田保洪 肖×× 欧阳××（田保洪后改学报务）

训练班开学时，由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主持开学典礼，朱总司令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中，要不怕困难，在红军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毛泽东同志经常到训练班讲政治课，作时事报告。

训练班于 2 月开学，在第二次反“围剿”开始时，即 5 月份，学员即毕业，学习时间只有 4 个月。当时还没有正规的训练计划，学习内容主要为报务，兼学一些机务原理。调来学习的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都是年轻有为的基层干部，政治觉悟高，学习热情，他们不分昼夜，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任务，他们成为我军最早的一批自己培训出来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关于这一期训练班的情况，一些同志在回忆中写得十分具体。

王诤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青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教诲，成了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是十分简陋的，林荫做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大拇指做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上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开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

刘寅同志在回忆中写做：“训练班的同学们，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部队宿营时，他们协助技术人员工作，行军时他们做宣传鼓动工

作，还常常为生病掉队的监护员背枪、背包袱，个子高大的还替运输员抬蓄电池和挑机器。”“这个初成立的单位，物质条件虽然简陋，但政治工作是健全的。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领导人对我们关怀备至，亲自培育。他们虽然十分繁忙，还常抽时间为我们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大家都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着。4个月后，同学们结了业，正式走上技术岗位。人数虽然不多，但除了充实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以外，还开始向湘赣、湘鄂赣两苏区撒下红色无线电兵种子。”“紧接着第一期学员结业，无线电训练班开始了第二期学员的训练。第二期学员的人数比第一期多一倍。第二期与第一期的教学条件基本上差不多，但学生都是男生，平均年龄比第一期大一些。”

“在第一、二期报务人员训练期间，还举办了机务人员训练班，也是十几人，文化程度比报务班低一些，但都是身强力壮的战士，学习同样很努力。他们把学习同在电台上的值班及机器检修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对机器的原理学得少，但对机器的使用、检修、器材的保管、运输，以及燃料的节约、代用等，却了解得十分细微。他们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机器，因为他们懂得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使电台停止工作。为了迎接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期机务人员的训练，在使用更大功率的机器和扩大机务工作方面，都做了必要的准备。”

胡立教同志在回忆中说：“我到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时，无线电队和训练班是在一起的。最早任政治委员的是冯文彬同志”，“我是在二连当政治委员的时候调到训练班学习的。和我同时在第一期学习报务的共12人”，“我在训练班学习两个多月就开始工作了，先到红三军，后到红四军。”

温净（温亮彰）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成立无线电队，王净同志任队长，冯文彬同志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建起第一部无线电台。先用于侦听情报和抄收新闻，以后发展到用于通信联络。2月初，又开始办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红三军团抽调一部分优秀青年学员参加学习。学员有胡立教（由红三军调）、曹丹辉（由十二军调）、温亮彰（由红四军调）、李立田、钟贞一、钟佩兰（女）（由方面军总部调），共计12人。另有机务学员几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4个月，于5月中旬结业。因为从5月16日起，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电训队立即结束，学员分别返回总部和红一、红三军团参加前方作战行动。”



## 二、红一方面军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

在第二次反“围剿”前，第一期结束。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下，从5月16日至30日，从东固、富田向东横扫，一直打到建宁，15天行军700里，五战五捷，打败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1931年6月底，红一方面军移驻江西丰南县康都镇，利用这一空隙，举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这时训练班仍归属总部无线电队。

第二期训练班由队长王净兼，政委冯文彬，后为曾三。教员都是电台人员兼任。王净兼教机务，报务教员有刘寅、沈毅力、陈宗泰等。

学员20余人。有李白（班长）、邓国钧、欧阳枫、郑执中、刘子玉、罗闽初、林永桂、邹毕兆、林辉士、陈志东、周天凤。这一期学员到1931年10月5日毕业。

## 三、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

1931年11月，在福建长汀招收第三期学员，1932年年初，学校移至瑞金洋溪村。

从第三期起，中央军委决定把无线电训练班改名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这时成立无线电学校的条件已成熟。第一，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1932年2月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之前，中央根据地扩大，红军增多，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第二，已经缴获了一批电台及器材，有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特别是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为红军通信建设增添了力量。第三，已经办了二期训练班，积累了一些经验。第四，红军的发展，急需无线电设备，因此对人才的需求也增多。

校长刘光甫，政委开始是杨兰史，后为曾三同志，教务主任先是吴汝生，后为沈毅力。学校开学时，朱德同志到会祝贺。这时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同志，也参加了教学工作。学校教员有：涂作潮、阎侃斋（阎知非）、刘寅、陈士吾、魏明道、杨笑是、周玉麟、黄乐天、朱邦英等，不少是无线电队的同志兼任学校教员。

学员共36人，编为一个队，因程度不同分为甲乙班。已知的学员有：钟夫翔（钟福祥）任学员排长。其他同志是：李景瑞、钱昌鑫

(钱江)、黄子昆(黄良诚)、肖森、赵宾玉(宾玉)、吴希圣、李文通、唐陶德(唐明)、冯云芹、黄致文、黄荣、陈明新、邱品均、李行立、雷永通、刘士庆、彭康等。

这期学员甲班于1932年4月毕业,乙班于5月毕业。

自从训练班改为学校以后,教学工作逐渐走上正规,教学条件也有了改善。有了专职教员,可以集中精力备课,教学质量有了提高。这时开始编写教材,油印后发给学员。沈毅力编写的通报英语十分受欢迎,学校建立了正规的作息、考核制度,保证了质量。

学校有了校歌,这首歌的曲子是苏联的一首革命歌曲的曲调,歌词是当时学校在瑞金举办展览会的前言中的几句话,即“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三个条件: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身体要健壮,”以此为基本内容谱词。歌曲如下。

2/4

### 通信学校之歌

(1936年以前)

5 5 | 3.4 5 | 6 4 | 3.2 1 | 2 3 | 2 1 5 |  
 . . . . .  
 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  
 6 6 1 | 5— | 5 5 | 3.4 5 | 6 4 | 3.2 1 |  
 . . . . .  
 三个条件政治要坚定学习马克思  
 2 3 | 1 7 1 2 | 3 2 | 1— | 3 1 | 2 1 |  
 .  
 列宁主义武装我头脑技术精明  
 2 1 2 5 | 3.2 1 | 2 1 | 7 6 | 2 1 7 6 | 5— |  
 . . . .  
 精明还要精明工作学习联系最要紧  
 3 1 | 2 1 | 2 1 2 5 | 3.2 1 | 2 3 7 | 1 7 1 2 |  
 . .  
 身体健康才能战斗顽强通信学校同志  
 > > >  
 3 2 | 1— ||  
 要努力!

曾三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我军无线电技术人员训练班很快就由一个发展成为几个，1932年在瑞金发展为通信学校，我兼任该校政委，校长是刘光甫。我在学校里先是教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当政委以后，就主要做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到1934年，学校的学员已增加到1000多人，分8个队：1个无线电队，1个电话队，5个司号队，1个旗语队。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保管、修理和购置器材并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

“1933年通信学校在平山冈举办了一次小型的无线电机展览会，在展室的前言上有几句话：‘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三个条件：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体格要健壮。’当时红军中流行一支歌，谱子很好记，就用这个谱子唱前言中的那几句话。1936年，在瓦窑堡时，经请示上级同意，便把这首歌定为通信学校校歌。”“从此，‘政治坚定、技术精明、体格健康’就成了训练通信技术人员的基本要求。”

“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大多是政治机关的青年干事、指导员、党或团的支部书记、宣传员和司令部各部门的通信员、侦察员、司号员等，他们大多是部队的优秀青年，也有少数是由地方上自愿参军的。江西老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来学习，表现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限爱戴和信任。有的孩子年龄太小，我劝他们过两年再送来，他们就拍着孩子的头说，‘在学校里一边学习，一边就长大了嘛！’除了电话队有些年龄较大的学员以外，其他都是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青年。教职员工的年龄也不过20多岁。学校呈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气象。”

“红军通信学校学员的文化程度，以无线电队为最高，但也只是初小毕业和高小毕业，或者在红军里学过两三年文化，能写写墙报。学无线电，必须学习英文和数学，学习期限又只有6个月，困难是不少的。但是由于这些青年非常努力，每一期绝大多数都能毕业。许多新的教员看了我们的教育计划直摇头，但是最后都对学员们的学习成绩心悦诚服了。”

“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条件是很差的。校舍是群众让出来的一些房子，东一间、西一间地住着教员和学员。床是用石块和砖头垒起‘腿’来，搁上两块木板做成的。住在楼上的就把稻草铺在楼板上，每人只有一条布‘毯子’，通常都是两个人共睡一床，以便垫一条，盖一条，冬天就再把棉衣盖上。好在江南稻草很多，能保暖。夏天的夜晚，蚊子多得很，除了受优待的教员有蚊帐以外，大家都只能用艾蒿一类野草烧烟驱赶蚊子。这样仍免不了蚊子叮咬，影响睡眠。但第二天还是照样打起精神上课。教室里的桌子、凳子很少，多数是用几块石头架起一块木板来当桌子用，坐的也多是石头和蒲团。”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学习、办公用品很缺乏。没有纸张，就用当地产的竹子自己造毛边纸用。油印教材缺少蜡纸，校长刘光甫想了个办法，把毛边纸放到大米汤里过一下，晾干以后当蜡纸用，那种‘土蜡纸’还真能印不少份。毛笔、土墨虽然能买到，但是学无线电的同志练习数码和英文用的铅笔和钢笔就难搞到了。大家从书上看到外国人从前把雁翎削成笔尖，沾水写字，就学着利用竹片或鹅翎削尖了做钢笔。如果分到一个钢笔尖，那就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用了必擦，不让它生锈，用坏了还要磨磨、修修再用。在节约铅笔的方法上也有不少创造，每个班都专门开会讨论，研究削铅笔和用铅笔的方法。一只铅笔用到只剩两三厘米长还舍不得扔掉，削两片竹片夹着铅笔头，用线绳拴牢继续用。那时没有电灯，也买不到煤油，就用燃烧的松枝照明，满屋烟雾。为了保证教学，有时就用苏区自己炼制的樟脑油。这种油很贵，一桶樟脑油的价钱相当于10桶煤油。可见当时领导上很重视学校的工作，舍得在培训学生上下本钱。”

“吃的也是比较差的。粮食限量，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菜金（包括油盐）两分。学员受照顾定量稍微多一点。肉每人每月1~2斤，食盐三钱。1933年，我们自己种菜、喂猪、养鹅、打柴，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到了1934年粮食供应困难，不少同志吃不饱，就采取分配包干的办法，每人用小蒲草包蒸米饭，包上挂个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大家都注意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食盐也省着用，到长征开始时，每人保存了一小包食盐，这可是宝贝，过草地时，就派上了大用场。”

“分得一角或几分‘伙食尾子’时，党团员们总是立即交两枚铜元的党费、团费，再交一枚铜元的‘互济会’会费，剩下的就买牙粉、牙刷和针线，有的买二两麻搓绳子打草鞋。”

“生活条件虽然差，但文娱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学校有俱乐部，各队有‘列宁室’，有墙报、棋子、乐器。全校只有一个篮球，但常进行比赛。晚会上有唱歌、猜谜语、讲故事等几种节目，有时就来个捉迷藏。每逢春节，就同群众一起敲锣打鼓，跳跳唱唱，热闹几天。说实话，那时候我们一心要学好本领打反动派，对于这样的文娱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学习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都愉快，很努力。生活虽艰苦，但是都知道学习的目的。青年们有意见就说，有错误就改，满腔热忱，积极要求进步。闹情绪，不愿学习，违反军纪、校纪的现象极少。分配上前线正合心意，决定留后方工作也没有大的意见，对工作挑肥拣瘦的现象是没有的。把生长在农村的青年，同敌人拼过明枪明刀的战士，调到

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尽管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但都毫无保留地服从分配。在上海为党的事业牺牲的李白同志，就是一个代表。”

“就是这样一些淳朴、热情的革命战士，通过勤奋学习，很快掌握了无线电通信这一专门技术，成了通信工作的骨干。有不少同志毕业后担任了队长、政委或指导员。直到今天，他们中还有很多同志在通信战线或其他战线上担任着重要领导工作。红军通信学校的名字，永载我们党的革命史册。”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带着红军通信学校的学生们和一个运输大队，也踏上了这史无前例的伟大征程。”

长期在通信学校任教务主任的沈毅力同志在回忆中说：“1928年我考取上海老西门国民党交通处第六台所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毕业后分配在该台见习一段时间，又调到南京国民政府第二电台当报务员，后又调到国民党十七军团电台当报务员。”

“1931年我在国民党二十八师（公秉蕃师）的一个100瓦电台上工作。1931年5月该师在江西苏区被消灭，公秉蕃只身逃去，我同徐锦荣、林卓然、杨景春、黄庆元等一同被俘。当时红军某师一个团长来缴电台，他问了电台情况，然后说：‘我们毛总政委欢迎你们这些技术人员，你们跟我们一道干吧！’我们带过来的除了那一部100瓦电台外，还有不少器材，仅6伏蓄电池就一大堆。”

“到红军以后，就参加了电台工作。朱总司令、毛总政委都很关心电台工作，经常到电台上来。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每次到电台来，总是平易近人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使我们很快便稳定了情绪。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跟我们讲‘将来你们是了不起的’，我觉得满有道理。”

“当时，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已经办了第一、第二期，王诤同志主持训练班。1931年11月开办第三期训练班，把我调去参加训练工作，我正式搞教务工作就是从第三期开始的。那时也不懂得教学计划怎么个搞法，只晓得报务这个课程开始学多少，中间学多少，以后学多少，安排个学习进度。由于敌人包围封锁，训练班没有教材、蜂鸣器，手键也很少。为了解决教材问题，我们就把通报手续、勤务用语汇集起来，想一点，写一点，教一点，并编写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学员。现在看来，那是不称其为教材的，可是当时管用。宁都暴动时，二十六路军又过来一些同志，经大家修改补充，教材就像样了。”

“第三期学员30余人，比第一、第二期多，学员中有原邮电部长钟夫翔同志，沈阳邮电管理局顾问郭龙飞同志，还有邱均品、李文通同志

等。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文化程度高低不一。根据这个情况，采取分别训练的方法。没有文化的先进识字班，学习3个月，而后再学无线电报务技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一开始就学习报务技术。待收发报技术基本掌握后，再增加外文、勤务用语、通报手续等，共计学习6个月。学习有一定指标，经过考试，符合要求的按期毕业，早达到要求的提前毕业，不符合要求的留校继续学习，直到学好为止。”

“第三期训练班开办不久，就发展成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以后又改为红军通信学校。从第六期起学校除无线电队外，还增加了电话队、司号队、旗语队等，信鸽和警犬通信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未办成。通信学校政委开始是杨兰史，后来是曾三同志。校长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过来的刘光甫，他是无线电工程师。我主持教务工作。教员有陈士吾、魏明道、黄乐天、杨笑是和我。当时师生员工1000多人，很像个样子。”

“长征途中，学校改为教导大队。刘光甫是大队长，我还是教务主任。那时一面行军一面上课，大休息时上个把钟头课，到达宿营地再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就这样使技术水平得到巩固与提高。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8月，我们教导大队同四方面军报务训练班合并，在道孚这个地方又恢复为通信学校，教员有我和刘寅……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2月，我们到达瓦窑堡，同陕北的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军委通信学校。”

“在长期战争岁月里，红军通信教学工作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三条：一是教学目的明确，教和学紧密结合，教材内容精简实用；二是教理论与教实际紧密结合，不光教书本，还要把实际经验贯穿进去，结合模型教学，提高实际操作水平；三是课堂学习与课后复习结合起来，除了讲课，还要耐心辅导，因人施教。由于采用了这个方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培养了我们自己的无线电报务人员。”

钟夫翔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搞无线电通信工作是从1931年底开始的。当时，正在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三军团七军代表。开完会后，七军来了通知，叫我留下学无线电。”“我是第三期学生，第一、二期叫训练班，从第三期开始改称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

“学校共有36名学生，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教务主任沈毅力。36人编为一个排，我兼排长。这一期健在的还有钱昌鑫（钱江）、肖森、黄荣等同志。”

“我们这期学习时间很短，不到半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把我分配到总台实习。”

#### 四、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1930年6月红八军、红十六军合并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1931年初，红三军团已配有无线电台，编在九分队，队长吴汝生，政委杨光池。为了适应电台的建设，1931年4月，红三军团在军团所在地会昌举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共办3期，第三期未学完，即合并到红军通信学校第五期。

1. 红三军团训练班第一期于1931年4月开学，9月毕业，由电台负责人吴汝生、杨光池负责，附属于九分队，韦文宫、黄庆元兼任教员。

2. 第二期于1931年9月开学，1932年3月毕业，地址仍在会昌，负责人与教员未变，学员共7人，有林青、黄荣、张应侯、赵宾玉、林拔祖等，除林青、黄荣同志外，其余均在反“围剿”中牺牲了。

3. 第三期于1932年2月开学，9月与军委无线电学校合并。在合并前，训练班地址在江西上饶营前圩。在4月间，三军团的部队到广东南雄参加水口战役，后方人员留在营前圩，无线电训练班与军团的政治大队合并，政治大队长兼政委周桓同志，训练班由韦文宫临时负责。这一期学员共12人，有黄力祥（黄萍）、贺回仔（贺子明）、叶根、贝昌相东（后改名）、汪裕荣、黄荣等。

林青同志在回忆中说：“1931年红三军团成立无线电九分队。队长吴汝生，政治委员杨光池，报务员有韦文宫、黄庆元、吴慕林、李建华（女），机务员刘炳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9月间，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决定，送我（原名林合）、黄荣、张应侯、宾玉（赵宾玉）、林拔祖5人到江西会昌红三军团司令部无线电九分队报务训练班学习。无线电九分队先后举办了3期报务训练班，队长吴汝生兼训练班主任。1931年举办了第一期，学员有曹祥仁、方智等4人。我们是第二期，学员中红七军有5人，还有范振华、余光等共7人。第三期有黄利祥（黄萍）、叶根等10余人。他们后来被送到中央无线电学校继续学习，九分队训练班就停办了。”

黄萍同志在回忆中写道：“红军时代的通信工作，开始的时候，有徒步通信，有信号、旗语、灯光，还有电话。电话不是很普及，像红四军、红五军有一点。等到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电话就比较普及了。第二次反‘围剿’后，我调到总部电话队，学过一段电

话，1931年6月调去的，学习不到两个月，又把我调回到军团，从那时起就跟着滕代远同志。1932年2月打赣江，3月7日撤出战斗，到营前一个圩子上休整了一两个星期，就是在这个地方调我去学无线电的。那时红一、三、五军团有了无线电大队。三军团无线电大队长吴汝生，政委杨光池。除他们2人以外，还有方治、彭康、林青、张应侯、赵宾玉、李建华（女）、韦文宫、吴慕林等同志，人员不少。机务员有陈明，我开始跟他们学机务，不到一个月，成立报务班，我就去学报务了。此外还有两个学机务的，一个叫赵寿，一个叫郭东生。后来让我们撤到江西上饶的营前圩。根据当地的形势，军团决定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离营前圩一二十里的地方，是个山村，山势比较险要，在那里盖一些房子，屯集了很多粮食，彭老总、滕代远同志都和大家一起背运粮食，准备把伤员集中到那里去。在这里经营一两个月后，部队参加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去了，把我们这个报务班留了下来。在留守期间，把我们合并到军团的政治大队，作为政治大队的一部分。那时由韦文宫带着我们，他是我们的教员。当时政治大队兼政委是周桓同志。我们报务训练班和政治大队合并后，差不多是二分之一时间学政治，二分之一时间学报务。学报务的有十几人，现在健在的有贺回仔、叶根、贝昌相东、汪裕荣。那时干电池买不到，就用蓄电池（6伏的），用蜂鸣器上课。以后蓄电池也不行了，没办法只好用嘴念，你念我抄。我们这一期办了一半时，就与军委无线电学校合并了。”

“我们报训班到通信学校后不久，天气就冷起来了。开学时，我们已学了一半，每分钟抄八九十个字。江文同志是第四期的，我们这个班就算第五期。我学习比较快，跳到第四期乙班，江文在甲班，他比我先毕业。我于1933年二三月间结业，到总部电台见习了一两个月便分到十八分队。”

### 五、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第四期）

1932年5月招收第四期学员，校址在江西瑞金县下路头。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教务主任沈毅力。不久迁至洋溪村，学员于1933年2月毕业。

教员有陈士吾、邹成、魏明道、黄东天、朱帮英、阎知非（阎侃斋）、周玉麟、杨笑是等，不少是电台的工作人员兼任教员。

学员20余人，分为甲、乙班。已知的有贺俊贞、江滕芳（江文）、董祥、李行立、陈明新、龚玉、胡备文、刘生雄（刘恋）、郝林等。黄



萍为五期学员，升四期乙班毕业。黄保洪随本期毕业。

## 六、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第五期）

1932年6月在洋溪村招收第五期学员，不久迁至云集圩。校领导同上。教员有魏明道、黄东天、朱帮英、汪英、陈颜、王玉衡等。

学校从这一期开始扩大，设电话队、司号队，共200余人。其中无线电班20余人。因学员水平不齐，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学习。

学员有郭成、钱景瑞、何祥昆、金潘铭、俞得开、刘少洪、王业根、贺回仔（贺子明）、贝昌相东、汪裕荣、李金水、梁思文等。8、9月调贺俊贞、周九生（周涌）插班学习。

甲、乙班于1933年3月毕业，丙、丁班于4月毕业。

## 七、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第六期）

1933年3月招收第六期学员，校址由瑞金云集圩迁至瑞金坪山冈。

这时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招收无线电专业，而且有司号、旗语专业，还准备办信鸽、警犬等专业。“无线电学校”已名不副实，因此从第六期起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这是我军第一所综合性通信院校，标志着红军由单学科的无线电学校，走向多学科综合型通信学校的阶段。

学校无线电科20人，有线电科100余人，司号科30余人，全校后来发展到1000余人。第六期开学时，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内务部长何叔衡同志到校讲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成为红色通信技术人员。

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校教务处长张瑞，无线电科教务主任沈毅力。无线电科教员有黄乐天、汪英、陈颜、周维、魏明道、王玉衡。

无线电科的20人分为甲、乙两个班。已知的学员有李耀渲（李力）、雷永通、吴幼生、麻福芳、夏侯求皇、肖祖德、黄国泉、刘泮林、欧阳景视、罗绍辉、李光寿等。

甲班10人于1933年9月9日提前毕业，乙班10月毕业。

李力同志在回忆中说：“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红五军团参加完著名的东陂、黄陂战役，便在江西宜黄县境内的农村休整，忙着祝捷、庆功和总结工作。当时，我在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正和队里其他同志一起编排文艺节目。突然，队长贺东潮同志叫我，说：‘李耀渲同志（我当时的名字），’

刘伯坚主任要你立即到军团政治部去一趟。’刘伯坚同志是我们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找我去有什么事呢？到了军团政治部，刘伯坚同志简单地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文化程度及参加红军的经历，然后说：‘军委办了个通信学校，要抽调一批政治可靠，又有一定文化的红军战士去学通信技术，军团政治部经过研究，决定调你去。’‘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发展壮大，指挥作战，传递命令，了解情况，光靠通信员两条腿跑已经不行了，要靠先进的通信工具，有了先进的通信工具，我们指挥作战才能眼亮耳敏，仗就更易取胜。’首长的话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我，使我浮想联翩。当时我虽未与电台打过交道，但多少知道一点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有的战役，就是因为缺少现代的通信工具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说红军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机体的话，那么军事通信工作就是它的传感神经，这一机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就必须要有反应敏捷的神经系统。而当时红军的通信工作还很落后，电台很少，除军团领导机关有电台外，部队基本都靠通信员传达命令，传递情报，这是多么亟待解决的问题啊！想到这里，我站起来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军团和首长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

“随后，我便背负着军团首长的殷切期望，怀着满腔热情，去军委通信学校。五军团与我同时调到通信学校学习的还有黄国泉、夏侯求皇，我们是一起结伴从宜黄驻地赶到瑞金的。军委通信学校设在离瑞金城20里的平山冈。平山冈是山区的一个小村，交通不便，较为偏僻，只有十几户人家，学校就设在村中一幢瓦房中，村旁一块晒谷场，有一副篮球架，是球场，也是操场。村里没有商店，但距离平山冈二三里远的云集圩街上有几家店铺。当我们赶到通信学校后，各军团选送的同学也陆续赶到了，共有21人。进校之后并不是马上就成为正式学员，还要经过一定的考核和体格检查。记得体检时还重点检查听觉，教员拿着一块怀表放在一定的距离，检查你是不是听得见表的‘嘀嗒’声，当时我们感到挺新鲜的，闹不清这样检查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开始学习收发报，才明白是检查我们的听觉，报务员收报完全靠耳朵的听觉来区分‘嘀嗒’‘嘀嘀嘀嗒’，听觉不灵敏是不能胜任的。经过学校检查除一人不合格退回了原部队外，我们20人便成为军委通信学校的第六期学员。”

“军委通信学校校长是刘光甫，政委是曾三。教职员大约有20~30人，其中任教的教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军队解放入伍的通信技术人员。教员不到10人，我记得有沈毅力、汪英、陈颜、周维等。我们第六期进

校时，第五期的丙、丁两个班还未毕业，直到三四个月后才毕业。而在他们即将毕业时，第七期学员又进校了。我们第六期在校期间，通信学校学员教职职工约 100 人左右。”

“学校的物质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当时虽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但整个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封锁之中，蒋介石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而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路线又推行越来越‘左’的政策，苏区的物质供应越来越困难了。学校属于后方，当时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必须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前方，因此，后方的物质生活自然更艰苦一些。记得在前方作战部队工作时，虽然每人每天也是五分钱菜金，但常常打土豪，筹款子，打了胜仗又常有缴获，每到月底便可分到点伙食尾子。这样，战士们手中便有点零钱可以买些日常用品。后方就不同了。我们在通信学校时，饭虽能吃饱，但常常是南瓜、白菜，缺油少盐。数量也少，开始吃饭时还能挟上两片南瓜，吃到后来便只能喝点菜汤了。就这样，每天每人五分钱的菜金也差不多都吃光了，月底一结账，往往剩不下几个钱。有时也分到过毛把钱，但学员们多数是青年团员，互济会员，一交团费、会费，也就不剩钱了。”

“然而，艰苦的生活也锻炼了我们，使我们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学员上课没有现在常用的‘振荡器’，每个班只有简易的‘蜂鸣器’，大家轮流练习，没有轮到的人便在一边背电码，练手指。此外，抄报用的纸笔也十分紧缺，平均每人每天一张纸，这哪能够用呢？然而，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大家也找到克服困难节约纸张的方法。为了使每一张纸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我们开始抄报时尽量写轻一点，等到写满了再用橡皮擦掉重写，正面写完了再写反面，直到抄报纸上密密麻麻不能再写为止。就这样每星期 10 张抄报纸还常常节省下两三张。至于铅笔，更是注意节约，小心地削，轻轻地写，用到最后剩下香烟头那么一小截时，便用小竹筒子套上，接长了再用，一点都没有浪费。那时铅笔供应相当紧张，如能发上一支巴拿马牌的，铅芯不软不硬，大家就很高兴了。但有时发的笔铅芯过硬，常常把抄报纸划破，这是最头痛的事。学习紧张的时候，每个学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支较好的笔。有一回我上云集圩，在店铺里看见有一种铁壳活动芯铅笔，不贵，只要毛把钱，我看了老半天，多么想买它一支呀，然而，没有钱，不能买。至于缺少生活必需品，大家就不那么计较了，没有钱买牙粉，就用牙刷沾点水刷牙，公家每月只发两双草鞋费，不够穿，就自己打，或者

上两块木板钉上两根布条当鞋穿。横竖是苦惯了，再苦点也没有啥。”

“军委通信学校第六期甲班的10名学员是1933年9月9日提前毕业的，这是军委通信学校最短的一期。毕业的时候曾三政委代表学校给我们讲了话。他总结了我们半年来的学习与生活，指出：‘只有我们红军战士才能有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通信学校的学业。’他勉励我们再接再厉，在前方的战斗岗位上，进一步努力钻研技术，提高业务能力，成为红色通信技术人员，为红军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军委通信学校毕业后，我分配到军委电台工作。在长征途中，我又先后在九军团、五军团电台工作过。在以后十几年的战斗生活中，尽管我也经历了许许多多悲壮曲折的战争场面，吃了许许多多的苦，然而军委通信学校6个月的生活，却总是难以忘怀的。确实，那6个月的学校生活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在我的心中，它又是那样的不平凡，那样地火热。它时时在我心中掀起波澜，伴随我爬雪山过草地，走过那更艰难的革命历程……”

### 八、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第七期

1933年7月，招收无线电科第七期学员，校址及领导人均未变。从这一期开始增设旗语科。

全校学员300余人，无线电科30余人，有线电科100余人，司号科80余人，旗语科50余人。

无线电科分甲、乙、丙班。学员排长余光荣，已知的学员有曾庆良（曾庆谅）、赖勤生（赖生）、张玉山、金宝昌、肖萍、任居仁、李嘉汉、李光鑫、刘世清、龚兴贵、李光寿、李鳌鱼（李旭）、马日晖、蔡文兰、黄明生、罗雄辉、余光荣、尤宜春。

甲班于1933年年底毕业，乙、丙班于1934年2、3月毕业。

### 九、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第八期

1934年2月，学校由瑞金平山冈迁至云集圩，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校部下设政治处、秘书处、训练处、队列科、总务科、俱乐部。学校设无线电科、有线电科、司号科、旗语科。其中司号科学员即600余人，分为5个区队。全校师生近千人。

因学员招收的较多，文化水平不能全部达到规定要求，所以从第七期开始增设预科，学员入学后，文化水平低的先进预科补习文化，然后升入本科。



下面是第八期学员（即预科第二期）征调的通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征调无线电第二期预科生条件及分配名额的通令**

司字第一号（原司字第一号改司字第四号）

现通信学校无线电科第七期已全部毕业，须即征调第二期预科生，选送学生各项条件如下：

一、条件——贫苦工农分子，政治上坚定，年龄在17岁以上23岁以下，文化程度：能看普通文件写简单书信，脑筋灵敏无耳病者为合格，不分男女。

二、各部应征调数目分配：

一军团六名、三军团六名、五军团四名、七军团四名、九军团四名、工人师二名、江西军区二名、福建军区二名、粤赣军区二名、闽赣军区二名。

三、到达日期——限于三月十四日前到达军委，望各部即按征调数征调为要。

此令

主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

根据此调令，第八期于1934年3月开学，无线电科34人，实际报到20余人。已知的有：邱和兴、艾清山、张日银、罗朝彬、李寿标、李家焕、罗振云、钟道云、曾锦春、黄金乐、李占荣、龙炳旺、钟寿山、刘孟成、钟云通、钟启芳、朱×增、黄明生（七期，因病在此期毕业）。

这期学员于1934年6至8月间毕业。

这一期司号科学员很多，司号科改编为司号大队，下设5个区队。下面是选调司号科、有线科学员的命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通信学校学员分配及选送问题的命令**

司字第十六号

——1934年4月18日——

通信学校电话架设班第二期四月底即可毕业，须即征调第三期新学员，决定由各部电话排内抽调，各部应调名额分配如下：

一军团四名、三军团六名、五军团（三十四师在内）六名、七军团四名、九军团四名、江西军区二名、二十三师二名、福建军区（二十四师在内）四名、粤赣军区（二十二师在内）二名、电话总队四名，

合计三十八名。

条件：

- (一) 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
- (二) 政治坚定，工作积极。
- (三) 身体强健无疾病者为合格。

附注：

- (一) 毕业后分配到各电话队工作。
- (二) 如电话排不能选出，可在其他部分选调新学员，概于五月十日前到达军委转送通信学校训练。

此令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通信学校司号队学员条件名额规定的命令

司字第四十二号

——1934年8月15日——

(一) 通信学校司号队学员已陆续调到各部队工作，现需继续招生训练，并教以简单的各种信号及音响通信，各部应选送名额如下：

一军团十八名、三军团十八名、五军团十二名、九军团六名、赣军区四名、闽军区四名、粤赣军区四名、闽赣南军区四名。

(二) 各部选送学生条件是：

- 1. 直接参加过战斗的战斗员及通信员而是工农成分。
- 2. 政治坚定、身体强壮、肺部发达。
- 3. 年龄在二十四岁以下，十八岁以上者。
- 4. 文化程度不受限制。

规定各部选送的学生，限于十月一日前，有组织地送到瑞金总兵站第二招待所转通信学校。

此令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通信学校无线电科征调学员条件及名额的命令

司字第三十五号

——1934年7月8日——

通信学校无线电科第十期预科，现已修业期满，已转入正科学习，

将继续开办无线电第十期预科。预科定额为三十名。

1. 决定各兵团及各军征调数目如下：

部别	数目	附注
一军团	二名	
三军团	六名	
五军团	四名	
军委直属队	三名	
闽赣军区	四名	连西方军在内
福建军区	二名	二十四师在内
粤赣军区	二名	连二十师在内
赣南军区	二名	连二十一师在内

2. 学员条件

- (1) 工农出身政治坚定的。
  - (2) 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四岁以下的青年初级指挥干部或通信员、战斗员。
  - (3) 文化程度：最低限度要能识两百个字以上。
  - (4) 身体强壮没有耳病目病的。
  - (5) 要有学习精神的。
- 以上规定，仰各首长转饬所属严格遵照执行。

此令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

## 十、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第九、十、十一期

1934年4月以后，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使中央苏区及红军陷入困境。自1933年9月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虽然取得局部胜利，总的来讲我军已十分被动。7月，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边前进。8月，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探索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路线，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红军通信学校的第九、十、十一期正是处在这一时期，抽调的学员不能按规定数量准时到校报到，学校也在进行调整，最后合编整顿，在长征中办学。

1. 第九期

1934年3月，通信学校招收第九期学员，因局势紧张，多数单位

选调的学员未能按时报到，已知的学员有俞铎、黄启贤等。

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教务主任沈毅力，教员有陈士吾、赵绍先、刘俊英、李柱南。

### 2. 第十期

相隔一个月，于1934年5月，又招收第十期学员，这期学员主要是从通信学校司号大队中抽调文化水平较高者，调到无线电科学习。

### 3. 第十一期

1934年7月8日，军委又下令征调第十一期学员。

以上三期同时在校学习。九期分甲、乙班，甲班毕业后，乙班经过调整，只有李贻玉、叶法胜等几个学员。十期学员到校后，分为甲、乙班，甲班大部是司号队调来的，乙班是从前方调来的。不久十一期学员又到校，校方对学员全部进行考核整顿，凡是合格的都升到九期，有些文化水平过低的，回到原部队。所以在长征前，第十、十一期已不存在，只有九期。

这三期的学员有袁以辉、黄奕棋、刘科彬、曾本山、李贻玉、叶法胜、杨立镇、曹明衍、邹文清、钟明江、聂鑫、郭德明、刘周映、方起寿，通信学校干部朱梅桃（女）、丘×英（女）也随班学习。

这三期情况较复杂，以上材料是根据袁以辉、黄奕棋等同志提出供的材料整理的。在长征中最后剩下六七人，分配到电台实习。

## 十一、通信学校无线电高级班、机务班

1934年7月，为了提高在职通信干部的理论水平及维修技术，举办高级班，这一期与普通班第九、十、十一期同时在校学习，在长征前结业。

学员共5人，即钟夫翔、李景瑞、朱虚之、郑执中、李林。

在与第九、十、十一期的同时，通信学校还举办一期机务班，学员10余人，已知的有钟兆隆、罗兴方、廖昌林。机务班在长征中渡乌江前分配工作。

## 十二、通信学校在长征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通信学校机构及学员都进行精简，仍保持原建制，改称“通信教导大队”，共425人，编入红军通信团，大队长刘光甫，政委曾三，代号为“红星”第三大队。这时通信学校只剩下袁以辉、俞铎、黄启贤、黄奕棋、刘科彬、曾本山、李贻玉、叶



德胜、杨立镇、曹明衍、邹文清、钟明江、聂鑫、郭德明、刘周映、方启寿、朱梅桃（女）、丘×英（女）等18人。在长征途中继续学习，1934年12月，部队到达贵州翁安附近的猴场，李贻玉、叶法胜分配到三军团，曹明衍分配到一军团，袁以辉、黄奕棋分配到中央军委台，聂鑫等同志分配到电台实习。

通信学校在长征后，留有少部分人在中央苏区继续办学，后大部分被敌人杀害。

### 十三、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恢复通信学校名称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会师，通信学校与四方面军电训班合并。2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召开机报人员联席会，1935年8月，教导大队在道孚地区又恢复了军委通信学校的名称。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除普通班外，还有一高级班，有聂鑫、刘周映等。8月12日，伍云甫奉命率通信学校及电话队回到卓克基，随总部行动，北上陕北。校长刘光甫，调四方面军工作，离开通信学校。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2月到达瓦窑堡，军委通信学校与陕北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军委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政委曾三。

中央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共办11期，后合并为9期。全校共培养各类学员（司号、旗语等）2100余人，其中无线电通信人员约200人。

关于通信学校第九、十期及长征中进行学习的情况，袁以辉同志有较详细的回忆。

袁以辉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34年3月的一天，当晨雾在山峦渐渐散去，天边染上一抹红霞的时候，我告别了领导和战友，背着背包，大步流星地前往中央军委通信学校第一队所在地——瑞金云集圩走去，参加无线电通信训练班学习。第一队设在一家土豪的院里，上下两层楼房，屋子里没有课桌、凳子，大家伙在地上打几根木柱，再架上木板，就成了课桌和凳子。”

“学习开始了，课程表上排着电学、无线机械常识、收发报、通报等课程，其中还有一门英文。我们不仅没有见过英文，连听说还是第一次，大家都怀着好奇的心理，想看看外国字是什么样儿。沈毅力老师来上英文课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English’说：同志们，这个词的词义就是英文，读音是‘英格里许’。英文有26个字母，所有英文

单词都是这些字母组成的。收发电报的嘀嘀嗒嗒声，就是阿拉伯数字0~9。我们用英文字母编成电码代替汉文发出去，是非常方便的。比如，e代表1，b用2代替，拍发出去，对方就知道是‘再见’。我们这些掌牛鞭子、拿锄把、握枪杆子的，学习它却尝够苦头。这些字母不方不正，不圆不扁，曲里拐弯的，真稀奇！课间大个子李贻玉风趣地说：‘好家伙，地雷、手榴弹、刺刀？’李贻玉走到黑板前指着a说，这家伙像地雷，指着b说，这家伙像手榴弹，指着f说，这家伙像刺刀。同学们都捧腹大笑起来。这事传到政委曾三同志那里，他听了也好笑，特地跑来鼓励我们努力掌握这些武器。”

“从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越来越复杂。为了帮助自己记忆，我把英语的读音与生活常见的事物联系起来。如message（电报），有点像‘墨水剂’，‘if so’（如果这样），读音像‘医务所’，copy（抄写）读音像‘考你’。虽然是土办法，但都容易记。我把这个办法告诉李贻玉，他却挨了顿批。Something（一些事情）一词，李贻玉记不住，班上一个同学叫曹明衍，读音有点像。当老师提问时，李贻玉语音清晰地回答‘曹明衍’。沈老师一听，大发雷霆。”

“由于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到1934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剩下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几个县了。这时敌机来轰炸瑞金的次数多了。不可能坐下来继续学习了。果然，我们无线电队各科提前考试。一个个科目接着进行，最后轮到考英文。同学们很担心李贻玉，沈老师却偏偏先考他翻译能力。沈老师说：‘电报。’李贻玉站起来从容翻译成英语‘message’。‘我这里有电报给你，请抄录’。‘Here are some message to you, please copy.’沈老师用英语说：‘I have an Urgent message to you, please answer at once.’‘我有紧急电报给你，请你立即回答。’李贻玉又顺利地译成中文。沈老师笑着点点头。沈老师说：‘我平时对你态度很粗暴，你对我有意见吗？’李贻玉坦率地说：‘你对我态度粗暴的时候，我心里不舒服，过后，明白了你的好意，也就心情舒坦了。’沈老师深情地对大家说：‘我虽然是你们的老师，但我在你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看到了红军战士的顽强意志。’”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伟大的长征，通信学校的代号是‘红星’第三大队，学校保持原建制。1934年10月20日，红一、红三军在江西信丰、安远一带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古陂宿营。虽然十分疲劳，但我一想到未全部掌握全部电台技术，趁宿营时间拿出蜂鸣器练起收发报来。同志们也都围了上来……在长征路上，大家一片纸

也没有，就用树枝在地下记下来。突然，沈毅力老师高兴地说：“03 电台，here are many messages to you qrk?”（这里有电报给你，现在情况怎样？请回答）我立即回答：“01 电台，please gd”。（请你立即发报）沈老师连说三个“OK！”这时刘光甫校长和曾三政委来了，见大家情绪这样高，表扬说：“长征路上办学，这是我们红军的创举！”集合号响了，部队沿赣粤连界继续向西挺进。”

“1934 年 12 月，红军向五岭的最后一座山——老山界进军，在山下休息时，我们又抓紧时间学习电台知识。队伍中忽然传来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来了的消息，同志们刷地站了起来。只见周副主席穿一身因被风吹雨淋而褪了色的灰军装，打绑腿，着草鞋。他俩日夜操劳，都比开始长征开始时瘦多了。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见了我们的蜂鸣器和地上写着的阿拉伯数字，很感兴趣地停下查看。‘你们是通信学校学无线电的？’周副主席打量着我们。‘是！’我们齐声回答。他转向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休息时间学电台技术，真不简单呀！’朱总司令亲切地对着我们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周副主席接着说：“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教材啊！”临走时，首长鼓励我们刻苦学习。”

黄奕棋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学校最后一期即第十一期的学员，以后才升到第九期乙班的，我入校时间是 1934 年年初。当时的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教员有陈士吾、李柱南、刘俊英、张瑞、沈毅力，还有两个是打龙岩后参加红军的，一个教外语，一个教电学，名字记不起来了。”

“我进校的时候，正值学校第八期学生毕业，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期学生考试时，我看到仅英文考试就在两块大黑板上写得满满的，这说明他们前几期的学习是按计划按部就班正规化进行的。而我们入学后全课程都是采用速成的了。后来由于环境越来越困难，国民党的飞机频繁来袭扰我们，上课都得进山洞里去，直到黄昏才返回学校。同时又由于在积极地做长征的准备（当时我们学员对做长征的准备是不知道的），当时生活也很困难，粮食是定量的，每人一天没有超过半斤的，吃的油、盐、蔬菜都没有，靠学生去挖野菜交给伙房做没盐的淡水酸菜。有时能弄到点硝盐也是不容易的。其他学习用品如纸张、铅笔不仅数量少，质量也差，还要节约使用。”

“我们第十一期部分同学提升到九期乙班，其原因就是要准备长征。由于十期、十一期有一批同学升到九期乙班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一批人在长征路上一直跟随总司令部行军，在行军中继续学报务。教员是第一分队电台报务员兼任的。另外还有一个机务班，也有10来个人，钟兆隆同志就是那个机务班的，还有罗兴方、廖昌林。报务班、机务班，我记得过乌江前就分配到第一分队和第六分队见习去了。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报务班，只剩下几个人，有我和袁以辉，其余有的阵亡，有的病故了。”

聂鑫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1934年，我先后在红十八军、五十二师、十八师当通信员、宣传员、警卫员。1934年5月—1935年10月，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中央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后随一方面军长征。在中央总部到达四川懋功时，一、四方面军会合，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先后在第四、九、三十军、西路军总指挥总电台当见习报务员。1936年6月，在迪化（乌鲁木齐），我在新设立的干部大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习。总负责人有三局局长沈侃夫和王子纲，刘寅负责训练工作，我任训练班班长。1938年4、5月间，从新疆回到延安。”

秦华礼同志在回忆中说：“1934年秋天，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通江县有个通信学校（无线电训练班），由电务处长沈侃夫管，教员姓戴，名字记不清了。我到学校比较晚，是在部队过嘉陵江时入学的。邓国军、刘继明、胡正先等同志比我去得早，我们是同时毕业的。那时学校共有30余人，组成一个排，我是排长。和我一个排的有杨大奎、李福荣、冯国寿，还有个姓黄的同志，在我去之后，还有一批学员。我们学习的科目有报务、机务、英文和通报用的缩语。”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两个方面军的通信学校合并在一起，校长刘光甫，教员有刘寅、沈毅力，兼课的教员有李世俊、王玉恒，岳夏专教英语，政治课教员是刘振堂。我们进校时，原准备学习一年时间，实际上只学习了8个月，到1936年5、6月就毕业了。还有一个高级班，学员有聂鑫、郭龙飞、刘周映、钟明江等同志。”

“通信学校上课是很艰苦的。在民房上课不到两个月时间，其余都在野外上课。虽然我们学习的条件很差，可学习的劲头都满大的，例如，26个英文字母不到一个礼拜就都背熟了，还学会了拼音。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目的明确，并且与各个方面的活动配合得很紧密。例如，集合报数，晚饭后做游戏，规定用英语 one、two、three……；行军休息时，采取两个人编一组，随时都可以相互学

习，学习班使用的是木头电键，数量也很少，30多人只有6个，在平时是用大拇指去练，行军中也是边走边练。我们用的是前方电话队用完了送到后方的，已经没有电了，就把锌皮插上几个洞，放在竹筒里用盐水泡起来，还可以用很长时间，我们叫它‘麻子牌’电池。铅笔、纸张很少，一个月只发一支铅笔，沈毅力教员专门给我们讲怎样削铅笔，规定只准削掉木头，不准把铅削掉，抄报时要转着用；纸每人只发一小块，到考试时才准用，平时练习抄报用的是打土豪时从地主家抄来的古书和打仗时缴获的文件。缴获的收音机拆掉后交给学员自己保管，如电容、电阻、变压器等。我们把这些零件看成宝贝一样，保管得很好。机务课主要是刘光甫讲，讲他个人的经验，他的经验很丰富，机器什么毛病，会出什么现象，讲得很清楚。他讲，我们就听，也不会记笔记，因为我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

“刘光甫讲的那些经验，后来我们在工作中确实都用上了。我们还学习装机器，学的是哈特莱发报机和三管收报机，发报机用两个31号管，收报机用三个30号管，都是RCA公司生产的。学习方法是把地上铲平弄平，用棍子在上面画个图，然后在上面摆好零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布线，知道那一根线怎样连接。进一步就是在木头板上去摆，把线绕上就可以了，也不必焊接，摆好后由教员检查，接好线用电表量一量，那时只有一个150伏的电压表，通了就行。第一个人装好后拆掉，下一个人再装。就这样，我们都学会了装收发报机。”

“我们学习收发报是很紧张的，只要有一点时间，即使是行军休息一小时也要上课。还要学文化，规定每天识两个汉字。行军时，每个人的背包上挂个小木牌，上面写上汉字，前面的人走，后边的人就学。就这样，我们毕业时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发报一分钟可以发到140个电码，我在学校一共学习了8个月，由于前方要人，我们就提前毕业了。”

#### 十四、红军总部通信材料厂

红军通信学校是教学单位，但与通信材料厂有密切关系，下面引用通信材料厂厂长涂作潮同志的一段回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间，我们总队随红军总司令部由前方回到了瑞金。一天王诤同志对我说：‘红军中现在收发报机不少了，有的需要修理，有的需要改装，我看你就在后方负责搞这一工厂吧。’我同意了。不久，军委命令成立无线电通信材料处，我任主任。”

“当时全处只有六七个人，我现在记得有：张永生（留苏学生，苏北人）、肖寒、刘本秀（负责伙食管理），此外还有学生张明清、肖明治等。另外，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起子）。但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凭着双手修理好几台收发报机和一些发电机，还将一台国民党‘交通兵团’造的收发报机改为‘哈特莱’式，波长也由原来的80~130米改为40~70米。”

“1932年年初，材料处由瑞金搬到于都北面的平安寨的一大山洞里，这个洞深几十里地。三月间，王净同志派我到红三军团去，要我在红三军团打下赣州后，进城买点无线电通信器材回来。我到三军团后，住在无线电队里，一天，我去前沿阵地看红军攻城。看到彭德怀同志在指挥一门炮，瞄准赣州的城门，一发（也只有这一发）炮弹就准确地把城门楼子轰掉一个角。后来由于蒋介石派罗卓英增援赣州，红三军团围攻不下，便撤回了苏区，我也随着回到了于都。”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王净同志的布置，我用从上海偷运来的无线电零件、配件，为赣东北苏区装配了一部TNT型号的50瓦电台。我好像记得，当时随电台去赣东北的机务人员是余亚禄（苏北人，宁都起义）等。”

“当时我们除了修理收发报机外，还能够做电源插头、蓄电池、活塞涨圈、齿轮等。此外，我们还能制作落地就响的手榴弹。后来我们还改装成功一台手摇发电机，但是比较笨重，光齿轮箱大概就有六七十斤重。”

“到1934年年底，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红军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4市两的粮食，菜里几乎没有咸味（一块银元只买七钱二分盐，而且还买不到）。但是我们都是积极愉快地工作着。”

## 十五、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生活

红军通信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生活十分活跃。下面摘录当时报刊上登载的通信学校的生活情况。

### 1. 《红星》第三期第三版（1933年8月19日）

#### 通信学校的活跃

通信学校成立不久，在纪念“八一”的工作进行上，特别表现了他们的活跃。在党中央局关于“八一”决议案的各项号召之下，都有了布尔什维克的回答。这主要的表现在：

一、在提高军事技术上，他们除了各队完成教育计划外，第一队的

六期甲班学生，提出了“五个月完成六个月的计划”的口号，落后的五期丁班学生，也得到了优良成绩而毕业，帮助落后的同志学习已是全校学生的口号了。全校与通信材料厂合并开了一个运动大会，不但提高全体学员对赤色体育运动的注意，而且他们表演的刺枪动作又整齐、又精神，技术人员的军事化充分表现了出来。

二、经济战线上的伟大成功。外籍红军请求免发那未发的两元公债，在反帝拥苏盟员大会上得到百分之百的成功，一共又退还了公债三十元五角，各队共募集草鞋一百一十余双，募集助战费大洋二十七元五角一分。私人节省亦得到很大成绩，计划光甫校长二十七元、周维同志十元、汪英同志三十元、沈毅力同志八元，节省籍一元五角五分二厘。这些都是热烈的自动捐助，虽然自己打赤脚，也拿所有的钱去买草鞋慰劳新战士。这一次表现得最令人敬爱的是第一队党团员，在七月二十四日晚上用冲锋的精神，一点钟之内，募得六元多大洋，又第一队团的第一小组、党的第五小组发起每人做一双草鞋，又搜集了二十八双之多。

三、通信学校对于政治上的学习是特别提倡的，他们希望把每个无线电的报务见习生，都练成为各分队青年工作及列宁室工作的领导者；每周有政治报告，讨论会或演讲会，已经造成一个学习政治的热潮，每一个忽视政治学习的现象，都给以无情的斗争。

这些成绩是不是够了呢？他们并不以此自满，他们正在拿这个经验去计划与进行“九四”的工作，他们的口号是：

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要做到政治是坚定的，技术是精明的，体格是健康的，这三个条件。

## 2. 《红色中华》第一六八期第三版（1932年3月29日）

### 通信学校的节省运动

瑞金通信学校全体工作人员及学生，响应本报节省号召决定：

（一）节省灯油的实际办法——早晨提早起床，把温习的时间提到早上，把会议和讨论放到晚上，并利用月光开会，实行会合办公。（二）节省纸张，尽量利用一切废纸写字。（三）保护公物，进行补衣运动。（四）保护灯罩。（五）在伙食方面，除节省食米外（甲）协助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使成为改良伙食、杜绝贪污的主要设计机关；（乙）消灭贪污浪费和偷窃现象；（丙）糠菜养猪，并用大力来开煤矿（全校每月买柴需大洋三百五十元以上，真是很大的数目）。

## 3. 《红色中华》第一零四期第五版（1933年8月22日）

## 通信学校拿起锄头

——为积极进行秋耕而斗争——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还是做礼拜六工作去吧！”这是通信学校学员每一个星期六上午必做的工作。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却不同了，各队在党总支委员会号召下，开展了一个热烈的伟大的苏维埃菜园运动，来创造大规模的苏维埃菜园。

前几天就向苏维埃交涉好，找到三丘大田，今天早晨各人借好了锄头簸箕，早饭以后，便个个都在田上工作了。真勇敢呀！他们田里所需要的水，都是由塘里挑去的呢。这个说，种萝卜菜最快，那个说，种青菜。谈谈笑笑，虽酷暑亦不觉得热。

## 4. 《红星》第四十一期第四版（1934年5月10日）

## 回答本报每月再节省六万元的号召

——通信学校

## 一、通信学校节省伙食尾子（四月份）

第一队	米三百斤	菜钱十五元
第二队	米三百斤	菜钱十五元
第三队	米三百斤	菜钱十五元
第四队	改编的	菜钱十一元
第五队	米三百二十一斤	菜钱十五元
第六队	尚未结清	菜钱八元
校部	米十八斤	

## 二、通信学校有津贴的同志节省：

刘校长	五十元	周节文	八元	曾青云	一元
张瑞	十五元	叶寿山	五元	吴如生	十五元
曹莹	十元	白铸	五元	赵绍光	十二元
陈士吾	十元	沈毅立	五元	李桂南	三元
董哲	一元	杨培得	一元		

## 三、通信学校的退还公债：

二期公债十一元五角（内马连生八元五角、李教泽三元）；

建设公债七十四元（内叶寿山十八元，曹莹十五元，曾青云五元，其余各队零星交到）



### 第三节 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红二方面军是由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组成的。1928年年初，周逸群、贺龙同志受党中央的派遣，先后到达湘鄂西的桑植、鹤峰一带组织武装斗争，不久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春，段德昌等在洪湖地区建立红六军。1930年7月，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邓中夏任政委。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1934年年初，红三军由湘鄂西转至黔东地区。

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开赴井冈山，黄公略率余部坚持湘鄂赣游击区的斗争。1929年10月，红五军北上湘鄂与原留守的红五军一部会合，逐步建立了湘鄂赣根据地，当地红军编为红十六军。1928年7月，平江起义组成的红五军，在1929年转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苏区，1930年当地武装编为红八军。1930年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委。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湘鄂赣的红十六军被迫转移至湘赣根据地，与红八军合编为红六军团，坚持武装斗争。红八军改为十七师，十六军改为十六师，十八军改为十八师，统归红六军团建制。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1933年年初，红二军团不得不离开洪湖地区，转至湘鄂川黔地区。红六军团也于1934年10月，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下，由湘赣、湘鄂赣苏区转至黔东。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会师，红三军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统一领导红二、六军团。

红二、六军团经过一年的斗争，创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9月，蒋介石调动130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1936年6月到达甘肃会宁，红一、二、四3个方面军胜利会师。

#### 一、红二、六军团无线电通信的建立

1930—1931年，湘鄂西、湘赣、湘鄂赣地区红军不断发展，作战

规模不断扩大，急需建立无线电通信。1931年年底，洪湖苏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邓中夏同志，曾三次给党中央去信，要求派人建立无线电台。

1930年9月31日的信中写道：“第一次报告中所要求各事均请办理，特别是无线电话（台）要紧之。”

1930年10月15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请派无线电话（台）的同志来，并携带应用电器，又须与中央长江局约好密码。”

1931年1月3日的信中写道：“无线电报的人才及材料，望速派人送来。”

1931年10月26日，湘赣苏区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无线电机及人才此次必须要求你们兑现交代表带来，以便打通湘赣省、湘鄂赣省到中央区的交通，这是与建立全苏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打通各省苏区有重大关系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实行交通上（的）计划。”

党中央根据他们的要求，于1931年1月底，从上海派了无线电通信人员喻杰生等同志，携带一部50瓦电台到洪湖苏区，从此湘鄂西有了第一部电台，但不久喻杰生同志去世。1931年10月15日，湘鄂省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到：“这次运来的无线电机在武汉已被海关抄去未（到），同时此间无线电负责同志早已牺牲，请中央另选特种技师来。”

1931年10月16日，夏曦同志给中央的信中也提到：“无线电喻同志已病死，此间无线电没人招呼，红三军需装设军用无线电。”

根据湘鄂西的要求，1931年年底，中央从上海派去刘进、胡天白到洪湖地区，不久又派学过电气专业的大学生李文彩到电台管机务工作。1932年洪湖苏区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赣东北苏区正式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但是在1932年10月敌人第四次“围剿”时，红三军在向黔东南转移中，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将电台埋掉，电台人员失散，红三军（即二军）与各地无线通信联系中断。

湘鄂赣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台，是1932年6月由中央苏区派去的。电台队长徐萍，政委肖英和报务员、机务员各一名，配50瓦电台一部，并与外地沟通了联系。1934年5月中旬，在宜丰、奉新地区遭敌人6个团的包围，在战斗中失去电台。

湘赣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台，是1932年10月中旬由中央军委派去的，电台队长阎侃斋（阎知非），政委周德元，跟随到红八军就任军长的肖克同志一起去的，带50瓦电台一部。同去的还有报务员张有年、胡鹄、吴潮，机务员刘德才，见习生张玉山、边忠福等。电台建立后，

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建立了联系。

1933年6月，党中央派任弼时同志就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江文同志带5瓦电台一部随同前往。正值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同湘鄂赣调去的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这时成立无线电中队，阎侃斋任队长，江文任政委。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后，建立以塔卧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战斗中缴获大小电台7部，收报机一部，成立电台大队，阎侃斋任大队长，江文任政委。1935年11月长征，1936年6月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

## 二、红二、六军团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

红二、六军团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常常得不到中央指示而无法行动。1932—1934年近两年中，与中央联系几乎中断，派交通员往返需半年，人员常常在途中被敌人杀害，即使带回信息，也时越半年。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贺龙同志说：“宁可丢掉一个团，也不能丢掉一部电台。”有的指挥员规定，打土豪得到鸡也要分给电台一只，以示关怀。王震同志把电台比做神经系统，一旦麻痹，一个人的行动就会失常。根据这些情况，二方面军下决心培训无线电通信人才。

湘鄂西苏区在1932年建立第一部电台，台长刘进同志，亲自挑选严成钦、熊大树到电台，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报务员。后来撤离洪湖地区，电台被埋掉，因此未能举办训练班。

湘赣苏区自1932年10月中央军委派阎侃斋带电台到苏区后，开始举办训练班。

### 1. 第一期

1932年12月中旬，湘赣军区在江西永新县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电台队长阎侃斋（阎知非）、江文兼课外，张有年也兼课，1933年5月，王永浚同志参加红军，也担任教员。

学员约10人，他们是彭富九、孙志高（孙勇）、赵瑾、黎仁、贺回仔（贺子明，由三军团电训班转达来）、李忠国、王永祥（后叛逃）、彭绪道（后叛逃）。这一期于1933年7月毕业。

### 2. 第二期

1933年10月，在永新又办了第二期，仍由阎侃斋、江文负责，教员有王永浚、阎知非（兼）。

这期学员约7人，他们是龙振彪、旷泉吉、肖荣昌、康元芳、李继

生（未学完）、胡义生（未学完）。这一期于1934年4月毕业。

### 3. 第三期

1934年12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12月在永顺县塔卧镇举办第三期电训班，负责人仍为阎知非、江文，教员有杨继昌、龙振彪。

学员有8人，他们是黎东汉、颜吉连、刘细晚（刘宗舜）、江涛（江天生）、刘智能、贺保里、刘华生、贺家泰。这一期到1935年4月毕业。

红二方面军共举办以上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共培养约23名学员。

阎侃斋同志在回忆中说：“为了加快无线电通信发展的步伐，经军团首长同意，在湘赣苏区的永新县，由江政委和我制作了一个蜂鸣器，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将张有年调回中队任教，改由张玉山任电台队长。”

“在湘赣苏区永新县共开办了两期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第一期是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第二期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4月。以后又在湘鄂川黔苏区的永顺塔卧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时间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6月。”

“这三期学员的毕业，给红二方面军无线电通信的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此外还有从三军团来的贺回仔，从一方面军来的周涌（原名周九生），以及赖渊、严成钦、刘法壙、彭洪志、雷才民等同志。”

彭富九同志在回忆中说：“湘赣军区从开始建台以来，对培养无线电干部非常重视，抓得很紧，在第一部电台到达不久，就开始选调学员，于12月中旬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就开学了。这一期学员有孙志高（现名孙勇）、赵瑾、黎仁、贺回仔（现名贺子明，是由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转来的）、李忠国、彭绪道、王永祥等。我当时在永新县担任儿童局书记，经冯文彬同志推荐也参加了第一期训练班学习。起初因无固定教员（在7个月内换过四五个教员），又无成文教材，后又因敌情变化而多次转移驻地，耽误了一些学习时间，延至1933年7月中旬才毕业。在第一期临近毕业时，又选调了第二批学员，并于10月份开办了第二期训练班。学员有龙振彪、肖荣昌、旷泉吉、康元芳、曾纪砚、李继生、胡义生等。由王永浚同志任专职教员，编有正式教材。1934年2月18日，敌十五师再次袭占我永新县城，训练班进行了转移。这期学员在1934年三、四月间毕业。”

“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10月在贵州省印江县会合后，向湘西挺进，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于1934年12月，在湘西永顺县的塔卧，开

办了第三期训练班。学员有黎东汉、颜吉连、刘细晚（现名刘宗舜）、江天生、贺保里、刘智能等。这三期训练班，办得很及时也很成功。毕业的学员，大多数学习成绩都比较好，经短时间的见习都能独立工作。后来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多次战斗中，又先后缴获了五部电台，这些电台的报务员刘法壖、严成钦、彭洪志、赖渊等同志，加入了我们这支队伍。红二、六军团由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原在一方面军电台工作的周涌同志也转到了红二、六军团。使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不断增加新的力量。”

“我们这支无线电通信队伍，是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在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精心培养和直接指导下，在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它战胜了许多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并且树立了优良的作风。这种优良作风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我们在前进的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例如，电台工作必须有电源，而当时的农村、山沟却没有电源，自己虽有一部充电机，但很难找到汽油来发电。5瓦电台需要干电池工作，但买不到现成A电池、B电池，就千方百计搜集手电筒电池串起来用。当时器材补充特别困难，大家都十分注意节约爱护机器器材，把机器看做自己手中的武器，在遇到敌人袭击或敌机轰炸时，不是首先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小心翼翼地保护机器。但电台日夜工作，机器的部件不断受到损耗，对损坏了的机件，我们就设法用代用品，不能代用的就自己动手修理、改装或自制。如15瓦的真空管坏了，就改用两个25瓦管子，电阻、线圈坏了自己绕，电容器坏了自己修。训练班没有振荡器就自制蜂鸣器进行教学……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这种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创业精神，要维持正常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确在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的。

第二，勤奋学习、知难而进的精神。谁都知道，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是一门技术，须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志是小学生水平，要掌握这门技术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无线电侦察是被动的，敌台的呼号波长经常变换，必须随时能找到它；侦收的电报不能要求对方校对，必须一次抄好，所以难度更大一些。为了掌握这门技术，作为战胜敌人的武器，大家要专心致志地努力学习，时间抓得很紧，废寝忘食地利用一切机会勤学苦练。在行军途中，一有机会就抓紧学习，教员口念电码符号，学员用手指默抄。当时的学员几乎都不识英

文字母，没有电学知识，数学水平很低，但我们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顽强学习，终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第三，严守纪律，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通过首长的教导和实践的体验，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往往关系到一次战斗甚至一个战役的成败，因而能自觉地严守岗位，遵守纪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力求把每一份电报都发好收好。1935年12月，我们由湘西突围至湖南芷江境内，与敌陶广纵队作战时下着大雪，我军在一个山头上，当时我任红六军团电台队长，军团首长命令立即架台联络红二军团和十七师。山上没有房屋和天线杆，监护班、运输班的同志就用扁担架起天线，我就匍匐在雪地里工作，及时沟通了联络。有时连续日夜行军作战，极度疲劳，饥饿难忍，一到宿营地，便不顾疲劳和饥饿，立即架台工作，唯恐错过一个联络时机，漏抄敌人一份电报。正因为大家都有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所以效率很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差错，在侦收工作中往往敌人自己还在校对，我们却已抄好，抢先送去翻译了。

第四，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革命感情。红二方面军的报务人员来自各个方面，出身、经历各不相同，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也有差异。但在革命的共同目标下，经过红军这个大熔炉的冶炼，使我们紧密地团结战斗在一起。在工作上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合作得很友好。在学习上尊师爱友，互敬互学，共同提高。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彼此体贴，融洽相处。当然有时也难免会发生一点争吵，但天线一架都是一家，工间嬉戏如同兄弟，已成为共同遵守的风习。这种阶级友爱的感情，在我们幸存者之间，至今还是很深的。

第五，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大多数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受的教育很少，政治理论水平不高，革命的道理懂得不多，但旧社会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无情剥削压迫，国民党对革命人民的残酷屠杀，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深感不革命就没有出路。这种朴素的革命觉悟，促使我们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以后又被选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技术，更觉得是党对我们的信任而感到光荣。在党的教育下革命的觉悟逐渐提高。特别是长期在任弼时等同志身边工作，受到他们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临危不惧、忘我工作、艰苦奋斗精神的熏陶，不断地激发着我们的革命热情和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奋发图强的活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从而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王永浚同志在回忆中说：“湘赣军区训练班由军区无线电队阎侃斋

队长、江文政委直接领导。他们首先为第一期训练班解决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明确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的训练方针是：既要速成，又要质量好。当时敌人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是一次‘围剿’被粉碎之后，接着又来一次新的‘围剿’；一次战役、战斗之后，接着又来一次新的战役、战斗。我们无线电训练工作，要在战争环境中，利用前后两个战役、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第一期训练班虽曾因敌人进攻永新受到影响，但还是见缝插针，抓了战争的空隙，完成了训练任务，这样达到了速成。

第二，掌握学员条件。当时是按照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在招生命令中所规定的标准选调学员。选调来的学员都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小青年，年龄一般是十四五岁至十七八岁，出身好，政治觉悟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具有聪明、活泼、忠实、好学的性格。他们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和充足的干劲，有信心有决心学好无线电报务专业。

第三，解决教员问题。当时由于电台人员极为缺乏，抽不出专人任教，都是采取兼职办法。参加训练班教课工作的，有军区无线电队长阎侃斋同志和张有年、张玉山同志。他们教无线电收发报，也讲一些电路机务常识。”

“我们在永新地区办了两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给无线电通信、侦察工作充实了力量，为配合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战略转移，做了很好的准备。”

“为了增加力量，根据任弼时同志指示，除大胆使用解放入伍的技术人员外，又于1935年12月间，在湘西永顺县塔卧办了第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直接领导这个训练班的仍然是阎侃斋、江文两同志，此时我已从训练班调离了。”

“以上3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毕业学员，共有20人左右。他们投入工作以后，就为红二、六军团无线电通信战线和无线电侦察战线增加了生力军。他们和中央红军调来的干部，从战争中解放入伍的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形成了红二、六军团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的骨干队伍，胜利地保障了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突围长征、北上抗日的重大战略转移。他们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有半个世纪了，他们从基层干部到担任更高领导职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龙振彪同志在回忆中说：“由于形势发展，电台技术人员缺乏，阎

知非、江腾芳、周德元、张有年等同志对培养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工作抓得很紧。他们一到湘赣苏区，就着手开办训练班，12月在永新县城开办了第一期。这期学员共有8人，现健在的只有彭富九和孙志高（孙勇）两位同志了。30年代无线电是一种新技术，加之革命的急需，省委和军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选调一些优秀青少年学习这门技术。冯文彬同志当时是共青团中央派到湘赣苏区的中央巡视员，他当过中央军委无线电队政委。他到湘赣苏区后，就向省委建议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并亲自选调学员。第二期训练班也是在永新城开办的，1933年10月开学。我是这期的学员。这期的同学有旷泉吉、肖荣昌、曾纪砚、康元芳、李继生、胡义生。曾纪砚同志于1938年派往蒋管区工作时，在西安被捕，英勇牺牲了。”

颜吉连同志在回忆中说：“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黔东南会师后，即向湘西发动攻势，相继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座县城，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部分地区。11月20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领导机构宣告成立，建立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在新形势下部队扩编很快，仗越打越大，为了适应作战指挥的需要，急需建立无线电联络。但是，当时既缺乏电台，又缺少技术人员。为了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无线电大队抓紧战斗间隙，于1934年12月永顺县的塔卧镇开办了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同时利用缴获的破旧机器，七拼八凑，装配了一部管灯收报机和一部有两个‘31’型管的发报机，组成了一个电台。”

### 三、湘鄂苏区、湘鄂赣军区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1月，上海党中央派喻杰生同志带50瓦电台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后喻病故。1931年10月，上海党中央又派刘进、胡白天两同志接喻杰生生前所从事的工作。他们一方面沟通与外面的联系，一方面培训人才。首次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严成钦、熊大树等4人。

1932年6月，肖英、徐萍两同志带电台到达湘鄂赣军区，成立军区电台队，由肖英、徐萍分别担任电台队长和政委。

电台为了培养人才，采用边工作边教学的方法，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共办了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第一期是1932年10月始，学员五六人；第二期是1932年12月，学员六七人；第三期1933年1月，学员六七人。以上三期共20余人。

严成钦同志在回忆中说：“1931年有一天，有两个同志到省军事委



员会来审问两个外国人，这两个外国人是从长江外国船上抓来的，开始非常傲慢，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个不字，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外国人是不怕的，他们只好乖乖地低头。”

“刘进、胡白天同志给我讲，在上海培训他们的是李强同志。当时学习的条件很差，由于国民党搜查得很紧，他们只好秘密学习，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时还要伪装，桌子上放着很多报纸，在报纸下面放着‘蜂鸣器’，有人来他们装做看报纸，人走了就把蜂鸣器拿出来继续练习。同他们一起学习的约有八九个人，以后都由党中央分配到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江西苏区等地工作。党中央不仅派来了电台报务人员，而且还运来机器，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第一部电台，就是由上海党中央秘密装上民船运到洪湖的。1931年10月，党中央又派李文采同志到湘鄂西苏区电台上工作。到1932年秋，由于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向湘鄂西苏区大举进攻，加之当时的‘左’倾错误在肃反中扩大化，红军的战斗力严重削弱，致使湘鄂西的反‘围剿’遭到失败，电台被捣毁。1936年，在长征途中，我碰到王子纲同志，他对我说，我的老师刘进、胡白天同志是他的学生。”

#### 四、红二十五军无线电训练班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向贵州转移后，同年11月16日，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同志重建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同志的指挥下，突破重围开始西征，于12月到达陕西南部，1935年上半年创建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合编为十五军团。

在到陕北前，1935年7月17日，吴焕先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自离开老区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陕西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我们建议……（六）我们已有全副无线电，一个电生也没有，无法用之。请派两个可靠的电生来，我们现监用一个被俘的电生，只用呼叫中央台各两次，未见回答，未能发报，不知如何，请确定永久保持来往的方法。”报告中所提的电台及俘生，是在陕南一次战斗中缴获的一部电台及报务员方建华。

1935年夏，在冉家沟成立无线电训练班，由军的参谋钱钧同志负责，由方建华任教，学员共10人。他们是肖永昌（班长）、顾光泽、徐思铎、宋永华、彭绍坤、张福廷、杨发科（杨杰）、潘和宴、廖少权

(廖辉)、陈生贵。因为是游击区，无固定校址，无固定教材，1935年9月到陕北时，学习尚未结业，并入陕北训练班第二期。其中顾光泽、徐思铎随第一期毕业，陈生贵、廖少权因病随第三期毕业。

顾光泽同志在回忆中写道：“红二十五军在1934年以前没有电台，那时我在军通信排当通信员。1934年4、5月份，二十五军攻打安徽太湖县，敌人太湖县政府一部电台被我缴获，因战士不认识电台，又很笨重，给砸掉了，军长吴焕先同志知道后还发了脾气。1935年夏，二十五军在陕南消灭西北军谭司同旅，在冉家沟口又缴获了一部电台，敌台长报务员都跑掉了，只俘虏一个电台特务长（即司务长），他会报务，只因手法不好，才当了司务长。缴获电台的当天晚上，就从部队调人来学习。我在小学和私塾各学过一年，有一点文化，就被指名来学习，先后一共调来10人。训练班成立后由钱钧任队长，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对电台多少懂得一些。10个学员都是通信排（班）的通信员或警卫员，教员就是那个被俘的司务长，叫方建华。他原来在西安一个交通学校学过报务，因发报练坏了手法，当了司务长。当时没有训练器材，我们10个人多不识字，姓方的看我们不识字，好像没有信心。我们说红军不识字也可以学会无线电，于是他就教起来。先学10个字码，他用口念，人们抄。我们10个人当时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学习，一是保护电台，所以我们每人配备支驳壳枪。当部队到达甘肃两当县时，搞了一个继电器（即蜂鸣器），方教员用蜂鸣器发报，我们抄收，天天白天行军，晚上住下练习。”“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钱钧把我们10个人留在陕北训练班他就走了。”

### 五、红二、六军团毕业学员到工作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

无线电通信系统一建立，就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下面简介几例。

1935年6月13日，电台侦察到湘北敌人指挥部给四十师的作战方案的电报，红军急行军120里，先敌到达忠堡地区设伏，结果全歼敌四十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该师师长张振汉，并乘机反击，攻占沅县、桃源，对中央红军的长征起了战略掩护作用。

1934年4月5日，在沙市战斗中，侦知敌军进攻计划、兵力部署、行动路线。红军事先设伏，歼敌十五师之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

1935年总指挥部在湖南沅县大堰，电台侦破敌人第二天派飞机轰炸，于是总指挥部立即转移，次日敌机七架对大堰进行轰炸，总指挥部

早已转移 40 里以外。

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六军团长征，留下红十八师坚持斗争。1936 年 1 月 9 日，二、六军团占领江口，与从湘鄂川黔突围的十八师会合。十八师在突围时，电台损坏，可变电容器变形，波长失常。电台队长黎东汉同志为了与指挥部联络，逐段变换频率呼叫。总部值班员龙振彪在原频率上守听不到十八师的呼叫，于是转动度盘，逐段守听，结果在原频率 40 度的地方听到呼叫。在总部电台的指挥下，十八师顺利突围与总部会合，避免了难以想象的损失。

#### 第四节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培养 工作及新疆新兵营电训队

1927 年 11 月，湖北黄安、麻城一带农民在吴光浩、曹学楷等领导下发动秋收起义，组成游击队。1929 年，鄂东、皖西、豫南三个地区各成立一个师的红军。1930 年 3 月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和红一军，特委书记郭述申，一军军长许继慎。后来活动于湘鄂边区的红十五军进入鄂东北，红一军与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不久，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1931 年 11 月 7 日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于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在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后，发展成 40 个团，主力红军达 45 000 人，这是鄂豫皖苏区最兴旺时期。1932 年 10 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到川北、陕南。

红四方面军 1932 年进军到川陕地区，随即建立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四方面军发展到 8 万余人，编为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1935 年 6 月在四川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师。1935 年 8 月 6 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分裂主义，张表面上同意北上抗日，随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时，张国焘反对北上，率军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退却。10 月 5 日在绰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1935 年 11 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1936 年 7 月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经过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其中央并率部北上。1936 年 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在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五军团 2 万余人组成西路军，渡过

黄河向甘北西进，被敌人包围，最后只剩下数百人突围到新疆，经党中央营救，于1937年回到陕北。

### 一、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的建立

1931年1月初，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在四姑墩歼灭吉鸿昌三十师一个团，缴获电台一部，但因不会使用而未能发挥作用。1931年2月17日，中央给鄂豫边特委写信，信中说：“关于交通问题，直到现在不曾打通，不久党中央曾派人由皖西进去，但特委始终未派有一人出来打通建立交通关系，这是十分不对的。现在一方面由中央从外面派人进去，同时你们必须立刻由内打通出来。听说在皖西缴得敌人无线电机一架，不知确否？如果确实，你们很好地保存着，中央马上派人亲送一切呼号密码来。”

1931年10月9日，鄂豫中央分局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写道：“要求中央多派几个军事人才、党的工作人才到这一苏区来，做支部工作的也要，以及……无线电（可惜红四军最近获得徐源泉最新式的一架无线电，四军未注意保护，损坏了，中央能设法买一架更好）、修造枪械、医生等人才。”

1931年10月，中央从上海派王子纲、蔡威等同志经南京、蚌埠、正阳关、麻埠、金家寨到新集。沈侃夫、徐以新经南京、徐州、信阳到新集。

1931年初，红一军在四姑墩地区歼灭敌三〇师一个团时，缴获电台一部。三月上旬，红四军在双桥镇战斗中歼敌三十四师，活捉该师师长岳维峻。岳维峻家属托人与党中央联系，为把岳赎回来，送来几万套军装和一批有线电器材。9月1日，红四军又缴获徐源泉四十八师电台一部。但所缴获的电台与器材，由于没有无线电技术人员加以保护，多被损坏了。沈侃夫等到新集后，只找到一个三管收报机，经过修理，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供领导参阅。12月23日，攻打潢安，全歼敌赵冠英六十九师，缴获一部完整的15瓦电台。同时潢安县电报局钱局长及女儿钱筠参加了红军。钱到四方面军总部电讯处，担任新闻翻译工作，钱筠到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2年年初，在商（城）、潢（川）战役中，又缴获敌张钫部骑兵旅一部完整的电台，带有手摇发电机。沈侃夫骑马赶到前线，亲自把电台运到后方。徐向前同志见到沈侃夫时，十分关心电台的建设，指示参谋主任舒玉章同志选调两匹好马供电台使用。

1932年年初，沈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等同志，在新集附近小潢河南面钟家畈的一个旧祠堂里，架起了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无线电台。1932年1—2月，先后与湘鄂西苏区、江西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沟通联络。与上海党中央的来往电报，经中央苏区代转。沈侃夫同志回忆：“红四方面军向党中央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报告鄂豫皖苏区兵力情况；第二份电报是报告商潢战役的胜利。”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在苏家畈取得大捷，歼敌3万余人，活捉敌总指挥厉式鼎等人，缴获电台5部，于是建立红四方面军第二部电台。一台沈侃夫、王子纲、孙光明带领，随总指挥部和军委行动；蔡威负责两台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员、学员随中央分局、军委机关在后方行动。

1932年底进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1933年建立川陕省委及川陕苏维埃。1935年中旬，在旺苍坝成立电务处，沈侃夫任处长，一台台长王子纲，二台台长蔡威，三台台长沈侃夫（兼），四台台长游正刚，副台长胡礼信，五台台长徐明德，副台长张天华。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电台由5部增至12部，1~5台为四方面军电台，6~12台为一方面军电台。

1936年11月，西路军被包围，1937年3月14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7部电台只留下一部，其余全部砸烂，部队进入祁连山打游击，只有一总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1937年3月23日，奉中央指示进入新疆，当部队到达红柳园子时，被敌人骑兵包围，只好将最后一部电台砸烂。1937年5月5日，800余名同志在陈云、滕代远同志的接应下，到达迪化（乌鲁木齐），到达新疆的报务员共12人。他们是沈侃夫、王子纲、李继照、徐明德、刘寅、汪名震、荆振昌、贾善、郑执中、唐士吉、聂鑫、王玉衡等，还有10位同志在途中牺牲。

## 二、红四方面军举办无线电训练班、新疆新兵营电训队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举办两期电训班，在川陕根据地时又举办两期共4期，到新疆的同志也曾办过两期。

### 1. 鄂豫皖时期第一期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总指挥部参谋部成立鄂豫皖苏区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址在湖北新集（现属河南）。1931年9月18日举办一期特种兵训练班，包括炮兵、卫生兵、通信兵，共有学生70余人。在通信科中设无线电队、有线电队各一个，通信训练队队长、副队

长都姓王，政委孙光明。训练班开学时，军委参谋部主任李昂慈讲了话。教员有穆子路，电台工作人员王子纲、金乃绍、马文波、戴国栋、钱××（潢安电报局长）都曾讲过课。通信队学员共编5个行政班，有线电4个班，无线电1个班，有学员10人。他们是冯志禄、游正刚、徐定选、董德英（女）、徐世凯、袁少清（女）、孟芝新（女）、吴寿堂（女）、蒋应春（女）、王×兰（女）。

训练班设有军事、政治、文化、收发报等课程。有线电班的课程有电话单机、线路架设等。

这一期学员于1932年初毕业。

## 2. 鄂豫皖时期第二期

1932年6月，在新集举办第二期训练班，训练班和行政管理由军委参谋部直接负责，业务训练由电台的同志负责。训练班负责人为蔡威，学员排长冯志禄，一班长徐定选，二班长徐明德，三班长刘坤（刘忠生）。学员共30人。徐定选、吴寿堂（女）为第一期留下的学员，其余有钱筠（女）、毛建华（女）、史兰青（女）、陶婉荣（女）、刘世朗、吴明英、肖铁、曾化东等。

这一期的教员有戴国栋、金乃绍、马文波等。

1932年7月，国民党开始第四次“围剿”，训练班被迫停课，随军转移，有些同志分配工作，到1932年底毕业时，只有冯志禄、徐定选、游正刚、黎明德、刘忠生、陶婉荣（女）、史兰青（女）等。

## 3. 川陕时期第一期

1933年9月，在通江毛裕镇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连续计算为第三期）。这时红四方面军成立电务处，由沈侃夫、王子纲、蔡威同志负责。这时电训班的负责人也由上述领导兼任。教员有徐德明、徐定选、徐世凯、马文波等，电务处的领导也都兼课。

学员有彭宗珠、胡礼信、邓天杏、张天华、裴本信、何景文、罗映清、王一如、詹小室、李永悌、史仁杰、范柯华、范照发、彭作柱、李玉吉。这一期于1934年6月毕业。此外张永孝、杨大奎、张大志、戴永年4人留在下一期学习。

## 4. 川陕时期第二期

在上一期末毕业时，1934年4月举办第二期（连续计算为第四期）。负责人未变，但训练班人数增多，约30余人，所以单独建队。队长汪德祥，指导员查茂德，后为彭宗珠。教员有戴国栋、彭宗珠等。

学员排长为秦华礼，其他为刘澄清、邓国军、唐士吉、胡正先、刘成义、胡时全、刘继明、李福荣、郭福喜、田友仁、刘福乾、杨家德、杨永贵、何世长、李春林、何永忠、冯国寿、谢而胡、刘纪绍、葛正美、谢申明、邱金华、刘修扬、齐振海等。还有上一期留下的4人。

这一期开学不久，即随军渡嘉陵江向川西北移动，所以学习时间拖得很长。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一方面军通信学校的一些同志，与这一期合并。合并后，校长刘光甫，教员有刘寅、沈毅力、李世俊、王玉衡、岳夏（罗若暇）、刘振堂等。

合并不久，这一期即毕业，一方面军通信学校的人员继续北上，直到陕北。

#### 5. 有线电训练班

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有线电通信比较发达，曾架设以新集为中心沟通整个苏区的有线电通信。1931年8月架设新集经箭厂河、杨林岗、七里坪至黄安，全程50公里的永备线路。为了培养有线电技术人员，红四方面军曾多次举办训练班。

①1931年10月在新集举办第一期，学员50余人，学员有耿锡祥、李玉奎、陈光灿、方继亭、周吉山、刘洪彬、叶应礼、杨应宽、施仁杰、周森林、戴学浩、李农一、李有道等。电话队队长张××，康某担任教员，1932年并入彭杨学校。

②1932年春彭杨学校举办第二期，电话队长戴学浩负责，学员30余人。

③1933年1月在通江地区举办第一期训练班，学员40余人，学期两个月。

④1934年春在通江举办第二期。

通过以上工作，红四方面军的有线电通信打下了很好的技术基础，有线电通信系统一直比较健全。

⑤1935年12月在四川懋功举办有线电技术训练班，1936年5月结束。由李玉奎负责，技师王化馨、罗××任教。学员有孟长春、王昌荣、颜邦应、王国富、袁学邦、李青成、苟在尚、张华成、罗福兴等。

#### 6. 新疆地区无线电训练班

1937年7月西路军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后，住东门外后街（现五星街）一座营房内，对外称“新兵营”。1937年6月，中央从延安来电指示“严守纪律，安心学习。”于是新兵营开始进行训练。学汽

车的 67 人，学装甲的 50 人，学炮兵的 87 人，学无线电的 24 人，学空军的 42 人，学军医、兽医的 10 人，共 280 人。

1937 年 5 月，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由刘寅负责，王子纲、荆振昌、徐明德、郑执中为收发报教员，贾善负责修理扬声器、蜂鸣器及电键等。

学员 24 人，他们是何永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高峻）、聂鑫、陈大孝、王道义、宋有生、阙子山、胡正先、何世长、杨伟、刘成义、杨永贵、童仁邦、王家祥、赵青、郭书文、陈彬、唐永弟等。这些学员，不少是在川陕苏区时学习过的同志，这次又继续参加学习。1938 年 3 月，这期学员由刘寅同志带领，经兰州到延安，已是 1938 年 4 月底了。

1938 年 4 月，邓发同志在新兵营又举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教导主任兼教员荆振昌，收发教员徐明德，算术教员王聪，语文教员王莲，陈谭秋讲中国革命史。

学员有 20 余人。已知的有俞以仁，李先觉、赵达明、杜天义、朱家霖、张达明、敬选清、任道先、罗万荣、王福学、边候先、李映光、李培基、徐国安、罗泽润、裕正禄、刘顺发、刘兴贵、罗兴发、胡有贵、杨发金、陈廷顺、曾庆发（曾辉）、郑如宽等。这批学员于 1939 年 7 月毕业，大部分同志于 1939 年年底返回延安。其中张达明、余嘉仁、任道先、裕正禄、杜天义 5 同志准备由荆振昌带领到苏联深造，因故未去成，1940 年 6 月返回延安。

耿锡祥同志在回忆中说：“1931 年 8 月上旬，区委汪学权同志对我说：‘组织决定调你到彭杨军政学校去学习’。我问：‘学什么？’他说：‘学炮兵。’就这样我离开了游击队和地方工作单位，经区、县介绍来到了新集（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的所在地）。和我一起去报到的学员有 3 个人，报到后，又要我们到通信训练队学习通信。”

“通信训练队是由红四方面军军委参谋部开办的，设有有线电通信和无线电通信两个专业。学习有线电通信的有 50 多名学员，学无线电通信的有十几名学员，全队共 80 人左右。训练队设在新集北街彭杨军政学校的右侧一个当铺的小院内，房子很破。训练队只有一名行政管理人员，名叫张德善。我们报到早的几个学员就和瓦工、木工一起修房子，房子修好以后，学员也逐渐到齐了。开课以前，张德善同志还领着我们到附近的山上去打柴和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



“通信训练队于‘九一八’以后正式开学，参谋主任李昂慈同志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训练队的队长、副队长都姓王。开课几天后，又调来一个政委，叫孙光明，政委来了以后才成立党支部。训练队共编成5个行政班：学习无线电通信的学员编成一个班，有冯志录、游正刚、徐定选、董德英、袁少清、孟芝新、吴寿堂、徐仕凯（后退学）等同志；学习有线电通信的学员编成4个班，有陈光灿、周吉山、方继亭、施仕杰、刘洪彬、孙森林等同志。学员中有列宁小学的学生，有从前方战斗部队调来的干部、战士，有从各县调来的青少年。教员数量很少，无线电报务教员有穆子路（原国民党徐源泉部电台队长）和一个青年人（名字忘记了），有线电教员是个技师张××，山东人。”

“鄂豫皖苏区的有线通信建立的比较早，有线电通信于1930年8月就成立了。1931年11月，组织上从通信训练队抽调一部分学有线电的学员参加半永备线路的架设。第一条半永备线路干线是由鄂豫皖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前线总指挥部开通，全程约50公里左右。路线为：新集（军委）—箭厂河（总医院）—杨林岗（总经理部、兵工厂）—七里坪（共安县政府、被服厂）—黄县南门外郭寿九村（方面军前线总指挥部）。1931年12月20日正式开通。接着又陆续建立了许多条线路：军委至各县指挥部、独立师、各前沿阵地。鄂东地区数县也通了有线电话，东至麻城、宋埠方面的前沿，以及柳子港、长林岗、长宴区、蔡家榨、长仙岭以北等前沿。从而在根据地内形成一个军队和地方政权合用的有线电通信网。”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在通江成立川陕省委，建立了以通江为中心的通、南、巴根据地。由于红军飞快地发展，根据地的扩大，于秋末冬初，在通江县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员有彭宗株、胡礼信、郑天杏、张天华、裴本信、何景文、罗应清、王一如、高吉明、杨大奎、詹××（外号叫小宝）、王××（外号叫秃子）、李永悌、张永孝、史仁杰、范柯华、张达志等共17人，最后有3人因不适合学技术没有毕业。詹（小宝）在查林寺方面军医院病故。郑天杏在进至草地边沿舟坝时，因高烧导致脑神经错乱，落水而亡。报务教员是徐定选、徐明德二同志。王子纲同志在后期有时考核检查收报课，沈侃夫同志兼教英语课。第三期训练班和一台合在一起，一台的领导也是训练班的领导。”

“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尚未毕业，于1934年4、5月间在通江县城

内又开办了第四期。这期成立了队的建制，汪德强同志任队长，查茂德同志任指导员，是个独立的小单位。党政生活归总部直属工作处领导，行政生活归总部直属部门管，业务训练仍由一台负责。戴国栋同志是训练班的主持人，又是报务教员和英文教员。学员有30多人，我只认识其中一部分同志，有胡正先、刘澄清、邓国军、唐士吉、李春林、何永忠、葛正美、刘纪绍、谢而胡等。”

“1934年秋末，击败川军‘六路围攻’后，在巴中县对两期无线电训练班进行了调整。第三期的学员除杨大奎、张永孝、张达志、王××（秃子）四同志留到第四期继续学习外，其他同志结业，分配到电台见习。第四期按原计划不变，仍为独立小单位，归电台直接管理，调彭宗林同志任指导员，查茂德同志调一台译电。第四期训练班教学条件十分简陋，利用一架旧风琴上收报课，学员无电键进行发报训练，直到一、四方在军会师后才补训发报课，因此，第四期到1936年夏秋才结业分到电台见习。”

游正刚同志在回忆中说：“1931年11月，我和冯志录、徐定选、袁少清等七八人，从鄂豫皖苏区文化委员会创办的列宁高小提前调出，分到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特种兵训练班学习。训练班设在新集城街北头一家大当铺里。”

“训练班约七八十人，分炮兵、卫生、通信等几个专科。在通信专科还分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

“我们从郭家河列宁高小驻地出发，在几个同学的送行下，背着小包袱，步行60多里，来到新集。负责教务工作的领导同志接待了我们。他问了问我们各自的一些简单情况后，顺手拿出一张纸，念了念学校事先拟定好的分配方案，明确了每个人的学习专业。我被分配在无线电专业，学习报务。”

“教我们课的老师先后有王子纲、蔡威、沈侃夫同志，还有刚从苏联回国的徐以新同志。王子纲、蔡威同志是在上海通过党中央特科关系，学会报务和机务的。沈侃夫同志也是上海学的，他和徐以新是我们无线电训练班开课后从党中央派来的。几位老师王子纲教报务，沈侃夫教英文，蔡威教机务。在教学中他们责任心强，要求严格，深入浅出，能把通报英语和电容、电阻、电波这些难学难懂的知识，讲得形象具体，易学易记。”

“蔡威老师，操着一口福建口音的上海话，加上学员对无线电名词生疏，开始听他讲课，就像听外国话一样听不懂。于是，他就

不厌其烦地拆开机器，对照实物和线路图，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解，使我们既学了技术，又学了文化，终于掌握了这门看来深奥玄妙的专业。”

“无线电训练班学制规定6个月，大家一律过军事生活，穿军装，打绑腿，戴红五星八角帽，吃饭吹哨，早晚点名，队列教练极为严格。我和麻城来的同学董德英等人，因学习理解快，成绩优良，且又因工作急需，学了刚满5个月，就提前结业，分配到电台上边工作边学习。”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后，接着在原地方又办了第二期，老师仍由王子纲、沈侃夫、蔡威等兼任。先后共计培养学员30余人。由于残酷的斗争和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这批人经过反四次‘围剿’，西征到达四川时，只剩下5个人，结业后补入各台。”

“我们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教课的几位老师，是专门负责组建红四方军电台工作的。所以，他们除教好课外，还十分注意了解部队在战斗中的缴获，一旦发现有发电机、电动机、无线电器材，路程再远也要亲自去搜集，搬运回驻地。”

“1932年初春，我们学习进入到实习阶段。一天，蔡威老师得知我军粉碎敌第三次‘围剿’中，连续大捷，在全歼潢安守敌赵冠英的六十九师时，缴获15瓦电台一部和一些无线电器材。但当时因四方面军没有这种专业人才，不会使用，且搬运不方便，只好先就近掩埋在来家河。后因负责掩埋工作的同志一时找不到，来家河又是一片山地，不知情者很难寻找，故机器就一直沉睡于地下。蔡威老师通过访问当地老人，深入调查研究，打听到了埋藏地点。于是就带领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去挖掘，抬回新集后，蔡威老师让我们当助手，他亲自拆洗、检修，边干边讲，修复了机器。”

“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得知后，当即决定架设电台，与党中央和兄弟苏区进行联络。为了安全保密和工作方便，总指挥部在新集南门外河东边钟家畈村边柳树林里，用石头垒了一幢房子，作为电台工作室。我们几个年轻学员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搬机器、架天线、搞卫生、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安置妥当。”

“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建立了，由沈侃夫负责，报务人员有蔡威、王子纲，我和董德英做见习。徐以新、沈侃夫离上海前，徐以新背的一本即与上海党中央联系的。沈侃夫记三本，即同中央苏区联系的一本，同湘鄂西苏区联系的一本，同湘鄂赣苏区联系的

一本。”

“电台开设前，尽管沈侃夫背熟了通报密码，但党中央为保险起见，又派专人送来密码本。”

“一切准备就绪后，王子纲先带上耳机，按动电键，小心翼翼地调着频率，按照规定呼号呼叫，一呼叫就沟通了。守在旁边的人，特别我们几个学员更是高兴，顿时破除了头脑中的一个迷信：这些机器在天空里就能传字。”

“我们首先沟通联络的是与中央苏区，接着便又与湘鄂赣、湘鄂西苏区联络沟通。随之，我们就经中央苏区电台转报，向上海党中央发出第一份和第二份电报，先后报告鄂豫皖苏区的兵力情况，报告潢安战役、商潢战役的胜利。中央给我们的第一份电报是祝贺胜利和通报各苏区的情况。”

“看到这种千里传信息的情况，四方面军首长和广大红军战士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再不用派地下交通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地来回跑了。敌人又抓不着，还很安全。’”

徐明德同志在回忆中说：“红四方面军最早的无线电通信工作者是沈侃夫、王子纲和蔡威同志，他们都是上海党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来的。鄂豫皖根据地虽然原来也有一些电讯器材，而且办了个训练班，但真正把工作开展起来还是他们几位同志到了根据地以后。在他们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一、上海党中央很关心红军的通信建设，在上海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干部和人才，他们到达各根据地后，为建立和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从战争中解放过来的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发展的规律基本相同，先是抄新闻，搞侦听，以后发展成为电台通信。

二、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是从缴获敌人设备，俘虏敌人电台人员装备，自己充实自己而发展起来的。那时购买电讯器材很难，器材来之不易，大家都很爱护。由于张国焘执行过左的政策，对团结、改造、使用从战争中俘虏过来的技术人员重视不够，分配他们在电台工作的很少，影响了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壮大，这是个历史教训。

三、培养通信人才和正确使用问题。鄂豫皖时期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1931年秋办了一期，是一个班。1932年6月办了第二期，有两

个班。我6月初到训练班时第一期还有八九个人。两期教职员和学员加起来不到50人。第一期学员到反四次‘围剿’时已学了9个月，每分钟能抄收110~120字，发90~100字。

四、无线电台组建后，先抄新闻，进而开展侦听破译工作，掌握了敌人的情况。为了保障作战指挥，通信战士团结一致，忘我工作，通信联络和侦破工作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特别是在反“六路围攻”时，沈侃夫、王子纲、马文波同志都日日夜夜地坚持工作，四部机器对着四个方向，累得吐血、打摆子。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一支坚强的队伍。

五、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红四方面军通信工作有很大促进和提高。

(1)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制度比较完善，作风也好。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建立了12个电台。

(2) 建立了报务登记制度。会合后，我学习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法，自己订了个本子，进行报务登记。同时，学习他们的通报方法、报务英文缩语。我把他们通信学校使用的教材找来一本，自学了一遍，掌握了英文通报简语。以后，还自觉地学习了一方面军的电台缩语和一些规定。

(3) 通过电台工作，互相来往，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友谊，不论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红军战士，看到天线就找到家了，进去就能吃饭。1935年在懋功，周维同志的电台没有煤油了，不能工作，我送给他半桶煤油。他们在纵队队部（马尔康）时，没有电池了，电台停止工作。当时我台有两组B电池，周维同志来找我，我给了他一组B电池，电台马上恢复工作。一方面军电台在困难情况下没有盐吃，我曾给他们送过盐。红一、四方面军电台是互相支持、互相关心、团结一致的。

(4)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无线电人员培养制度和方法上有提高、有改进。中央苏区通信学校和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后，就按正规制度训练。训练方法有改进，形成一定制度。到了新疆办无线电训练班也是用这些方法。”

马文波同志在回忆中说：“在第一部无线电台筹建期间，无线电干部的培训工作，也在抓紧进行。1931年秋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第二期训练班开始后，组织上调我去训练班工作。这一期学员有

30 名左右，直属电台领导。行政编为一个排，冯志录同志任排长，下面编为 3 个班。教员有钱××（原黄安县电讯局的局长）、金乃绍（原是敌军电台报务主任）和我。”

高峻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37 年西路军经过严重挫折，于 4 月到达新疆，只剩下 800 余人。到达迪化（乌鲁木齐）后住在西大桥附近一个木材加工厂内。我们有幸到达新疆的 800 余人，在陈云、滕代远的直接领导下，在工厂的大院内休整和组织学习，对外称‘新兵营’。不久移至东门外东大营，系新疆守备部队的营房，800 余人划为一、二、三 3 个大队和干部队。干部队共有 50 余人，队长潘同，政治教员刘鹤孔。全队分为 3 个班，刘寅、王子纲、汪名震、荆振昌、王玉衡、徐明德等为一班，其他在二、三班。”

“6 月，陈云指示在干部队中办无线电训练班，刘寅同志为班主任兼教员，其他教员有王子纲、荆振昌、王玉衡、徐明德、郑执中。学员中有的原来就是学无线电技术的，如聂鑫、何永忠、杨家德、杨永贵、胡正先、唐士吉、杨大奎、刘成义。新学员有高峻、王道义、宋永旺、陈健先等十六七人。1937 年 6 月开学，至 1938 年 4 月离开迪化，先乘苏联开往兰州的抗日运货汽车，到兰州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约 3 天，租用民用汽车到西安七贤庄。二三天后又乘民用汽车，约两天行程到延安，这时已是 1938 年 5 月了，我被分到 51 分队，队长陈士吾，报务主任邹念先。”

### 三、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人员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早期培养的人员，未能及时发挥作用，到了川陕以后，电台迅速增加，电训班的学员到工作岗位后迅速发挥了作用。下面简述几例。

1932 年 8 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蔡威同志的电台随王树声同志过京汉线铁路时，突然遭到敌第十师先头部队的拦阻，电台被敌人截去，徐向前总指挥派一个团向敌人反击，终于夺回了电台。1933 年 5 月在打敌人三路围攻最后一仗时（空山坝战斗），电台准确侦破了敌人作战企图，我军以 8 个团的兵力消灭敌人 9 个团，缴枪 6 000 余支。部队首长讲：“空山坝这一仗，没有电台不行呀！”在小坎子战斗中我部被敌人包围，突围又无准确方向，于是发电给张国焘，张回电五个字：“死守待援，国焘。”后电台侦听到敌人的行踪，于是我们部队迂迴到敌后，消灭了敌人，终于解围。

1933 年到 1934 年 9 月，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时，我电台基本破译了敌人密电，沈侃夫、王子纲、蔡威等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有时将破译的电文告一方面军，对协同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红四方面军电台在破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在延安，毛泽东同志见到沈侃夫等同志时说：“你们四方面军电台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四渡赤水，在云贵川湘一带，你们提供了重要情报，我们顺利渡过了难关。”

## 第四章

# 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延安通信学校）、 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 第一节 陕北红军无线电通信教育工作

#### 一、陕北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建立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党组织在谢子长、刘志丹、唐澍等同志的领导下，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游击队。1932 年下半年游击队合编成为工农红军第十六军，下属红二团和红四团。1935 年 1 月，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下属红八十四师。1935 年 2 月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前敌总指挥部，惠子俊为工委书记，谢子长为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前敌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1935 年 9 月 18 日，在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会师后，3 个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下设七十五师（原二十五军）、七十八师（原二十六军）、八十一师（原二十七军）3个师，开辟了陕北、陕甘边区根据地。

陕北红军初建时，通信工作主要靠人力通信，1935年以前，既没有电话，更没有无线电台。1935年成立红军以后，每个团设有通信员5人，师设通信班。为了让传送信息的通信员能迅速找到指挥岗位，师、团、连驻地大门上插红旗做标志。在作战中，主要靠通信员以口述法传达命令，夜间则以火为号，通信十分不便。至于各游击区之间，经常很长时间无法联系，基本上是独立作战。

1935年5月，红二十七军一、三团解放延长县，延长油矿电服务局有一部15瓦电台，该台台长是吴泽光，经西北工委郭洪涛同志做工作，吴泽光同志欣然参加了红军，从此陕北红军有了第一部电台，电台设在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上。吴泽光同志，广东潮阳人，早在大革命时，在汕头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四一二”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岁时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后到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军用电台工作，因看不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作风，不久即离开二十六路军到商船电台工作。22岁时又考取当时交通部招收的无线电报务员，先后在安庆、芜湖、浙江定海等电台工作。1934年调陕西延长油矿任电台台长。

吴泽光同志参加红军后，因为只有一部电台，只能抄收国民党中央新闻社的新闻，供领导参考。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在崂山榆林桥战斗中，歼东北军一一〇师的大部，缴获50瓦电台一部，报务员申光、李益民、杨育高等同志参加了红军，从此陕北红军有两部电台。以后由李益民同志带一部电台随徐海东到达前方，但未正式与后方通报。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率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月底在甘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一、三军团合并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加入红一方面军。11月3日组成新的西北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3日，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一个团，又缴获电台两部，常茂林（常如松）、孔文甫、郭延廷等同志参加了红军。

1935年11月，西北军委移驻瓦窑堡，这时在陕北地区的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无线电台有了发展。据军委三局1944年《通信工作历史总结》记载：“中央到达陕北时期的电台配属情形：中央带来了五个电台，陕北已有三个。……熟练报务员：随中央来者二十三人，另有见习生四人（后调到通信学校补习），陕北原有者六人，直罗镇战斗俘四人，机务员：随中央来者三人，另有机工二人（后改学报务），陕北原有一个。”

在此期间，1936年1月，经王诤、陈士吾同志的努力，用插叫的方法与红二、六军团沟通联系，通过电台通知尚在贵州境内的二、六军团，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1936年2月2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组成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作战75天，通信工作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1936年5月19日，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十八军进行西征。在西征时，红十五军团在盐池一带消灭马鸿逵一个骑兵团，缴获15瓦电台一部，叶云章、梁骥（梁世俊）、范元纪、鞠文奎、盛钧、贾涵等同志参加了红军。

1936年10月9日，一、四方面军首先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一、二方面军在甘肃省隆德县将台堡会师。据《通信工作历史总结》记载：“随二方面军的有联络台六个，新闻台一个，报务员二十一人。随四方面军来的有联络台五个，新闻台一个，报务员二十三人，机务员五人。不久又来报务员十一人，机务员二人，共计联络台十一个，报务员五十四人，机务员七人。”这时红军电台总数已达30部，能独立工作的无线电报务员100余人。

1936年6月21日，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7月10日后进驻保安。9月红一方面军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在歼敌骑六师战斗中又缴获电台一部。至此，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共缴电台6部。电台由原来的8个分队，增

至18个分队：后方（党中央）2个，前方指挥部2个，一军团3个，十五军团3个，二十七军、二十六军、三十军各1个，其他5个为新闻台。

为了便于党中央了解张学良、杨虎成的情况，三科派出彭绍坤、刘克东同志在张、杨部队建立秘密电台。彭绍坤同志专门了解东北军情况，1936年9月刘克东到西北军特务二团通信排任准尉排长，了解西北军的情况。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西安，彭绍坤电台公开，军委派曾三、申鸣鸿到西安建立备用电台，不久又调吴希圣到公开电台。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彭绍坤、吴希圣、梁茂成三同志带电台随叶剑英到云阳镇红军西北办事处，曾三、申鸣鸿带一电台随周恩来在西安。

西安事变后，经与张学良达成协议，东北军撤离延安，红军于1936年12月18日进驻延安城。1937年1月7日，党中央由保安移至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中央进入延安后，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副局长朱道松。下设两个科，一科负责通信联络，朱道松兼科长；二科负责无线电技术与器材工作，科长申光。不久成立四科，负责生活管理，科长白振武。政治思想工作由军委第二政治处负责，政治主任伍云甫。

军委三局还直属两个通报台、一个新闻台、一个通信学校。

## 二、陕北红军、西北工委无线电训练班

### 1. 第一期

1935年7月，根据吴泽光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无线电训练班，7月底第一期开学。负责人及教员只吴泽光一人，地址在延川县永坪镇。

学员由根据地各县调选，条件：年龄在23岁以下，党团员，有一定文化程度。这一期学员共4人，他们是景生智、张振文、王精锐、李洁逵。

学习内容主要是收发报技术、通报英语及简单的电学常识。因器材很少，一般是吴泽光口读电码，大家抄收。训练发报时，大家用手指代替电键，偶尔在蜂鸣器的电键上试试手法。这时没有正规计划，没有教材，一切由吴泽光同志负责。1935年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有了振荡器，每人一副耳机，一个电键，可以随时练习。突击训练一个月，最后学员每分钟可抄收130个电码（英文），中文抄收120个电码，发报每分钟80个电码。

1936年1月第一期毕业，二、三期的顾光泽、徐思铎、刘克东随

第一期毕业，所以第一期毕业时共7人。刘克东留校帮助曾三同志做党支部工作。

## 2. 第二期

1935年9月，西北工委决定从陕北根据地各县现抽调一些学员到训练班学习。因为各种原因，学生没有到齐。子长县调来薛希仁，清漳县调来马鹤鸣（马六），延长县调来刘克东（刘满治），这3名学员编为二期。

9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同志率领下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红二十五军有一电训班（前章已述），负责人为钱钧。学员共10人，他们是肖永昌、顾光泽、徐思铎、宋永华、彭绍坤、张福廷、杨发科（杨杰）、潘河宴、廖少权（廖辉）、陈生贵。这10名学员与陕北红军第二期合并，称为第二期。

这时负责人为吴泽光、钱钧。因为在甘泉、榆林桥战役中歼东北军一一〇师全部、一〇七师大部，一些原电台人员参加红军，如计加贵、常如松（常茂林）、贾鹤龄、申光（申惠光）、李益民等，他们都兼任教员，红二十五军电训班的方建亦到电训练班任教。

第二期比第一期正规，制订了半年的训练计划，电台及教学设备增多，学员有了上机实习的条件。

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北吴起镇，11月到瓦窑堡，陕北红军电训班随西北工委也到了瓦窑堡。中央红军到达后，改为通信学校。

第二期于1936年3月毕业，因为有的随第一期毕业，有的随第三期毕业，二期实际毕业6人：肖永昌、宋永华、彭绍坤、张福廷、薛希仁、马鹤鸣。

## 第二节 军委通信学校（延安通信学校）

### 一、军委通信学校的建立

中央红军在江西瑞金创办的通信学校，长征开始时招收第十一期学员，长征途中学员陆续分配工作，通信学校改为教导队，代号为“红星三大队”。在四川懋功，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时，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招收的第二期学员尚在学习，两部分合并后，又曾恢复通信学校名义。不久学员毕业，通信学校只剩下校部少数同志。1935年11月长征

后中央红军到陕北瓦窑堡。

1935年11月，根据陕北今后发展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继续举办军委通信学校，任命校长吴泽光，政委曾三，钱钧同志另有任用，教务主任沈毅力。1936年2月，吴泽光曾加参一方面军东征，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无线电大队长，5月返回继任校长。

### 第三期

1935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从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中选调通信学校学员，与陕北红军的电训班在一起学习，称第三期，这时一、二、三期同时在校学习。

教员有贾鹤龄、申光、常如松、计家贵、李益民、佟路竹，王诤、陈士吾也兼课。学员有肖贤法、刘长生、王兴、胡平山、温凤山、俞占鳌、姚士禄、吴预彬、温储金、罗木青（罗江）、梁茂成、孙道会、邱世淮、吴德山、郭城、赖观水、际云东（陈云栋）、张崇仁、杜会聪、郑经玉、周治芳、尤可功（温储金在学习期间病故）。

从中央红军调来的学员，因在长征途中受了极大苦难，身体十分虚弱，走路都摇摇晃晃，不能经常听课，所以留级的较多。

第三期于1936年二三月间毕业。因第三期不少学员留级，毕业时只有吴预彬、孙道会、邱会发、潘河宴等少数几人。

### 特别班

中央苏区红军通信学校第九期，因在长征途中学习毕业，学习的内容较少，所以长征到陕北后，军委三局决定把他们调回通信学校继续学习，补完应当学的课程，这些同志组成特别班。

1936年1月，只有黄经略、黄启先、袁贻辉、俞铎4人到校，其余人员因工作无法离开，未能到校。这些同志到校后，一边自学，一边等待人员到齐。到1936年2月20日，红军组成抗日先锋队渡黄河东征，各部队急需电台人员，这4位同志均分配工作，所以特别班虽然存在，实际未开展教学工作。

### 第四期

1936年3月第四期开学。第四期领导人未变，校址迁至瓦窑堡附近的韭沟台。

这一期学员，实际上是原第三期留下的同志，他们身体好转以后，编为第四期学习，至1936年6月毕业。学员排长刘长生，班长肖贤法。毕业时的学员有肖贤法、郭城、王兴、吴德山、姚士禄、陈生贵、梁茂成、陈云东、胡平山、俞占鳌、罗木青、周治芳、赖观水、张崇仁、杜

合聪、陈生贵、郑经玉、潘河宴、尤可功、刘长生等 20 余人。

1935 年冬，周恩来同志在瓦窑堡拟订“中央军委后方工作编制计划”中的通信学校计划如下表。

班 次	现有学生	毕业期	拟增学生（一）	毕业期
第一班	3 人	二月半毕业		
第二班	6 人	三月中毕业		
第三班	14 人	四月底毕业		
第四班	11 人 （现在病中）		9 人	五月底毕业
四个班			9 人	

（注：此表是在校学生数，后来因升留级，毕业人数与有关同志回忆文章不尽相同。）

李洁逵同志在回忆中说：“红军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高桂滋、井岳秀部的慌乱，对红军游击区拼命‘清剿’，从榆林、米脂、绥德、佳县、吴堡这一线，到处修筑碉堡，合村并庄，保甲连坐，并押了红军家属，使这几个县的人民又处于暗无天日的黑暗统治之下。活动于神木、府谷、佳县北区的红军第三团，与以永坪为中心的中共西北工委和主力红军的联系中断，这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通信。在吴泽光同志的建议下，开始组建无线电训练班。”

“7 月开始选调人员，条件是：忠实可靠，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热爱无线电工作。报到早的是景生智、张振文、王精锐，我到 8 月中旬才报到。我们 4 个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景生智和张振文同志是做儿童团工作的，王精锐同志是司号员，我是做青年团工作的。”

“我们的老师吴泽光同志，是广东人，普通话说得很好，特别对陕北土语说得还很有韵味，我们称他为广东的陕北语。他抄收英文电码时都可直接译为汉文，不仅熟悉明码，英语笔译能力也很强。”

“1935 年 9 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同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组成第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也有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刚组建不久，共有 10 人，班长为肖永昌同志。钱钧政委是他们的带队人，钱是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原是一位飞机驾驶员，还懂点无线电报务知识，会使用汽油发电机。还有位姓方的油机员，有时也给我们上点课。我们两个无线电班合并了，由钱钧、吴泽光两同志共同负责。”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5 年 11 月中央机关和

军委机关陆续到达瓦窑堡。中央红军也有个无线电训练班，组织比较健全，有指导员，有排长，共十几位同志，由曾三同志负责，不久又同我们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在一起。中央红军的这部分同志，由于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达陕北后又不服水土，得疾病和贫血的同志很多，其中有位梁茂成同志，走路都很困难，骨瘦如柴，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爱护他。”

“根据3个无线电训练班的进度，确定原陕北的4人为第一期，原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为第二期，中央红军的同志为第三期。”

梁茂成同志在回忆中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为了适应‘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的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必须尽快地准备建立一些新的电台。因此，军委在吴起镇时就决定从各部队选调一批青年战士学习无线电报务，我就是其中一个。当我们抵达瓦窑堡时，陕北苏区已有无线电训练班，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通信学校。”

“原一方面军通信学校，是1931年初春在江西瑞金的洋溪创办的，办到11期，因长征而中断了。原陕北无线电训练班，是1935年7月在延川县永坪镇建立的，负责人吴泽光，他原在延长油矿电报局任局长，红二十六军攻占延长时，吴泽光同志参加了红军，在西北工委领导下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之后又在同国民党作战中陆续吸收了申光、李益民等电台人员充实教学力量。我到通信学校时，该训练班已招收三期学员。第一期学员4人，有李洁逵、王精锐、张振文、景生智。第二期有学员9人，都是红二十五军来的，他们是肖永昌、杨发科、徐思铎、彭绍坤、马鹤鸣和刘克东等。我们来到学校时，正好是第三期开学的时候，因此，我们一方面军调来的也编入第三期。有刘长生、肖贤法、王兴、胡平山、温凤山、俞占鳌、邱世淮、孙道会、吴德山、姚士禄、吴预彬、温储金、罗木清、梁茂成等。二、三期学员大都经过长征，艰苦跋涉，身体很虚弱，故因病留级的人很多，毕业时间参差不齐。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温储金同志，长征中是三军团十团的宣传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党员，学业未成，即住院病逝，值此我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第二期毕业的除肖永昌、彭绍坤、徐思铎、张福庭、宋润华、潘河宴外，尚有三期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的温凤山、罗木清。第三期毕业的有薛希仁、马鹤鸣、邱世淮、孙道会、吴豫彬。留级的学员多数留到第四期。这一期毕业的有刘长生、肖贤法、王兴、吴德山、姚士禄、陈生贵、梁茂成和陈云东（陈系长征到瓦窑堡后从机关调来的）。其余则留到第五期、第六期才毕业，例如，杨杰（杨发科）、廖肇全、胡平山

等同志。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从第五期开始，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后，每期的学员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1937年实现国内和平以后，全国广大青年涌向革命圣地延安，使通信学校也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从十一期起，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在抗大、陕公和职工学校学习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这种变化，使我军通信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5年10月建立陕北通信学校起，吴泽光同志一直任学校校长，直到1944年到中央党校学习时为止。政治委员仍由原江西红军通信学校的曾三同志担任，他于1937年年初调到西安电台工作。以后当过学校政治委员的还有魏宏亮、张振球等同志。在通信学校初建时期先后担任过报务教员的有申光、李益民、常如松、计家桂、贾鹤龄、佟路生、黄庆元等。政治教员杨又卿，王净、陈士吾同志也兼过课。”

刘克东同志在回忆中说：“吴泽光同志参加红军后，电台就架在延川县永坪镇内的一个坡上的窑洞里。当时叫疙瘩上，我家离永坪镇只有20里。刘志丹同志考虑到今后红军要建立无线电通信，必须培养技术人员，于是通知各县抽调有文化、政治可靠的青年到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由吴泽光同志负责培训。学员条件是：年龄在17岁以上，23岁以下，具有初步的文化程度。”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歼灭东北军的牛元锋师，缴获了一部电台，一些报务员参加了红军，不久派到训练班当教员，他们是计加贵、常如松、贾鹤龄、申光等。”

“关于通信学校地址的变迁，开始在延川县永坪镇里一个高坡上的窑洞里，当地人叫疙瘩上。后红二十五军来后迁到离永坪镇五里的李家沟，后来1935年12月到了瓦窑堡，在城里中心区靠街的三四个窑洞里。在这住了不久搬到城外一个叫水沟坪的地方，一排12个砖窑，十分漂亮，就是在这个地方与中央红军来的同志会合的，在这里宣布成立通信学校。不久又从水沟坪移到韭沟台，第五期以后我就离开通信学校了。”

## 二、军委通信学校第五至第十二期

### 第五期

1936年5月招收第五期学员，校长吴泽光，政委曾三，教务主任沈毅力。教员有佟路生、计家贵、贾鹤龄、常育尚、常如松、李益民。校址由瓦窑堡城内曾迁至城外水沟坪，又迁至韭沟台，不久又迁到保安



西五家沟门。

学员共 25 人，均为从红军中抽调的干部、战士。根据学员水平，分为甲、乙班。学员排长熊梦飞，甲班班长罗璋（罗华秀），乙班班长黄启先。其他为李从洲、黎辉宝、周德显、杨福、匡士贤、崔传云、梁世九、胡仁寿、刘友光、王连甫、林英才、陈德、郭城、胡平山、吴振兴、胡时全、曾增英（女）、李玉兰（女）、张润兰（女）、温宝华（女）。

甲班于 1936 年 8 月毕业，乙班于 9 月毕业。

#### 第六期

1936 年 5 月 30 日，招收第六期学员。校长吴泽光，政委曾三（于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时调往西安，从此离开了学校），教务主任沈毅力。

教员增加了吴尚南、阮宗昭、李钦、黄庆元。第五、六期入学时间仅相差一个月，同时在校学习。

第六期根据学员水平的不同，分为甲、乙、丙 3 个班。学员都来自红军干部、战士，共 26 人。已知的有：邢绍孔、刘远、池大昌（池龙）、王必恭、王宗金、李锡成、吴恒寿、区思炫、林英才、李乾、张生明、何渭信、钟潘猷、李桂生、彭效萍（彭连祥）、罗士海、郭长波、张乃见、刘克、施正前、王树青、张作功、陈德、赖仰高、甄彩云（女）、杨发科（杨杰原四期学员，因病随六期毕业）。甲班于 1936 年 10 月毕业，乙班于 11 月毕业，丙班于 12 月毕业。

#### 第七期

1936 年 9 月上旬招收第七期甲班，10 月乙班入学。开学时校址在保安西五家沟门，1937 年元旦，学校随党中央到延安，住城内城隍庙内。1937 年 6 月随红军总部迁三原县云阳镇姚家寨。不久，学校奉命开赴前线，行军到富平县庄里镇，不久又折回云阳镇，冬季返回延安，住盐店子。

校长吴泽光，指导员杨毓卿，教务主任沈毅力。教员又增加了汤翰章、杨迪哲。

学员多数是长征过的青年战士，也有从上海参加革命到陕北的青年。学员根据情况分为甲、乙班，甲班 7 人，乙班 11 人，共 18 人。他们是贺瑞金、曹怀银、柳仁甫、张合山、杨才盛、钱构甫、刘建辉、刘占国、陈云轩、潘文宽、攀济昌、吴思楠、叶忠堂、罗志平、刘绍泽、金静英（女）、李鹤翔、陈建慧（女）。

甲班于 1937 年 2 月毕业，乙班于 6 月毕业。

### 第八期

1936年11月底，招收第八期学员，12月开学。校领导未变，教员增加了王曙、雷振岐、申仲义、严东生、洪杰、张维东、孙有余等。

第八期开学不久，于1937年1月随党中央迁到延安，先住清凉山下。后来决定将该处交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于是学校迁至城内住城隍庙。不久迁至富县住在一小学内，因小学开学，又迁至天主教堂内。1936年4月，随红军前线指挥部迁到陕西关中地区的三原县云阳镇姚家寨，不久又迁至富平县庄里镇，后又返回云阳镇。第八期学员于1936年9月在云阳镇毕业。

第八期学员是从部队中选调的，共32人。

学员根据水平不同，分为甲、乙班。学员排长为李永发。学员有黄传龙、张利贞、鲜才文、陈桂运、吴近禄、刘传德、张树名、李索铭、赵永清、陈慧清（女）、龚才发、许国桢、秦相同、王恩清、邱家模、赖洪、李家齐、鄢育子、廖昌材、谢辉保、王玉华（王青生）、孙元恩、徐元芝、顾玉平、曾绍先、张悟道、廖代春、刘发海、匡钱生、赖平、赵尚椿。廖少权（廖辉）原在三期，因病随八期毕业。彭国安因病由七期留八期毕业，龚才发由九期提前到八期乙班毕业。

### 第九期

1937年6月招收第九期学员，校长吴泽光，魏洪亮任学校政委。

校址由云阳镇迁回陕北住在距延安20里的盐店子。

这一期学员只有9人。颜斌、张模陶、吴茂达、赵德淳、秦贤成、袁测心、许胜光、郭志瑞（女）。匡钱生因病由八期留在九期毕业。

这一期于1938年2月毕业。

### 第十期

1937年12月招收第十期学员，校长吴泽光，政委魏洪亮，教务主任沈毅力。教员有张维东、汤翰章、杨迪哲、刘法墉、洪杰、陆亘一、申仲义等。学校于1938年3月12日由延安迁至富县东村，第十期在东村毕业。

当时第十、十一期同时在校学习，所以通常将第十期称为一队，第十一期称为二队。

一队队长杨迪哲，指导员张兴胜，教育主任王曙。一队随校部住盐店子，二队（十一期）住裴庄。

学员共42人，分为甲、乙、丙3个班。他们是：杨志德、马克定、李庄、赵希忠、张汉超、李宗义、蔚国文、林胜文、李占云、王聚胜、

李乃志、罗正旺（罗长波）、余泽山、吴明显、孟开兴、邓忠德、李芝明、曹定祥、顾兴德、黄文友、廖金贵、何青云、刘世忠、廖开宁、张光确、郭世和、张建良、袁吕寅、钟常喜（钟尚清）、陈振华、陆聆民（女）、王心兰（女）、钟月林（女）、杨柳（杨芝兰，女）、叶孚之（女）、叶晋之（女）、刘建华（女）、彭道华（女）等。

这一期于1938年5月在富县东村毕业。

### 第十一期

1938年3月招收第十一期学员，学校先在富县东村，因吃水困难，迁到富县督河村，一队住在天主教堂里，二队住民房内。因为与十期同时在校上课，十一期称二队，队长张可曾，指导员杨毓卿，副指导员曹昌，教育主任汤翰章，主任教员刘法墉。

校领导与教员未变，只有沈毅力于1938年下半年调新闻台工作，王曙同志任教务主任。

从第十一期开始，学员除从部队抽调外，增加了从大后方及陕北公学调来的学生。从部队调来的编为第一排，排长熊景钊；从陕北公学及大后方来的同学编为二排，排长刘天元（刘凯），后来又根据进度编为甲、乙班。

甲班学员有熊景钊、张振第（张凯）、朱仕朴（林彬）、韩诗农（林峰）、韩古农（王进）、李天民、毛良妆、余清泉、李永清、邵永清、杜唐禄、李光绳、胡光堂、马鸿福、刘海珊、陈士泰、沈昌荣、王辉明、王明祥、甄俊儒、贺学生、朱学春、冉福贤、杨明权、杜士辉、胡天秩、王美龄（王静女）、洪心（女）、马锦帆（女）、杜培毅（女）、陈孚芹（女）、郑唐哲（女）等30余人。其中有13人提前毕业分配到二局工作。

甲班于1938年8月毕业，地点在富县督河村。毕业后又到三局教导队学习两个月。队长沈毅力，报务教员王子纲，电学教员段子俊（材料厂厂长兼课），三局局长王诤同志也有时讲课。

乙班学员有刘天元（刘凯）、陈大义、陈文定、张志廉、田正本、彭作贵、彭金声、邱正才、王成泽、刘绍斌、何永禄、谭玉山、张金华、沈前如、崔传云、张锦云（张池，张景运）、梁桂真（梁立波，女）、宋明朝（女）、宋玉生（女）、胡文卿（女）等约20余人。

乙班于1938年9月毕业。

此外还有未学完即调往有关单位工作的，如怀福田、胡文清（女）、李松才、张明、李萍（女）、白凤莲（女）等。

军委通信学校于1938年5月建立实验室，从十一期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电工和无线电的有关实验。实验室的器材，大部分是从电台换下来的旧机器和零件，电池是从白区购买的，B电池是实验室人员自己组合而成的。

实验室负责人先为申仲义，后为张立中、唐英洛。

### 第十二期

1938年5月15日，招收第十二期学员。校长吴泽光，政委张振球，教务主任王曙。

教员有陆亘一、周建南（周亚夫）、申仲义、刘法塘、涂光大（王平）、孙有余、雷振岐、汤翰章、袁血卒、洪杰、孙俊人、翁濂等。

学员共66人，第一队（十期）已毕业，十二期又与十一期同时在校，有一段交替时间。十期毕业后，一队领导负责十二期。

第十二期队长杨迪哲，指导员张兴胜。学员分为三个区队（也称甲、乙、丙班），学员区队长由学员兼任，吴新、贾峰戈、章钊（女）分别担任区队长。

从十二期起，学员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不少学员是从后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大多是高中学生，因此学习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数学、物理、无线电原理等。

已知的学员有：贾峰戈、吴新、章钊（女）、崔藏玉（崔伦）、陈伦、黄冠群、绳吉伦、邢中里、张文东、杨家祥、高凤亭（高飞）、杜牧平、郭超凡、赖监、郭淑文、吴永图、何志智（何轰）、钱辉察、边义选、朱书堂、张起信、周明海、邹青山、刘永福、穆图、王乃大、秦运皋、潘流、吕进、刘崇南、李包夫、赵好学、张焕鼎、白志贤、张正鳌、张宗仁、龙维寅、郭志丰、彭为功、周希仓、赵心印、吴双根、莫少召、赵永誉、唐英洛、丁古（许久和）、胡延明、杨万英、彭廷贵、孙志敏、王鹏、贾宋勤、孙藻勋、杨才、赵客苍、王玉库、曹瑞华、李天征（女）、李作秀（女）、凌野（女）、陈昭（女）、杨瑟（女）、高翔（女）、李淑芳（江洪，女）、王少榕（女）、胡方（王文华，女）、张蜀俊（女）、薛道真（女）、吴友文（女）、胡均（女）等。

这一期于1938年11月毕业。

关于这几期的情况，不少同志写了回忆材料。杨迪哲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于1936年11月到通信学校工作，我到学校的时候，已办到第七期，正筹办第八期，新学员已开始报到，学校驻在保安县城外十几里地的一个叫西五家沟门的村子里，离三局局部很近，仅隔一条沟。当时

没有营房，大家都和老百姓住在一块，有的教员就跟老百姓同炕。‘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主动退出延安，过了1937年元旦，我们跟着毛主席走了三天路，进了延安。延安居民、学生、商人都出城迎接我们。进延安后，三局住在清凉山下，我们住进营房，以后让给红军大学（七七事变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我们搬到城里城隍庙，1937年6、7月，学校迁到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总指挥部就在这里。我们住在距云阳镇十几里地叫姚家寨的小村子里，住民房。1937年冬时，学校又从云阳镇回到延安距城西北方向有25里远的盐店子，就搬到天主教堂。教堂在山上，要下山到沟里挑水吃，于是7月份又搬到督河村，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到1938年6、7月份，又迁回延安。……后来学校搬到距延安西北30里的川口，大兴土木，开始建校舍，挖窑洞，建办公室，在这里住了几年，从此有了自己的校址。”

“1936年我到校时，六期丙班未走，七期甲、乙班还在，八期是1936年12月在西五家沟门开始办的。开始一个班，30多人，以后分为两个班，训练时间为半年。在八期我教了第一课，讲了英语26个字母和几个数码的读音及电码组成。校长吴泽光教电学，教务主任沈毅力教英文。学校在十期以后从1938年2月起才分队，十一期一队由我负责，十一期二队由张可曾负责。学生来源，十一期以前，由部队挑选年轻又有战斗经验的同志，文化程度基本没有严格要求。到了十期，学生文化程度就高一些，十一、十二期，外面来的中学生就多了，是从抗大和陕北公学挑选来的，是已经经过入学教育的学生。1938年10月，在督河村接收十三期学生，这期人数最多，有220多人，先学报务，又学技术理论，到1940年春才毕业。当时具备这个条件，有器材也有教员，孙俊人、陆亘一、周建南（周亚夫）都是电学教员。最受欢迎的是孙俊人和周建南。十三期分为3个队，一、三队是女生队，二队是男生队，我是一队队长，王林是二队队长，张楞曾是三队队长。1939年回到延安，学校还曾迁到保安一段，一队和校部住在五家沟门，二队住柳家坪，三队住沙道子。当时的教材、教具比较简单。开始就用几个蜂鸣器，接的是1.5伏小电池，这样教十几个学员还可以。到1938年有了两个振荡器，一个队一个。当初在保安时，纸张很缺，连红绿标语纸都用来抄报。到延安时就有了白纸用了，那时铅笔也不够用，学员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抄报。教材是自编的，电学教材是吴校长写的，英语教材是与通报用语结合起来由沈毅力写的，收报不用教材。教学进度根据学期计划由教员自己掌握，开始每分钟抄收20个电码，上机工作时每分

钟抄报 80 ~ 100 个电码。后来专业教员多了，学生多了，就发油印的讲义。工农成分的学生学习很努力，我都为之感动。那时教员和学员天天在一起，对学习吃力的学生，我们都要重点帮助，使他们赶上。那时对学生考核很勤。我教收发报，一说考核学生就紧张起来。平时抄报抄得好的，这时也抄不好了。以后我就不讲考试，只是悄悄地看学生抄收两分钟，再叫大家把抄收的报交上来计算成绩。这样学生不紧张，能看实际成绩。电学考试发卷子。算术课的教学是与报务相结合的，学加减乘除，还有分数，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学更多的基础文化知识。”

柳仁甫同志还记述了吴泽光校长的情况：

“1939 年 8 月下旬，我和钱构甫同志到保安五家沟门通信学校报到，参加七期甲班的学习。我们必须等待五期同学在 9 月 1 日毕业离校了，才能搬入他们的窑洞开始接受训练，我们暂时住进了校部。”

“校部，设在一口不到 20 平方米的方形石窑里。它是学校首长、全体教员工作、学习、生活的唯一处所。除了政治委员曾三同志住了一个高铺和在铺前有一张狭小的桌子外，其他人都睡在地下门板上。我们两个就挤在政委床铺旁的地铺上。”

“所有的技术教员都是在西北被我军‘解放’过来的电台人员，他们全都不安心在红军中工作。我发现了其中有一位五短身材、宽脸庞的广东人，最多二十多岁，他目光炯炯，一副坚毅神态，显然与众不同。其他的教员沉默地坐在地铺上，只有他在忙着写什么，看什么。别人称他“吴校长”，我才知道他是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

“校长十分重视我们的发报手法，他经常利用晚自习时间转悠到我们班上来，我们都十分高兴校长指导我们练习发报。我们轮着发一段报文，请他评判自己手法上的缺点，以便改进。他对每个同学的手法，都仔细地听，然后，慈祥而又认真地像对待小孩子那样用形象而通俗的语言讲评，既给予鼓励，又指出克服缺点的方法，最后用示范的方法让学员听他的手法。大家对校长给予自己的指导，全都觉得有出自内心的欢欣。有时，住在隔壁的乙班同学，也参加进来，要求校长指点，他同样耐心地评论指导。”

“漂亮的手法，在我军电台的报务人员中不是很多的，据我后来的观察、比较，吴泽光校长的手法，可说是正规得无可挑剔，无论点画、间隔，都接近于机械发报的水平。他在发报示范中，经常用‘口码’（用口腔发声模拟手法）给大家示范，要我们在心里具有正规手法的根本印象，我称之为‘心码’。用自己的观念来说，手法和心码有极大的

关系。”

“1941年，我在通信学校十五期当教员。十五期有两个队，是属同一教学进度的。在重新按收报考成绩进行编队之前，由吴校长在一个特大的教室中，亲自会考，几十个同学‘整装以待’，迎接校长的统一考试。全校的收发报教员，站在四周。校长那严肃而认真的姿态，感染了大家。当然，那时我们已有了低频振荡器，声音洪亮优美，校长的手法，我们听了，真是一种享受，谁都从心中感到心悦诚服。”

“队伍快临近延安北关了。北关外有红军大学的学生们列队路旁，不知是迎接那位中央首长。到延安了，我们心情激动，行军疲劳也消失了。忽然，吴校长起声带领我们唱歌，我们伴着行军步伐，也随着吴校长边走边挥动手臂，齐声唱着雄壮的歌曲，直到了延安城。路旁的红军大学的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并鼓励了我们。”

“到了延安，我们的住房条件比保安好多了，还有一个简陋的篮球场。听同学们讲过，中央在瓦窑堡时，机关、学校、部队曾开过一个运动会，通信学校当然参加了。吴校长在田径赛跑中得了第一名。他个子矮，动作敏捷，两臂摆动快，脚步也快，我想，这当然是他得冠军的有利因素，但重要的一点，是他每干一件事，都有那么一股必须干成的决心和拼命劲头。这‘拼命劲头’是体现他个性的重要方面的。他常打篮球，在生活中是普通一兵，在球场上同样是普通一兵，但在胜负上从不谦让，从不饶人，当仁不让，胜了是争得的，输了把帽子狠狠一抓，摔在地上，现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通信学校在保安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校歌，歌词较短，曲调好像移用苏联的革命歌曲。抗战开始后，形势发展了，通信学校规模不同于前了，学员中知识分子成分大大增加了，非常需要新的校歌。学校本身没有音乐家，据汤翰章同志回忆，是他陪同吴校长专程到延安请教了吕骥同志，吕骥同志给他们讲解了创作歌曲的基本要求和办法，鼓励我们大胆实践。原来准备两人合力创作，但由于人为的原因，汤翰章同志不久就被迫停止工作，创作校歌的重任，只好由吴校长独自承担了。在创作期间，很多同志都看到，吴校长或在晨曦初露之时，或在明月当空之际，在那窑洞前时而进行纵情吟唱，时而停步低头思索。这支歌，表达了通信学校的教育方针，体现了我军那种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它将永远鼓舞通信兵胜利前进！敬爱的吴泽光校长，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张可曾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第九期到通信学校的，开始在校部。

校长吴泽光找我谈话，让我筹备第十期学生进校的准备工作，担任队长。当时一队就是十期，二队就是十一期，同时在校学习。1937 年底开始调学生，一队是从前方部队调来的，二队是从边区调来的。学校 1938 年 3 月 12 日迁往富县东村，我记得起程那一天正是孙中山的诞辰，满街贴有标语。第十一期是在 1938 年 1 月在裴庄筹备的。1938 年 4 月袁血卒同志到东村，当时《论持久战》刚发表，他给十一期学员讲《论持久战》，讲得非常生动。我们是 1938 年 6 月听到传达，《毛选》上记载是 8 月 15 日发表的。第十三期在 1938 年 10 月从东村移到督河村。当时有一、二两个队。一队队长杨迪哲，政治指导员张兴胜，二队队长张可曾，政治指导员华魁。1939 年 3 月，在督河村编为三个支队，一队队长杨迪哲，二队队长王林（孙有余），三队队长张可曾，政治指导员张兴胜。我在三队时，下设三个区队。第一区队长是吴新，第二区队长贾峰戈，第三区队长章钊（女）。后来由督河村迁到保安，这时第三队设两个女生队和一个男生班，两个区队长及班长均由学生担任。1939 年 6 月由保安又回到延安，准备赴晋察冀前线。后来军委决定不去华北，学校就迁到川口。到川口后又重新编为两个队，杨迪哲为一队队长，张可曾任二队队长，华魁任二队政治指导员。我在 1939 年 12 月底，调到马列学院学习，就离开学校了。”

张志廉同志在回忆中说：“1937 年底，我从八路军总部抽调到延安学习无线电报务，和我一起去的有朱仕朴、熊景钊、刘凯、陈大义等。我们一起先到山西洪洞县高公村集中，经临汾、蒲县然后到延安。1938 年 1 月开学，我是十一期第一队，共两个排 60 多人，一排 32 人，二排 29 人。一排有四个班，排长熊锦钊。二排是从陕北公学调来的，女同志多，知识分子多。上课以排为单位。校址一队在盐店子，二队在裴庄，3 月初搬到富县东村。这时十期还没有毕业，到东村不久十期就毕业了，同时十二期也到校，我们十一期和十二期同时在校学习。我们十一期是在 1938 年 8 月在督河村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回延安，在路上行军三天，当快到延安时碰到十三期的新学员，正向学校走去，人很多。大部分是抗大来的，有男有女，他们都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青年。”

朱仕朴（林彬）同志在回忆中说：“1937 年年底，从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前总机关抽调一些青年到延安通信学校学习。人员在前线总指挥部集中以后由熊景钊当排长，我当支部书记，带队到了延安。1938 年 2 月，我们第十一期正式开学，到 1938 年 8 月毕业。学员由两部分组成，



一排是从前线回来的青年战士、干部，二排是从抗大、陕北公学调来的知识青年。队长是张可曾（张奚嘉），指导员杨毓卿，我是支部书记。我们到学校还进行考试。一是测验听力，把一块马蹄表放在身后一段距离的地方，让学员辨别声音的大小及方向。二是测验智力，我记得当时问我：‘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当时不知是智力测验，马上答‘一斤铁重’，结果答错了。学习内容主要是学报务，也有一点机务内容。还学政治经济学。校址开始在延安裴庄，开学不久迁到富县东村，因吃水困难又搬到督河村，一直到毕业。这一期是延安通信学校的一个转折期，以前的学员全部是从前方调来的，从这期开始，有成批从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第十一期与十二期同时在校学习。我们十一期开学不久，第十二期即开始报到，十二期也是在督河村毕业的。”

孙俊人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38年年初到延安，首先在清凉山解放社学习半年马列主义。一起学习的有周建南、孙有余和一个姓苍的，共5个人。……1938年6月中央组织部分配我们工作时，是陈云同志同我谈的话。到了三局与王诤同志谈的话，确定和周建南到通信学校当教员，孙有余到工厂。”

“我到通信学校时是十一期结业和十二期开学的交叉时间。十二期、十三期我都教过，以后我就到工厂了。通信学校前一段教务主任是沈毅力，后一段是王曙，校长是吴泽光。报务教师是洪杰、王平，李兆吉是文书，我们几个人都睡在一个炕上。王曙当班长，领导我们出操，我们就叫他班长，至今见了面还叫他‘班长’。那时学校主要训练报务员，技术课很少。学报务必须学电学，达到能自己修机器的水平。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是初中生，个别是高中生，少数还是小学生。当时感到困难的是学技术课。后来，把一些文化低的工人编成一个大队，由我教课，因此，我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授课的方法，是有体会的。”

“通信学校后来根据王诤同志的建议开设了机务班，程明升去了以后又办了高级机务班，相当于大专程度。王诤同志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储备很重视，像我们这些学过无线电的人，到延安都去了三局。他亲自和我们谈话，介绍情况，分配工作，对我们的生活也比较关心照顾。王诤同志在人才培养上是不惜下本钱的，三局在人才培养上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尽管当时我们还很穷，但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钟夫翔他们那一期干训班学完理论之后，为提高实际操作技能，王诤同志批准拿出20部美制15~20瓦的新机器要他们反复进行拆、装练习。1938—1939年我在通信学校当教员时，为满足学生实习需要，

王诤同志也批准使用无线电元器件。手摇马达（电动机）是很不容易搞到的，他也批给学员做实习测试用。那时，器材来源非常困难，这是个多么大的本钱啊！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远见的。”

“我们这些大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差，王诤同志和我们一起动手，我们上课，他也上课，还听过我们的课。那时大学生少，谁给我们上过课的就喊他‘老师’。陆亘一、周建南、孟贵民等都上过课。除上课以外，三局局里的同志有时还来作点专题技术报告。”“王诤同志还注意从国外购进一些无线电书籍。早期在延安没有无线电技术书籍，有一点也是个人带去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材或手册，后来王诤同志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上百本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技术书籍，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从此就有新的书看，能了解国际上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大家都很高兴。”

### 三、延安通信学校的校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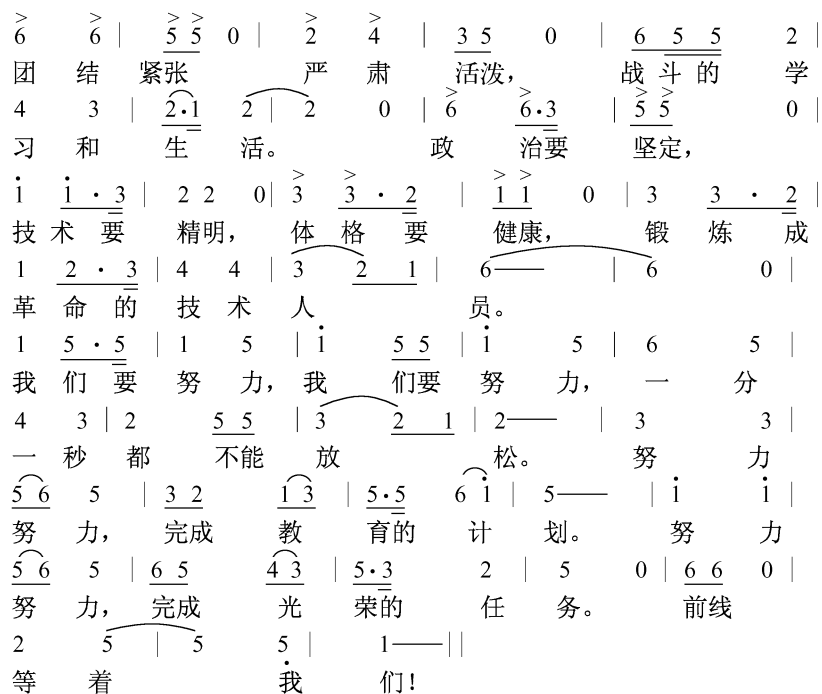
通信学校开始没有校歌，大家唱红军时期通信学校的校歌，后来大家要求延安通信学校应有个校歌。于是在 1938 年初，由吴泽光、汤翰章等几个同志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找到吕骥，本想请他给谱写校歌。吕骥同志说写歌并不难，他讲了一些作曲的原则，让通信学校同志自己编写。后来通信学校的吴泽光及汤翰章等同志采用 1933 年军委三局在瑞金平山冈举办的无线电器材展览的前言中三句话‘一个红色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三件：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身体要健壮’作为歌词的主要内容，以吴泽光同志为主，几个同志共同谱写出延安通信学校校歌。歌子写好后交给吕骥看，他略加修改，请示上级同意后，于 1938 年 2 月就把这首歌正式定为《延安通信学校校歌》。以后这首歌传到各根据地的通信学校、无线电训练队等，这首歌成了各地共同的校歌。

此外通信学校教员汤翰章（丁戈）同志，还谱写了许多歌曲，受到同志们的欢迎。

#### 延安通信学校校歌

G2/4 吴泽光词曲

$\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1} \quad | \quad \underline{6 \cdot 5} \quad \underline{6 \quad 5} \quad | \quad \underline{4 \quad 3 \quad 3} \quad \underline{\widehat{2 \quad 6}} \quad | \quad 2 \text{——} \quad | \quad 3 \quad 1 \quad |$   
 我 们 生 在 艰 苦 伟 大 的 时 代， 为 着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5 \quad 5}} \quad | \quad \underline{3 \quad 5} \quad | \quad 1 \quad 4 \quad | \quad 3 \quad \underline{2 \cdot 3} \quad | \quad 4 \quad 3 \quad | \quad 3 \quad \underline{2 \cdot 1} \quad |$   
 大 众 的 生 存 解 放， 要 牺 牲 一 切 斗 争 到  
 $2 \text{——} \quad | \quad \underline{6 \quad 6}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6 \quad 5}} \quad \underline{3 \quad 5} \quad | \quad 6 \quad \underline{6 \cdot 5} \quad | \quad \underline{6 \quad 6} \quad 0 \quad |$   
 底。 今 天， 我 们 的 战 斗 任 务 是 学 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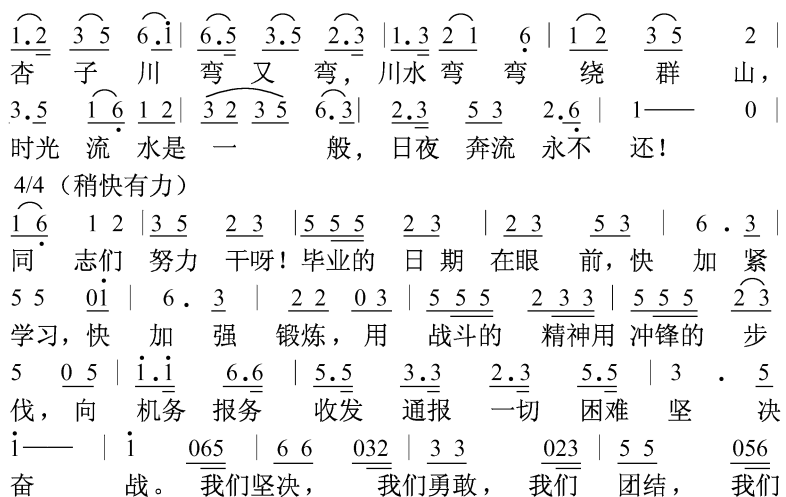
## 通信学校十三期毕业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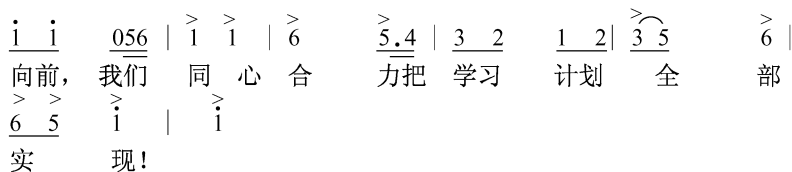
G=1 4/4

丁戈(汤翰章)词曲

(1939年延安)

(一) 突击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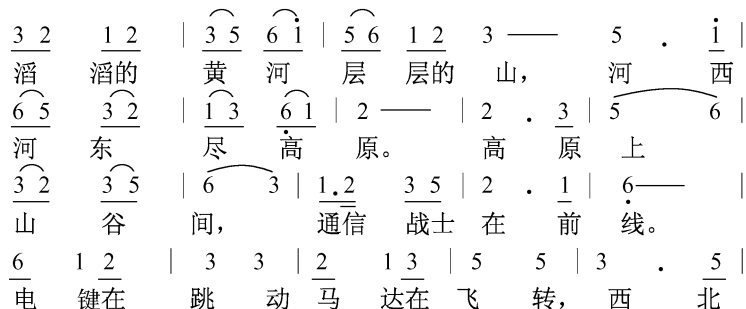
## (二) 毕业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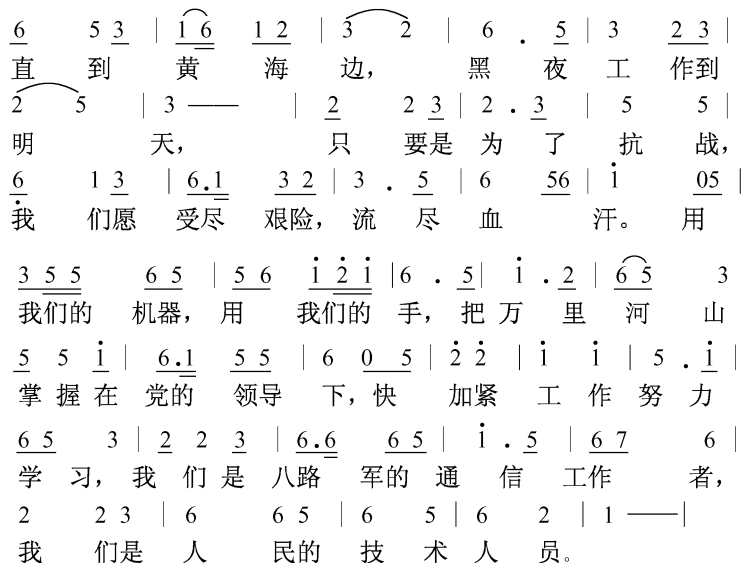
D=1 2/4 (中速)



## (三) 通信战士歌（工作歌）

D=2/4 (进行曲)





## 技术人员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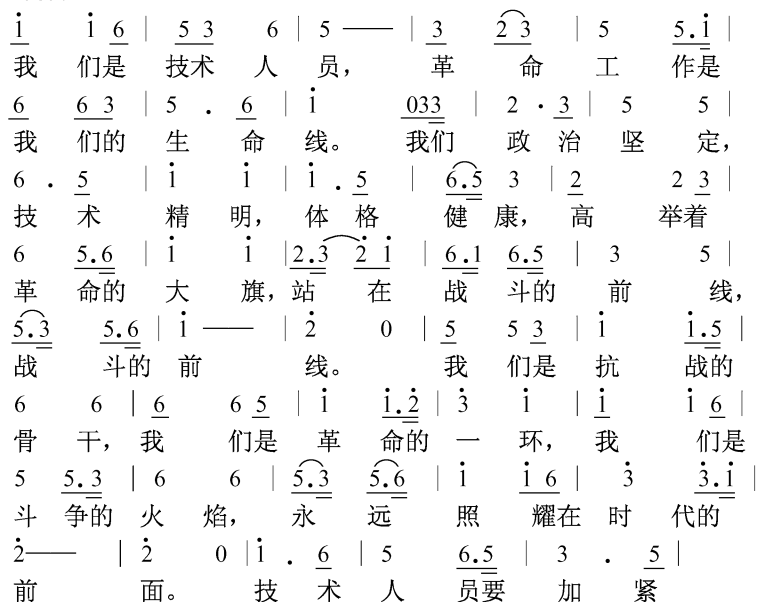
C = 1

彭为功词

2/4

丁戈(汤翰章)曲

1939.2



6 5.5 | 6 . 5 |  $\dot{1}$  — |  $\dot{2}$  0 | 5 . 6 |  
 工 作 要 加 强 锻 炼, 为 了  
 $\dot{1}$  1.3 |  $\dot{2}$  — |  $\dot{1}$  — |  $\dot{1}$  — 0 |  
 伟 大 的 明 天!

#### 四、军委通信学校第十三期至第十五期

##### 1. 第十三期

通信学校第十三期，是人数最多、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期，入学时间比较分散，校址也有数次变动。

第一，学校领导及教员。校长吴泽光，政委张振球，王诤同志曾一度兼政委，总支书记龙细欧，教务主任孟贵民，管理科长张经约，卫生科长隰积德。

这时教员人数较多，为了便于管理，将教员编为一个班，班长王曙，其他有周建南、申仲义、汤翰章、刘法墉、孙俊人、雷振岐、张立中、王光辉、袁血卒、王飞、严东生、洪杰、孙有余、涂光大、翁濂、吴元亮等。

第二，校址变迁。学生入学时在富县督河村，1939年3、4月，迁到保安城北，校部及一队住东五家沟门，二队住柳家坪，三队住沙道子。住了两个月，上级决定学校调回延安，确定分赴晋绥、晋察冀前线，为此学校进行轻装。后来考虑到办学需要安定的环境，又决定仍留延安。学校到延安后，暂住抗大校址。7月学校迁至川口。

第三，学员的编队。1938年底，在富县督河村时，学员分为两个队，一队队长杨迪哲，指导员张兴胜；二队队长张可曾，指导员华魁。1939年3、4月在保安时，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生产，编为三个队。一队队长杨迪哲，指导员王×；二队队长王林（孙有余），指导员华魁；三队队长张可曾（张奚嘉），指导员张兴胜。一队多为女生，70余人；二队为男生，约60人；三队为女生区队，有一男生班。1939年7月，学校经过延安到川口，由3个队又编为两个队，学制延长半年。这期间，有的学员调离，有的调出在学校工作。

1939年10月左右，从新疆回来10余人，编入第十三期，因程度不一，编入第一队，叫补习班，于1940年6月毕业。

第四，学员入学、毕业时间。第十三期入学、毕业时间都有一定间隔，学习中间变化也较大。入学时间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毕业时，第一批为1939年5月，第二批11月，第三批在1940年2月。

第五，学员人数。总数约 220 人。已知的学员如下。

男学员有：李重修，李潜修（李力）、李仲俨、余铎（杜肇远）、李兆吉、李希哲、候选、保金、郭锦伦、马连科、王武臣、张可杰、李克融、吴德来、宋自光、吴永华、胡兆瑞、李尧才、苏德洪、李际、吕怀、金凯章、杜志远、梁彦、姚琅斋、张志申、武通甫、陈家义、何凯、吴尚志、刘禄、吴作贤、墨绍昭、彭力、吴建铭、彭振华、陈朝辉、文志勤、刘其中、王干之、霍建生、罗九也、赵金山、田少农、曾昭祥、刘宗汉、郭富俊、卓剑雄、张富勤、陈承举、周维希、蔡作政、赵永纪、陆步斗、刘富农、徐传涛、周行及、郑德周、牟德昌、延登科、李寅旭、李赤维、郭叙亭、张冰、李锐明、辛鲁奋、武劳华、王承先、穆鼎彝、杨金甫、张照通、李明、魏建铭、杜印荣、郭文锦、冯士珍、史珍等。

女学员有：白俊芝、王佩珍、叶钟英、吕兰海、徐芝云、杜玉清、李超、王子芬、马光荣、李涛、梁竟新、杜士琦、张晓冰、温华、叶成志、吴浪群、陈英、吴元英、鄢先碧、庄俊田、武梅荣、牛凤菊、何珍、王秀英、杜去、周荃、陈小玲、周文馥、屈逐心、屈有焕、王锦堃、郭朋、陈影、江村、曾美若、黄德容、郑道源、张峻、童叶、胡雪琴、陈良桂、史玉林、李应祥、郑重、秦岩、顾秋、屈眉、徐建群、杜林、段锐新、曾宪静、党猷、林润蓉、胡影、朱云、张正芳、田遥、朱贻先、徐慧贤、何叶、林泽敏、魏遵才、郭勇、李凯、斗争、王润兰等。

## 2. 第十三期高级班

1938 年 8 月，通信学校招收一期高级班，学制一年。学员是从普通报务班毕业生中及已工作人员中选调。1939 年 8 月毕业。

学习内容主要是无线电机务，如无线电原理、各种收发报机的原理及装配维修技术。

1939 年 7 月，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形势紧张。这时各根据地已基本形成，中央曾决定无线电通信人员由各根据地培养，原通信学校人员进行整编，规模要缩小。通信学校的一部分人员调往晋察冀，一部分到晋西北，一部分到白区。因此在 1939 年内没有招收普通班，只办了一期高级班。

在 8 月份调来学员 60 余人，高级班开学以后又陆续调来一些同志，共 100 余人。队长杨迪哲，指导员邹剑秋。学员共编 8 个班。

男学员有：姚琅斋、陈承举、周维希、蔡作政、赵承纪、罗九也、

陆步斗、牟德昌、张正仑、武通甫、吴尚志、刘昌文、周赤维、郭叙亭、张冰、李锐明、辛鲁奋、武劳芳、王承先、穆鼎彝、杨金甫、张照通、李明、郑德周、李寅旭、魏建铭、杜印荣等。

女学员有：秦岩、牛世勤、杜玉清、顾秋、郭朋、周荃、屈眉、徐建群、杜林、段伯琪、段锐新、曾宪静、李应群、杨萍平、李冠华、郑重、郑道源、胡雪琴、周素琴、王真伦、贾俊秀、党献、黄德绥、黄德容、林润蓉、胡影、朱云、张子芳、张正芳、刘敬业、童叶、田遥、陈影、朱貽先、胡文卿、王培珍、魏紫先、杨瑞芝、陈良桂、徐慧贤、庄俊田、何叶、林泽敏、曾美若、魏逸才、郭勇、李凯、斗争、王润兰、陈昭等。

### 3. 第十四期

通信学校自1939年缩编后，与抗日大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前方需要大量报务、机务人员，各根据地环境不稳，不能安定地办学，所以从1940年起，军委决定通信学校继续招生。于是于1940年7月，招收第十四期学员。

校长吴泽光，协理是邓典桃，组织干事程萍剑，教务主任孟贵民，教育干事王乃大、苗柏洁，校部秘书裴壁、李立成。1943年增加技术书记许西、赵景武。总务科科长龙许，后改为总务股，股长邓舜菊，管理员孙丙城、任发富，建设科科长袁屏。

教员有：孙俊人、雷振岐、刘法墉、贾峰戈、傅英豪、唐旦、唐英洛、翁濂、王飞、史根顺、黎沱、张立中、湛亚选、严成钦、李兆吉。各学员班班主任也担任教学任务。

这一期学员有80余人。开始学员编为一个队，队长杨迪哲，指导员邹剑秋，不久杨迪哲调干训班学习，学员编为3个班，以后又编为两个队，一队进度较快，二队略慢。

已知的学员有：陆凯、马达、史云峰、刘云方、胡瑞五、宋绍武、程万华、吴玖银、梁文汉、刘忠信、胡有琰、涂怀星、李英、何汉卿、赵俊壁、刘云波、文学义、胡学瑞、邹杰、黄益、赵大砚、杨德本、刘子忠、卫伯九、刘吉祥、林奕保（阿宝，女）、王荣（女）李树珍、刘杰、王振海等。

这期于1941年1月毕业。

### 4. 干训班

通信学校共办二期干训班，1941年3月，招收第一期干训班。学员都是在通信单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同志。



学习内容主要是新式收发报机的原理及线路结构。由孙俊人、孟贵民、程明升同志讲无线电原理。孙俊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孟贵民参加革命前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就读，程明升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工学院。他们讲授的课程深受同学的欢迎。林一民、王飞讲政治课，王进（韩古农）教英语。

学员共15人：黎东汉（班长）、刘法壙（副班长）、麻福芳（副班长）、孙勇（孙志高）、江涛、顾光泽、杨迪哲、严成钦、何祥昆、袁贻辉、肖开龙、周德显、李贻玉、曾化念（曾华）、王乃大。

这一期于1941年12月毕业。

### 5. 第十五期

1940年12月招收第十五期学员，校址在川口，学校领导及教员与十四期基本一致。

这一期学员人数较多，约140余人。学生从部队抽调和从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处调来的。一队队长杨华，指导员张发（张怀礼），班主任李光寿；二队队长李先觉，指导员苏冶，学员班主任柳仁甫，教育干事林奕蓉（女），政治教员李立，数学教员史根顺。

学生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根据文化水平及接受程度，又重新编队。将原来文化水平较高，对报务接受能力较快的编入一队，其余编为二队。一队由山上搬到山下，二队仍在山上，另编训练计划进行教学。

这时一队队长杨华，指导员张怀礼，班主任柳仁甫，副班主任骆祖光。二队队长李先觉，指导员邹剑秋，班主任李光寿。原在各队的教员均集中到校部。一队分3个区队、7个班，一区队长姚太林，二区队长向明华，三区队长秦山。一队共70余人。

不久上级决定抽调一部分学员学习苏联的收发报技术，于是从一、二队学员中抽调一些学员组成三队，队长刘束，指导员邹剑秋，班主任任翁濂。在原学习基础上又学习3个月。

第十五期学习内容政治经济学、电学、英语、收发报技术，哈特莱式收发报机。当时实习课因器材有限，仪器不够，先让学员在地上练习画出线路图，并将每一个元件的性能及连接牢记在心中。然后在地面、木板上画出实验线路，经教员审查合格后，即按线路放置各种元件，用导线连接（不焊接），再经教员审查合格后，通电试验即算合格。以后还学习手摇发电机、电动机的使用与维修知识。

教学活动主要在队里，班主任是教学的组织者和收发报的主要教

员，朝夕与共，承担了主要教学任务。

第十五期各队毕业时间不同，一队于1941年10月毕业，二队于1942年4月毕业，三队于1942年5月毕业。

已知的学员目前不能准确分出一、二、三队，已知的学员有：段恒德、向明华、关宪章、姚太林、晋邦杰、李双春、孟自成、聂德尧、李群、鲁浩、张贵德、艾明、肖林、陆双欣、乔望祥、王碧翔、张治国、慕连如、丁昌绪、张季夫（方田）、秦山、刘保禄、姚福康、刘德世、张守仁、关克刚、彭志义、喻俊庭、黄飞、智勇、马震、石磊、杨树基、高光普、高平、冀守廉、李希臻、张万顺、赵兴福、杨忠、王平凡、张方、田原、刘克保、王进勋、郑有源、白江潮、魏良、冯友仁、范成周、张琅、熊志山、高峰（邢建）、范凤鸣、陈天恩、温凤山、郝书田、张春阳、雷宏、曹锐、李映光、李培基、李培德、罗泽润、邱大印、张定有、龚福邦、陈平（马丙午）、马一、宋长芝、敏锐、张超、杜修德、章品君（女）、唐静（女）、郑唐（女）、陈斌（女）、潘静（女）、赛菲（女）、刘平（女）。

王曙同志在回忆中说：“1931年夏天，原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的总指挥部，在西安创办无线电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我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去报考，考试成绩合格。翌年夏，学习结业，分配到总部电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到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

“1937年初，党组织将我的情况介绍给罗迈，并送我到延安。中组部分配我到军委三局。局长王净和我谈话后，分配我到通信学校当教员。当时学校住在三原云阳镇，学校的前身是陕北无线电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吴泽光参加革命后创办的。我到校的时候，学期班次已办到第八期。校长吴泽光，指导员杨毓卿，教务主任沈毅力，教员有杨迪哲、阮宗昭（1937年秋送往大后方）。我担任报务的拉丁文课。后来到校任课的还有张维东、汤翰章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部队由渭北一带开往抗日前线后，学校从云阳镇返回延安，住东盐店子。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的扩大，大后方的知识青年不断地投奔延安。吴泽光的侄子吴元亮从广东来到延安，经过自学当了机务教员。张可曾也来到通信学校任教，在地下党搞电台工作的申铭鸿，也介绍他的弟弟申仲义到通信学校。沈毅力写信动员他的亲属黄友发、顾光德参加革命，他们从江苏千里迢迢到延安通信学校学习。同年冬，洪杰、雷振岐、严东生到通信学校，他们是杨虎城部队的电台报务员，从晋东南来到延安，由总政部介绍到通信学校当了教员。”

“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因此，1938年3月12日，学校又从盐店子搬到富县东村。”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前方、后方都需要报务员，学校规模也相应地扩大，第十期学员比九期多，到十一、十二、十三期规模就更大了。学员来源与过去不同，从陕北公学、抗大学员中选拔的青年知识分子占多数，也有少数从白区直接来的，还有一些从部队选拔的。校长吴泽光、政治委员魏洪亮、总支书记龙西欧。”

“十一期学生中青年知识分子占主要成分，如王进、林峰是高中学生，那时高中学生在延安是不多的。这一期学员在通信部的有张凯等，十二期有崔伦、杨家祥、绳吉伦、高飞等。十二期教学时间较长，既学报务又学机务。总体来看，这一期学生文化水平较高，基础好，思想进步快，教学质量是最好的。”

“学校在东村高原上，住在一个教堂里和部分民房里。最困难的问题是没有水源，靠天吃饭，生活很不方便。后来学校就搬到高原下面的督河村，这里吃水不困难，供应条件比较好，军民关系也好。当时把学员编成3个队，队长杨迪哲、王林（孙有余）和张可曾。教员有孙俊人、周建南、刘法塘等。孙、周、王都是从上海交大来延安的，先在新华社工作，后来到三局，发挥了他们的专长。学校的规模扩大了，教员的专业知识水平高了，学生的文化知识基础也比过去好，这是通信学校比较突出的变化。学员精神振奋，生动活泼，努力学习，情绪十分高涨。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可以说，在督河村那一段时间，是通信学校历史上的发展壮大时期。在这期间，教务主任沈毅力调新闻台工作，王曙任教务主任。”

“1939年春，国民党反派发动反共高潮，督河村虽好，但位于陕甘宁的边远地区，不大安全。因此，三局决定将学校搬到保安。途经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亲切接见全体师生，我第一次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话，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在保安，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差多了。同时，学生和教员都要一边学、一边教、一边上山开荒生产，教学计划难以如期完成，因此同年7月，通信学校迁到延安附近的川口。”

“迁回延安后，王净曾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从长远设想通信学校要继续办下去，规模暂不扩大。在此期间，通信学校继续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报务与机务相结合、新生与老干部培训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分出一些人员到前方办校，调出与批干部分别

到大后方统战区和抗日前线电台工作。”

“1946年6月，刘善本驾机起义飞抵延安。我同材料厂有关技术干部奉命到机场登机参观，我先到机场附近延安地区卫戍司令部，向王震将军请示后，把机上无线电通信、导航设备抢先全部拆卸下来研究学习。未过几天，这架飞机被国民党飞机炸毁。之后，我们冒着敌机再次轰炸的危险，不畏酷暑，汗流浹背，又将被烧毁的机身铝皮拆下来，加以利用，解决了我们急缺铝材的困难。同志们在紧张的劳动中，一面‘叮叮当当’地用榔头、改锥拆卸，一面高兴地唱起豪迈的歌曲：‘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都是神枪手……没有无线电通信器材，有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送……呀呼嗨！’逗得大家不亦乐乎。这么好的工作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令人欣慰。”

“1947年春天，国民党对陕北重点进攻，首先围攻延安。战时的思想动员工作早已开始了。一切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要求通信、广播畅通无阻，工厂既要坚持生产，又要准备搬迁。王诤决定：派我和有关人员星夜兼程前进，把美军观察组的1000瓦报话机和50瓦汽油发电机抢先运到瓦窑堡。遵照中央关于‘在战争期间确保语言广播一天也不能停’的精神，于1946年年底以前，我们把广播设备从延安搬到瓦窑堡附近的好坪沟里。接着，工厂也迁移到这里进行生产和维修工作。后来，工厂又搬到苇子湾。到1947年4月，我军初战告捷，战局变化，三局随叶剑英率领的中央后委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这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由设在邯郸地区的广播电台接替继续广播。”

黄达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年秋去延安通信学校，在机务训练队学习，人数不多，20多人，有柳仁甫、戴东、苏冶、关熊等。学习内容较深，学习美制电台如V101、V284等通信机。学一段时间，就让自己动手按图纸装配出来。当时虽然器材很缺，但是三局和通信学校不惜本钱去培养人才。孙俊人教电学，傅英豪、唐旦夫妇教英语，他们两人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40年到延安的。在学习期间，正值‘八一五’日本投降，同学们高兴极了，有的同学把衣物当做火把烧了，以示庆祝。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

杜牧平同志在回忆中说：“1938年5月，我从陕北公学调到通信学校学习，当时通信学校的全名叫‘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通信学校’。当时通信学校训练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八路军训练报务员。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队之间都要通信联络，需要大量报务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信学校就抓紧培训，一期未完一期又开始。训练规模虽然不大，只有两个

学员队，每队50~60人，但从做好物质保证工作来看当时也不太简单。训练出来的学员要适应部队要求，要一批批送往前线，所以课程设置、时间安排都要紧密结合实际。训练时间每期半年，课程有政治课，军事训练很重要，一方面为了将来到部队工作，另一方面有现实的需要，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富县，这里是两面政权，时常有摩擦，进行军事教育关系到站得住站不住的问题。我们学习了站岗、放哨，巡逻中对各种情况的处理。有一次有消息说国民党一个连向我校开来，可能袭击我们，当时军事训练是必要的。业务技术课有收发通报、英语（报务英语）、电学（包括电工学和无线电原理）。当时对电学课很重视，因为这门课学得好不好将决定报务员能不能修机器和将来能不能独立工作。英语学的是沈毅力编的课本，是按通报程序编的，当时用英文电码，学完这一本，就会上机会话。这门课以后叫报务学，这方面沈毅力是有贡献的。”

“当时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吴用），政委是张振球。一队队长是杨迪哲，二队队长是张可曾。校部有党总支，总支书记是刘绍文，文书是李兆吉，教务主任是沈毅力。教收发报的教员是涂光大。英语教员是沈毅力兼。电学教员，甲班是陆亘一，乙班是周亚夫，丙班是孙俊人。军事、政治教员是袁血卒。孙俊人、周亚夫也讲过列宁主义概论。”

“校址是在富县以西的东村（距直罗镇一二十里路），以后因吃粮吃水困难，又搬到富县东边督河村。十三期开始也住督河村，后因国民党闹摩擦，摸我们的哨，夜间我们因看不清楚，曾打死过老百姓的牛，住地不安全，影响训练，所以不久就搬到保安，以后又搬到延安。当时我们每班有枪放哨、打靶用。那时部队生产比老百姓好些，学校也搞助民劳动，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交公粮、扩军，都要演节目，由各队指导员组织。”

唐英洛同志在回忆中说：“1938年春，我一个人从武汉经西安到延安。到延安时，我希望到通信学校去学报务，就直接到了富县东村的军委通信学校。不久，军委三局王诤局长带领从陕北公学、抗大调来的60名学员，也来到东村。”

“5月份，第十二期开学，学员就是我们这61人。王局长带来的这部分同志，一般都有初中、高中程度，大部分还在陕公、抗大学习过一段，其中还有两个（涂光大、翁濂）是学过报务的，留下来当报务教员。”

“十二期开学后，十一期还在校。这时，全校编了两个学员队，十二期的是一队，队长杨迪哲，教育主任王曙；十一期的是二队，队长张可曾，教育主任申仲义。”

“我们十二期这个队，按文化程度高底分为3个区队，也就是3个班，叫甲班、乙班、丙班。甲班的电学教员是陆亘一，乙班电学教员是周建南，丙班电学教员是孙俊人，他们3个都是大学生，1937年进马列学院学习过。报务教员有翁濂、涂光大、严东生、雷振岐、睢洪杰。”

“富县东村，在陕北的塬上，水井深几十丈，打不上水，洗衣服要跑几里路到沟底下去，生活、交通很不方便。后来，通信学校就迁到富县督河村去了。”

“1938年7—8月，十一期学员毕业了。其中比较出名、学得好的代表人物是韩氏兄弟韩古农、韩诗农，古农（后改名王进）为兄，诗农（后改名林烽）为弟。后来他俩在通信学校、在三局搞训练、编教材，编辑《通信战士》刊物，在通信工作上做出不小的贡献。另外，还有马锦帆、梁立波等几人，也是学得比较好的。”

“十二期的学员学习了6个月，于11月就毕业了。我在十二期甲班，比一般的学员理解得快一点，学得好一点，在学习过程中，就一面当学员，一面帮助丙班的一些跟不上的同志补课。因此，在毕业时就把我留下来当教员了。因这时学校扩大了，需要干部，同时留下的还有贾风阁、吴兴（后来在十三期当区队长）。还有几个，现在已经去世了。”

### 第三节 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1942年春，军委通信学校改名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简称“电专”、“电讯工专”。因校长吴泽光到党校学习，只有教育长程明升，政委刘洪涛，原政委张振球调往延安大学。学校设4个班次。

#### 一、干部轮训队

这是继1940年举办的干部训练队之后，举办的第二期训练队。

1943年3月，军委三局通知各解放区选送一部分老通信干部到延安通信学校进修，主要学习无线电理论及维修技术。不久，学生陆续到来，大部分是老电台队长，共50余人。

干训队没有设专职干部，由学生中选择人员组成支部，自行管理。第一任支书是钟夫翔，以后钟调中央党校学习，继任是邱钧品，邱调出工作后，由耿锡祥继任，1944年耿因工作需要调走，由徐明德继任，一直到1945年干训队结束。

干训队队员入学不久，1943年4月延安开展审干、‘抢救’运动，停

止业务学习，开展政治运动，在运动中出现‘逼供信’现象。1943年冬，中央发出通知，纠正过“左”的行为。整风以后，干训队进行了重新组编，1945年春节后，一部分学员到裴庄，与军委三局在一起，集中学习业务，张立中讲电子仪器，傅英豪讲报话机、超短波，孙俊人讲发报机。学习8个月后，又集中时间进行装机实习。军委三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拿出美国的收发报机以及手摇马达让学员拆卸组装，然后自己装收发报机，学员的理论与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干训队还学了一些气象知识。

这期干训队于1945年毕业。

已知的学员有：钟夫翔、邱钧品、徐明德、徐定选、李廉仕、李士俊、李从舟、李鳌鱼（李旭）、刘文粟、宋云华、张福廷、孙勇、吴希圣、曹怀银、史萍、冯云芹、王兴、胡仁寿、刘泮林、吴正顺、黄奕棋、黄明生、林英才、高吉民、赵伟、哈文光、贺子明、罗华胜、李锡成、江涛、刘孟成、郭长波、吴金陆、范元纪、王玉衡、李耀渲（李力）、罗兴英、邓国军、王庆才、俞占鳌、麻福芳、严成钦、龚兴贵、朱贻先、段伯琪、柳仁甫、邹念先、雷振岐、赵传壁、李常春等。

## 二、无线电机务队

1945年成立，学员20余人，有黄达、戴冬、苏冶、柳仁甫、柯平、张明、杜志远、姚太林等。由孙俊人、傅英豪等同志任教。主要学习美军的通信设备。

## 三、无线电报务队

学员有张季荣、李先候、孙敬宗等。

## 四、有线电机务队

学员有张甫臣、孟长春、王昌荣等。

第十六期正值整风期间，学校不能按正常计划进行教学，主要进行整风及生产劳动，整风以后，方开始学习。但在改为电专以前，学校正式铅印教材，如《代数》、《算术》、《电磁学》、《电话学》等。

这一期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陆续分配工作。

1945年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以后，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随参加七大的各地领导到抗日前线。军委三局决定派出干部到东北、华北地区。程明升、段子俊等到东北，傅英

豪、唐旦、姚太林到晋察冀地区，吴泽光、钱文极、丁古、张立中、赵传壁等到晋冀鲁豫地区。吴泽光到晋冀鲁豫军区后，任军区三局局长，他还筹建了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并兼校长。

“在干训队，我们还学过一个月的气象预报。那是因为美军观察组要搞气象观察，提出要训练一些人搞气象观测通报，便在我们队里一周上两堂气象课。来讲的是个美军上士，他说我们学好以后也可以像他那样当官。翻译是张乃召。实际上我们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团级干部。考试时，除一个人以外，都得100分。以后，我们并没有一个人去搞气象。1944年以后，联司独立办过气象通信班。”

#### 第四节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心通信学校工作

1939年4月，军委通信学校从陕西富县督河村移驻保安时，经过延安，应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请求，毛泽东主席在王家坪总部礼堂接见通信学校全体干部、学员。毛主席由王诤局长、吴泽光校长、张振球政委陪同下进入礼堂。王局长把学员队长、指导员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登台讲话。毛主席说：“通信工作是机要工作，是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是耳目。没有通信联络工作，中央、司令部和作战部队缺乏准确及时的无线电联络，军队打不了胜仗。王诤同志是军队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过去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成绩，今后要做更大的成绩。你们要当无名英雄，人民群众都是英雄。我们革命队伍里有有名英雄，有无名英雄。许许多多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都是由无名英雄参加进行的，许许多多卓越的功绩都是无名英雄创造出来的。朱总司令是有名英雄，报纸上要登总司令嘛！广大指导员，包括你们做无线电工作的、当教员的、当炊事员的，都是无名英雄。有名英雄是少数，无名英雄是多数，多数啊！”毛主席还讲了抗战形势，勉励大家埋头苦干，艰苦奋斗，钻研和精通业务，做出更大的成绩。

1945年春节，三局的同志到枣园给党中央拜年，当时正是“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后，不少同志在被审查中受到冤枉，心中有气，很不舒畅。毛主席在接见大家时，主动承担了责任，给大家解开了思想疙瘩。此外，毛主席还曾风趣地对三局的同志讲，没有你们三局，党中央在延安窑洞里就失业了。

李际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年大年初三，瑞雪飞扬，大地银装素裹。我们要去给毛主席拜年，从心里像揣着一团火。从厂地（注：通信材料厂）



盐店子到枣园8华里，大伙儿敲锣打鼓，一路小跑，不一会儿就到了。”

“毛主席听见锣鼓声，走出窑洞，我们一齐向主席敬礼。主席身穿青色斜纹制服，清瘦的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坐下后主席就坐在一把旧藤椅上，娓娓地谈起话来：‘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这次整风是‘灰锰氧洗澡’，把大家的皮烫破了。整风把你们‘抽倒了’，我也有责任的。我把你们扶起来，拍干净身上的灰，给你们赔不是！同志之间还能没有过借？错了改正就对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向我提！’主席一番话，说得大伙心里暖烘烘的。”

“现在，大家坐在毛主席身边，心里都明白了，厂里的审查搞逼供信，是康生一手布置的，毛主席并没有了解情况，却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一肚子委屈早已烟消云散了。许多人不断地拭着眼眶中的激动的泪花，怕模糊了视线，会场上只听见雪花落地的沙沙声。主席越谈兴趣越浓，主席对我们说：‘同志们是开工厂的，我也是开工厂的，不过我开的全国性的工厂，你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全国有许多根据地，通信工作就像长长的绑带把各个根据地连接起来，连到我身上。’主席言简意赅，通俗义深的讲话像融融的春日，驱散了我们心中的阴影。”

## 第五节 通信学校的文体与物质生活

关于通信学校的文体与物质生活，钱文极、裴壁同志有生动的回忆。

钱文极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38年10月前后分配到军委三局通信器材厂工作的，那时三局下属各单位只有材料厂在盐店子村附近，人数不到一百，周围也没有其他驻军，文化生活比较枯燥。我到厂后不久即担任党支部的文体委员，兼任厂俱乐部主任。那时厂内文体活动只有打打篮球，唱唱歌。春节组织秧歌队到老乡家去拜年时才红火些。”

“到1938年情况起了变化。这年4月通信学校搬到了川口，离盐店子只有6里。他们约有200人，有近百名学员，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女生占了一半。同年8月三局局部搬到盐店子村，电话队搬到裴庄，离盐店子村约3里地。文体活动从这时起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1940年5月，局里把在延安地区的电台大部分集中到枣园、盐店子、川口一带，有10个电台，这时在盐店子村上下五六里地以内集中了近千人，20岁上下的男女青年占了很大比例。都是青年学生，又是在一个系统内工作，互相间都很熟悉。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创造了开展文

体活动的条件。”

### 一、体育活动

“在体育活动中开展最普遍是打篮球，其次是打排球。其他项目很少，如足球、网球、乒乓球等因条件不具备都没有开展过。游泳只在夏季少数游泳爱好者到河里去游一下。冬季的滑冰只有极少数有冰鞋的滑一滑。田径类项目只开过一次全局性的运动会，举行过部分田径项目的比赛，平时没有什么活动。”

“在盐店子村口有一座小庙，三局为了开全局的运动会，在庙和大路的中间修了一个篮球场，在庙的北边修了一个排球场。在庙的西边要了一块地，修了一个运动场。”

“王净局长是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尤其是喜欢打篮球、排球，所以那时全局打球的运动开展得很普遍，尤其是打篮球。每天吃过晚饭以后人们自然地往村口小庙四周溜达玩耍，爱打球的人就上场打球了！王局长差不多是每天必到，不是打篮球，就是排球。不打球队的同志，有的看打球，有的在附近散步，或参加歌咏队练唱歌。”

“1940年，中央军委季在延安北门外大砭沟组织了一次军委直属队的‘五四’运动会，竞赛项目有男女篮球、歌咏、墙报等，三局组织各种代表队参加比赛，得了很多冠军，其中有男女篮球、歌咏等。篮球队的队员有王净局长、张立中、申仲义、李庄、陈伦和我等；篮球女队的队员有郭朋、曾宪静、魏作坤、党宪、童叶、张峰等。那时王净同志指定要我当男队的队长和女队的教练。我们三局的男女代表队战胜了所有队，夺得冠军，成了当时延安有名的球队！”

“运动会结束时，延安女大提出要同我们的女队比赛。那时的女大集中了进入边区的相当多的女青年学生，她们女队的实力相当强，队员中还有一位是进过体育专科学校学习过的，她的打球动作像男子一样。我们接到这个挑战后，毫不畏惧地应战了。比赛时他们提出要男子规则，我们也同意了。那时女子比赛常用的规则和男子不同：一是上场六个人，球队一分为二，六人中三为攻，三人为守，不能越过中线；二是时间不是分上下两个半场，而是分四次打，每次时间只七八分钟。这些规则都为了减轻她们的运动量。我们女队在家练习时也大多采用男子规则，所以比赛时不感到困难。比赛结果，我们把女大队打败了。我们真是欣喜若狂！我队的主力队员们水平比较好而且平均，如曾宪静、童叶、党宪她们的防守能力都较强，而郭朋、魏作坤两人的进攻能力较

强，尤其她们两人的中距离投篮的命中率较高。这就促成了我队在进攻和防守方面都能打得较好。”

“就在这年夏天，三局组织了一次全局性的体育运动会，由局政治处组织领导。政治处主任刘绍文同志是个热心人，他要我帮他来组织和主持这次运动会。为了开这次运动会，向老乡要了小庙大路西边的一块地作为运动场。大家动手把地平整好，四周还打了半人高的土墙围起来。场里设了两个篮球场，挖了一个沙坑，做跳远用。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多，球类只有篮球一项，田径只有一百米、两百米赛跑和跳高、跳远比赛。全局各单位都组织了人参加比赛，开得很热闹！赛跑比赛因为场地没有跑道，是在不很平整的大路上跑的。王局长的个子高，爱好跳高，他在平时也常说起他在学生时期是个跳高能手，能跳过一米六七的高度，这次他就参加了跳高比赛。还有一位跳高能手是汤翰章。他也是一个瘦高个，腿也长，跳高项目最后就成了他们两人赛了。”

“那时排球也打得比较多，经常上场的有王局长、李林、陈志强和我等人。女同志中党宪是个积极分子，她经常和我在一起打。李林和陈志强是从苏联回来的，他们是打六人制的，而我们那时国内流行九人制，所以他们都不很习惯。李林同志是一个较好的进攻手，他的右边近网扣技术是较好的。”

## 二、文娱活动

那时延安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看电影也是很少的。鲁迅艺术学校和延安京剧院，有时演出一些话剧、歌剧、京剧等，可以去看。我们驻地离城有30里，所以也不是每个人经常能去看的。因此本单位的文娱生活主要靠自力更生，自己来解决。约在1939年下半年，三局在盐店子修了一个大礼堂，能坐下300人左右，还有个舞台。这为开展文娱活动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0年前后的三年内，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文娱活动，成为是三局在延安时期最活跃、最红火的时期。这些活动都是在三局政治处领导下开展的，政治处主任刘绍文同志就是一个活跃分子。他性情开朗，说说笑笑，同青年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积极组织与推动各单位的文娱活动，搞得很活跃，内容也比较丰富。

文娱活动以唱歌最为普遍。因为它不要什么物质条件，大家都可以唱。那时，延安的山沟里到处可以听到嘹亮的革命歌声。三局所属单位都有歌咏队，经常组织学唱革命歌曲，各种晚会都有歌咏表演。三局有

不少歌咏明星，如丁古、汤翰章和王景云等，丁古、汤翰章还是歌咏指挥能手。当时大型合唱团的指挥就是汤翰章。还请朝鲜作曲家、《延安颂》作者郑律成来合唱团教唱歌。合唱团曾演出过《黄河大合唱》，丁古和王景云是男女高音领唱。

在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时，三局还组织排演了一些戏剧节目。在话剧方面，不但演出过《飞将军》、《群莺乱飞》等大型剧目，而且还演出许多自编的小型剧目。王一如、许西分别是三局和通信学校的名导演。登台演出的女角很多，其中王景云、顾秋、郭鹏等是名角。在歌剧方面，主要由我校演出。当时我校有一批表演和演奏人才。在教育长程明升的带领下，演出了《血泪仇》、《周子山》等大型歌剧，唱的是眉户调。有名的男主角是苏冶、赵戈、戴冬，女名角是丁里。乐队板胡一把手是雷洪，其他是程明升的三弦，谌亚选的笛子和钱文极的二胡。这些歌剧演得相当成功，不少观众看了悲剧《血泪仇》都掉了泪！

秧歌剧是一种小型的地方歌剧，演出时不用舞台，每剧演员只要二三人，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很受部队和群众欢迎，在延安演出极为普遍，在通信学校也演得比较多，尤其是春节向老乡拜年时演得更多。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参加演出的女同志有唐静、杨瑞芝、郑重、郑道渊，男同志有柳仁甫、李庄等。

舞蹈，主要是交谊舞。虽然会跳的人较少，但仍不乏其人，多是单位组织小型舞会。鲁迅艺术学院每星期六晚上组织较大的交谊舞会，三局少数“舞迷”也赶去参加。当时，三局虽然地处偏僻山沟，生活十分艰苦，但由于文娱体育活动开展得好，精神生活非常充实、愉快，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在抗战期间，通信学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尤其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同学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1斤半小米，只有到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一点白面和大米，以及少许的肉。每人每年发1套单衣，紧张时不发棉衣，只发一些补衣服的布。住的是窑洞，学生集体住宿，只有校长、政委每人两孔窑，一间住宿，一间办公。做饭用的柴，是同学到山上砍好背回来，冬天烤火木炭，是同学们自己烧制的。鞋子也发得很少，有的打草鞋，夏天不少同学穿用自己做的木板拖鞋。教师、干部发一点津贴，旅以上干部每月每人5元，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学生1元。后来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津贴费停发。

1942年边区搞大生产，学校开始养猪、种菜、纺纱，以改善生活。不少人用自己纺的毛线织毛袜子、毛衣以解决过冬问题。到1942年冬，

学校伙食有了很大改善，大灶每人每月可以吃到5斤肉，过年过节可以会餐，春节后的半个月，天天有肉菜可吃。生活虽然艰苦，但文化生活却十分活跃。

## 第六节 延安通信材料厂

在军委三局领导下的单位——通信材料厂与通信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同志是先在材料厂工作，以后调通信学校任教，有的先在学校任教后再到材料厂，或者同时两者相兼。两地相距三五里，一在盐店子，一在川口。从材料设备及学生实习来看，也是协作相通的。通信学校第十三期以后设机务班，与材料厂关系更加密切了，因此，材料厂的情况也做一些记述。

### 一、材料厂概况

1937年前后，军委三局机关大约有50人，设通信科、材料科、行政科，以后又设教育科。在材料科下设材料库及机务室。机务室开始只有七八人，有少量工具，但没有机床、动力电源及测试仪表，仅担负修理组装少量15瓦以下电台。其中，原器件多数是从白区购进的，自己做一些阻流线圈、低周变压器、波段开关、机架、单双开关、面板、机箱等。开始时机务室主要由王诤同志亲自负责。

1938年2月，在延安西北30里的盐店子村建立“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1939年以后改为“军委三局电器件材料修造厂”。有简易公路通枣园、杨家岭到延安城。顺公路而上5里即到通信学校所在地川口。1939年秋，三局机关由李家湾迁到盐店子，总部直属的电台在裴庄，这样三局所属的通信学校、工厂、电台都集中在此，成为全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通信中心。

工厂从筹建到1947年春撤出延安，在这段时间内，厂的领导人经过几次变化。1938年至1939年秋，厂长段子俊、副厂长申铭宏；1939年至1941年春，厂长陆亘一，副厂长耿锡祥；1941年夏至1942年春，厂长程明升，协理员张怀章；1942年春至1943年夏，厂长孙俊人，协理员张怀章；1943年到1944年，厂长段子俊，以后是程明升。1947年由王曙同志带工厂随三局迁往晋西北。

材料厂自建立后，设备、人才逐步增多。有从国内各大学毕业的同志，如罗沛霖、孙俊人、孙有余、钱文极、胡华清、申仲义、傅英豪、

唐旦等，有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段子俊，有留英学生陆亘一，有留日学生程明升等。工人也逐步增多，从抗大、上海、重庆调来不少技术工人，从30余人到70余人，最多时有近百人。1939年，机构也逐步建全，正副厂长下设一室、材料供应股、制造股、装配股、修理股。

材料厂的设备，开始仅有钳子、扳手等简单工具。到1939年，车、钳、铣、包、铸、锻、装配等工序基本配齐。关于动力设备，开始是人力摇车床，后用畜力带动转轮皮带再带动车床，后来以水煤气做原材料用汽车发动机发电，以后用石煤做燃料，用15千瓦的蒸汽锅炉带动发电机发电。最后以从前方运回的一台工矿使用的20千瓦直流发电机改装为220伏约2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从此解决了电源问题。这部发电机，不仅供做厂用电，特别是为新华社、三局总台提供了电源。在延安抗日战争时期，能用上电灯的，只有盐店子、裴庄。

关于解决军委三局所用电讯材料问题，有几件事值得提起。1938年春至1939年初，周恩来同志先后三次派申光到香港，通过地下党及爱国民主人士购买电子管、手摇发电机等器材。

1940年，一批从香港运回的器材，费尽心机，历尽周折，通过层层封锁，运到重庆。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关卡，周副主席亲自带车队送到延安，又派他的警卫员龙飞虎把器材送到三局。耿锡祥同志记得有15瓦手摇发电机10箱，每箱4部，电池大约50箱。许多三极管、五极管、漆包线、铜线、各种表头，其中有当时最新产品250TH、100TH、RCA807、6V6、6L6等电子管。1941年5月，用这批器材，为中央新华广播电台，组装了新的发射机组，大大加强了无线广播宣传能力。当时转播苏德战争消息，播送整风文献等，全国各地均可收到。还有一次，为了护送器材，朱总司令不坐小车，坐在大卡车驾驶室里，把器材由西安送到延安。

延安材料厂建成以后，开始试生产可变电容，25瓦小功率电台、三管收音机等，到1939年即可改装50瓦、100瓦发报机。1940年生产5门、10门、50门电话交换机。1941年春到6月23日苏德战争爆发前，为了传播党中央的“加强党性的决定”、“整风”文献，赶制出500瓦发报机一台。1941年批量生产手摇发电机。还试制出对讲机，曾在枣园与王家坪之间试用，受到毛主席的称赞。500瓦的电台主振荡器使用807电子管，第一级高放使用814，强放级使用806，连电源在内，整机高1.5米。这两部500瓦发射机装成后，交新华社使用。在当时条件困难情况下，能生产出这些产品，是克服了无数困难才完成的，很多工人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有很多发明创造，技术人员也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申光同志在回忆中说：“我在汉口除建立电台外绝大部分时间是买材料，当时买整机比较容易，买成批材料则比较困难。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初战胜利，威望提高了，买东西也好买。当时汉口有个中华无线电社（经理姓陶），是钟尚清岳父开的，器材质量很好，愿意和我们做买卖，曾经要求我们帮助他中华无线电社迁到西安，然后再迁延安。”“我在汉口买器材的批数不少，但数量不多，整机买不起，一部15瓦机要3500块现大洋。如果用这笔钱买零件和原件自己可以装10部。我们自己装，不算手摇发电机只要200元一部，他们卖的只不过装潢好看一些。”“我买好器材后，交给搞运输的龙飞虎、邱南章、王超北等同志，由他们抢运回延安。那时是1937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党节节败退，来不及对付共产党，所以运输并不困难。”“再就是到香港去买，香港的材料大部分是从上海运去的，我经过李克农同志向周副主席请示到香港去搞材料。周副主席同意去，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3万块左右，准备搞80~100部机器的材料。周副主席批准了拿3万块现大洋，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1938年2月我去了香港，在香港通过中原电器公司（廖承志的同学莫鉴开的）、中华无线电社和孙立记驻港代表以及美国RCA公司代表。花了3个月的时间凑齐了第一批材料。我尽量多买手摇发电机，共买到40部，还有A电池、B电池、801、71、30和31型电子管。买器材我是成套的买，一共买到够装80~100部机器的器材和必要的备品备件。”“在香港我们是以八路军名义出面的。那时出入香港没有什么手续，从广州上火车到九龙下车，坐轮船渡5分钟就到了。”“这样第一批器材由香港经汉口、西安运达延安。1938年6月3日局里收到。……1939年我回到延安，王诤同志很高兴，说这批器材可解决问题了，延安原来只有十几部机器，利用这批器材，一下子能装配近百部，对八路军抗战来说会起很大作用。”

“1938年8月，周副主席对我说，你再去一次香港，林青那里有些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同时再去买些材料。李克农同志问我要多少钱，我说和上次一样，这样，8、9、10三个月我又去香港买了第二批材料，大概够装60~70部电台的材料。”“材料还没买完，日军就占领了广州，铁路被切断，汉口也紧张了。我把器材清点后拿到装箱单，材料是通过越南的海防市转运到桂林办事处……，一直到1939年底，第二批器材才从桂林运来。”

“我第三次去香港是1940年底，皖南事变之前，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我连夜坐飞机到了香港，……第三批器材比前两批增加

了大电子管和蓄电池等，车子是延安开来的。”

“1938年春，机务室还接受了一项加强延安党中央广播电台功率的任务。在王诤同志的指导下，经过全室同志的日夜奋战，在不很长的时间里，改变了原有机器的线路，更换了主要元器件，自制了强力电源，终于使功率从50瓦加大到100瓦，使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

“1938年2—3月，‘抓紧选择厂址，立即着手建厂，的决定终于盼来了。在王诤同志的指导下，在延安城西北约30华里处的盐店子村选择了厂址，并定名为‘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1939年秋改为电器材料修造厂）。’”

“从1939年开始，装配、维修电台所必需的各种元器件以及金属材料，外源日渐枯竭，就地取材方面，主要有以下途径：

1. 我八路军破袭同蒲路后，给我们运来了一些钢轨，从此生产所需的钢材有了部分保证。
2. 利用废旧吉普车弹簧钢板，改做工模具和磁性材料的器件。
3. 从陕甘宁边区农具厂调来些生铁、生铜，解决了铁、铜原料不足。
4. 把大油桶剪开轧平，成了制造机架、机箱、面板等薄铁。
5. 派人外出搜集铜壶、铜盒、铜钱、腊烛台、铜钟等，使铜材来源有了补充。
6. 被我击落的敌机残骸和从敌战区偷割来的有色金属线，是铝材及其他金属材料的来源。
7. 只要技术许可，我们最大限度地用木材代替非金属材料。”

“我们派人外出选购存放多年的杜梨木，做成管筒后又用湿火‘油炸’到适当程度并且在绕上铜线后，再在线上涂上一层蜡，这样完全达到了高频电路上线圈的技术要求。”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特别回忆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关注的时候，我的心情极不平静，如春潮起伏，难以言表。”

谢干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42年1月从中央军委三局通信学校调到通信材料厂动力股工作的。通信材料厂在离延安30多里的盐店子的山洞里，与军委三局机关同住在这个小村，生产和生活都是在山坡上的窑洞中。我记得这个小村子只有20多户人家，村子偏僻，但环境却很清静。就在这环境清静偏僻的山沟里住着负责全党、全军通信联络的领导机关——中央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设有车工股、钳工股（含



翻沙、锻工)、装配股(含木工)、动力股、试验室、材料组。管理人员很精干,有正副厂长、协理员,文化教员、生产管理员、行政管理员。工厂职工中有不少是经过长征到延安的老红军,还有从上海、广州、马来亚等地来的工人,到延安学习后参加了通信材料厂的技术工作,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帮助也很大,都使我终生难忘。”

“1942年1月,我被调到通信材料厂动力股,学习修理汽车头和小柴油机,拆洗蓄电池等。当时大家正忙于解决全厂生产的关键——动力问题。我们在胡华钦同志的领导下,日夜连续工作,克服了缺少材料和工具等种种困难,按时完成了任务。”“当时生产设备很简陋,为了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大家都能开动脑筋想办法。车床设有动力,用毛驴拉,没有电力供应,用汽车头带着发电机发电。汽车头没有‘油’吃,用木炭生产煤气照样发电。”

“后来把我调到实验室,什么工作忙就帮助干什么,抽空也装配过三极管收报机。当时收报机中除真空管外,大部分零件都是我们自己动手造出来的。”

“后来从实验室把我和陈之干临时调出来,在材料组陈强同志组织下,试制衣服扣子。用牛蹄、羊蹄、羊角等为原材料,用大锅煮软后,再用冲模冲成圆片,把冲出的圆片放在热压机上压成扣子,涂漆后出厂,供给军服厂使用,后来要大量生产,就发展成为扣子工厂了。”“后来,我和陈之干同志在材料组候选同志与实验室其他同志指导下,又开始试制电池工作。首先试制炭精棒,后来试制电池配料,经鉴定能用后,即组织批量生产。”

## 二、毛泽东、朱德同志为通信材料厂题词

1940年7月,在材料厂建厂两周年的时候,为了检阅成绩,总结经验,军委三局决定举办通信器材展览会。展览会设在三局大礼堂。会上展出通信材料厂自制的生产设备、无线电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以及各种无线电元件、零部件,如可变电容器、慢动刻度盘、灯座、灯丝变阻器、线圈座、开关及电键等。当时通信材料厂制造的机器,70%以上的零件是自己制造的。朱总司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参观了展览。

7月7日,王诤到杨家岭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并带去自制的收发报机和小型手摇发电机,这时毛主席、朱总司令挥笔为材料厂题词。

毛主席的题词为“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厂的自制，就是证明”。

朱总司令的题词为“努力进行交通战，建设自己的交通，破坏敌人的交通”。

以上题词刊登在当时的《通信战士》第4、第5期合刊上。

### 三、毛泽东同志为《通信战士》题词

1940年1月，军委三局出版《通信战士》杂志，在1941年10月，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为刊物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关于《通信战士》杂志的出版，在创刊号上，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同志写发刊词，题为“写在前面的几句话”。摘要如下：

“为创办自己的刊物提出一年多了。1940年的第一天才与同志们见面。它的诞生正是成为庆祝我们同志新年的健康的礼物，祝我们同志新的进步。”

革命的胜利与发展，要求我们开展我们的工作，同时也给予我们可能条件来开展扩大这一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紧张与政治形势的变幻，将更显着它的作用。将近两年半的抗战与统一战线的胜利，极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工作。创造了大批的技术干部涌到抗战的前方与后方，为着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贡献个人的一切。虽然我们没有直接拿着枪和炮同敌人决斗，但是我们正是拿着更精巧的另一种武器来实现战斗指挥。从1939年到今天，通信工作的作用当抵得若干万武装队伍的力量——依靠她掌握战斗全局；依靠它来实现党的及时领导：依靠它来明了国内外的情况。”

“今天和大家见面的礼，应是技术知识的灌输者；交换工作经验的媒介；建立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的推动者。它应使我们的工作更前进一步，优良的传统更加发扬。”

## 第七节 红中社、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通信、广播工作与通信教育工作，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在早期曾经属于军委三局，因此在记述通信教育工作时，也简要将有关部分记述如下。

## 一、通讯社

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成立“红色中华社”，负责人周以粟，以后为王观澜。红中社的任务是：①出版《红色中华》报，开始5天一期，1933年改为3天1期，4开版，由中央印刷厂铅印，使用苏区生产的毛边纸，每期发行三四万份。②编辑《参考消息》（每日电讯），每次1~2张蜡纸，印四五十份。③播发新闻，用无线电以明码播出。

1934年1月第二次“全苏”大会，红中社由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兼任社长，任质斌为秘书长，半年后徐正名任秘书长，在红中社工作的还有沙可夫、韩进、谢然之。

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报停刊，总政办的《红星》报继续出版。遵义会议前由邓小平主编，以后由陆定一主编。

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红色中华》报复刊，任质斌任主编。《参考消息》也恢复。《红色中华报》每五六天出一期。

1936年向仲华到红中社，不久迁保安。1936年12月廖承志也到红中社，红中社由博古同志负责。廖承志负责国外电讯，向仲华负责国内电讯，还有李柱南同志负责译码。《红色中华报》由向仲华负责。

1937年1月红中社迁延安。红色中华社（红中社）改名“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博古同志负责，秘书长先为廖承志，后为李初梨，再后为沙可夫。

1937年3月，廖承志调《解放周刊》工作，沙可夫调鲁艺任副院长，新华社、新中华报由向仲华负责。

1938年3月，解放周刊、新中华报、新华社统一归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秘书长徐冰。

1939年初，新华通讯社与新中华分开。

1940年，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带回一广播发射机，在王皮湾建立广播电台。

1941年5月，《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为《解放日报》。

1941年，向仲华到前方工作，新华社由博古负责，吴文涛为副社长，不久陈克寒调任副社长。

1945年，博古因飞机失事遇难，廖承志任社长，范长江、钱俊瑞、石西民、梅益、徐迈进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副总编。

1947年，范长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其余迁往晋绥，后到平山。在平山时成立编委会，由胡乔木负责。下设第一编委会负责文字广播，

由胡乔木负责；第二编委会负责口播，由廖承志负责。

1949年3月22日起，迁往北京。

## 二、新华社的通信建设

### 1. 红中社时期

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播发新闻用的发报机功率为100瓦。这种发报机是在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敌二十八师公秉藩的指挥台。

红中社播发新闻使用的呼号为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这一呼号一直用到1956年9月改用汉字模写广播为止。在电台工作的有王诤、刘寅、陈士吾、沈毅力等。

红中社播发的第一批新闻，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和文件。同时还将抄收的中央社的消息编成“参考消息”发给代表参阅。

1931年1月6日，中央红军成立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这个队的任务之一，就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

1933年5月，红中社正式建立专用新闻台，当时使用的是一部回授式5管机。台长岳夏，报务员王茂全。后黄乐天任新闻台台长。

1934年10月长征时，新闻广播停止，但抄收新闻一直未停。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11月25日，在瓦窑堡电台恢复工作，对外呼号仍为CSR。电台代号是二分队，队长陈士吾，报务主任申光，发报机是缴获东北军一〇一师的50瓦电台。

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也成立新闻台，台长是岳夏，报务员是他爱人李建华，直至1938年6月红四方面军北上为止。

1936年7月，红中社迁保安（今志丹县），担任CSR发报任务的是一分队，队长海凤阁。

1936年10月，一、四方面军新闻台合并，台长岳夏。

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建立西安分社，这是在外地建立的第一个分社。

### 2.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1937年1月迁入延安，红中社改名“新华通讯社”。这时共有两部三管机。一部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文字广播；一部抄收同盟社、哈瓦斯社的部分广播。塔斯社、合众社、海通社的广播，因收讯质量不好，只能抄收一点。新闻台台长岳夏，后为黄乐天，再后为李柱南，8月，高吉明任台长。

发报台由五十五分队负责，队长曹丹辉，发报机功率100瓦。

1938年，新闻台由城内迁至延安东关。1939年7月迁至李家湾，9月迁盐店子。新闻台由曹怀银、陈生贵负责。1939年沈毅力任新闻台台长。

1940年成立九分队，队长傅英豪，政委周浣白，后来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带回的广播通信机，此机功率为500瓦。1940年12月30日，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广播，每天播音两次，每次一个小时，代号为XNCR（X系国际电讯联盟规定中国电台代号，NCR是新中国广播电台的英文缩写）。

1940年10月，负责新华社文字广播的十分队迁到王皮湾，与九分队合并改为九分队，报务主任汤翰章。呼叫格式是CSR DE XNCR。在此之前，呼叫格式是QSR DE CSR。每天广播两次，上午8—12时，夜12时到次日2时。文字广播稿从40里外清凉山送来。

1941年5月，新华社由杨家岭迁清凉山，与《解放日报》社住在一起，6月，新闻台也迁清凉山。

1941年冬，新华社建立自己的通报台，1942年秋又成立第二个通报台，到1945年日本投降通报台已发展到4个。

日本投降后，总社向各根据地增发《参考消息》，用简单密码播发，呼号为CQ，每晚2个小时。

通报台开始由邱振才负责，1943年由刘忠楠负责，1945年由冯月潭负责。

1942年6月，沈毅力调走，张可曾任新闻台台长，同时兼管通报台。1943年6月新华社成立电务科，张可曾任科长，下设新闻台和通报台。新闻台下设三个系：中文系，负责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汪伪中华社电讯；民主系，抄收塔斯、路透、美联、合众、美新社等处新闻；轴心系，抄收海通社、同盟社、斯蒂芬尼等法西斯国家的电讯。新闻台设3个报务主任，他们是曹怀银、李光绳、杜牧平，后来李光绳任总领班。

1944年9月1日，恢复口语广播，每次2个小时。

1945年8月，新华社文字广播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由王皮湾迁盐店子与军委三局总台合并。

1946年6月，为了集中管理，在大砭沟建立集中台，将新华社英文广播、中文广播、新华广播电台，分别由裴庄和盐店子迁到大砭沟。在组织上成立电务处，处长耿锡祥，副处长李伍，下设一、二、三、四科。一科负责中文译电，科长李宏烈；二科负责抄收国内外新闻，科长曹怀银，副科长李光绳，不久曹调走，李任科长；三科负责通报联络，科长为冯月潭，总领班杜牧平；四科负责口语、文字广播，科长毛动

之。全处 70 余人。

1947 年 3 月，胡宗南进攻延安，3 月 14 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完中午节目后转至瓦窑堡好坪沟。

1947 年 3 月 19 日，新华社开始以“陕北”电头代替“延安”电头播发新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

1947 年 4 月 1 日，设在涉县西成村的太行临时总社正式接替在行军中的新华社所有文字、口语广播。在交接过程中，文字广播一天也没有中断，只有口语广播在接替之初，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停播 3 天。

新华社撤出延安后，一路由范长江带领小分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组成电务科，先后由杜牧平、韦明、孟自成负责，共 16 人，其余由廖承志率领于 7 月中旬到晋冀鲁豫边区涉县，与太行临时总社会合。会合后，电务处长耿锡祥，副处长李伍、高非。一科长安文一，副科长张连德；二科长李光绳，副科长彭志义；三科长冯月潭，副科长杜立；四科长毛动之。

1948 年 3 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支队离陕北到河北建屏（平山县）西柏坡村，总社也迁至平山。

1948 年夏，新华社的第一个国外分社——“布拉格分社”成立。

1949 年 3 月，迁北京。

### 三、新华广播电台

我党很早就计划建立广播电台，进行口语广播，但设备无法解决。1940 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功率为 500 瓦。于是开始筹建广播电台。

1940 年 7 月，王诤同志召开电台筹备会议，会上宣布筹备工作总负责人为朱总司令，财政部长李富春，中央直属财政处长邓发负责经费，王诤负责业务技术工作，阙明负责具体工作。

台址选在距延安 40 里盐店子以西的王皮湾，这是一个 30 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在村长协助下挖窑建房，经过两个多月时间，挖成深 6 米的两个石窑，盖起 4 间工作室和两间宿舍。

11 月，将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发射机运到王皮湾。

两孔石窑建在陡立的岩石上，两窑之间有通道相通，以此作为机房。一孔用来装发电设备，一孔放置广播发射机。与石窑相对隔河相望的山坡上的土窑作为播音室。洞口挂上土产羊毛毯做隔音设备。

电源是从旧汽车上拆下引擎，用燃木炭产生的煤气做燃料。天线是

木制 Y 形的，略成西北—东南向。

1940 年 10 月，新华社发射台（十分队）迁到王皮湾，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合并，统称九分队。这时拍发的新华社电讯，由 CSR 改为 XNCR。

1940 年冬天开始试播，上级调来的两个女播音员，一个叫麦风（徐瑞璋），一个叫姚雯，以后又调来肖岩同志。在试播时，她们坐在话筒前轮流呼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接着反复朗读报上的一篇短文。不久，从裴庄、枣园、安塞方圆数十里的地方传来“声音良好”的回音。但是晋西北等解放区听不到声音，主要原因是电力不足。于是电台人员在电源上下工夫，经过努力，终于达到预定要求，经过调整波长，再一次试播，从各根据地拍回的电报，都说声音良好。

1946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开始播音。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一小时。周率为 600 千周。

广播稿从清凉山新华社的广播科送到电台，通信员每天上午把稿件送到三局，九分队通信员下午送到王皮湾。无论风雨寒暑，始终如一。有时延河涨水，通信员把稿件用油布包好，顶在头上泅水过河。下午 4 时播音员拿到稿件就开始准备，然后播音。播音室只有一张白楂木桌，一只话筒，一本字典，一个破旧手摇唱机和 20 张唱片。

播音开始，经过呼叫后，因新歌曲没有唱片，就由播音员自己唱“兄妹开荒”，然后读稿件。有时把延安的文艺团体请来，演唱“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把播音室挤得满满的。电台还播送过郭沫若写的“屈原”、“棠棣之花”片断，也播过马连良、梅兰芳的唱片。

遇有重大问题时，就请领导人员到播音室演讲，朱德、林伯渠、王震、廖承志都曾作过演讲。

以后又调来播音员孟启予、于一、钱家楣、杨慧林、孙茜等。日籍原清子也做过播音员，负责每星期三的日语广播节目。

1943 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刚一开机，发现发射管失效，当时没有备份零件，因此语言广播不得已而终止。

这时党中央千方百计从敌占区设法购买器材，冲破重重险阻，送到延安，三局及电台人员利用旧发射机和购进的器材，改装成一台 100 瓦的发射机。1945 年 9 月，又恢复了口语广播。

1947 年我军撤出延安，3 月 22 日，晋冀鲁豫军区在邯郸建立的广播电台，接替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详细情况见下节晋冀鲁豫军区通信人才培养的章节。

## 第五章

### 一二〇师、晋绥、西北地区无线电 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37年8月底，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活动于神池、宁武、朔县一带，在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的指挥下，建立了晋西北根据地。1938年6月一二〇师以第358旅715团、独立第4支队等部组成2300余人的大青山支队（又称李井泉支队）深入大青山地区，建立大青山根据地，从而建立了晋绥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1日，建立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政权，辖晋西北和大青山两区。

为了执行巩固冀中、支援第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任务，一二〇师主力于12月23日由山西岚县出发，通过同蒲、平汉铁路线的封锁线，于1939年1月25日在河北省河间县的惠伯口同冀中党政军队领导机关会合。5月与冀中第四、第五支队合并，成立独立第一、第二旅。1940年2月，一二〇师奉命返回晋西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薄一波和山西地方党组织，帮助阎锡山建立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其中绝大部分政工人员



与一部分军事指挥员是共产党员。1937年8月1日，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宣告成立，随后相继成立第二、第三、第四总队。不久由4个总队发展成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相当于旅），另外组成工人武装自卫队、政治保卫队第二〇九、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1939年2月，阎锡山发动反革命“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4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决死队。

根据党中央指示，决死队进行反击。不久决死队第二、第四纵队、工卫旅、政治保卫队第二〇九旅、政治保卫队第二〇九旅、暂编第一师编入第一二〇师序列；第一、第三纵队及政治保卫队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编入第一二九师序列。

1942年5月，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中央军委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林枫为副政治委员。下辖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绥军区部队和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

1944年11月9日，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的南下支队，南下湘粤边与东江纵队打通联系，准备在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因难以立足，于1945年10月返回鄂豫皖根据地。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于1945年6月8日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到河南新安地区时，日本投降，即奉命开赴东北。

1947年，蒋介石集中23万人向延安地区进攻，为了主动打击敌人，我军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为了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7月31日，中央决定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兼前委书记。7月，中央决定将晋

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 第一节 一二〇师师部报训班、新军无线电报训班、晋西北地区党委报训班、晋绥军区电训班、绥蒙军区通信队

### 一、一二〇师师部无线电报务、机务训练班

1. 1938年4月，七城战役之后，一二〇师在山西岚县举办第一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训练班附设在师部电台。负责人及教员有尤静轩、孙勇、龙振标。学员有彭爱清、徐辉青等10多人。机务室主任靳子云也随班学习报务。这一期于1938年11月毕业。

2. 1939年1月，一二〇师奉命由晋西北到达冀中地区，与冀中地区党政军机关会合。1月末，师部举办第二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地址在河北肃宁。负责人为电台队长何基，教员霍维征。学员有荆国庆、梁恭之、张健、张秉坤、郑肇东、李株铸等20余人。于1939年8月毕业。

3. 1939年3月15日，一二〇师在河北任邱县举办第一期机务训练班，由电台大队长尤静轩，机务主任靳子云负责，教员有刘振东。学员来自冀中三纵队，独立第四、第五支队，沔南自卫军。学员共7人，即白景文、蔡田夫、邵有才、袁树声、纪俊舟、赵银根、魏扭棒。白景文为班长。每周上课两三次，其余时间为实习，装配收发报机。这一期于1940年3月毕业。

4. 1940年，一二〇师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这时新军成立总部，新军第二纵队也转移到晋西北。因为新军中电台人员程度不齐，因此一二〇师举办以新军报务员为主的训练班。一方面进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学习业务。学员自1940年3月入学，9月毕业。

5. 1940年2月，晋西北区党委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一部分同志调到一二〇师师部，组成报训班，因早期学员在冀中已毕业，称之为甲班，这个班又称乙班。地址在兴县。负责人何基，电学教员霍维征，收发教员尤静轩、张汉超，电台工作人员刘久中亦兼课。学员有刘科、李逸民、任志勋、李存保等七八人。这一期于1940年10月毕业。

6. 1940年3月，一二〇师师部在兴县招收第三期报训班，又称丙班。学员来自三五八旅、独二旅、新军等部队。负责人何基，指导员路丁一，教员杨佑、霍伟征、刘振中、洪杰、李钊之、马璋、高耀东、万静轩、张汉超等。学员40余人，有申健基、马礼靖、刘国臻、李珏卿、王龙、刘磊、

崔殿英、王世海、崔正海、闵孔才、马汝勤、吴定钧、杨兆吉、李世英、褚国华、李友、贺郁、路清俊、武炳池、赵玉山、徐清泉、袁树声、张凤来、罗恒发、白玉中、王三货、李节玉、杨登山、石怀德、郑彦如、陈子明、张慕枚、申健基等。这一期于1941年3月在兴县黑峪口毕业。

7. 1941年5月，一二〇师师部在兴县举办第二期机务训练班，又叫研究班，负责人荆振昌。组织有一定经验的报务员学习无线电机务，这一期于1942年4月结业。

8. 1942年4月，一二〇师师部举办第三期机务训练班，由靳子云、霍伟征负责，还有彭洪志等。1942年7月结业。

## 二、新军无线电报务训练班

1937年8月1日，在山西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名义上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指挥，实际上由我党领导。至1939年已发展到4个纵队，加上政卫队、工卫队、暂一师等共7万余人。

新军第二纵队由阎锡山派驻一部电台，电台队长丁克强。

1. 由于新军的扩大，急需电台，1938年初，决死队派王天心、高仁杰、王维舟（林平）、晋长才、王天新、陈宝琛等到丁克强电台实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报务。

2. 1939年1月，由电台指导员刘振中主持，正式举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有赵兴田、郭申伦、张克白、李存仁、郭海仓等10多人。

以上两批共十六七人，至1939年年底先后分配到新军的所属电台。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妄图消灭新军，新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这些电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年初，一二〇师自冀中返回晋西北后，新军第二纵队并入一二〇师编制。

3. 1940年年初，新军总指挥部在山西兴县石楞子，举办一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负责人刘永福、李益民。学员有刘联华、樊杰、王松森等10余人，学习半年时间，1940年秋毕业。

4. 1940年秋在上期学员毕业后，新军总部在石楞子举办电台队长预提培训班，将准备提升担任电台（队）长的崔正海、史振声等四五人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时间3个月，年底结业后分别担任各电台（队）长。

## 三、晋西北地区党委报务训练班

1939年初，一二〇师及部分主力开赴冀中，晋西北地区党委电台命名为“华北无线电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李益民。

1939年6月，由电台中队举办晋西北区党委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地址在山西岚县王狮村。负责人李益民，教员刘永福。学员十五六人，学员来自地方党组织及山西民族中学，有郑一、黑杰、任久中、成天雅（成毅进）、刘春来、王道宏、杨世义、杨锦春、李玉富等。

同年10月，由新军暂一师调入刘科、李逸民，由工卫旅调入任志勋、赵存保等同志。

1940年2月，早入学的同志已毕业，这时一二〇师由冀中返回晋西北，入学较晚的刘科、李逸民、任志勋等七八人，并入一二〇师报训班（又称乙班）继续学习，10月毕业。

#### 四、绥蒙军区报训队

1945年成立绥蒙军区，八纵队第八军在集宁市成立报务训练队。队长李益民，学员有赵国英、常井山、李绍基、刘照年、米绍江等20余人。

#### 五、晋绥军区电训班

1. 1941年9月，晋绥军区举办通信干部训练队，训练电台（队）长、报务主任、报务员。队长孙道会，指导员靳瑞成，电学教员赖坚，机务教员靳子云，英文教员霍伟征。学员60余人。1942年4月毕业。

2. 1942年4月，晋绥军区举办第二期通信干部训练队，学员60余人，主要学习收发报机的维修技术及英语会话，还学一些近代史，1942年10月毕业。

3. 1945年10月，晋绥军区在兴县李家湾举办报务训练班，设队长、政指，教员有杨佑、霍伟征、李钊之。学员由各分区选送。行署举办的报训班也并入军区报训班，晋绥日报社电台区队也选了部分学员，共约60人。学员有刘巨德、白秀、王廉、杜德保、于宏、王世喜等，学习半年，于1946年4月毕业。

龙振标同志在回忆中说：“1938年4月收复土城后，我们在岚县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因为没有专职教员，我们就把训练班设在师部大电台，由尤静轩、江文、孙勇和我分别兼职任课。学员有彭爱清、徐辉等八九人，大部分是红军时期的优秀战士，政治上可靠，文化程度不高，几个学得好的学员很快就当了电台队长。同年底部队离开岚县，第一期训练班也告结束……1939年1月，我们从山西岚县到冀中，这时决定筹办第二期报务训练班。因为冀中斗争比较艰苦，就在我们青年学生中招收学员，由在晋察冀的钟夫翔同志代训。一到冀中我们就开

始招收学员，冀中青年学生比较多，脑子灵活，接受东西快，我们挑选了荆国庆、梁恭之、张健、李铸、郑肇东等 10 余人，于 2 月开课。我们派出霍伟征和另一同志任教员。这批学员于 8 月毕业，到晋西北以后都当了通信工作的骨干。与此同时，我三五九旅在冀中自己举办了一期报务训练班，招收的仍然是青年学生，有杜力、齐振兴、周玉瑛等 13 人，这批学员在山西灵丘毕业。”

霍伟征同志在回忆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一直在一二〇师工作。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1 月，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大的围攻，形势日趋严重。一二〇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奉命于 1938 年 12 月 23 日东出冀中，与第三纵队协同巩固冀中根据地。进入冀中以后，部队迅速发展，电台增多，但无线电报务人员却很少。此前，师部虽于 1938 年 4 月举办过一期报务训练班，培训了彭受清、余辉香等近 10 名报务员，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对此非常着急，电台大队决定组织一个报务训练班，周士第参谋长还就此事亲自找我谈话，讲了为什么要办训练班，并让我担任教员。”

“1939 年 1 月，我们从冀中抗战学院和部队中挑选了梁慕之、张秉坤（张健）、荆国庆、郑肇东、李铸、崔振海等 80 余名青年学生和战士，在肃宁举办了一二〇师第二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尤静轩大队长兼班主任，教务主任基负责行政管理并兼教报务课，由我负责机务和英文课。开办初期，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教材，就靠自己过去学的一点东西来教，自己编教材、刻蜡板；没有振荡器，就用口来念电码，因为敌人经常来袭扰，即使有振荡器在行军途中也不能拿出来使用，怕来不及收拾，只好用口念。坚持边行军、边打仗、边训练。并利用行军间歇在地上一坐下就练，用树枝在地上写，行军中你前边念电码，我后面抄，有时累得不行了，就前边一人拉住牲口尾巴，后边一个拉着一个，闭上眼睛打着瞌睡走路。但只要一有空，同志们就积极训练，从不叫苦叫累。到了 4 月，环境更加艰苦，师部决定让我们跟彭绍辉的特务团，越过铁路到晋察冀，同钟夫翔副大队长领导的电训队合并，我们编为其中的一个排。钟夫翔同志是电训队队长，教员叫韩克树。由于双方的训练进度不一样，决定各自继续培训自己的人员，只是在行政上由副大队长钟夫翔统一管理。”

“晋察冀与冀中相比较，要稳定一些，训练进度也加快了许多，到 8 月学员全部结业。这时一二〇师也正由冀中向北岳区转移，我们就随部队一起行动。日寇对北岳区西部、东部的进攻遭到打击后，又向北岳区南部进犯，企图占领陈庄，以作为其冬季对北岳区大举进攻的支点。一二

〇师在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著名的陈庄伏击战，经过7天7夜的激烈战斗，消灭敌人1000多名，大大地鼓舞了士气。”

“陈庄战斗刚结束，敌人又调集兵力对晋察冀进行报复，声称要消灭一二〇师必先消灭三五九旅。这时天气渐渐转冷，有的地方已开始下雪、结冰，敌人又特别多，我们的供给发生了困难，经常饿着肚子打仗，与敌人周旋。后来在黄土岭战斗中，第一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击毙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共歼敌900余人，敌人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开始退兵，我们方得以在会口作短暂的休整。这时，我们训练班的学员才正式分配到一二〇师所属各个电台上担任见习报务员。”

“在会口休整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阎锡山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日寇的诱降拉拢下，加紧妥协投降，到处搞摩擦。中央指示，一二〇师迅速从北岳区返回晋西北，进行肃清顽军与旧政权的斗争。于是，我们离开会口，经临县，于1940年1月到达兴县，赶走了顽固派。这时，师部决定组织第三期报务训练班，从一二〇师各部队和新军中选调了闵孔才、申建基、马汝勤、吴定钧、李兆吉、李世英、刘磊、崔殿英、王进海等40余人，队长何基，我任教员，杨佑同志曾任过一段时间的报务教员。后来晋绥区党委报训班的任志勋、刘科等六七人，也合并到我们这里继续学习，地址在兴县东边的五龙塘，这一期到1940年10月结业。”

“1941年9月，根据地形势好转，部队相对稳定一些，师首长决定组织电台队长、报务主任、报务员进行轮训。于是，三科便成立了晋绥军区通信干部训练队，孙道会任队长，靳成瑞任指导员，电学教员赖坚，机务教员靳子云，英文教员是我。先后共训练了两期，第1期40余人，于1942年4月结业，紧接着第2期开学，学员60余人，训练了约半年时间。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机器的维护与检修，英语会话，还学习一些近代史等课程。”

“从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二〇师为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无数次战役战斗，尽管战事频繁，条件极其艰苦，但一二〇师的报务训练班从未停止过，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保障了战争的需要，而且这些人员以后成为一二〇师通信工作的骨干，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通信岗位上，继续奋斗不息，为党和国家的通信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益民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38年7月到晋西北的，开始我在区党委任队长，报务员有刘永福同志。1939年初，一二〇师和彭八旅

在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时军委三局任命我为华北无线电大队第五中队长，中队设在彭八旅（实际上此时彭八旅兼区党委），这样我就到了彭八旅，区党委电台有刘福同志，我仍兼任该电台队长。”

“1939年4、5月间，我们以中队名义在区党委办了一期报务训练班，地址在山西岚县王狮村，由我和刘永福同志负责分别代授报务和机务课。学员有刘克、李维福、范存保、杨锦春等10余人，学习时间为半年。”

“我到新军后，仍任第五中队长（实际为新军中队），并兼任总指挥部电台队长，三科长是熊志坚同志，是管全部通信的。”“1940年初，新军总指挥部举办了一期报务训练班，地址在山西兴县石楞子或高家村，学习时间为半年，负责人为刘永福，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报务和机务。”“同年秋，为了适应部队的发展需要，我们在兴县石楞子举办了一期电台队长（预提）培训班，学员有四五人，学习5个月左右。”

刘科同志在回忆中说：“晋绥的通信工作可分为军、地两方面，地方的通信也在军队通信部门领导之下。下面就我调入通信部门以后经历的情况，简述如下。

### 1. 晋西北区党委报务训练班。

1939年6—7月间，晋西北区党委在山西省岚县王狮村开办了一期报务训练班，队长李益民，教员刘永福。学员开始是由山西民族中学和地方党选送的，有郑一、黑杰、任允中、成毅进、刘春来、王道宏、杨时义、李玉富等人。同年10月，又由新军暂一师调来了李逸明、刘科，由工卫旅调来了任志勋、赵存保等人，插入训练班学习。1940年2月，郑一等先受训的同志毕业，后来我们和以前未毕业留下的共六七个人又插入一二〇师报务训练班继续学习。

### 2. 一二〇师对新军通信组织的整编。

1940年初反顽斗争胜利以后，决死二纵队由晋西南转移到晋西北，与原在晋西北活动的决死四纵队、工卫旅、政治保卫队、暂一师等部队组成新军，设立了新军总指挥部，由李益民任电台中队长。这时，一二〇师也由冀中返回晋西北临县，为了加强对新军通信工作的领导，一二〇师组成以新军报务人员为主的训练队，一是进行政治审查，思想教育；二是组织业务学习，严格遵守通信规定。经过数月的学习，绝大部分同志留在部队电台工作。

### 3. 一二〇师报务训练班。

1940年2月一二〇师返回晋西北后，晋西北区党委报务训练班刘科等六七人并入一二〇师报务训练班，称为乙班，甲班在河北时已经结

业。当时训练班负责人是何基，电学教员霍伟征，政治教员高耀东，文化教员马璋，收发报课由尤静轩、张汉超、刘允中等电台上的同志兼任，乙班在1940年10月结业。

1940年三四月间，报务训练班成立丙班，从三五八旅、独二旅、新军等部队抽调了一些人进行学习，学员有王龙、申建基、马礼靖、刘国琛、李玉卿等30余人，到同年底结业。

#### 4. 一二〇师通信组织情况。

1940年一二〇师返回山西临县，电台是大队的建制，大队长尤静轩，政委刘迪芳，机务室主任靳子云。师部有个电台中队，中队长龙振彪，副中队长黎东汉，管辖师部及一二〇师所属各旅电台，师部电台代号是B字头，共有4部电台。

1台：队长孙道汇，政指靳成瑞，报务主任顾兴德。

2台：队长龙振彪（兼），政指亢小峰。

3台：队长刘绍泽，政指路丁一，报务主任冉迎祥。

4台：直属大队部，无队长、报务主任。

三五八旅电台队长彭洪志，三五九旅电台队长黎东汉。

晋绥行署电台队长杨维夫，晋绥分局电台队长冯跃，抗战报社电台队长王绍禹。

1940年10月，我从训练班结业后分在师部四台任见习报务员。四台主要联络大青山支队。1941年4月，四台联络任务并入1台，原四台改为新闻台，队长颜斌，设在军区政治部，电台代号Sr7，是新华社的第7台，这时一台主要联络军委、晋察冀、平西、前总、一二九师、大青山等；二台、三台主要联络一二〇师下属的旅、团电台。1942年10月，我在师部电台大队部代理政治指导员。1943年12月，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师部成立电台区队，由龙振彪任区队长，政治协理员方新，后为靳成瑞。

#### 5. 晋绥军区通信训练队。

精简整编以后，电台任务减少，人员较多，军区就组成了一个训练队，把这些报务员、见习员、机务员组织起来进行再学习。学习内容是：一文化学习；二整风文件；三收发训练；四电学知识。孙道汇任队长，路丁一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刘科，教员霍伟征、赖坚、陈瑛等，学员有王龙、李世英、张凤来、马礼靖等数十人。1944年冬，这些同志回到电台，参加师部整风和“抢救”运动及大生产运动。

#### 6. 抗战胜利前后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组织及人员。

1944年下半年，荆振昌调晋绥军区任三科长，龙振彪、靳子云等



同志相继调走，洪杰担任电台区队长，政指刘科。1946年夏，洪杰调绥蒙军区，电台区队撤销，由三科直接领导电台的工作。

#### 7. 晋绥军区电话通信队。

晋绥军区原有一个电话队，一个通信队。整编后将两队合并为电话通信队，队长为郭正祥。1945年8月以后，又分为电话队（队长孟长春，政指刘科）和通信队（队长赵尚连）。

#### 8. 西北通信学校。

1947年3—4月，军委三局东渡黄河向晋察冀转移后，留下了一些教员及原联司通信训练队招收的新学员，部分干部和晋绥军区通信训练队合并组成晋绥通信学校由晋绥军区领导，校长曾庆良，教务主任曹怀银，教员李映潭、刘永福等。1948年秋，甲班结业了，乙班已临近结业，后来又由部队和分局选送了一些学员，与在校的丙班组成两个队。一队队长刘永福，二队队长李映潭。

1948年冬，学校迁至临汾界峪、西宜村，进一步扩大，并改名为“西北通信学校”，校长曾庆良，政委李明松，政治主任胡长生，教务主任曹怀银，副主任李映潭，总支书记刘科，学校归西北军区通信联络处领导。1949年夏秋之际，学校迁至西安五岳庙门，后转大湘子庙街。这时曾庆良调联络处任副处长，彭洪志和严成钦任副校长，不久彭也调联络处，严任校长，白新太任政委，后来学校又迁至长安县王曲。

郭武军同志在回忆中说：“1938年6月，我参加新军决死二纵队，次年1月，我到四团电台学习无线电报务，电台台长贾履瀛，是阎锡山派来的，陈宝琛等是我党派来的。1938年初，为了培养自己的报务员，纵队开办第一期报务训练班，由于克强台长（阎派来的）和指导员刘振中负责，学员是我党派来的，有王维舟（林平）、王天新、高仁杰、陈宝琛、晋长才等。1939年1月，纵队举办第二期报务训练班，由电台指导员刘振中负责，学员有赵兴田、郭申伦、李存仁、张克白等人，同时由各团电台自己培养两名报务员。四团培养的是我和张振锋，由电台台长贾履瀛负责，当时他对我们的训练还是认真负责的，由于处于游击战环境，经常行军、打仗、转移，只能在战斗间隙中进行训练。那时器材缺乏，只有一个小蜂鸣器，用两节小电池，一人发报，我们抄收，主要靠自己刻苦练习。”

## 第二节 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报训班

### 一、三五八旅报训班、吕梁军区报训班

1. 1938年7、8月，三五八旅电台区队选择一些战士学习报务。由

电台区队长彭洪志、报务主任齐振兴负责。学习不到一年，于1939年春改为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地址在晋西北临县，负责人为彭洪志。学员有樊士俊、谭绍松、霍国休、阎贵山、李丰年、高士俊等七八人。1939年夏初，学员结业。

2. 日本投降后，张宗逊率三五八旅到吕梁地区成立吕梁军区。由于部队扩大，军区三科决定成立无线电报务训练队，直属三科领导。1945年11月，报训队第一期开学，地址在山西离石县凤和沟。马连科任队长兼教员，李存仁任副队长兼英文教员，李常兴任指导员。学员有张振国、赵典茂、孟照壁、梁峰、李文化、李化、夏高义、王国本等十五六人。梁峰为组长。1946年1月，训练班迁至山西汾阳县，3月底第一期学员毕业。

3. 1946年6月举办第二期，地址在山西汾阳，领导与教员未变。学员有周云、赵达昌、王凤英、谭国华、苏锐等20余人，大约在年底毕业。

4. 1947年4月报训队举办第三期，地址在山西中阳县北坡村，领导与教员未变。学员有李近斌、赵忠晋、薛居达、毛为民、黎光、杨世清、章金龙、贺静波、冀林、刘宗保、高芝世、王源忠、杨志清、张廷玉、李玉山等40余人。后因需要调走一部分，毕业时只有30余人。学习时间为半年，大约在同年11月毕业。

## 二、三五九旅无线电训练班

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抗战开始，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六军团编为三五九旅，下辖七一七团、七一八团。1937年9月2日，三五九旅北上，经山西太原到达灵丘。这时旅部电台很少，但是部队联络主要靠无线电通信，于是王震同志提出组织无线电训练班。

1. 1938年10月在山西灵丘县上寨开始举办无线电训练班，由电台队长黎东汉负责，并负责教报务、机务，旅部敌工科长（日本留学生）教英文。学员共13人，有杜力（杜文秀）、田振凯、段怀夫、齐振兴、刘兴怀、刘攀桂、张维屏、周志夫、刘双菊、王日修等。还有三位红军干部及地下党员雷玉保、肖绪明、何汉鑫。这期于1939年3月毕业。

1939年9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搞摩擦，总部命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地区，旅部驻绥德。

2. 1940年下半年在绥德举办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主要是各电台的报务员，学习内容主要是机务知识。因为在前线时部队忙于战斗，

无暇进修，利用这一时机训练报务人员。负责人及教员为黎东汉。学习时间为8个月，于1941年上半年毕业。

3. 1944年11月，三五九旅奉命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建立根据地。行至湖南茶陵，日本投降，因南方形势复杂，从南雄又返回北方。1945年2月三五九旅到湖南平江时，举办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负责人为龚才华，电台人员均兼课。训练班边行军边教学，经广东、湖南、湖北，1946年5月到达河南光山县窑村，学员在窑村毕业。学员有罗全元、蒋炳煌、李桂祥、向斌、曾庆琪、曾庆骥、吴建国、徐修伦、易志华、龚霞、彭志诚、汤才洲、周处世等20余人。

4. 1947年三五九旅九团在山东扩建为新六旅，后组成西北野战军二纵队。1947年底在山东渤海举办无线电训练班，由电台队长吕淮负责，教员有刘兴贵等。学员有高鹏福、薛玫玲、姜学诗、高明、李之久、邱修善等。训练班由山东经山西达到陕西韩城。1948年7月在陕西毕业。

黎东汉同志在回忆中说：“1937年9月3日，三五九旅出师北上，经山西太原、忻县到灵丘（雁北地区）……在此期间，敌后根据地形势很好，部队扩大发展得比较快，对通信特别是无线电通信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王震同志提出要我组织无线电训练班，人员从冀中新来的新兵中挑选。1938年10月，在灵丘上寨接到了组织训练班命令，同时训练班学员也都来了。可是器材、教材、教员都没有，怎么办呢？为了革命发展的需要，只好克服困难。我们自己动手装配一部振荡器，自己担任教员，教材也是自己边教边编。学员有十几名。后来俞占鳌、罗四海也来帮助教过课。当学员抄报速度提高到每分钟100字时，再提高就困难了。所以让他们提前上机，抄收新闻，在机上教他们适应各种通报情况，经过5个月的训练，这13位同志都很快独立工作了。”

### 第三节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训练队、西北电讯学校

自军委三局举办的通信学校于1944年规模缩小后，1944年2月，联防司令部举办通信队，为西北地区各部队培训通信人才。

#### 一、干训队第一期

1944年3月，联防司令部为了培训老通信干部，举办第一期干训队，地址在延安飞机场。联司通信队由联司三科副科长曾庆良负责，干

训队队长荆振昌。

干训队学员来自西北各部队的电台工作人员，学员 70 余人，编为三个区队。林彬（朱仁朴）、刘绍泽、彭效萍分别为区队长。

已知的学员有：彭国安、杨树基、张凤来、齐振兴、胡勇、张守仁、杜力、朱家霖、严东生、颜斌、刘远（刘景瑞）、张贵德、雷翻、冀守廉、杨顺延、李英、李映光、罗泽润、张大明、赵永一、谭少松、孙平、罗万云、朱世玉（朱世松）、张俊生、许国桢等。

这一期于 1944 年 12 月毕业。

## 二、新生队第一期

与干训队的同时，1944 年 3 月，招收新生队，新生队队长刘克东，教员有严成钦、唐英洛、李映潭等。

新生队约 60 人，编为两个排 8 个班，已知的学员有：王谷怀、刘振勇、杨丙元（高军）、刘羿、赵万才（赵远）、张重远、黎旭、刘浩、刘铁桂、岳宗泽、郝如秀、马有德、赵康、李天伟、谢跃恒、温子才、李桂田、王进显、杜如琛、王振祥、严克昌、张序友、刘景华、李志、吕书云、袁子珍、刘文凯、李玉全（李申）、王俊杰、刘明江、蒙真、焦庆忠、张国祥、史国杰、由鸿业、高瑞昌、张连生、唐成绪、王昌林、彭三明、弓全明、肖书业、张培荣、谢文普、王欣元、刘文彬、黎华、郝程荣、杨秉志、张增或、魏志凯、李玉梅等。

这一期新生队于 1944 年年底毕业。

## 三、干训队第二期

1944 年 12 月举办第二期干训队，领导人与地址同前。学员约 100 人，分为 4 个分队，崔伦、孙道辉、陈伦、张乃召分别任区队长。第四区队是附设在联司通信队的气象班，详情在下节中另述。

已知的学员有：叶孚之、张浪、杜志远、王世勤、刘克保、张芳、杨家详、俞友仁、王佩珍、魏占明、白晋之、饶富康、马汝成、王平凡、张醒民、王占林、张汉超、安振声、马礼靖、郭武钧、胡嘉、海毅、张秀夫、胡兆瑞、吴玫银、孙志敏、金凯辛、吴九宁等。

这一期学员于 1945 年 8 月毕业。

## 四、新生队第二期

1945 年 9 月招收第二期新生队，校址由飞机场迁至北门外联防军

后勤部附近。队长严成钦，协理员朱仕朴，支部书记向明华，教员有李映潭、黄达、汤翰章等。学员共70余人，分为两个区队九个班。张俊生、许国桢分别任区队长。

第一区队的学员有：袁正行、王占祥、王占登、王文海、王根堂、王庆忠、袁玉体、吕泽润、康崇如、高玉书、贾士林、贾常瑞、刘文森、邵德俊、孙尚如、白振亚、李玉宾、史金水、魏志芬、何群、吴文正、顾品、何增明、张文立、林华、赵焕奎、田泽坤、刘群英、李世春、李英、甄尚荣、苏荣喜、李廉进（女）、王铭慈（女）、彭秀文（女）、张清新（女）、邢志华（女）、李康将（女）、李锦（女）、王杰（女）、张英华（女）、詹志青（女）、信书志（女）、亚莉（女）、刘参（女）、李敬联（女）、彭金鸾（女）等。

二区队学员有：李绵华、汪济泽、高文印、张清进、赵智、乔九清、李自生、卢世雄、张钧汉、程×恩、高克剑、李德智、杨科、贾振宁、李跃雄、白孝、刘振才、霍步贤、吴世本、王唯一、李银华、魏兰芳、李荣华、韩金虎、杨双奎、赵志、李志升、张清世、李银、徐国亭、邵德俊、李永义、张克俭等。

这一期于1945年9月毕业。

### 五、新生队第三期

1946年5月招收第三期学员，地址仍在延安北关。队长严成钦，协助员朱仕朴，支部书记李英，教员汤翰章、黄达、李映潭。

学员共40余人，编为6个班，无专职区队长。已知的学员有：王崇昌、李永玉、贺思明、马义祖、张亮图、霍善南（霍英）、刘锦英、邓保山、焦志邦、张文明（女）、亚楠（女）、柳佩英（女）、霍芝英（女）、石保仁、贺学沉（女）、余劲（女）、陈国华（刘华、女）、魏兰芳（女）、白风玉、高祥林、申景才、霍兆瑞、刘国权、杨志清、吴绵梅（女）、曹洪先、秦跃华、高东明、高学友、刘生名、杨科、屈生明等。

这期学员于1946年12月毕业。

### 六、西北电讯学校

1946年冬，上级决定将联司通信队扩大为“西北电讯学校”，校长刘克东，副校长朱仕朴，在延安、米脂、绥德一带贴出招生广告，招收新生。学校派出朱仕朴、汤翰章等到绥德一带招收新生。

1947年年初，学校在延安绥德等地招收了一批新学员，一些新学员陆续到校报到。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攻陕北，中央机关陆续搬出延安，通信学校学员还未到齐，原联司通信队同志加上已报到的新生共百余人，于1947年3月10日，由支部书记李英、教员李映潭带领迁到绥德，与在绥德招收的同志会合，转移到黄河边，这时西北电讯学校实际已不存在。这批百余名教学人员于1947年渡黄河到山西临县三交一带。军委三局住孙家沟，这两部分学员均由三局暂时代管。1947年5月迁到临县弯里村，正式成立“晋绥军区通信学校”。

曾庆良同志在回忆中说：“1942年七八月间，在留守兵团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比留守兵团大得多。原来只有陕甘宁边区，现在成了陕甘宁晋绥五个地区，把整个晋绥包括进来了。贺龙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是副司令，关向应任政委，三科科长是王子纲，我是副科长……1943年我们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我兼任了一段班的领导工作。训练班共分两个队，一队是干部队，二队是初级报务队。一队队长荆振昌（兼），他是晋绥军区的三科科长，这个队主要是训练干部。学员有当时的区队长崔伦、朱仕朴、刘绍泽、陈伦等七八十人。二队队长刘克东（兼），学员大部分是从抗大选来的，主要是学报务技术，亲自实习装机器，除此还搞思想教育，叫‘鼓气’。队下边还有几个区队。日本投降后我调走了……日本投降后成立了晋绥野战军，命我为三科科长……1947年晋绥野战军撤销，我回到晋绥军区参加建军会议，然后到通信学校任校长。1948年底，西北通信学校搬到山西临汾，几个月时间学校得到充实和发展，调来了政委李明松，增补了副校长彭洪志、严成钦。学校成立了政治处，加强了校务处、管理科，建立了两个学生大队，全校人员增加到近千人。西北军区王维舟副司令员还到临汾通信学校视察工作，并向全校人员讲了话。”

刘克东同志在回忆中说：“1944年2、3月间，遵照军委三局指示，由联防军司令部三科负责成立通信训练队，驻延安飞机场，由我任队长，颜成钦、唐英洛、李映潭任教员，这是联司通信训练队第一期，学员近百人，1944年年底毕业。”

“1945年8月，第二期开始训练，分两个区队，学员近200人，严成钦任队长，林彬（朱仕朴）任政治协理员，向明华任书记，张振生、马义（后由许国桢接替）任区队长，黄达、汤翰章、李映潭任教员。开始驻飞机场，后迁到延安北门外联防军后勤部附近。这期学员于1946年5月毕业。”

“1946年5月，第三期开始训练，有学员70余人。严成钦任队长，朱仕朴任协理员，黄达、汤翰章、李映潭任教员，李英任教育干事。训练队仍住延安北门外联防军后勤部附近，这期学员于1947年底毕业。不久联司训练队改为西北电讯学校，并开始招生。我任校长，朱仕朴任副校长，并派出朱仕朴、汤翰章、杨忠赴绥德地区招生，同时也在延安和附近地区张贴招生广告。关于学校名称问题，曾考虑用通信学校，因为在地方上招生，怕引起误会，认为是培养通信员的，所以叫‘西北电讯学校’。当时联司有个石印机，招生广告是我找人写好以后，用石印机刷的，首先贴在延安的各处墙上，以后到绥、米一带张贴，学生报名的不少，邻近延安地区的学生到延安报名，绥德附近地区的学生到绥德报名，直到1947年10月离开延安为止。延安地区报名的新生连同联司通信训练队原有的学生共约百余人，于1947年3月10日，由李英、李映潭带领撤至子长县，后又撤至绥德，同朱仕朴招收的数十名新生会合，由李英、汤翰章、杨忠、李映潭带领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三交附近，由军委三局代管。这一部分人员于1947年5月到临县弯里村，同绥德军区报务训练队合并，组成晋绥通信学校。延安来的学生和晋绥报务训练队的学生再加上从贺龙中学招来的学生，共约200余人。”

朱仕朴同志在回忆中说：“联防司令部在1944年办了通信队，这个通信队一共办了4期。第一期是1944年3月到1945年8、9月，有学生40多人，在第一期的同时，联司将所属的一些老通信干部集中在一起，叫干部队。一方面是整风学习；另一方面是研究如何改革通信工作，如何保密，如何做到迅速准确。这个干训队有20多人，我是支部书记、区队长。”“第二期是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队长严成钦，我是协理员，向明华是支部书记。学员50余人。第三期是1946年5月到1946年底，学员50人左右，领导人没有变。第四期是1946年到1947年3月，学员大约50人，领导没有变。1947年1月，联防司令部准备在通信队的基础上扩建为西北电讯学校，任命刘克东为校长，我是副校长。1947年1月，我和教员汤翰章到绥德，招收绥德、米脂、佳县等地知识青年。当时还贴出了招生广告，报名的人很踊跃，绥德师范、米脂中学报名的人不少。”

“到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对绥德地区进行轰炸，一些报名的学生没有来，只有10多人报到。不久军委三局从延安转移到绥德，王诤同志及联司通信队的干部、教员都到了绥德。王诤调我到西北野战

军司令部通信科任副科长，科长是刘克东。联司通信队的人由李英、汤翰章、李映潭等同志带领渡黄河到了晋绥。”“1950年我到了西安，上级指定我筹建第一通信学校，地址在长安县王曲镇。在全国招收几百名青年，湖南人较多，多是高中学生，也有初中学生。我当时是西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所以在筹备到一段落后，由上级任命通信学校的领导，校长陈外欧，政委江波。”

## 第四节 联司通信队第四区队、军委三局气象台

1944年初，美国派出包瑞德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他们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的接待，并同解放区军民建立友好关系，后来美国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撤走观察组。

美军派出观察组期间，他们提出建立电台，并在各根据地设气象观察通信组，由美军提供器材，由我方派出人员。达成协议后，我军立即从三局总台及各旅电台抽调人员到延安学习，称气象班，附设于联司通信队。

### 一、联司通信队气象班（第四区队）

1945年3月气象班正式组成，当时延安没有专门气象机构，于是附设于三局，三局确定附设在联司通信队，编为第四区队。

气象班负责人为张乃召，他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培养的少数气象专业毕业生之一，当时在延安医科大学任教。领导知道张乃召有气象专长，于是中组部调他到通信队负责气象班。

气象班教员除张乃召同志外，美军观察组成员中负责气象的，（如瓦尔克等）也担任课程。

学员共21人，区队长高平。学员分为3个班，因为学员都是老报务员，所以主要学习气象知识。已知的学员有王振海、葛仕民、陆双欣、房士奇、张升福、吴九云、王平凡、饶福康、刘宝祥、胡友训、周文才等。

学习内容气象、美军通报手续、报话机的使用。1945年5月学习结束，葛仕民、王振海、吴有利3人乘美B-52飞机到晋冀鲁豫长岭机场降落，然后在涉县设立气象通信台，周文才到定边设台，房士奇到绥德，张升福到甘肃庆阳设台，以后胡有训到山东设台。电台每天两次向延安美军观察组报告当地气象，此外，引导美军飞机在各解放区降落



或执行轰炸日军的任务。

## 二、延安气象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美军观察组要离开延安，经中央与之交涉，他们的气象通信设备移交给我们。当时党中央与重庆来往飞机较多，也需要有气象、导航设施，于是决定成立气象台。这段历史邹竞蒙有详细回忆。

邹竞蒙同志在回忆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了相当大一片根据地，抵御了大部分敌人。美国史迪威将军派了一个美军观察组往延安，搞军事外交。美国在成都、昆明、衡阳设有空军基地，经常用号称‘空中堡垒’的 B29 型轰炸机轰炸日本控制的战略地区——华北、东北，乃至日本本土，因此迫切需要我解放区的气象情况。”

“美军提出由他们派人到解放区各地建立气象台站。经多次商谈，我们只同意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设立一个气象台，延安以外各观测点由我们派人，设备由美方提供，技术人员由美方和我方联合培训。为此，我党决定抽调革命队伍中学过气象的同志同美国人一起搞气象。张乃召同志 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气象系，当时在医科大学任教员、支部书记、协理员。中央组织部点到了他，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亲自找张乃召谈话，鼓励他同美方人员搞好工作，把解放区的气象事业建立起来。美国在中国共设 4 个气象台：昆明、成都、衡阳和延安。”

“当时我军气象工作由军委三局负责，局长是王诤同志。1944 年 2 月，三局在延安举办报务训练队（联防司令部通信队），其中第 4 区队一方面训练报务员，一方面教气象知识，20 余人重点学了气象。但他们毕业后只有 5 人分配到定边、晋察冀、晋察鲁豫、山东等 5 个点搞气象观测。他们毕业后步行到各观测点，观测仪器由美空军空投到观测点。不久，各点开始工作，向延安美军气象站发报，再转到国民党统治区美空军基地。那时使用的设备有 SCR—284 和 V101 发报机，简易的气象观测仪器，如空盒气压表、手摇干湿球温度表、手提式阿曼风速仪、指南针、手提风速表等。为了工作方便，每人还发给一块手表，这是我党我军第一批气象工作者。”

“1945 年日本投降，中央预见到蒋介石可能要打内战，中央军委考虑要培养一批气象人员，准备在解放战争中配合我们的空军活动。1945

年，马歇尔、魏特曼搞国共调停，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副主席陪同。这一期间重庆和延安之间的飞行非常频繁，需要气象保证，而美军观察组又要从延安撤退。为了保证飞行安全，要接收这个气象台。我军从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边区政府抽调了一批年轻有文化的同志，最早去气象台的是毛雪华、周鲁女，又过几天曾宪波、邹竞蒙也到了，加上张乃召共5人。以后增加到11人，他们是张乃召、湛亚选、邹竞蒙、曾宪波、周鲁女、毛雪华、陈涌珉（女）、傅涌泉、苏中、张丽、杨×。”

“我们学习、工作、生活都同美军观测组在一起，住在外宾招待所。大家学习很紧张，也很团结。当时黄华、凌青同志也在那里。美国人讲课时，张乃召当翻译，有时凌青也给我们翻译，张乃召自己也讲课。美军气象人员集中教了3个星期气象业务，有5门课程：第一是地面观测，讲常规仪器、日射观测；第二是学经纬仪，搞小球测风；第三是无线电探空；第四是无线电测风；第五是制氢技术。美国在延安气象台有半自动无线电探空仪、无线电经纬仪、地面观测常规仪器、小球测风经纬仪、测云高的测云仪。这些设备在当时来讲，可算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我们毕业时，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杨尚昆同志主持，叶剑英参谋长讲了话……叶剑英讲话后，叶顿上校还郑重给每一个毕业人员发了毕业证书和一个标志气象工作的美军臂章。”

“我们毕业后就开始工作，起初和美国人联合工作，后来形势变化，我们毕业一个月左右，美军就撤走了，有一段气象台未落实到具体单位管。后来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主动将气象台管了起来，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

“1948年8月，华北地区电讯专科学校有一个班40多人，既学了通信业务，也学了气象。组织上派我们去讲过课，气象课主要由张乃召讲，我们也讲课，带领实习，那是在河北获鹿县。后来这部分同志有些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气象部门的领导骨干，如甘肃气象局长胡继文，贵州省气象局副局长李国文，河北省气象局长冯生亚，中国民航总局气象处长周国栋、杨清源等。”

“胡宗南于1947年3月19日大军进犯延安。为了最后战胜蒋介石，党中央决定党政机关全部撤出延安，气象台于3月11日撤出。1946年冬，器材就开始转移了，由邹竞蒙、曾宪波开汽车疏散到山头、河沟里。但撤走时还有大量书籍、资料和器材……当时主要运输

工具是骡子、毛驴，撤出时优先照顾气象器材。从瓦窑堡到山西临县，后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我们一路行军，一路押运器材。有两个水银气压表比较贵重，专门由一头驴子驮着，还派专人负责照看。上坡时后面有人扶着，前面有人牵着。总之，我们千方百计把器材安全运出来了。现在有一个水银气压表还在包头地区气象台。”

在《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载有：“1944年夏，亚洲太平洋战场风云紧急，美军节节胜利，逼近西南太平洋。当时美军最高统帅部有一个登陆中国沿海，以切断日军羽翼，孤立日本本土的战略计划。与此同时，日军则处处失败，紧缩兵力，固守中国沿海，确保东北、华北。因此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地理中，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本土的第二号目标。”

“美军统帅部当局，尤其是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从早日结束对日战争之目的出发，自然注意到我党的力量，因此急需联络我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衔命筹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反叛各州，这里指延安）。 ”

“1944年7月22日，包瑞德乘飞机从重庆到延安，11月10日返重庆。”

包瑞德在回忆中也写道：“共产党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为我们的海军、空军收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合作，在通信主任道木克上尉的监督下，许多小型无线电台和指挥行动的仪器被送往共产党控制区的边远部分。惊人的、大量的、有用的报告，一旦通过这些小型无线电台发出，延安就收到了。”

“这些情报中有一个情况给雷·卢登和我以极大的欢乐（卢登同约翰·谢维思、约翰·埃默森一样是我们小组的顾问）。无线电发布了一些消息之后，接着又播送天气预报。某一方向的云的形状，诸如‘积云’、‘卷云’等将要被记载下来，描述云的特殊术语播送时不多也不少。”

“9月，我离开这个使团之后，特别有名气的几位气象预测家被派往延安参加这个小组。这些专家每天放一些气球，把它们和无线电联在一起，使之在空中自动报导天气条件（科学的奇迹）。 ”

葛仕民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年2月，我在延安川口军委三局的无线电总台工作。一天，三局副局长刘寅同志找我去谈话，他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联司通信队去学习，他还讲了为什么要学气象，以及注意

的问题。既然组织上已决定，我愉快服从分配，回到总台就交代工作，两三天后，就到设在延安机场的联司通信队报到。川口在延安西北 10 余里，经常往来，很快就到了。”

“1945 年 3 月我们开学了，开学时三局局长王净同志讲了话，大意是美军在延安设立了观察组，为了飞机的起飞降落，以及引导美军飞机到前线轰炸日军阵地，需要气象资料。我们不希望由他们驻在各根据地的美军观察组直接设电台，最后我们商定，由他们出器材，我们出人，共同合作做好气象工作。条件是他们给 20 吨器材，我们出 20 个人。这样，你们将来要和美军一起工作了，每天向延安美观察组报气象资料，当然也要向总部报。他还勉励我们努力学习。”

“不久，叶剑英把我们叫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去，向我们讲了话。他说：‘过去我们没有空军，气象工作对我们不大需要。现在情况不同了，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来来往往，他们还要飞到前线去，所以需要气象资料。美国人急于要气象资料，曾提出在你们学完后，把你们空投到各根据地去。我说你们都是放牛娃，不会跳伞，只能从地面走，或乘飞机到有机场的地方降落，再步行到目的地。’他还交代了毕业后与美军一起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在联司通信队我们编为第四区队，学员共 21 人，有一个是预备队员。学员都是从各电台调来的老报务员，我记得有胡有训、王振海、陆双欣、葛仕民、周文才（现在西安国防科委干休所）等，区队长是高平。21 人分为三个班，学员还有房士奇、张升福、吴九云、王平凡、饶福康、刘宝祥等。毕业时，周文才到了定边，房士奇到绥德，张升福到重庆。”

“学习的内容有以下几种：

1. 气象。由张乃召同志教课兼翻译，内容有能见度；云的类型及高度、云的速度及流动方向；气压；温湿度；风向、风速、风力；报告气象的格式等。

2. 美军通报手续。这门课主要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电台去实习。每天他们派车把我们接去，在他们的电台上与重庆的美军电台联系。指导我们实习的美军是瓦尔特·格雷斯基。

3. 报话机的使用。主要讲 V-101 和 284 机器的使用，教员及翻译是一个姓李的。”

“1945 年 5 月学习结束，共学习 3 个月左右。在 6、7 月份，我

与王振海、胡有训3人，乘美军B-25飞机，随身带284机一部，温度计一部，气压表一个，风速器一个，指南针一个。我们从延安起飞，到晋冀鲁豫军区的长岭机场降落，然后用牲口把器材驮到军区所在地涉县赤岸。我们到赤岸后，驻有一个美军观察组，有一个中校，还有电台人员。我们到后，他们的电台人员即回延安了。一周以后，王振海又被派到太行，胡有训到了山东，从此我就开始了气象工作。”

“当时我与美军观察组住在一起，大门是双岗。我自己有两间房子，外间是电台，里间是住室。我们每天观察气象两次，记下数据，然后接收山东、太行给我们发来的资料，汇总在一起，报往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个月后，总部来电，同时向总部报送一份。我除了报送气象资料，他们编成密码，也由我发出。”

“在我工作期间，美军飞机在长岭降落四五次，都由我事先告知气象情况，引导降落。他们的飞机主要是接运被日军击落飞机的跳伞机组人员。被日军击落的飞机，机组人员跳伞到解放区，由我军护送到军区，再从长岭机场送走。有时美军飞机经涉县与我的电台联络。”

“那一年夏天，天旱少雨，大家十分盼望下雨，经常问我今天下不下雨。有一天下午，气压、湿度突然有了变化，我告诉大家傍晚有雨，果然下起了滂沱大雨。”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在上党战役前，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把我叫去，告诉我，如果美军问我们到哪里去了，你就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们还击去了。要劝告他们不要离开驻地，以免发生误会。”

曾宪波同志在回忆中说：“延安时期举办的气象训练班，是张乃召同志负责建立起来的，张乃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学的气象专业。我从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调到气象训练班之前，张乃召已陆续培训了一些气象人员，主要是将原来的电台队长，调来学习一段气象知识，然后派往各解放区，随美军观察组向重庆方面报气象，以供美军空军对日轰炸飞行之用。”

“我去了以后，建立气象台。延安气象台归三局领导，负责人张乃召，工作人员有邹竞蒙、周鲁女、苏中、傅涌泉、张丽、曾宪波、湛亚选等。”

“1947年我们随军委从延安撤到晋绥，又到达平山西柏坡，1948年

8月并入华北电专。这时学生有一个班，50余人，叫陆空联络气象班。我们气象台的几个同志负责教气象课，随刘善本起义的几个通信人员教陆空联络课。”

“具体课程：张乃召讲气象课，曾宪波讲气象仪器，邹竞蒙负责管理气象仪器，苏中辅导观测，张丽做辅导工作。湛亚选在我们之前到电专，他大概教英语，他爱人王立娣教数学。”

“我们到华北电专有两个任务：一是教陆空班的气象；二是也学些报务及陆空联络的知识。由于战争形发展的需要，1948年底，北平即将解放，从我们气象班抽调了一些教员、学员，组成接管小组，后来分赴北平、天津、太原接管了气象部门。曾宪波带几名学员到北平接管，邹竞蒙带了几个学员到天津接管，傅涌泉带几个学员到太原接管。所以一部分学生还没有毕业即离开学校，和我们一起参加接管工作。”

孔永同志在回忆中说：“1947年夏，按照当时的分工，由东北航校负责培训飞行人员，晋察冀电专负责培训陆空通信、气象人员，我们这个班就是为空军建设培训人才的陆空通信专业班，后来又增学了气象专业，称陆空通信、气象专业班。”

“1948年7、8月，我们以陆空通信专业为主要内容的训练已基本结束，1948年底，张乃召同志率领从延安气象台撤出的6位同志邹竞蒙、周鲁女、苏中、曾宪波、傅涌泉、张丽到达华北电专，参加了我们当时的陆空通信班教学工作。张乃召同志担任了四队队长，我们班分成6个组，邹竞蒙等6人分别担任6个组的组长，副组长则由我们同学担任。从此以后气象专业内容大大增加。1948年12月，张乃召等同志为接收北平、天津的气象台而先后离校，我们班由周鲁女同志负责，直至1949年5月毕业。毕业时，全班参加合影的41人。”

“我们入校学习的专业是陆空通信，主要教员有两位，都是1946年随刘善本起义到延安的。一位叫江焕章，另一位叫何辉庭，还一位教员崔凯，一位助教韩招第。学习的课程有空勤概论、陆空通信、陆空协同战术、英语、电工、无线电，还有气象。因为气象与航空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设有气象课，但讲课比较简单，没有气象仪器，也没有实际操作。陆空通信是学习重点，基本上按江、何两位教员在国民党空军学的那一套内容教的。如联合国布板信号、莫尔斯电码、英文、中文电报的收发等。后来朱贻先同志担任主任教员兼队长，她发报速度达150个码

每分钟，经刻苦学习，我们中英文收发报速度 120 个码每分钟，并初步掌握了双工通信。”

“1948 年夏，张乃召等 7 人来校后，我们转入以学气象课为主。这时气象课分为气象知识、气象观测规范及观测的仪器使用、天气预报知识等几门课。有理论，有实际操作。气象课主要由张乃召同志讲授，邹竞蒙讲文化及气象观测，曾宪波讲气象仪器，另外几位给辅导。那时的观测项目与现在没有多大区别，有云、风、风速、气压、温度、湿度、能见度、降水等。教材是张乃召、邹竞蒙等几位同志编写的，由周鲁女等同志刻蜡纸油印。使用的气象仪器全部是美制的，有空盒气压表、福丁式水银气压表（英寸制）、手持风速表、手摇干湿球温度表等。这些仪器是张乃召同志从延安撤出时带出来的，记得来校时是用六七匹牲口驮来的。每个组都有些轻便仪器，手摇温度表很多，有两三套。当时仪器没有来源，张乃召同志一再强调，仪器操作要时刻小心，不要损坏。我们在练习手摇温度表测量时，还是有个别同志不小心打坏了，有一次，周鲁女同志还伤心得流了泪。”

“1949 年 5 月上旬，我们在华北电专毕业，组织上把我们调到华北军区航空处北平气象台实习提高。当时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副处长油江，副政委吴仲昆。航空处下属有场站科，科长就是我们的老上级张乃召。场站科下有三个股，气象股长邹竞蒙，通信股长曾宪波，场站股长林军。为了便于学习领导，我们又成立了华北军区航空处气象陆空通信训练队，由周鲁女任副队长……直到 1949 年 10 月 4 日训练队结束，全部人员有 36 人。”

## 第五节 晋绥军区通信学校、西北通信学校、第一通信学校

1947 年 5 月，由联司通训队的成员、晋绥军区电训队的成员、军委三局电训队的成员合并成立晋绥军区通信学校，归军委三局领导，校址在山西临县大柏岭。学校未设校长，教育长为曾庆良，政治协理员张怀章，教务主任柳仁甫。曹怀银、钟尚清为学员队长，组织干事邹青山，教育干事李映潭。教员有汤翰章、梁立波、凌野，管理股长秦山，后为向世清，学员约 200 人。

从延安、绥德地区到联司通训队的新学员有刘和璧、钱国保、刘国

权、刘巨德、李再良、马林香（女）、刘春梅（女）、郭凤章（女）、魏志敏（女）、李雪梅（女）、叙波（女）等百余人。

1948年春，由梁茂成、柳仁甫带领延安通信学校的人员赴河北平山。晋绥通信学校仍留原地，改称“西北通信学校”。学校于1948年迁至山西临汾，并在晋西北招收新生。

西北通信学校校长曾庆良，政委李明松，副校长彭洪志、严成钦，政治处主任胡明生，教务主任曹怀银，副主任李映潭，后李映潭为教务主任。学员约200百余人，学员由3部分组成：一是从延安绥德招收的学员；二是在晋东南招收的学员；三是在晋西北招收的学员。

1949年8月，学校由山西临汾迁到西安，途经陕西大荔、蒲城、韩城一带，又招收一些学员，到西安时已有学员300余人。到西安后住钟楼西的五岳庙内。到西安不久，曾庆良同志调往西南工作，校长改为严成钦，政委李明松，后为白新太，政治处主任胡明生，教务主任李映潭。

学员分为3个大队：一大队长刘永福，二大队长杨维福，三大队长×××

1950年6月，学校迁往长安县王曲镇，与十九兵团报训队一起并入西北军官学校，编为第四大队。大队长刘永福，政委白新太，副政委冯跃，教务主任李映潭，学员220余人。

1950年12月由西北军官学校第四大队原通信学校人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通信学校，校址由王曲迁至韦曲。校长陈外欧，政委江波，严东生也在学校担任过一个时期领导工作。政治处主任白新太，训练处长李映潭，副处长高登第、刘永福，校务处长党建国（后为崔志英），干部科长奕国钰。

学员分为3个大队：一大队长孔祥玉，政委刘贵荣，副大队长杨树基，一大队下设4个中队；二大队长刘绍泽，副政委郑国成，副大队长赖合义；三大队长刘新科，政委冯跃。

1953年6月，第一通信学校撤销，一部分到第二通信团，一部分到张家口通信学院，一部分由江波带到高级通信学校，一部分到丹东防空司令部。

李映潭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在联司通信队第二期去的，当时只有3个教员。严成钦教收发，唐英洛教机务，我教英文、收发。学员有两个区队，许国桢、张震声都是区队长。汤翰章、黄达是第三期去当教



员的。第二期还有一个干训班。”

“到1947年联司通信队要扩大，用石印印发了招生广告，贴在延安街道墙上。校长刘克东，副校长朱仕朴，除在延安招生外，还到绥德、米脂一带去招生。1947年3月就从延安撤退，先到了子长县，学生已有七八十人，一路走，一路还有报名的，接着到了义和镇，这时已有100余人，这些人由李英负责。我们到了义河镇后与晋绥失去联系，听说军委三局住在绥德，我一个人到绥德去找三局请示行军方向。走到刘家川，见到梁茂成同志，他告诉我，王净同志在绥德。我赶到绥德已是中午，正值国民党飞机轰炸，不知王净同志住何处。根据我的经验，军委三局所在地必有高大的天线。于是就向城内走去，终于找到了三局。王净同志说联司的人在清涧，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上去找联司。当我赶回义河时，学校的人员已到黄河边上。我见到李英，经研究决定先渡黄河再说，于1947年4月过了黄河。这时学校已没有名字了，联司通讯队已不存在，西北通信学校又没有成立起来。过了黄河到三交，三局在孙家沟，我们住吴家沟。不久搬到临县湾里村，这时晋绥军区有个报训队，由曹怀银带几十名学员来到这里。1947年5月，成立晋绥通信学校，由晋绥军区三科科长荆振昌兼校长，彭洪志为副校长，张怀章是协理员，教员有我、汤翰章、杨忠。我们不久又搬到三交县孙家沟大柏岭，三局在晋东南又招收了一批学员，成立电训队，也到了这里。学校的领导人也有了变更，只有教育长，是曾庆良同志，教务主任柳仁甫，组织干事邹青山，我是教育干事，后来我当了队长，叶孚之当教育干事。”

“后来又分家，三局带上延安通信学校的人员及在晋东南招的学生到了河北平山，余下的仍住孙家沟，校名改为‘西北通信学校’。1949年夏，天气十分热，学校由临汾迁到西安，学生有200多人，到陕西后，一路走又招了一些新学员，到西安时已有300余人，到西安先住城里，很快就迁到王曲镇与西北军官学校合并，编为四大队，到1951年又成立通信学校，从湖南湖北招了一批新生。校长是陈外欧，政委江波，我是训练处长。后来西南通信学校收尾，由一个中队长带一个大队到了这里。1953年，大部分学生毕业，余下的学生中高中程度的送到张家口通信学院，剩下的由江波带领到张家口高级通信学校，另一部分到丹东防空司令部。”

## 第六节 军委三局通信队

晋绥通信学校成立后，由军委三局代管。1948年春节后，在军委三局主持下，通信学校一分为二。一部分由曾庆良同志负责，仍留原地，不久改为西北通信学校。另一部分原军委三局及延安通信学校的人员，由三局干部干事梁茂成及通信学校教务主任柳仁甫率领到河北建屏（平山）西黄泥村。这部分学员是晋东南籍的同学及河北调到三局的几十名新学员。同去的干部有邹青山、钟尚清、向世清、汤翰章、梁立波等。

到达河北后，成立三局通信队，三局调高飞任通信队长，增调何暇、黄俊良、周明远等同志任教员，教务主任柳仁甫。

学员共120余人，编为两个队，一队队长邹青山，二队队长钟尚清。训练队开课时，三局几位局长都曾到校讲话。开学不久，1948年春，奉命迁往河北获鹿县，与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合并。

柳仁甫同志在回忆中说：“1947年3月16日我们奉命向黄河边转移，经瓦窑堡，到晋西北临县、三交一带。在孙家沟驻有军委三局、总台和机要处。这时三局办了一个学习班，一共6人，有唐士吉、刘澄清、李重修、钟尚清、罗章、柳仁甫。50%的时间学政治，50%的时间学机务，由孙俊人讲课。”

“1947年冬天调我到晋绥通信学校当教务主任，地址在大柏岭。晋绥通信学校当时没有校长，教育长是曾庆良，协理员是张怀章，秦山做行政工作，教育干事李映潭，教员汤翰章、梁立波、凌野等。通信学校下设3个队：一个队20多人，已接近毕业；还有两个队，每队七八十人。队下设区队和班。一个队长是曹怀银，另一个队长是钟尚清，还有邹青山。”

“1948年春节以后，晋绥通信学校分家了，一部分人留下来，他们到了孙家沟。另一部分由梁茂成带领向河北平山转移。有我、汤翰章、梁立波，还有两个队学员100多人。一个队是从晋绥通信学校的两个队中抽出来的；另一个队是刚从华北调来的新生。一个队长是钟尚清，学生七八十人；另一个队队长邹青山，学生五六十人。”

“到平山后，正式叫军委三局通信队，队长高飞，我是教务主任，向世清做行政工作，教员有周明远、何暇、黄俊良等。下设两个队，一个队长是钟尚清，另一个队长是邹青山。1948年6月，奉三局命令与华北电专合并，我们向河北获鹿转移，行军十多天到达，途中正值端午节，华北军区通联处的领导，请我们吃了粽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 第六章

###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37 年洛川会议后，一一五师的一部在聂荣臻等率领下，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并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吕正操率东北军一个团，在藁城梅花镇，脱离了旧军队系统，进入冀中，改为人民自卫军队并与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开展游击战争。1937 年 11 月 7 日，奉朱总、彭总的命令，成立了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38 年 1 月 11 日，在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经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中心区在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之间。同年 4 月，冀中方面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把山区与平原连在一起，扩大了晋察冀边区。

1938 年敌人对边区进行第三次大“扫荡”，但经过边区人民的斗争，1940 年，已经发展到东至渤海、西至同蒲、南至正太、德石路、北至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的各一部分的广大地区。

1939年2月成立冀热察挺进军，建立冀热辽根据地，成为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一部分。

1946年9月成立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肖克，政治委员罗瑞卿，辖4个野战纵队。1946年12月，野战军建制撤销并入军区，1947年6月又恢复野战军，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关合并，组成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任华北政府主席，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薄一波任政委，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下辖2个纵队及北岳、冀中、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6个军区。

1948年11月1日，军委统一编制番号，成立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个野战军，组成5个一级军区，即中原、华东、华北、东北及陕甘宁晋绥军区（后改称西北军区），自此以后，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晋察冀军区十分重视通信人才的培养工作，其中以军区本身和冀中军区举办期数较多。有的军区因处在敌人腹地，环境艰苦，无法长期办学，因而举办培训无线电通信人才的各种训练班较少。

1937年11月7日，军区司令部设立三科，科长刘彬，负责有线电及无线电通信等。无线电通信自成体系，当时司令部只有一部电台，称八分队，分队长钟夫翔，不久任命梁达三为指导员。当时军区下设4个分区：一分区电台分队长刘长生，二分区肖永昌，三分区旷泉吉，四分区贺华胜。1938年各分区成立通信股，各分区股长是：一分区严殿华，

二分区周继光，三分区姚之一，四分区刘有恒。

## 第一节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班

### 一、第一期

晋察冀军区成立以后，根据地逐渐扩大，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1月，在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里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由电台队长钟夫翔，指导员梁达三同志负责，张锦文教电学及英语，谢振兴教报务。训练队附属于军区通信科，与电台一个伙食单位。学员有23人：韩克树、商桢祥、黄霖、杨培基、孙定邦、王道力、阎云山、孙谊民、李祥生、李志达、顾立达、许德安、徐海滨、臧本律、王荣文、赫永志、安松方、王金堂、张永宁、尚荣久、孙方如、周石夫、张振强。这一期到1938年4月在山西五台山金刚库毕业。自从这一期毕业后，无线电通信工作很快展开，与党中央及各分区都逐渐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联络。

### 二、第二期

1938年6月20日，在山西五台山金刚库举办第二期训练班，这一期到1938年10月毕业。由队长钟夫翔、指导员刘常真负责，日常工作除由教务主任韩克树管理外，还有解振兴。学员33人，已知的有王广仁、闵长生、李砚田、张书田、齐生瀛、梁树德、宋迎春、刘国华、张俊生、高国润、史文秀、马振西、马福泉（马毅）、杨维福、杨兴初、刘坤城、郑秀峰、张玉珍、谢振祥、刘玉山、郑殿贤、刘国贤、许建友、杨恩友、赵崇禹、唐新、刘振峰、张辉标。第一期的李志达、安松方、王鑫堂留在这期继续学习毕业。

### 三、第三期

1939年3月，军区无线电训练队举办第三期，1939年8月毕业。地址在河北唐县姜家沟，后移至阜平瓦炸地、马家沟。这一期学员增多，教员也增多，仍由电台队长钟夫翔、指导员刘常真负责。教务主任为韩克树、副任何基，支书杨光元。教员有周荣鑫、李瞬琴、薛希仁、吕进、张之凡、张勉学、霍惠风、霍伟征。学员分为两个排，设专职排长，一排长常家明，二排长杨贵元，学员共92人。一排有杨守泉、

陈德智、张世英（张华）、李锡寿、王德勋、理明策、张冠儒、阎继儒（阎钧）、林启深、武广孚、齐子清、王振武、洪惠、龚积庭、王济普、王文禄、宋嘉禄、刘子义、单荣礼、冯树仁、李纪铭、时原（女）、李铸、齐治平、张甲子、刘绍文、侯镇北、杨恩友、张明昌、贾隆昌、孙国风、梁炳勋、陈政治、刘景德、魏文龙、宋敬贤、武萍（女）、陈养中（陈群）、张如掌、晋军。

二排学员有李瑞山、荆国庆、孙秉武、蒋楚特、夏竹林、苏景（女）、宋林全、宋元科、朱恒璋、刘巨欣、薛化奎、王继夯、张秉坤、张学让、张学文、张复慎、张振通、梁慕之、崔振海（海毅）、常志杰、郑肇东、路振忠、计心敏、王栋、刘金奎、霍跃华、封文起、赵根顺、齐复华、鲁门、贡军波、王家朋、王泽元、徐陈秋、关福才、刘旺荣、崔清吉、路平、史珏书、方燕军（女）、高惠星、崔元吉、阎梦兰、郑殿阁、关风奎（关震）、岱力、任勇。

#### 四、第一期高训班

在第三期训练班未毕业时，为了提高在职通信人员的技术水平，抽调在电台工作的在职人员到训练班进行训练，当时叫高训班。

1939年3—8月举办第一期高训班，地址在唐县姜家沟，教员主要由韩克树担任。学员共20余人，排长为常家明，学员有周石夫、阎钧、贺华胜、刘道生、张志廉、闵长生、时原、苏景、伏希、尚荣久、洪惠、陈正止等。学习内容主要是装配哈特来式发报机及三管再生式接收机。这一期于1939年9月毕业。

#### 五、三期半

1939年6月，第三期开学不久，晋察冀军区抽调一些干部到延安，因敌人封锁，无法通过，即调到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当时称为三期半。这一期到1940年2月毕业。地址开始在河北唐县姜家沟，后来到阜平县石堂。

学员共12人，他们是王克俨、王俊义、陈子平、郝同钦、胡笠农、魏席人、郭锋、张树山、韩纯德、王为民、尤春林、刘析彦。

#### 六、第四期

1941年1月，在河北曲阳县举办第四期，这一期1940年秋在阜

平县石堂毕业。负责人钟夫翔，教务主任韩克树，教员有解振兴等同志。

学员 40 余人，已知的有蔡凌霞、何彦深、裴全成、李国华、刘尧、张顺朝、高振和、李刚、王延章、魏炳生、余进岐、甄汉卿、张立生（晨阳）、李树德、王泽民（陈英）等。

### 七、第二期高训班

与第四期同时，举办了高训班第二期，地址在河北曲阳县，学员约 20 人。

### 八、第五期

1941 年 2 月，在河北平山石古洞举办第五期，这一期于 9 月毕业。由钟夫翔及指导员徐守恒负责。支部书记刘秉正，教务主任韩克树。教员有解振兴、张志廉等，研究班的林爽等同志也兼课。学员 60 余人。学员编为两个排，一排长安俊杰，二排长刘文华。已知学员有：王守志、刘基、张效良、张满龙、刘雨、郑云战、孙殿毅、范振恒、刘世荣、王树仁、陈之干、宫子涛、赵尔昌、高顺昌、葛仕民、苗代耕、董方明（董明）、李世民、刘绪钦、师锦堂、宁卫屏、范根伟、杨玉林、刘镇德、李保良、刘建民、轩敬文、李尚书、刘亚平、王占领、杨世清（杨赤心）、刘家柏、张沛泽、韩尔信、张建民、杨树楷、张存义、田振学、单福生、陈长庆、陈玉龙、刘凤举、陈茂德、张志新、陈良清、孙国权、杨华、赵春庭、潘呈祥、泉鹏飞、甄绍德、王喜、李树梅、范振衡等。

### 九、第三期高训班

与第五期前后，1940 年又举办了第三期高训班，至 1941 年 7 月毕业，学员约 20 人：周石夫、陈子平、郭先瑞、刘文绪、闵长生、曲培雍、张振生、张炳尧、宫积庭、哈文光、梁树德、李克俭、范元纪、任汉章等。教员主要由研究班同志上课。

### 十、第四期高训班

1942 年底到 1943 年中，又举办第四期高训班，地址在河北平山县吊儿村，后移至阜平县白叉。教员仍为研究班同志，学员约 100 人，如周明远、李砚田等。



## 十一、第五期高训班

1943年春至1943年7月，军区又举办了第五期高训班。地址在阜平县炭灰铺。负责人旷泉吉、队长任汉章，教员仍为研究班学员。学员有30人，分为两个班，如王克俨、洪惠、杨华、贾力、刘树勋、池龙（池大昌）、张志廉、王世光（王伟）、贺明生、段世勤（燕军）、崔凯等。

自1941年第五期以后，军区以主要精力提高报务员水平，所以未再办无线电训练班。在日本快投降时，军区又举办第六期。第五、六期相隔时间较长。

## 十二、第六期

1945年3月至1945年9月，在河北阜平县双庙举办第六期电训队，8月张家口解放，电训队随军区迁至察哈尔省重镇张家口。这一期由军区通信处教育科副科长韩克树负责。训练队队长周石夫，指导员楚明远，教务主任林爽。学员108人，编为两个队，已知的学员有：王守敏（女）、王锦书、陶章、孟学华、刘义林、培宁、贺景跃、杨彦、马凤竹、苏敏、苏志刚、王志华、石岚、左继、沈默、王树明、张广华、田果、马春亭、沙菲、沙莉、裴振谦、张彦芬、臧进、鲁长城、李文生、苏毅、林亭、刘哲（女）、杨光远、赵清、赵昂、刘宝贵、史民、史建民、范贻文、王振英、田玉华（田杰）、王水清（女）、齐玉琴（女）、安金屏（女）、侯钟其（女）、张庚云（女）、张俊英（女）、刘允生、刘双振、刘其光、朱志洪、张进刚、崔占元、王秀清、刘兰谱、黎光等。

## 十三、第七期

1945年11月，在察哈尔省张家口举办了第七期。队长周石夫，教导员甘霖，政治干事陶章，总务股长高玉林。学员分3个队，一、二队是部队保送及从地方招收的，第三队是为边区政府代培的。当时边区政府需要报务人员，经钟夫翔同志批准为之代培报务员，政府给电训队一些小米作为补助。学员班设专职队长，队长有孟学华等，当时也叫主任教员，他们负责管理学员，也担任一部分教学任务。报务队共有学员100余人。因傅作义部队进攻张家口，训练队撤至涞源县，1946年7月在三甲村毕业。

在第七期还有一个机务班，学员大部分是从平津来到解放区的大学、高中学生。学生陆续到校，所以边等学员边上课，由军区通信处教育科正副科长韩克树、林爽上课，韩克树教机械制图、高等教学。学员共10余人，有林天一、黄岩、王兴、王蕴文、戈焰、江杉、康海、张英、吴友、石磊、严廷等。1946年6月，傅作义准备进攻张家口，机务班没有学完就提前毕业，分配工作。

1946年夏，准备招收第八期，周石夫带领人员去招生，在冀中解放区招收一批学员，有高小、初中学生，也有少数从平津到解放区的大学生。新招到的学生从涿鹿马军庄出发，先到涞源县的三甲村，与张家口撤出的电训队人员会合，后到了阜平县上下店，报务队住张家湾，机务队住上下店，后改为晋察冀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钟夫翔同志在回忆中说：“平型关大战后，聂总率部开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我被调到了军区司令部。司令部的三科是通信科，科长是刘彬。晋察冀的通信工作，开始时无线电通信与有线电通信是分开的，各成系统。晋察冀与晋绥是一个无线电大队，尤静轩是大队长，我是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长。晋察冀军区开始只有3个电台（记得不准确）：北方局一个台，骑兵团一个台，军区司令部一个台。通信业务都由军区中队负责，我是军区司令部电台队长，报务员是肖永昌、冯国寿、任汉章（他是五台山时从阎锡山部队电台来的），还有两个见习员叫鲜才文、李桂生，盛钧是机务员。”

“根据地迅速扩大，形势发展很快，电台也随之增加，报务员奇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冬，一到阜平就组织了第一期训练班，共36人，训练内容主要是报务，时间约3个月。1938年1月（或2月），敌飞机轰炸阜平，我们转移到五台县金刚库，学员就毕业了，分配到各电台实习。周石夫、韩克树、孙定邦等都是这一期的，以后都是骨干了。接着就办了第二期叫训练队，有50多名学员，其中有梁健、闵长生等，训练时间约半年。1939年办的第三期，开始是北方局组织办的，后来移交给我们，共100余学员，文化程度比较高，大部分是从抗大二分校调来的学生。从这期开始有了女报务员，记得有时原、贡军波、苏景、武萍等。晋察冀的无线电通信发展得比较快，冀中也有个无线电中队，刘文粟任队长，江文任政委。冀中也办了训练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北京大学逃出4个外国人，他们是英国人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他们到了根据地，当时还不能去延

安，聂总对他们懂无线电很重视，就利用他们的学识办了高级班。由王仕光同志负责组织教学工作，林迈可、班威廉都亲自任教，学员有林爽、韩克树、郭超凡、吕进、刘兆生等同志。”

“关于器材的来源，一是缴获，二是收购商人从平津偷运出来的，他们为了钱，我们为了用，价格要贵一点就是了。另外，我们自己搞一点，主要是手摇马达、哈特莱发报机、再生式收报机。搞生产的机务员最早的是盛钧。日本投降，我军进驻到张家口，延安派来了傅英豪、唐旦夫妇，林中等，专门搞小的无线电收发报话机。1946年以后，从北平进的器材多一些。在张家口，我们开了个亚洲无线电公司（电料行），专门利用商人从平津购买器材，一些小商人偷着带出来的各种电子管等器材。1946年3月，利用北平军调处的飞机，我同傅英豪到北平当时我军的军调处驻北平办事处（当时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负责），我们在北平买了一部分器材，从多方面想办法，较好地解决了通信器材的供给。”

“关于机报人员的来源，从延安派来的有8名，他们是吕进、张志廉、郭超凡、宋玉生（女）、何轰等。陈云东、梁骥、龚兴贵等是随部队过来的，也从北平来了一部分大学生。”

“北岳地区的有线电通信是不错的，刘彬对有线电话抓得很紧，还有一个从山西太原过来的人叫赵德，是专门搞电话的，他是内行。所以三科抓有线电通信、步骑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等都比较有条理。当时，三科的参谋有刘荡、刘尚华、王坦、赵德等。”

“孙毅同志任军区参谋长时，对电台的联络情况很重视。有一次（1938年或1939年）总部来说，日军企图围歼王震的三五九旅，要电告他们在早晨在3点钟以前离开驻地，聂司令员也不时来电话问‘电报发出了没有’，他很着急。孙参谋长一直盯着我，并说电报一定要发出去！当时是报务员值班，我这个队长在旁边听着。黎东汉在三五九旅的电台，他一直和所属各团通报，我们叫，他不应，他们通完报，立即走了，报没有发出去。参谋长可着急了，我说，‘这没办法，每分钟都在听他，叫他也不答应，什么时间与谁通报都有记录’。第二天三五九旅发来了电报，知道他们得到了情报安全转移了。孙参谋长对我说：‘钟夫翔呀，真危险啊，那份电报发不出去，三五九旅若受了损失，要掉脑袋的。’这个问题，我们每秒钟都在注意不放松，是绝对负责的，情况十分明了，事后孙参谋长表示信任。”

“日本投降后，我军进驻张家口，这时通信科改称通信联络处，已

经包括无线、有线和其他通信手段，无线电大队就不存在了。”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的通信工作，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领导重视，二是主管通信的负责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首先是领导，特别是聂荣臻司令员对通信工作很重视。如一开始成立晋察冀军区时，他想到今后发展的趋势，必然要建立很多电台，人员如何解决呢？靠上级送来吗？上级也没有，而且还有敌人的封锁，即使送也困难。因此，只有自己培养报务人员，这是当务之急。为此，我们提出立即招生举办无线电训练班的意见，马上就得到批准。当时困难是很大的，没有技术人员。那时只有一个电台，我是队长，还有两个报务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我们三个人，除了完成通信工作外，还必须担负起培训报务员的任务。第一期毕业后，将韩克树等同志留队工作并担任了第二期领导和教学，就这样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到第三期，由于晋绥的训练班合并过来，教学人员充实了，训练班更健全了，这期的学员素质有所提高，毕业后可以说在晋察冀的无线电通信方面，随时可以成立电台，随时可以派出无线电通信人员，这时已由被动转到主动了。”

“第二个问题是有了领导的重视，还要有主管部门负责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但要完成当前的通信工作任务，同时又必须考虑发展的需要，提出发展计划并付诸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不致处在被动地位。这不仅是过去的经验，而且也适应今后的任何工作需要。”

周石夫同志在回忆中说：“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培训，晋察冀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是1937年9月或10月间在河北阜平县城开办的。本期共有学员22-24名，主要来自北岳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部）也来了几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同年11月到的。训练队队长是钟夫翔同志兼，当时钟夫翔同志是电台大队的副大队长兼北岳区电台中队长和军区八分队（电台番号）队长。指导员是梁达三同志（现不知去向），以后又换了一个姓赖的同志，还有一个忘记是谁了。报务教员有解振兴（他是从阎锡山旧军队来的），钟夫翔同志有时也上课，电学教员是张锦文同志（已故），政治教员由梁达三兼任。学员有王道利、尚荣久、顾立达、徐海滨、商祯祥（已故）、韩克树（已故）、孙定邦等。当时因日寇分九路大扫荡，训练队于1938年3月迁移至五台县金刚库，不久就毕业了。我因同年大约2月初就调到八分队工作，所以未毕业。

以后我又调到三分区 28 分队和旷泉吉同志一起工作。第二期无线电训练队是 1938 年 5、6 月间在五台县金刚库举办的，韩克树任教务主任并兼教电学课，除张锦文到地方工作外，其他人员未变。本期学员共约二三十人，其中有张俊生、闵长生、李砚田等，本期到年底毕业。第三期无线电训练队是在唐县姜家沟举办的。韩克树仍任教务主任，学员约 100 余人，常家明就是本期学员，时间是在 1939 年 3 月至同年 8 月。第四期、第五期的情况记不清了，就不谈了。第六期无线电训练队是 1944 年 10 月左右在阜平双庙村举办的。这一期我是队长，指导员是楚明远，教务主任是林爽并兼教电学课，报务教员有邓宗福、电学教员张锦文（是从他家里请回来的），当时任三科教育股长的韩克树也住队上课。六期训练队是分两个队进行的，一队是 1944 年 10 月间开始，于 1945 年在张家口毕业的。该队编有 6 个班，每班 12—13 人，其中学员有陶章、石岚、杨彦、王锦书、贺景耀、裴宁、刘茂林、谷禹舜、田果、孟学化、王树明等。二队是 1945 年 3 月开的课，同年 11 月底在张家口毕业。该队也是编 6 个班，每班约 12 人，其中学员有田杰、苏明、黎光、杨光远等。第七期以后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办的了，属解放战争时期了。”

“高训班的培训情况：第一期高训班是 1939 年 4 月左右在唐县姜家沟举办的，学员主要是电台分队长以上的通信干部，还有第三期无线电训练队的优秀学员，共三四十人。学期为两个半月，于同年大约 6、7 月份毕业。负责人是钟夫翔同志兼，教员有韩克树、张滨，我和阎钧、常家明都是本期学员。高训班的课程有政治（哲学）、机务（理论基础、装机和检修）。第二期高训班是 1940 年办的，负责人、教员和课程同第一期，刘文粟同志也参加了这期学习。第三期高训班是 1941 年举办的，负责人仍是钟夫翔同志，学员有林爽、张滨、王仕光等。课程内容主要是讲主振放大、电子交联式发报机和外差式收报机，并讲了一些电学基础课。学期为半年。参加的学员有 40—50 人，陈子萍同志参加了这一期。”

孙定邦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于 1937 年 11 月初在河北省阜平县参加过无线电通信技术训练，是学习班第一期学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收发无线电报技术，同时讲一点机务知识，上一点政治课。因战争需要，学习时间只有两个多月，而纯学习的时间，我记得只有 46 个学习日，大概在 1938 年 2 月前后就出来工作了。当时学习条件很差，师资缺少，器材设备奇缺，只有少量自己制造的电键和一两部哈特莱式的破旧

机器。”

“无线电学习班的领导成员，我记起来的有以下同志：钟夫翔（八分队电台队长兼学习班的主要领导），解振兴（教员，教报务，在回延安途中不幸牺牲），梁达三（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和政治课），盛钧（机务员，收发报机的技术指导，已故），任汉章（电台报务员，有时给学员上收发报课，现在北京），商祯祥（在冀中工作，已故）。学员有20余名，准确数字记不清了，经回忆起来的有以下人员：韩克树（西安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黄霖、徐海滨（在西安），李祥生（已故），尚荣久（在北京），孙芳如、孙贤民（学习班结束后工作中怕艰苦离队回家），杨培基（武汉通信学院副院长，离休回京），安松芳、张永宁（抗战后期脱离队伍到敌占区），王道力（航天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臧本律、周石夫（总参通信兵部），顾立达、张志廉、李志达（改行在部队做政治工作），王绶文（听说已故），张志强（已故），阎云山（在济南工作，已故），郝永志。”

张志廉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39年5月从延安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八分队的（司令部住唐县张各庄，八分队住葛公）。当时晋察冀正在办第三期无线电训练队，由教务主任韩克树负责。教员有解振兴，指导员是刘常珍。主要训练内容：报务、机务、政治三门课。训练队开始住阜平县的瓦炸地，后来于6月份与军区共同移防，军区司令部住唐县和家庄，我们八分队和训练队共住唐县姜家沟。我曾给训练队上过收发报课。那时学习条件是艰苦的，上课用的桌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抄报纸用的多数是麻刀纸，要求两面都用完。练习发报电键不够，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和大拇指上练。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涨，文化生活也很活跃。”

“1942年夏天，晋察冀军区在阜平的白叉办了一期机务训练班，时间约6个月，训练内容有电学、数学和英语，学员都是从在职的机务人员抽调的，这期人数约30多人，分成3个行政班。队长由旷泉吉兼，具体由韩克树负责，教员是由研究组的同志担任，记得有金鑫、林爽、刘兆生、赵干清、潘家晋、张宾、雷振武、肖芳等。学员有：贾秋长、白奇、李文元、李政、何锦生、何彦琛、白中元、赵存义、刘造志、张浩善、张志廉等。据说贾秋长在总后勤部。”

王克俨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于1939年5月由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调到军区无线电训练队学习。原定送我们到延安通信学校学习，后因日寇对山西同蒲铁路封锁很紧，无法过路，才决定留在军区无线电训练队学

习，当时军区第三期训练队正在训练中，我们单独编了一个班随三期学习，比他们晚毕业几个月，晋察冀军区报务界习惯称我们是‘三期半’。训练内容主要学习收发电报，另外，还学习政治、英文、机务课等。学习条件是艰苦的，练习收发电报振荡器都很少，每个班发给一个电键进行练习，用老乡锅底的烟灰涂在墙上做黑板，把电阻丝钉在菜板上做‘电桥’实验，学习用纸是糊窗户的纸或将旧账本反面写字，夜间没有灯，就在月光下背英文。但学习情绪都很高，技术进步也比较快，只有半年的时间，就分配到电台去见习收发电报了。我们是第三期9班。训练队长是钟夫翔同志（原在邮电部工作），教务主任是韩克树同志（已病故）。当时9班的同学，现知的有陈子萍、王俊义、魏席人、郝相琴。”

林一天同志在回忆中说：“我1941年考入清华大学，后来又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以后又到上海学政治经济学。1945年回到北京，正好碰上中学时一位进步同学，我们一起到了解放区张家口。1945年12月我们到张家口电训队时，正在办报务班。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解放了不少中小城市，还有个别大城市，战争也逐渐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方向发展。除需要越来越多的报务人员外，也需一定数量的机务人员，修理维护收发报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6年3月，机务班开学上课了。该班有学员仅20多人，都是从北平出来的青年学生，有初中程度的，个别的读过大学。韩克树教机械制图和数学，林爽教无线电原理和辅导装调收发报机，他们都很会讲课，教学效果很好。电训队机务班的教学条件是很差的，但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法。比如制图课，就像小学生练字一样练习写工程字和制图，机械制图的实习内容是用马口铁焊制饭碗、水桶、脸盆。制出来的东西，评分后发给每个人或小组使用。无线电原理的实习就更加重视了，装配调试收发报机，收报机主要是三管自差式和管灯调整高放式的。而发报机是单管的哈特来式和两管的主振放大式。机务班上课3个月，就要撤离张家口，1946年6月底，向晋察冀边区疏散。电训队在6月间，大队人马向河北西部山区阜平疏散，仅留下机务班的男学员，由军区通信联络处教育科副科长林爽带领，转移到距张家口20华里的宁远堡，那里有解放区最大的新华广播电台，这个电台输出功率有10千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集中台，有七八部发报机，都是输出功率较大的，有50瓦、100瓦的，还有100瓦以上的。机务班到这里，一是为了实习，二是为了辅助转移。1946年‘七一’，由台长老红军赵洪政给我们讲长征历史。‘七一’以后林爽同

志给电台讲课。不久时局更为紧张，机务班学员一个个都押运器材走了，到8月份连林爽在内只剩下三四个人了。1946年10月11日上午，国民党飞机（B-24）开始轰炸，我们赶紧把最后能运走的器材装车运走，只剩下我和林爽。在黄昏时，我们将三四桶汽油倾倒在住地，随即点燃，然后奔向阜平县。我们不断回头，向宁远堡看去，浓烟滚滚，半边天都是红的……从宁远到阜平县，需要20天的路程。我们到阜平时，电训队的人员早已安营扎寨了。我们机务班的同志都分配工作，只剩下我和王蕴文同志留在电专工作。”

## 第二节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组（班）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地区不少文化水平较高的革命青年，陆续来到解放区。聂荣臻同志为了发挥这些同志的作用，决定在军区司令部三科设无线电研究组，由三科长钟夫翔同志直接筹建。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这个研究组后来办成研究班，集中了晋察冀地区的优秀的技术人才，他们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研究班，也是当时解放区最早的一所无线电工程教育与研究单位。

1940年年底，军区通知各分区，抽调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到司令部报到，1941年3月研究组正式成立，地点即在司令部所在地的阜平县，与当时军区所办的无线电训练队住在一起。研究组由钟夫翔同志亲自领导，到1941年底共有11人，设组长与副组长，分别由张宾、林爽同志担任。成员有刘兆生、常家明、潘家晋、张中甫、赵干青、史铁夫、刘坚、崔清吉、雷振武。研究组成立后，这些同志有的是在清华大学、齐鲁大学等校读过书的大学生，有的是高中学生，有的已从事电讯工作几年，有的还没有接触过无线电通信工作。因此在开始时，不可能承担研究项目，当时主要任务是参加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此外办一个油印小报（月刊）回答各电台提出的问题，还在无线电训练队兼任课程，如物理、数学、电工学等。

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驻在平津的英美领事馆人员撤离，大批侨民仓皇回国。就在日本对英美宣战的当天，日军封锁了燕京大学，燕大物理系主任班威廉（William Band）和夫人及经济系导师林迈可（Mical Lindsay）和夫人，在地下党员肖田同志的掩护下逃出燕大到晋察冀解放区。他们两人都是英国人（后加入美



籍),林还是业余无线电专家。当时还有法国记者、荷兰商人、美国资本家等,都到解放区。聂荣臻同志专门布置了院落,请了会做西餐的厨师、会讲外语的翻译接待他们。这些外国人都将转道经中国香港回国。但是聂荣臻同志特意挽留了班、林两位外国朋友,请他们协助开展研究工作。班已在燕大从教十多年,当时正在进行超低温物理的研究工作,林对无线电设备的装修也有一定研究,经聂荣臻同志的耐心工作,他们同意留在解放区。军区将王仕光同志调到军区司令部,这时也留在研究组,电训队教务主任韩克树同志也参加了研究组,总共11人。其中,王仕光同志担任班、林的助手。不久又从军区和边区政府调来顾宗直、吕进、郭超凡、张锦文、李雪、郑凯、李健民7人。1943年春,八路军总部、晋鲁豫军区听说晋察冀办了研究班,也派韩黎、吴本毅、吴立中、张芝荪、刘一清5人参加。他们远路从总部所在地山西左权县麻田,通过敌人封锁线到了阜平县,聂荣臻同志听说他们来学习,亲自接见他们,并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此外有平西来的金鑫同志。这样,先后在研究班学习过的有26人,其中有的同志因工作需要,中途调离工作,基本坚持到底的18人。到1943年年底,又有5人调往延安或其他工作岗位。

学员因到校时间不一,水平不同,所以编为甲、乙班,甲班由班、林两人直接用英语讲课,参加学习的有王仕光、韩克树、林爽、金鑫、张中甫、张宾、刘坚、常家明8人。潘家晋、刘兆生、赵干青、吴立中4人,有时参加甲班学习,有时参加乙班学习。参加乙班学习的有韩黎、刘一青、吴本毅、张芝荪、史铁夫、崔清吉等。

研究班又称高级班,所学的课程是:甲乙班共同必修课为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交流及高频)和无线电工程学4门课。选修课有高等微积分(即数学分析)、高等电磁学、光学、天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每人选学1-2门。量子论、相对论仅开个头没有讲完。所用的课本有斯坦福大学特孟(F. E. Terman)教授所著《无线电工程》、《无线电手册》(“RADIO” HAND BOOK)。数学分析使用《ADVANCED CALCULUS》(William. F. Osgood,《高频电子线路》、《光学》等都是班威廉编写的教材,用他自己所带的英文打字机打出,供同学使用。乙班的同志不能直接听英语讲课,一般由王仕光同志整理出笔记并译成中文,由张中甫、史铁夫同志印成讲义,并由甲班同志给乙班同志讲课及辅导。张中甫、史铁夫同志写一笔好字,油印出的书如同铅印教材。韩克树、林爽等同志,虽然自己要听课,但仍然抽出时间辅助乙班

同志，受到乙班同志的欢迎。

成 绩 表

(班用英文打字，译为中文)

学生姓名	必 修 课				选 修 课				说 明
	大学物理	微积分	交流电及高频电路	数学分析	高等电磁学	光学	天线理论		
张中甫	B	C	—						A + 特优 A 优秀完全掌握问题
赵干青	C	C	C						
金鑫	B	A +	B	A					B 很好高于一般学生的水平 C 大学一般水平
韩克树	A	A	B						
林爽	A	A	A		A				
潘家晋	A	B	A						
王仕光	A	—	A +				A		
吴立中	—	—	A						

班威廉 (签字)  
1943 年

同志们紧张学习，班、林严格要求，有周考、月考、期终考，他对每个人的学习情况都做出评语。同学们除了吃饭、睡觉及晚饭后散步外，全部时间用于学习。1942—1944 年，正是日寇大扫荡的年月，在反扫荡的行军中，只要是下午宿营，第二天照常上课。学生学习成绩越好，班、林教得越起劲。班在回忆中说：“可以比较任何第一流的大学的成绩，毫无愧色。”“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平。”班的评价并不夸张，在 1941 年左右，天线工程、相对论、量子论、数学分析等，能开出这些课程的大学，在国内是不多的，在燕大从教十多年的班先生，他是倾心使出所有的能力来教育这些学生的。上面摘录的是成绩登记表的一部分，下面是班先生给学生的部分评语。

评语 (译为中文)

张中甫和赵干青：现在课程的进度对他们两人来说是太快了，如果按正常速度两年，他们一定能在所学课程上达到大学生的一般水平。他们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克服所遇到的困难。

金鑫：很有条理，从头到尾掌握所学课程，在今后的继续学习中应继续努力。

韩克树：他可以学得更好些，经常在一些关键性的小问题上粗心大意。他对问题的理解是十分透彻的。

林爽：太急躁并且经常发生一些错误，这样使他难免用更多时间去写作业。他在作业的整洁程度上有了一些进步，但仍然出现不整洁的现象。他对问题的理解同样是十分透彻的。

刘兆生：他的成绩可以更好些，因为身体有病，课程没有学完。非常整洁和有条理。

潘家晋：因为他缺了6个月的课，他必须更加努力做功课。非常刻苦和热心。

班威廉（签名）

1943年5月30日

从评语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化程度略低的同志是鼓励的，对学习成绩好的是严格要求的，这也许是一些老教师的共同特点吧！

研究班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生活是十分愉快的，学习是紧张的。学员每人一个背包，吃饭时8个人一盆盐水萝卜丝，吃的是黑豆、高粱、玉米，学员经常到几十里外去背粮，有时一个人背50多斤，还要背木头到煤矿去换煤。学员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上“蝇头”小字。班威廉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房子是被敌人烧过的，经过他们自己动手修筑起来。教室屋顶是用木板搭成的，涂上一层泥土，遇到下雨，至少有20处漏水。没有课桌，就坐在板凳或树根上，前面做个土桩，搭上木板，就好写字。墙上有个洞，就算窗子。他们每人自己背着被服、牙刷、饭碗、一套替换的衣服和一双布鞋。另外有一匹骡子负责全部家具——一台油印机，一些纸，锅子，铲刀等。他们的纸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新闻纸。所有粉笔、铅笔、墨水、钢笔等都是战争的胜利品。”“猪和鸡，驴儿和石磨，还有一个老太婆，她常坐在教室门槛上，用两手把麻搓成绳子。”这一段话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学习与生活情况。

为了照顾这几个外国朋友（班夫妇都是英国人，班夫人在燕京大学教英语；林的夫人李效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并与林结婚），由厨师专门给他们做饭，但他们的生活比在北京艰苦多了。班夫人经常自己缝补衣服，自己做饭，每年圣诞节，他们请同学到他们家做客，师生关系亲密无间。

这两位外国朋友一到解放区，在脑海里就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战争还看不到任何胜利的艰苦年代，在深山沟办研究班？为什么这些青年放弃在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到这里来学习？在燕大教课，看到那些学

生毕业后没有工作条件，报国无门，难道在这穷乡僻壤还有什么用处？所以他一边教学，一边调查研究，他考察了每个学员的身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还和一个放羊的家庭结为干亲，经常去串门。同学们晚饭后陪他们散步，也了解他们的身世。班当时每天记录了解的情况，起名叫“龙牙”（Dragon Teeth），后来回国后出版了一本书《Two years with Chinese Communists》。1950年我们翻译为《新西行漫记》，在国内出版。他在书中说，他带着这些问题去问聂将军，聂荣臻同志对他说：“八路军不单是个战斗部队，实际是一个初步教育单位，目的在于领导人民走上文化建设的大路，所以在整个部队里就有决定性的政策，要求每个同志利用每一分钟来学习一切各种建设技能。”聂司令员的讲解，使他懂得了共产党八路军不仅是一个武装集团，根本目的是领导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班通过与学生的谈话，了解了学生参加革命的目的，知道他们是为理想而献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而自愿放弃优越生活条件投身革命的。班深有感慨地说：“你假如和贫苦的农民住上几年工夫，吃过同样的粮食，睡在同一茅舍之中，就可以完全了解这些游击队青年在深山中攻读高、中级科学的目的。”他以极高的评价，称赞这些研究班的青年。

研究班从1941年成立，1941年3月开学，并由班、林教课，到1943年冬，班的身体十分衰弱，由军区派部队送他们到延安，后来转道重庆回国。林迈克继续留在研究班教课，直到1944年4月，讲完无线电工程课以后，也由军区派部队护送到延安。但在通过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为了保护林能安全脱险，护送他们夫妇的一个班的战士英勇牺牲了，军区命名该班为“国际班”。林到延安后，又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经重庆回国。全国解放后，林曾多次来中国访问。

这两位外国朋友离开晋察冀以后，研究班又继续学习和开展研究工作，直到1944年底才陆续分配了工作。王仕光与晋冀鲁豫军区来的同志到太行地区，常家明、刘兆生、潘家晋、史铁夫、赵干青、金鑫分别到各军分区去了。韩克树、林爽留在军区从事教育工作。

这个研究班除了学习外，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为改装通信装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主要成绩是：第一，建立波长曲线表。过去电台的波长刻在度盘上，当使用波长变动较大时，就要带上台到军区校对一次，自从发给波长曲线表以后，解决了这一困难。第二，改进发射机。原来的电台由哈特莱式振荡器直接输出，电子管是直热式的，频率不稳，天线受风吹动，频率也随之变动，输出效率低，输出功率若

调得过大则停振，发射机停止工作。后来在林迈克的指导下，主要由王仕光同志带领大家完成了改装的任务。将哈特莱电路改为主振式放大电路。开始时用缴获日军的石英片做振荡，但石英片数量不够，后来用6V6、6L6管子改用电子耦合式电路，电子流是受帘栅电压控制的，负荷对振荡器无影响。同时对天线也做了改进，采用Ⅱ式天线，并调整线圈抽头，解决天线匹配问题。开始部队对这种机器不会使用，于是军区在无线电训练队专设高级班，轮训电台台长、队长、报务主任，学习新机器的原理及调整方法，然后带着新机器回部队去使用。在决定改装通信设备问题上，钟夫翔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为了迅速装配出新式电台，对各原件的制作、电子管参数和输出功率等都列出公式和图表，拟定程序和规范，使电台的质量有了可靠的保证，王仕光同志对此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改进接收机，对当时使用的再生式的三管机，改为超外差式，有的将不可调整的高放式改为可调高放式而且进行低压实验，保证接收机在接近电能耗尽时还能维持工作，以节省电池。

关于这一段的情况，班威廉著有《新西行漫记》，林迈可著有《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内容翔实，因篇幅较长，这里不再引述。

林爽同志在回忆中说：“1941年春天，我刚从一分区三团调到分区司令部还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司令部的命令，要各分区调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军区司令部三科（即通信科）材料股无线电研究组报到，分区司令部决定叫我参加。我接到这个命令确实感到非常突然。虽然我早有想搞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夙愿，但怎能想到在敌后战斗的环境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还去进行研究工作呢？就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许多从敌占区流亡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国际友人，也对当时聂荣臻司令员的高瞻远瞩，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进行国家建设而培养人才的决策表示赞叹。”（见班威廉夫妇所著《新西行漫记》第84页）

“从1941年3月研究组成立起到年底，各分区调来参加无线电研究组的同志陆续到达，共11人。组长张宾同志，副组长林爽同志，成员有刘兆生、常家明、潘家晋、张中甫、赵干青、史铁夫、刘坚、崔清吉、雷振武9人。我们这些人有大学生、高中生，有在电台工作过的，也有根本没接触过无线电的。当时既没有导师也没有具体的研究课题。说实在的，那时就是给我们课题，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有点文化和有点理论知识的，却没有无线电的实践经验，而有点实践经

验的，又缺乏理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调查研究，学习无线电的理论和实践（参加无线电收发报装配的辅助工作）。调查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去解决。这时我们还办了一个油印的无线电月刊，从各分区电台征集稿件，我自己也撰写一些稿件，并在月刊上答复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个别同志不定期承担当时训练队高级班的物理课和数学课的教学任务，加上日常战斗（反扫荡）和劳动，生活还是蛮紧张的。这就是研究组初期的情况。”

“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有些国际友人在我党的帮助下从平津（地区）陆续逃出敌占区到了根据地。当时来到晋察冀的，有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教授和他的夫人。另外还有两个法国记者，一个美国银行资本家，一个德国资本家的女儿，一个荷兰商人和一个奥地利医生。聂司令员恳留他们，聂司令员邀请他们参观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参加边区的一些活动，并为他们创造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当时曾派人去平津收集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并收集一些大学教科书作为研究组教学之用。他们在聂司令员的盛情邀请下，欣然同意留在根据地做我们的导师给我们讲课。1942年3月之后，除研究组全体成员外，还扩大了一些同志参加学习。研究组除原来的11人外，又有陪林迈可先夫妇从平西到晋察冀的王仕光同志，在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教务主任的韩克树同志参加，这时研究组共13人。我们这些同志里，王仕光同志的水平最高。他到晋察冀军区后，担任三科的教育股长，在这次学习中实际担任了班威廉和林迈可先生的助手，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也很多。除王仕光、韩克树外，参加学习的还有当时在军区和边区政府里从事无线电工作的顾宗直、吕进、郭超凡、张锦文、李雪、郑凯、李建民等同志。这些从工作岗位上来参加学习的同志，因工作需要不久又陆续回工作岗位上去。在1943年年夏天，晋察鲁豫又派来5位同志参加学习（他们是韩黎、吴本毅、吴立中、张芝荪、刘一清同志）。此时研究组正式改称高级班。另外还有金鑫同志（来的时间比上述5位同志略早一些）。这样，前后共26人参加了高级班的学习。中途退出学习的除前面提到的7人外还有雷振武同志。其余18人基本上坚持到底，只是其中张宾、常家明、刘坚、张中甫、吴立本离开的稍早一点，他们在1943年年底前因工作或身体等原因先后离开了高级班，到工作岗位或去延安大后方。由于入学时间早晚不同或外语水平、文化水平的不一致，学习进度不能完全一样，于是分成甲乙两组。甲组由班、林先生直接授

课，并参加班、林先生的考试。乙组由王仕光、韩克树、林爽同志辅导，刘兆生同志是乙组的组长，他也给乙组进辅导。有8人只参加甲组的学习，即王仕光、韩克树、林爽、金鑫、张中甫、张宾、刘坚、常家明。另有4人既参加甲组学习也参加乙组学习，即刘兆生、潘家晋、赵干青、吴立中。还有6人只参加乙组学习，即韩黎、刘青、吴本毅、张芝荪、史铁夫、崔清吉。”

“学习课程是，必修课有大学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交流及高频）和无线电工程4门课程；选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参加选修课的共4人，即王仕光、韩克树、刘兆生、林爽。”

“学习的全部时间共用了两年。除在反扫荡的最紧张时刻外，都一直坚持上课。学习的进度比较快。因为这是党给我们的唯一任务，所以尽管我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基础课程已丢下三四年之久，但大家勤奋学习，成绩都是很好的。我们学习成绩越好，他们两位老师越高兴，就增添教学内容，加快教学进度。我们也总是努力跟上，从未要求放慢进度。这使班威廉教授深深感到惊异。他曾问我们：‘这么好的学生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国民党区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多这样好的学生？’后来他才知道，凡是到抗日根据地来的，都是为了追求真理的革命青年。学习的目的明确，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为了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建设而学。”

“班威廉教授为了更深入了解抗日民主根据地，经常在晚饭后约我们和他们夫妇一同散步。一方面锻炼和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一方面便于他们到群众中去，到农民家中去做调查研究，因为很自然，我们就是他们的翻译。交谈中有时也互相了解各自的身世。通过这样活动，彼此了解得更多了。他对根据地更多了解和喜爱，他们曾和一个放羊娃的家庭认了干亲，经常去串门。班威廉说，在他的童年时期，英国农民的生活也很苦，耕种的方式也很落后。他也曾谈到自己的身世，说他的家庭在英国算是比较苦的家庭，而在英国等级观念是很强的，只有贵族才有地位。他虽然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学位并已经成为教授，但在英国仍然受到排挤。他的论文在英国不给发表而是在美国发表。英国的各名牌大学不聘请他当教授。经常的谈心使我们师生的关系更融洽，在圣诞节时他请我们去做客。他对教我们这些学生很得意，尽量把知识传授给我们。”

“在两年的时间内，敌人进行了两次‘扫荡’，在反扫荡中我们也

坚持学习。在转移中的短暂驻留，只要第一天住下，第二天就开始学习。遇上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中挂上黑板上课。1943年反扫荡时，形势比较紧张，在敌机轰炸的干扰下，我们坚持在树林中上班威廉先生的最后几课。这次扫荡虽然环境比不上1941年那次艰苦，但对班威廉先生来说，比起他过去的大学教授生活来说就不知道要艰苦多少倍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在班威廉长期要求下，聂司令员就派部队护送他们去了延安，然后他们又取道重庆离开了中国。”

“班威廉教授在根据地的两年多时间里，每天都写了日记，对这一段的经历和调查的各种资料都做了详细记录。他说准备回国之后写一本书，取名《龙牙》。后来人们看到了这本书，书名叫《新西行漫记》。”

“林迈可先生比班威廉身体好些，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要强一些。他在反扫荡之后继续留在根据地给我们讲无线电工程，无线电是林迈可先生的业余爱好，他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他对改造晋察冀无线电台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并指导了这方面工作，对晋察冀军区电台的技术改造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1944年4月，我们的无线电工程课上完了，林迈可先生也要求回国，聂司令员又派了部队护送他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去延安总部，但在过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为了掩护林迈可先生平安通过，我们牺牲了一个班的优秀战士。以后林迈可先生在延安又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经重庆回国。全国解放后他曾多次来我国访问。”

王仕光同志在给电子史料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说：

#### 《当代中国电子工业》编辑部：

附上原七机部副部长林爽同志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写的一份关于晋察冀军区高级机务训练班的材料，请做为参考。这个班是军区聂司令员决定由各军分区抽调高中毕业的同志为学员，由燕京大学两位英籍教授讲课的一个训练高级‘机务工作者’而组建的，是抗日根据地办的类似大专性质的训练班。

林爽同志原为军区无线电大队研究组组长，研究组改为高级班后，一面参加学习，一面担负大学物理课的辅导。

韩克树同志（原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一面继续负责报务训练队教务工作，一面参加学习。

这篇回忆讲我是随两位教授到晋察冀的，这是他记错了。我原是晋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已决定调到太行十八集团军总部工



作，被聂司令员留下担任无线电大队教育股长，主持高级班工作，并担负无线电工程课辅导，组织学员生产学习。

王仕光

十月二十一日

刘兆生同志在回忆中说：“军区无线电研究组建立于1941年春。1943年初，外籍教授班威廉、林迈可为军区首长挽留，王仕光同志同时到达，直接加强了研究组的组织领导和学术指导，充实了军区无线电科技阵容，从此推进了电台收发设备的程式更新，并相应开展了技术推广教育。两位教授和大王（即王仕光）同志亲自授课和指导的研究组，在人员培养、技术改造和推广以及技术学风的传播等方面，都曾发挥了一定作用。”

“研究组的正式导师是班、林。班先生专讲高等数学和物理，着重讲授了有关无线电的理论，如电磁波理论——马克斯韦尔的电磁波方程等内容；林先生讲过电器件结构原理、接收机改进、主振放大发射机特点等具体技术问题。两位教授满怀国际友情，在敌后坚持两年，苦心编写讲义，热心讲课，使我们深受教益。对全组成员来说，真正的教师是本组的直接领导，林爽和王仕光同志，他们两位讲课或辅导都是采用同学间询问‘互助’的方式，称呼上是‘老林’和‘大王’，从不以‘长’字相称。”

“研究组学习的初期，当时的副组长兼学习组长老林同志辅导我们学习无线电基础，结合实习三管再生式接收机，这是本组新成员的入门必修课。除上课外还个别帮助，直到确实弄懂掌握为止。此后在更长时间内，老林担任组长或班长。为了让大家学好更复杂的收发报机，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对我们集中或个别地进行辅导。”

“‘大王’身为教育股长，负责牵头组织全大队的教育工作。在学习的后期，他利用军区仅有一本的特尔曼撰写的《无线电工程》做底本，亲自辅导我们系统学习，讲A类放大，结合讲接收机；讲B类放大，结合讲扩音器；讲C类放大，结合讲发射机。重点放在主振放大发射机的设计原理上，从技术设计到装配、调试完整地进行讲授并组织实习。他还把自己刚刚研究、设计、装调成功的6L6电子管耦合发射机的成套技术成果，全盘传授给全班同志，以及机关的机务人员。”

“1942—1944年春，我组跟随无线电大队部，前后驻过平山、阜平两县的5个村庄，各地都驻3个月以上。由南向北，山沟越钻越深，生活越来越苦，办法却越来越多。”

“1. 第一个驻地石古洞村。在这里研究组新老成员和外籍导师大会合，组内的学习互助和各种兼职工作全面铺开，还有人数众多的电台干部高级班相邻共处，春夏间文化体育活动十分活跃，是研究组第一个兴旺时期。

经历一次扫荡威胁之后，秋季移驻几里以北的吊儿村。导师们满怀信心地评论性地说：‘大家学习很好。我们这里应当名副其实地称做‘吊儿大学’。’为尊重西方礼俗，圣诞节前军区首长情意深重地给两位教授赠送了慰问礼品，两位教授又举行茶话会和全组成员联欢，呈现了一派尊师爱生、好学上进的气氛。

入冬，开始节粮救济屡遭扫荡摧残的边区同胞。每天晚饭后到野外打柴以补助伙食，并定期外出背运粮柴以减轻群众负担。劳动多了，供给标准又降低，口粮短缺，有时饭不够吃，大家紧紧腰带就过去了。”

“2. 军区东南线日伪军大举蚕食，挖封锁沟，建碉堡步步进逼，并妄图奔袭军区机关。1943 年新年刚过，大队部搬进了瓦口西北角的小山沟——猪头沟，这里只住几户人家，我们的教室只能借用三圈，即羊圈、牛圈和驴圈。在此借到不足两间的老羊圈，虽是北房却无南窗，课堂的桌凳只能利用木板和原木等凑合搭成。

这时，野战军总部又派来吴本毅、韩黎等 5 位同志参加学习，人多了，学习劳动更热闹，学习互助组织更周密了。发生病号或赶上较闲的星期天，老的报务人员自愿拿出微薄的技术津贴补助病号或为大家改善伙食，也就是到山沟溪边挖些新鲜野菜，再买点羊肉，由手巧者烧一锅油多有肉的汤菜，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班先生夫妇在此和房东结了干亲，我们也参加了来往，军民关系十分融洽，这是我组的第二个兴旺时期。”

“3. 1943 年 4 月，经过两天行军路过灵寿到达阜平白叉村。只能找到一处旧的牛圈当教室。我组这时改称（机务工程）高级班。这里土地脊薄，产粮少，正闹春荒。新生杨柳树叶已被农民捋净吃光，正等新叶重生再捋吃一次。面对此情，机关全体同志一致同意更多节粮支援农民度荒，而我们自己也只有稀饭干菜糊口。很快夜盲症在众人中出现。随着气候转暖，吃上了自种鲜菜，同时军区领导又确定适当提高了我班粮食标准（提为战士标准，因为劳动背粮要求和战士同等），从此我班粮食基本够吃，再加吃到绿菜，十分厌人的夜盲症便迎刃解除，就此渡过一个难关。

但由于学习紧张，病号增多，有些同志闹疟疾，高烧头痛刚过，就马上投入学习。旷泉吉大队长不得不严肃地作队前批评：‘学习上的拼命主义是有害的，要不得的！’此后体弱多病同志才较为注意休息了，但谁都不轻易放过一点宝贵光阴。敌机频繁来袭，同志们习以为常，而两位导师却因惊扰使身体健康都受到影响。”

“4. 1943年，敌军又开始扫荡。初期，我班随北方分局机关行动，经阜平到繁峙、五台山一带，和敌军转圈子。带队的姚依林秘书长给我们讲时事形势，还介绍了‘大王’在天津租界办党的地下电台的故事，使我们深受感动。中期又改随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李志民部长行动，一天夜里，他亲自率领我们胜利地通过了一条危险的封锁线。后来，我们又回到大队部行列，在丛山峻岭间穿插转移，只要住下一两日即恢复上课学习，岩下、溪边随地都是我们的课堂。曾因敌军接近或包围而几度紧张危险，并安排过几种高度分散或深避山洞的应急方案，但在各位带队领导的沉着冷静和机智的现场指挥下，终于避开或绕过敌人，安全地度过了长达3个月的残酷扫荡，从中也进一步锻炼、考验了我班的每位学员。

事后得知，一支战斗部队为了掩护班威廉、林迈可一行摆脱敌军的凶恶追击，曾向敌人英勇冲杀，顽强阻击，许多优秀的战士光荣牺牲，出现了一个英雄集体——‘国际班’。”

“5. 敌军败退后，我们随大队部先回到原驻地白叉村，不久就移住沙河北的湾里村，仍借一间旧驴圈做教室。林先生和‘大王’讲授无线电工程到了后段的重要部分。这时劳动生产全面展开，种粮种菜，贩运百货，背运煤炭等，真是‘百业俱兴’！我班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上述行业差不多都干过。到20里外背煤，每次每人竟背回百斤以上，虽然劳动强度大，但从此肚子吃饱，健康好转，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这是我班的第三个兴旺时期。

1944年春，正式课逐门结束，胜利地完成了两年的难能可贵的技术学习，只可惜林先生继班先生之后要到大后方去了，‘大王’也奉命去路南总部机关工作，大家只好依依惜别。”

“6. 我班留下的人员一起转入材料股实习，间或到各直属电台检修机器。6月份，旷大队长带领一批机关干部（含我们全体实习人员），同军区一批机要干部一起进了分局党校（驻沙河北岸的栗园庄）作为党校第七队，开始了‘整风’‘审干’。10月份，整风结束，回到大部队。我们一个个愉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分头走上新的

岗位。”

林迈可在新中国成立后给高霭亭的一封信中说：“1942 年元旦我们到了肖克司令部。在那里我开始在他们的无线电台帮助工作。当我们到聂荣臻司令部时，他要求我留下来工作，并且任命我为军区通信部的技术顾问。我能够比较详细地告诉你的就是关于通信工作。我为军队上的技术人员上无线电课，并且到各分区司令部重建我们的通信装置。”

“我们的供应非常短缺，开始我们只有少数极简单的教科书。因此大部分教学工作只能从电学原理的第一个法则讲起。一次我们搞一个比较更为灵敏、选择性更强的接收机，以便同冀热地区通信，我们需要导出一个在超外差收音机中本机跟踪的公式。这个公式包括要解出三个三次联立方程式。我们集中了晋察冀数学人才从事这个工作，最后得到答案。当我们在 1943 年终于得到了一本特尔曼（Terman）的《无线电工程》时，我发现我们的公式是正确的，只是非常复杂。幸亏我从燕京带出来一个万能表和计算尺，这是在晋察冀绝无仅有的。通信部里存着一些无线电元件，我发现还有其他存货。无线电工程学习班中的一个学员，提到在他工作的单位里有一批他们储存的电子管和其他物资。但是当时我们大部分还是依靠从日本占领的城市里能够买到并且偷运出来的东西。我们还从拆卸缴获的日本装置中弄到一些元器件。日本人用的那种电台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的频率范围很窄。他们的微安表和射频电流表是很好的，同时收信管也是可用的。但是，发射管不能用，因为他们的真空度不好。我们唯一的能源是手摇发电机，如果把低压输出定为 6.3 伏做灯丝加热电压，高压为 450 伏，美国管子能受这样的高压，而日本管子则要起辉。我们把接收机的输出功率管作为发射机的管子用，最好是 6L6，但是，当时这种管子我们很少，我们仍要用灯丝电压为 5 伏的老三极管。”

“我的主要工作是用新的设计改造所有的无线电装置，老机器又重又大。发射机使用的是频率稳定性很差的哈特莱振荡器，我用一个主振荡器改造它们，在输出线圈上用抽头的办法调整功率放大器与天线负载的匹配。我们做出了一些比老电台又小又轻的电台，来自农村的木匠为我们做木箱。我们用一个电阻负载和日本的射频电流表估算出天线输出功率约为 20 瓦。我们使它们的频率范围尽可能宽，因为高频带适用于白天、远距离，低频带适用于近距离和夜间通信。我们最好的机器可以从 10 兆赫到 25 兆赫（几乎每个电台都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必须使用我

们能拿到手的一致性很差的元器件)。”

“我们没有改变具有反馈的栅漏检波器和一个变压器耦合的低频放大器的接收机线路，但是我们把接收机做得小多了，甚至比新的发射机还小。除了我搞的微型机以外，所有的管子都是30S。”

“当我们制造电子管插座时，我们在精确钻孔上遇到过一些困难。当有紧急任务并且要在天黑以后工作时，在只有半支烛光亮的植物油灯下工作是很不方便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并没有因为缺乏工具而停止不前。”

“到1943年年底，我们在装配新的电台中，把所有的元器件几乎全部用完，而且我已经给一些具有一定数学基础的人们上了无线电工程课。所以我们在1944年5月转到了延安。在那里我设计了发射机和定向天线，使得新华社发出的资料在美国都可以看到。他们曾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最大的发射管只能给出600瓦。我认为用一个窄波束的定向天线，这些功率是足够用的。我很幸运地曾经从特尔曼的书里把这个设计公式抄录下来。从此后，我担任了新华社英语服务部的顾问。”

“我们在1983年再到中国时，肖克将军告诉我，在国内战争中，新式的晋察冀无线电电台工作得很好。但我非常高兴的是，知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学习班的一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通信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来了，如梁骥、王仕光、钟夫翔、旷泉吉、江文、林爽等。”

肖田同志在回忆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在燕大管理发电工作，在管理发电的同时搞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我在机器房是技工，管理机房的设备及全校电机设备。1941年日本西苑宪兵队将我逮捕，追查1939年带几个外国人到何处去。我假称我是基督教徒去山西太谷教堂传教（实际未去），后来关押了一个时期把我放了。一天，我认识的一个宪兵队的翻译说：‘日本要和美国打仗了，并且要千万保密。’我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党组织，也告诉了司徒雷登。但司徒雷登不相信，认为日本不敢和美国打仗。我又找了林迈可等人谈了这个情况，林迈可相信了。我给他准备了一辆汽车，三支手枪和一些子弹。12月8日6点，我们在广播里听到美国和日本打仗的消息，马上把汽车送到林迈可的住宅，让他离开燕大。在这同时我查看了4个校门，发现只有东门没人把守，我让林迈可、班威廉及他们的夫人赶快从东门逃走。他们出走大约有一刻钟后，东门也被敌人把守了，全校戒严，禁止所有人出入。日本宪兵涌向燕大各处搜查，敌人首先到林迈可的住处搜查，发现已没人，

就到我的住处问我林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们林在我这里租了汽车找国民党去了。”

潘家晋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42年10月才进入研究班的，我先在北平游击区做地方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分局分配到研究班学习，我去时课程已进行了不少，后来慢慢跟上来。开始住平山吊儿村，后来转移到猪头沟。我是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1937年离开北京，1937年秋一度进西南联大，5年以后又回到课堂学习，别有一番风味。课余闲暇时间，班和夫人同我们在林边散步，和大家关系融洽，大家对他也很尊重。当时他就在写日记，经常了解我们参加革命的情况，我见过他写的一些片段，他把林爽用英语写成‘Double Tree’，即‘双木林’的意思，他们的生活也是很简朴的，我记得看见班太太为班先生做针线活，补衣服，在她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外国‘顶针’。我从来没有学过无线电知识，也没搞过这方面工作，我记得在学习一段理论之后，林爽同志辅导我装收音机，对我来讲十分新鲜，甚至是很神奇的。1943年日寇大扫荡，我们研究班随晋察冀中央局机关一起行动，在繁峙县、五台山一带活动。我们得到中央分局领导的关怀。分局秘书长姚依林知道赵干青有病，亲自来看望，并叮嘱吃烤干的馒头可以改善症状。当时生活艰苦，春节时，大家吃一顿玉米面团子，就非常高兴。林爽同志还担任伙食委员，帮助伙房工作，对改善生活起了一定作用。”

阎玉湖同志在回忆中说：“1943年秋，日寇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扫荡，原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夫妇，由我部队保护，住在平山县（当时叫孟平县）一个叫‘木村’的村子里。敌人进攻木村时，为了掩护林夫妇安全撤出，我部队牺牲了一个班战士。后来晋察冀报登载消息，并誉为‘国际班’。不久林迈可便被护送到晋绥根据地，然后去延安了。”

### 第三节 冀热辽、冀热察地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一、冀热辽地区

1938年6月，宋时轮支队（一二〇师雁北支队）和邓华支队（原晋察冀一分区）合并组编为第四纵队，在宋时轮司令员、邓华政委率领下，自平西斋堂出发，向冀东地区挺进，配合冀东人民大起

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冀辽根据地。随四纵赴冀东的共5个电台分队，台长陈云东随宋时轮，分队长龚兴贵随邓华，分队长池龙随三十六大队，分队长黄启先随三十一大队，分队长宋运华随三十三大队行动。1938年7月，冀东人民在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同志领导下举行‘冀东人民起义’。冀东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这时老报务员需提高，更需要培养新的报务员。

1. 1942年11月，在迁（迁西）、遵（遵化）、兴（兴隆）地区，陈云东、吕进任教员，开办了第一期在职通信干部轮训班，学习无线电基础知识和收发报机修理技术。参加训练班的有郭峰、龙夏林、宫子涛、马继斯等。

2. 1942年12月，军分区在兴隆县东王石开办第一期报务员训练班，由陈云东、吕进任教员，学员有张森、王世忠、冯明、王俊甫、杜朴、张景福、史杰民、张云明、杨世春、魏永敏、张思德等15人左右。

1944年1月，根据总部指示，为了配合美国空军轰炸日寇军事目标，军区组成气象台。电台分队长曾绍光，每天向延安报告气象情况两次，直至抗战胜利。

3. 1944年6月，军分区决定在迁、遵、兴、丰地区举办第二期通信干部训练班，轮训电台队长和报务员，一方面整顿思想，一方面学习报务技术。由陈云东、李砚田任教员。学员有石磊、赵东升、赵尔昌、刘富、佟景刚、刘正德、冯树仁、张沛泽、毛义成、王日修等10余人，至8月轮训班结束。

4. 1945年5月，在迁西县正沟峪举办第二期报务训练班。吕进为负责人，刘兆生、顾立达、吉益华、杨林祥、黎光任教员。学员有黄立本、利华、高秉章、刘亚然、张玉琦、刘裕民、韩文科、苏方、李安、何春泉、东坡、路兆瑞、王瑞双、谢增昌、陈永发、王旭、赵国栋、冯伯奇、杨兆安、王贺民、任作民、吴昆章、叶芝祥、李志文、刘保民、赵贵信、刘金栋、卢光达等30人。1945年11月学员毕业。

5. 1945年8月，十七分区举办报务训练班，由队长李砚田负责，教员有刘富、毛义成。学员有宋印甫、张静波、梁志远、程童、赵文义、蒋石铭、朱志诚、钟兴、李景文、刘文进、张同华、贾运动等40余人。这一期到10月毕业，毕业时只有学员30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李运昌同志率冀热辽部队向辽宁、吉林进军。

6. 1945年10月,军区在玉田举办第三期报训班,队长张东升,政指徐立。教员刘兆生、黎光。学员有王占海、吴士友、卢增瑞、耿志民、邢玉山、谢文魁、张德林、刘春甲、郑崇峰、赵文义、钟兴、张思、左继良、李作辑、孟庆荣、王润兴,于学勋、陈道民、马聪、孙超、戴尚义、王树庭、马立龙、刘文连、冯天哲等50余人。

1945年12月,冀热辽军区同“东北民主联军”正式合并,并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

## 二、冀热察地区

冀热察地区电台四中队,为了培养无线电通信人员,于1941年初举办了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负责人为电台中队长梁骥,教务主任金鑫,教员有王仕光(教电子),金鑫(教英语),电台报务主任董林教报务,梁骥、黄启先、宋运华等有时也兼课。

学员30余人,都是从部队选调的,年龄在十六七岁,初中文化程度。学员有高健民、杨树林、刘珍、赵光、孙祖华等。

1941年9月,日寇对平西北区进行扫荡,训练班化整为零。12月底又集中学习,当年年底学员毕业。

## 第四节 冀中地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进攻,国民党军队则节节败退,向南溃逃。旧政权瓦解,社会一片混乱。中共保属特委(中共冀中区党委前身),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决定所属党员干部就地坚持武装斗争,随后在党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指导下,在高阳、涿县、定县、安国、无极等县开展抗日斗争。同时,一些土匪也各树旗帜,霸占一方,一时间“司令遍天下,指挥赛牛毛”。

1937年7月,驻石家庄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奉命在永定河一带抵抗日军,后按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团长吕正操率官兵2000余人,开到晋县小焦镇,10月14日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宣布取消六九一团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

1938年1月初,中共保属特委孟庆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肃宁县城宣布成立“河北游击军”。



1938年5月,根据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与冀中第一次党代会决定,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王平,副司令员孟庆山。当时司令部没有通信队,但只有一部电台,台长是刘文粟。

### 一、抗战初期冀中地区通信人员组成

抗战初期,通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六九一团的技术人员,有地方党组织介绍来的人员,有聘请来的人员。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冀中地区办了10期训练班,各分区也办了训练班,前进支队、区党委也办了训练班。直至抗战结束,共培养400多人。

#### 1. 六九一团的通信技术人员

人民自卫司令部设通信队,亦称通信营。下属3个连,其中两个有线连(徒步、骑兵通信),一个无线电连。无线电连有连长兼台长刘文粟,报务员哈文光、李景元、张逢荣,还有李庆章。收音排长周石夫,后为李文华,报务员宋子信,有线班长徐海滨。

电台的主要设备,发射机是日本制的双71号管发射机,收报机是三管30号再生收报机。

2. 经过党组织介绍,一些技术人员到部队工作。有张鸿烈、王化南等。

3. 从社会上招聘的技术人员,有何明生、景润身、田维壁、田维平、赵震晨、刘廷选、李文元、范荣绪、王寒、李雪、顾宗直、密材、密崎、韩重仁、孔祥南。

4. 上级派遣来的人员有江文(红军通校四期),1939年4月由一二〇师调冀中军区无线电二中队政委。张凯,延安通校11期毕业,1939年3月从一二〇师调冀中。杨杰,延安通校第二期毕业,1944年调到冀中军区。郭长波,延安通校第六期毕业,1939年调冀中军区。吴恒寿,延安通校第六期毕业。张合山,延安通校第七期毕业。匡钱升,延安通校第九期毕业。还有黄霖、马克丁等。

从晋察冀军区电训队第一期毕业的有郝永志、商祯祥、徐德安、孙方如、闵长生;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有李砚田、王广仁、刘国贤、郑殿贤、杨维夫、刘坤城、马振西、宋迎春、张树田。

晋察冀其他各期毕业的有王克俨、王俊义、王瑞祥、甄云太、张冠儒、李纪明、张树山、宋敬贤、张学让、王栋、张炳尧等。

## 二、成立无线电训练队，培训通信技术干部

1938年以后，冀中抗日工作迅速展开，从1937年到1938年上半年，建立了数万武装，各地急需电台。1938年4月，在延平县子文镇正式成立冀中军区无线电训练队。

无线电训练队的宗旨是：紧跟形势，以短期突击方式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能的报务技术干部。

训练队的领导人：一是由无线电中队领导兼任的，如刘文粟、张凯都兼过电训队长；二是指派有专长的同志担任，如韩重仁同志从二到七期任教务主任，各期均设指导员。

师资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电台上的技术骨干到电训队兼课；二是配备技术水平较高的专职教员，以后一种形式为主。

政治教育由指导员讲授，没有现成课本，根据上级文件及当时形势，由指导员讲课，辅以讨论。当时讲课的内容如：抗战的必要性，必须拿起武器赶走日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共产党的性质，统一战线的性质，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等。

专业学习一般开设机务、英文、报务三门课。按专业技术分工进行训练。机务专业由电学知识水平较高的同志任教，收发报（含英文、通报英语）由收发报技术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有时单设英语课。电学课包括无线电专业基础；三管再生收发报机和线路、结构及使用；哈特莱、电子交连发报的线路、结构及使用。英语课包括字母书写、发音；通报英语，Q缩语；收发报课包括阿拉伯字码和英文字母的书写（适合收发报的需要），阿拉伯字码与英文字母的电码符号；收发报的拍发与抄收，英文抄收速度120~130字/分，拍发速度达120字/分；阿拉伯字码抄收110~125字/分，拍发速度达100~115字/分。

在以上专业训练的基础上，要模仿上机实习——在振荡器上模仿通报的全过程，然后到电台上见习。

选调报务员的条件是：①年轻：多数为16~17岁，不超过20岁。②政治条件：绝大部分是党员，部分是团员，非党团员较少。③文化程度：有一部分高中学生，大部分是高小、初中学生。④学员多选自部队中身体好、思想好的战士，地方来的知识青年及调干生较少。

学制一般是6个月，有时4个月即分到部队实习。训练方法是突出重点，集中抓收发报及英语会话（包括Q缩语）。

训练器材主要是一架低频小型振荡器和抄收用的铅笔、纸张。振荡器用一个变压器，一个 30 型真空管，一筒 A 电池，一块 B 电池，一个喇叭，一只电键。灯丝电压不足了，将几块旧 B 电池串联起来继续使用。一个班十几人，才配一个振荡器，除安排轮流练习外，其余时间是拍发空键，按大腿肌肉、搬手指等方法来模拟练习。

抄报纸及铅笔供应困难，抄报纸正反面使用，先用硬铅笔抄，再用软铅笔抄，铅笔用到剩下 1/3，用纸卷个纸筒套上再用。

### 1. 第一期

1938 年 1 月，在任丘县青塔镇开学。军区通信营无线电连连长（电台台长）刘文粟兼队长，指导员崔炳南。教员有密材、密崎、何明生、刘逢选、刘文粟（兼）。这一期于 9 月毕业。

共有学员 23 人，其中有 19 人毕业。他们是刘亚民、刘树勋、屈培壅、贾鹤令、郑一民、刘悦勋、宋国栋、赵步云、冯月潭、陈守信、贾秋昌（贾力）、冉迎祥、吴绍南、王香斋、刘云卿、崔铮、赵振天、郝景祥、刘国瑞、孔香亭、张蓬荣、郝俊杰等。

### 2. 第二期

1938 年 10 月，博野驻县城南关老盐店（后期在安平县大王各庄）举办。主持人商祯祥，指导员崔炳南，教务主任韩重仁。收发报教员宋国栋，英文教员赵震天。这一期于 1939 年 4 月毕业。

学员共 50 余人，一部分是冀中二分区（后改为七分区）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的 20 多名学员，一部分是招收的地方知识青年。

已知的学员有：王立春、贺清池、任连喜、谷国州、朱家斌、刘宗勋、郭瑶池、张桂芬（女）、马秀英、孟伯君、王培桐、刘宗南、李文昌、张殿一、胡志增（胡雄飞）、李瑞山、张君实、王志廉、黄学文、崔凯、尹金池、支配、陈友德、李韶九、刘乾、郭从周、李概田、李崇培、李丙昌、赵新普、赵振峰、赵治国、杨润身、郭令池、朱守彬、赵东升、张德荣等。

在训练过程中，曾遇上 1939 年 4 月的反扫荡，一二〇师奉命东进到冀中地区，不少同志提前毕业。

### 3. 第三期

1939 年 12 月 12 日，在安平县大王各庄举办第三期，1940 年夏末在冀西唐县北清醒村毕业。教务主任韩重仁，指导员张碧侠、报务教员王寒（王一撇）。

这一期学员分两批入学，分两批毕业，相隔两个月。共有 40 多名

学生，已知的有：赵纪峰、王世光（王伟）、臧尚志、郭捷、赵根顺、王宪曾、孙毅文、邓登科、甄洪州（甄汉卿）、候信、许士杰、宋卞、赵跃德、赵文海、杨孟然、高景林、王恕、杨洪祥（赵振民）、邸化一（丁化一）、兰纪珠、王愚曾、姜孚仲、庞树楷、董崇仁、张文勋、李燕生、赵文江、周文才、周××。

#### 4. 第四期

1939年12月，在冀中武强县举办第四期，主持人江文、韩克树同志。

学员报到后，正值反扫荡，全部学员与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队合并。1939年10月过平汉路到冀西河北唐县姜家沟，后迁阜平县瓦炸村。至1940年8月毕业。教务主任韩克树。

第四期学员近30人。已知的有：余进崎、刘福志、刘跃华、张立声（晨阳）、李国华、宋贵贤、吕银河（丁克）、李贵廷、李树德、何彦琛、裴金城、王大任、魏炳生、刘祖信、郭汉卿、杨宣山、蔡凌霄、鲁门、王瑞安、王善堂、张××等。

#### 5. 第五期

1940年4月，河北唐县北清醒村举办第五期，教务主任韩重仁，指导员是张碧侠，报务教员刘坤城（兼英文教员），机务教员韩重仁，1941年1月结业。

第五期学员共40余人，已知的有：戈振任（戈文东）、赵双全、齐克、孙春乾、田占侠、刘国栋、王登云、李志海（李福录）、袁绍武、张庆昌、刘庆珍、孙树楷、许瑞芝、白光乾、周廷柱、于学曾、王杏林、王义含（向光）等。

#### 6. 第六期

1940年11月，在河北唐县北清醒村举办第六期，教务主任韩重仁，指导员张碧侠，报务教员刘坤城、刘云卿、张世芬（实风）、机务教员是韩重仁兼。1941年7月毕业。

学员30人，已知的有崔荣秀、赵煜（玉）、李根波、田敬荣、崔仲元、高怀莲、鹿三全、李明贵、赵志合、邓秀福、张震、韩文江、赵兰祥、杨延章等。

#### 7. 第七期

1941年5、6月，在河北唐县姚家湾村举办第七期。教务主任韩重仁，指导员张碧侠，报务教员张世芬（张实风），电学教员韩重仁，司务长乔老律，副支书石生玉。这一期于1942年2月毕业。

这一期学员共有 80 余人，已知的有：张夫、周明远、王常有、齐清林、何主林、孟令仪、马振融、白崎。还有未毕业的张哲生、王志远、朱振东、王建安、白亚、韩同兴。韩重仁及学员姜国庆等在反扫荡中牺牲。

这一期正值敌人大扫荡，在一次遭遇战中不少同志牺牲。韩重仁同志自第二期担任教务主任工作以后，培养了 200 余名学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何文林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们这一期学习期间，赶上两次反扫荡。第一次在 1941 年 7 月，我们从南北清醒村连夜转移到山区小祠堂村，不几天，敌人就撤了，我们又回到原驻地。第二次在 8 月底，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我们又转移到小祠堂村。一天，一日军的小分队，沿着小河自西往东尾随测绘队追赶，经过小河的凹部，进入小祠堂村的东北面朝北方向的山沟。在 1 点左右，听到本村人讲，村西有情况，日本人在河沟追我军后勤人员。那时电训队与后勤部队没有通信工具，得不到准确通报，于是就集合队伍，沿着北山东侧的小道进入山沟。当队伍刚经过沟中的西府村，同追赶测绘队未遂顺沟返回的日本小队遭遇。当看到穿的服装不一样时，便发出口令，回答不上来，便迅速后撤，瞬间敌人开了枪，向我们队伍冲来。这时我电训练队人员均无武器，无法抵抗，大部分后撤，有的往两山坡疏散，十分钟战斗便结束了。电训队牺牲六七人，负伤两三人，被捕几人。韩重仁在向山坡疏散时中弹牺牲。余下的同志与在山上警戒的武装班七八人，和在西府村隐蔽的病号 7 人，在报务教员张世芬（张实风）带领下，回到刘家营村继续学习。1942 年回到冀中机关驻地，在安平县大会村结业，走上工作岗位。”

## 8. 第八期

1941 年 10 月，在唐县刘家营举办第八期，1942 年返回冀中深、武、饶、安地区。队长刘文粟兼，指导员张碧侠，教务主任张凯，机务教员张鸿烈，报务教员许士杰、郑一民等。

学员有百余人，其中女生 13 人。已知的有商桐雨、韩振江、张重烈、崔学章、段惠来、朱文忠、杨子亮、张哲生等。

这一期正值冀中“五一”大扫荡，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在大扫荡前夕，无线电中队精简下来的三四十人，由管理股长魏志成、指导员李广才带领随电训队行动。在深北地区，进一步精简，动员女同学暂时回家，一部分同志投亲靠友，余下的同志化整为零，编为三个

排。刘文粟、张凯、张碧侠分别带一个排，魏志成带一个排，5月初还能坚持上课，不久学员毕业。还有一些学员在11月以后即在人民群众之间与敌人周旋，有的参加部队工作。有些学员于1942年秋，冲破敌人封锁，转移到铁路西唐县张各庄一带，共10余人，由张凯、郑一民主持，于11月开始训练，1943年毕业。

### 9. 第九期

1944年12月，在唐县慈家台举办第九期，不久转至北清醒村。主持人张凯，队长齐木玺，指导员苏秀青（女），教员有赵干清、崔凯。

自1942年6月第八期以后，因敌人扫荡，冀中堡垒林立，团的建制单位已转移到外线，1943年冀中军区撤销，无线电队建制也撤销。后来，随着形势好转，第二次组建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为了适应部队发展需要，决定举办第九期训练班。

学员共60余人，已知的有：赵风梧、段群虎、郝学捷、刘辉、刘幻康、梁景新（女）、王宝祥、孟昭壮（孟平）、孟林兴、冯子民、孔繁勤、刘文英、王均、韩招弟（女）、郝砚田、李彪、李志祥、赵党、赵国兴、陈理、远应心、阎月芬（女）、杨培先、李东来、焦广成、孟繁凯、张丙演（张旭）、齐国卿、崔瑞馨（女）、边瑞修、李双林、孟庆丰、舒展、赵锦林、李炳瑞、齐树芬（齐克、女）、边文华、李春忙、吕振华、张宗山、刘治平、王占岗（王斌）、赵国侠、张健、宋庆林、王汝凯等。

这期学员于1945年5、6月毕业。

### 10. 第十期

1945年8月，在饶阳县前门庄举办第10期，后转至霸县。队长齐木玺，指导员崔三英，教员有齐木玺、赵干清、张保乾、胡雄飞、甄洪州、宋占海、关福才、张庆昌。1946年初毕业于任邱县段家务村。

学员有110人左右，已知的有：傅生法、罗同春、赵杰、李荣阁、杨力祥（杨孔祥）、张德隆、李进彦（李欣彦）、李宋贵（李盈贵）、李静平、邱治海、赵同瑞、范有民、李明、白家保、李志平、杜佳欣、赵应霄、程文海、李林一、刘英、苏青、高郁、王玉昆、张东绪、牛芬林、杜占禄、赵国光、陈志清、刘国喜、何建章、李勇、赵钧、吕秋振、邹永奎、王来顺、李新民、商国庆、刘春香、崔秀春、徐英、苏杰、马治章、张跟增、李治、赵凯旋、孙恒录、程中

顺、李德仁、韩世忠、李根波、李春德、彭建国、贺济义、李兆坤、高爽、刘李梅、张素銮、刘银花、李秀云、李献民、王亮、李云会、李士嫣、魏志卿、田林清、边文华、李锦林、刘志英、赵青、秦昌基、王树民、李志平等。

### 三、冀中军区各单位所办训练班

#### 1. 军区七十七台

1945年7月，王立春、袁绍武同志举办了小型训练班，培训8名学员。他们是赵淑芬、安秀池、刘云员、刘新雁、佟彩亭、杜文捷等。

#### 2. 六分区报训班

1944年10月，在宁晋县小留村举办训练班。主持人李文昌，后为吴恒寿。余进崎、高臻海都任过课。学员有刘占岭、王中春、刘省春（女）。1945年春毕业。

#### 3. 七分区报训班

① 1938年11月，在河北博野县南关老盐店，举办第一期。负责人商祯祥、韩重仁。学员20人左右，开办两个月，与军区第二期训练班合并。

② 1944年底举办第二期，由赵文海、赵志和负责，培训的学员有崔询、程文志、陆福生、马志章（女）、钮辉英（女）5人。1945年3月毕业。

1945年7月举办第三期，由赵文海、赵志和负责，刘幻康、陆福生等任课。学员有王朝贤、王材科、黎英、董风坡、李特、田振中、张德荣（女）、边庆英（女）、刘惠（女）9名同志。

#### 4. 八分区报训班

1944年夏在饶阳地区举办报训班，主持人屈培壅、刘树勋，由电台人员轮流上课。学员有赵孚雨、张谦、刘汝尚3人。

#### 5. 九分区报训班

① 1938年6月，在河北任邱郑州村举办报训班，主持人张文穆，教员有密崎，军事教员段源波。

学员共20余人，已知的有：刘鹏、王建国、齐木玺、赵荣萱、阎钧、刘永寿、范岩、鲁儒林、李恩旭、高延龄、刘洪振、梁惠宁、贾隆昌、魏敏秋。1939年毕业。

② 1945年2月，举办第二期报训班，主持人赵荣萱。学员3人，

于1946年3月毕业。

#### 6. 十分区报训班

1938年4月，在河北霸县城关举办第一期报训班，主持人李文元，教员李文元兼。

学员开始时有60人，结业时有燕军（段士勤）、关震（关风銮）、刘光汉、高继贤、张世芬（张实风）、关福才、张矗峰、王礼贤、吕文选、蔡青山、韩志民、王泽元、崔元吉、张治新、李镛、范荣绪、刘广岱、高惠星、崔清吉、徐震、田振华、崔惠吉、李仁德、边际永、胡永顺、孟光恩、冯树仁等。

1945年夏，举办第二期报训班，学员10余人，8月并于冀中军区电训队第10期。已知学员有王树民、王树芝、李小海等。

#### 7. 南进支队报训班

194×年南进支队举办报训班，主持人赵步云，学员有十五六人，已知的有：张顺才、崔亮（崔殿雷）、王锋先（王铎）、徐亮、王永国、于润藻（于杰）、李凤春、李光明、梁晋廷、孙仲英、郑金洞、张长进等。

#### 8. 区党委报训班

1940年举办第一期，已知的学员有：陈金才、郝志芬、刘文华、辛奎喜、赵志恒、崔侃、李文洪、柳恒发、刘镜、索刚等。

1941年6月举办第二期，地点在定县北俱佐村，队长丁克，指导员刘武、教员有丁克（兼）、郝志芬。这一期学员有10人，他们是许忠琴、诸文斌、石四海、高臻海、王存良、朱福申、张砚田、张继民、贾波、李树仁。

## 第五节 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军委工程学校

### 一、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保持主动，我军主力放弃了一些大城市。内战开始，国民党军队喧嚣一时，但不久即开始崩溃，一个新中国就要诞生。

1946年7月12日，党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的命令，同时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三）中明确提到“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员的训练。”当时，军政机关大量精减，以迎接解放战争，但中央预见到在全国解放后，必然需要大量技术人才，所以唯独提出军事技术人才的培训应该加强。

1946年10月11日，我军主动撤出张家口，晋察冀军区的无线电训练大队随司令部迁往河北阜平县。电训队正办到第七期，全体教学员撤到涞源县三甲村，第7期在此毕业。在撤出张家口前，学校派人到河北各县招收第8期学生，这时也到了三甲村。1946年12月，全体同志迁至距阜平县20里的上店、下店村。

根据军区的指示，1947年3月，将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大队改为“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 1. 领导人与机构

校长兼政委曾涌泉（兼），副政委杨屯，副校长钟夫翔（兼），副校长韩克树。

学校设校务处、教育处、组织股、宣传股，下设3个队。

一队下设无线电工程班、无线电机务班；二队下设无线电机务一班；三队下设报务1~4班，此外还有干训队及新生班。全校师生400余人，其中学生300余人。

### 2. 学校的任务和性质及师生来源

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无线电通信的工程、机务、报务3种技术人才，是大学专科性质的工程技术学校。

学生都是来自解放区的初中、高小学生，也有从平津到解放区的高中、大学学生。

教师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在解放区长期从事通信工作的老同志，有抗日初期到解放区的理工科大学生，有在重庆谈判后随中央代表团到解放区的重庆大学生。他们都热心从事教育工作，教学效果都很好。

### 3. 学制及专业设置

学校设无线电工程班，学制二年半（无寒暑假）；无线电机务班，学制二年；无线电报务班，学制一年；电话班，学制一年。

## 二、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1948年，革命形势发生了急骤的变化，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已被我军打得土崩瓦解，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即将结束，革命的任务将由战争转

向和平建设。

当时党中央已迁至河北平山县，华北各部队合并为华北军区，这时从延安、冀鲁豫、晋察冀各地来的通信技术人员都汇集在河北。为了集中培养通信技术人员，为我军进城接管城市做准备，上级决定以晋察冀电专为基础，组成华北电专，培养人才的范围也进一步拓宽。

### 1. 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的组成

1948年，晋察冀电专迁到河北获鹿县，驻在距石家庄20公里的大李庄、符家庄、张家庄、杜家庄几个村庄。接到上级指示后，电专即着手进行迎接兄弟学校的准备。合并来的有以下5个单位。

#### ①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

1945年抗战胜利后，10月在河南武安（现河北）城南同会村，成立通校，校长吴泽光（兼），梁骥、叶云章、林伟、贺伯升、秦华礼、张振文等都担任过学校的领导。1947年年底，通校招收第三期学员，全校师生400余人。学校设行政处、教务处、总务科，主要培训报务及有线通信人员。

1948年5月，奉命与晋察冀电专合并，全校师生在政委秦华礼、副政委贺伯升、副政委张振文带领下，经过13天的行军到达获鹿。

#### ② 军委三局通信队

前章已记述，晋绥通校在1948年一分为二，一部迁至临汾，改为西北通校，后迁西安长安县韦曲镇；原延安通校、军委三局的部分人员，随军委三局迁至河北建屏（平山）县，成立军委三局通信队。队长高飞，教务主任柳仁甫。学员分为两个队，队长为钟尚清、邹青山。1948年6月，奉命与晋察冀电专合并，6月前后分两批到达获鹿。

#### ③ 晋察鲁豫军区参谋训练队

1948年1月，军区为了培养通信参谋人员，在武安县陶冶固镇成立参谋训练队。队长何轰，指导员贾×伍，学员70余人。1948年4月全队参加从邯郸至石家庄的长途线路施工，施工完毕，全体人员调到华北电专。

#### ④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处机务队

1947年3月，军区为了培养维护使用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举办了机务队，学员50人，由钱文极同志讲课。训练队成立不久，1948年5月，并入华北电专。

### ⑤ 军委气象队

前章记述在延安的联司通信队气象班毕业后,一些教员到了军委三局组成气象台,1947年随军委三局到了河北平山,1948年在张乃召同志的带领下,合并到华北电专。

### 2. 华北电专的领导、机构与规模

军委三局局长王净兼电专校长、政委,副政委杨村,副校长韩克树,教育长林爽,副教育长周石夫。

校办主任师崇谦,政治部主任贺伯升,副主任李振纲,教育处长周石夫,总务科长赵怀琴。

一大队队长杨杰,副队长高飞,副政委杨明;二大队队长秦华礼,副队长吴希圣;三大队队长刘凯,副队长冯云琴,副政委刘梦远;四大队队长周石夫;干部训练班教务主任柳仁甫。

学校集中了大批通信教育干部及教员,如李召、潘家晋、湛亚选、冯月潭、史铁夫、齐文林、陈平、王丽媿、王立春、何暇、李戡、赵吉峰、潘广宽、王之敏、高玉林、向士清、李真、王尚林、赵元普、郑还、赵克、黄振翼、马守义、江荒野、郭吉甫、姚昕琪、邢中里、关震、史平、梁立波、汤翰章、毛继人、余进奇、肖国华、张振文、鲁德、王世光、赵传璧、崔凯、孙学古、张学文、朱贻先、冯应正、邹青山、周明远、王毅然、范西、段治国、张乃召、邹竞蒙、曾宪波、郭吉甫、康新、林天一、庄明夫等。

全校师生1500余人,学员1119人。

### 3. 学校性质及专业设置

当时学校的文件中规定“培养无线电、有线电、报务、机务工程人员”,它是一所培养无线、有线通信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学专科学校。学校设有以下专业。

#### ① 无线电工程(学制两年半)

毕业条件:能装修设计50瓦交流发射机、超外差接收机、超大型短波无线电话、50瓦以上广播电台;了解使用共电式自动电话,一般电力机械及高级仪表;熟悉美式V-101、SCR284通信机并能维修。

#### ② 无线电机务(学制两年)

毕业条件:能装置、校验、修理、使用15瓦军用电台;每人单独修理收发报机,在机械及电气方面均符合要求;能管理使用电台的附属设备,了解原理并能排除故障,如电话、蓄电池、手摇发电机、振荡

器、扩音机等。

### ③ 有线电机务

毕业条件：电缆的架设与维修使用；共电式电话单机及交换机的修理使用；自动电话单机及交换机的维修使用；载波电话、长途放大机的维修使用；熟悉电报局通信系统。

### ④ 超短波通信

毕业条件：熟悉超短波通信原理，能使用管理超短波通信机；熟悉各种报务、译电、话务工作；了解通信机在战术上的使用。

### ⑤ 国际报务

毕业条件：具有普通报务水平；翻书打字每分钟 140 ~ 150 字，看符号打字每分钟 140 ~ 150 字，听声打字每分钟 100 ~ 120 字；熟悉国际通报手续及 BK 通报手续；能进行一般英语会话；了解快机原理及通信手续；能进行一般英语会话；键盘打字达一般水平。

### ⑥ 陆空通信与气象

毕业条件：具有一般报务员水平；在一分钟内能铺出不同信号布板；能担负 2 ~ 3 小时的气象预报；能指导飞机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及盲目飞行情况下安全着陆；熟悉陆空通报手续（起飞、航行、作战、降落），熟悉 BK 通报手续；会使用报话两用机。

### ⑦ 普通报务

毕业条件：QSA3 情况下中英文收报每分钟抄 100 字以上，中文一次连收 5 页，其中 3 页错字不超过 3 个，漏字不超过 6 个。英文一次连收 1000 字符，错不超过 1%，漏不超过 1%，错 SPE 不超过 5 个；发报要求正规、确实、清楚、手稳、不得发错，每页平均不超过 2 个错误符号；学会通报手续，能进行简单通报；熟悉通报英语；认识一般零件及各种收发报机。

### ⑧ 普通电话

毕业条件：能装置修理各种磁石电话机及交换机；了解共电式电话，能修理蓄电池等。

当时的教材主要是油印的，1948 年以后，有了自编铅印教材。

实验设备主要是缴获的战利品，有日式、美式及国民党制造的各种收发报机。1947 年 11 月解放石家庄时，学校派人随军入城，得到大批器材，包括键盘打字机等。还搞到一部卡车，将引擎卸下，学校用此发电，这时学校的示波器也可以演示了。1947 年 10 月清风店战役，学校派人将击毁敌机上的通信设备运回，作为教学实验用品。学生实习用的

铝板，是击落敌人的飞机残骸，线材是割取敌人的电线，钢材是挖取敌人的铁轨。

#### 4. 教学原则及学风

根据战争条件下的特点，教学原则是：①教育为革命事业服务，革命的需要就是学校训练任务。②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考虑战时不可能有安全环境、充足的设备及物质条件，所以教学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有过高的要求。③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可能偏重于理论，因为战时学制不可能太长。同时在学校必须掌握必备的知识，因为在战争中不能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的机会，教学必须学用一致。④深入浅出，在巩固基础上提高。⑤讲究效率，分秒必争。⑥照顾多数。⑦逐步向正规化过渡。以上原则在实际中得到贯彻。

关于学风，王诤同志在华北电专开学典礼上，根据革命通信工作的多年经验，确定学校除贯彻抗大的校风外，还提出：①养成英勇顽强、不怕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②养成一丝不苟、细心耐心的工作作风；③具有任劳任怨、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④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保密作风；⑤好学上进，钻研业务，对技术精益求精；⑥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些要求都成为学校的规范，一批批学生结业出校以后，影响到终生的工作作风。

#### 5. 勤俭办学

1948年12月，学校总结中记载：“现在小米饭已加上豆子了，每周平均3次白面，每人每日10两，每人每天1斤菜，油4钱，猪肉每学期一人平均1.7斤。”

1948年9月记载，训练一名机务学员需4816.5斤小米，训练一名报务学员需2905斤小米。这是包括吃、穿、住、用等一切费用在内的。现在看来已是很节省了，但在当时1500人的学校，靠农民上交公粮来办学，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 6. 华北电专迁张家口组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

1948年下半年，战事急转直下，全国解放在望，上级指示学校大部分学员提前毕业，接管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电讯设施。

1949年春，北京解放，党中央迁入北京，上级决定华北电专迁至张家口，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工科大学——“中央军委工程学校”。7月份开始，华北电专向张家口转迁。

### 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

1949年3月31日，中央军委通令：“拟即举办一所机要通信学

校……并附设高级研究机构。”

1949年5月，曹祥仁同志代表军委到河北获鹿，召开全校干部会议，宣布华北电专立即着手迁到河北张家口，参加筹建军委工程学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

会后成立军委工校筹建组，由电专韩克树、刘凯，军委二局徐思铎、边竹共同组成。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49年11月27日，军委工程学校开学。

### 1. 学校领导、机构

校长兼政委曹祥仁，校办主任井润田，副主任白枫（余湛），政治部主任贺伯升，副主任康立泽；教务处长韩克树，政委徐思铎，副处长李树政；行政处长李振纲，副处长裴壁，副政委魏国禄。

学校下设6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孙晨、政委刘忠，副队长赵新普，副政委张振文；二大队队长张铁，政委苗鹏飞，副队长吴新安；三大队队长刘凯，政委陈艺，副队长柳仁甫；四大队队长秦华礼，副队长邢中里，副政委边竹；五大队队长徐墅林，副队长杨林，副政委史平；六大队队长宋肇宜，副政委杨明。

### 2. 教师来源

华北电专来的教师已远远不够，学校从宁、沪、杭、哈、津、京等地聘请教师59人，正副教授15人，还有日籍、苏籍教师4人。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95人，组成研究班，经过短期集训，担任教师工作。

### 3. 招收学员

1949年全国各地陆续解放，学校派人到全国大城市接收新学生，共招收2998人，其中大专以上程度的占25%，党员占5%，团员50%。

### 4. 增添教学设备

全国各大城市已解放，除缴获大量敌人的器材设备外，也可在大城市中公开购买。为了办好学校，上级调来大批各种无线电设备、器材，还拨给经费。学校派人在各地购买仪器、设备，到1952年已有2000余部仪器设备。

此外还筹建实习工厂和各种实验室。为了加强实习工厂的建设，军委三局将设在北京北小街的工厂的部分人员及设备调到张家口。经过努力，建立了物理、化学、电工、电子管、电机工程、材料、无线电、热

力工程、有线电话、有线电报、线路架设、微波等实验室。

### 5. 自力更生建设校舍

全国刚刚解放，经费十分紧张。学校迁到张家口时，住的是原日军留下的营房，国民党败退时已全部毁坏，到处是残垣断壁，在齐人深的草丛中，在破旧的营房地基上，到校的同学，自己动手，修建道路、校舍。经过3个月的建校劳动，修好6919平方米的房舍。上级投资80万元，修建了图书馆、教室、医院、电影院等。

### 6. 军委工校开学

1949年11月27日，军委工校开学，全校师生近4000人。中央得知学校开学，毛主席的题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朱总司令的题词为：“学习科学技术，巩固人民国防。”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题词是：“树立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军委作战部长李涛，通信部长王净，中央马列学院教务长杨献珍、教授艾思奇、王学文，察哈尔省省长张苏等。

1950年，学校根据专业不同，分设3个部，相当于大学的3个院。第一部，培训通信工程技术人员；第二部，培养情报工程技术人员；第三部，培养机要工程技术人员。

不久曹祥仁调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由军事作战部长李涛兼任校长、政委。

1952年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全体师生也迁到学校。

1952年开始，第二部、第三部分别迁到北京、长春另建学校，第一部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

从此，这所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学校，向正规化的大学前进。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迁到西安，1966年转为地方院校，改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改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第六节 晋察冀军区通信材料厂、广播电台

### 一、军区通信材料厂

1945年8月25日，我军第一次解放张家口，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随即迁入这座城市。这时通信事业有较大的发展，除电训队外，先后成立了技术室、通信材料厂、亚州电器公司等。

关于材料厂的情况，在《电子工业史料》第四辑中，田世班同志整理了一篇详细资料，选载如下。

### 1. 工厂在张家口建立

在军区通信联络处处长钟夫翔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经过紧张的筹备，晋察冀军区通信材料厂于1945年9月在张家口市正式成立。厂址在铁路斜街（现解放饭店对面）。该处原为日本阿波总洋行所属的一家小型铁工厂，它专为日军生产雷管等军需品。我军接管时，工厂不过50人。厂房不足200平方米，设备只有二三十台残破的皮带式床子。接管后经过整顿，又从张家口机场调来3台日产车床，利用它和原有的设备，以一台3马力和煤油发电机作为动力，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生产了。

1945年10月，林中和姜彬从军委三局延安通信材料厂调来领导这个厂，林中任厂长，主要抓生产；姜彬任副厂长，主要抓后勤保障和思想政治工作。林中、姜彬到厂后，花了很大气力气稳定工人情绪，调整各方面关系，对接收的物资、器材也逐项进行整理、登记，使工厂逐步建立了生产秩序。为了保密，通信材料厂的对外厂名定为“电华工厂”。

工厂设有工务室，林中厂长兼任工务室主任，有一个小公务员办理杂务。还设有钳工组、线工组、木工组、车工组、材料组。当时工厂只负责部队电台用手摇发电机的维修、生产及收发报机的机壳等部件的加工。通信机的设计、试制和装配，则由军区通信联络处领导下的技术室承担。由技术室与工厂相互配合，完成通信设备的生产和维修任务。工厂的技术力量很弱，主要由厂长林中直接抓。林中是车工出身，机械加工是其所长，但对电器线路等则不熟悉。由于技术人员缺乏，已经影响生产。

为了充实工厂和整个军区通信部门的技术力量，1946年春，钟夫翔处长责成傅英豪通过电台向延安军委三局王净局长反映，并请他尽快派技术人员来。不久，军委三局就派李庄、王天民、姚太林、赵戈、乔林、安民哲等7位同志到晋察冀军区通信部门工作，他们于1946年4月到达张家口向晋察冀军区通信联络处报到。因王天民熟悉电机及绕线技术，分配到工厂，李庄等6人分配到技术室。另外，由晋绥来的邢耀宏，也分配到通信材料厂任秘书，负责电器部分的技术工作。

这时，工厂已整顿得比较有秩序了，建立了职工考勤制度，工人很



遵守劳动纪律。有一次，天下大雨，一位老妈妈还冒雨到工厂来给儿子请假。

这时工厂的主要任务，仍是加工通信机的零部件和修理手摇发电机。由于战争的需要，部队送来修理的机器，都要求很快修复。而这些机器来源不同，规格、型号五花八门，要配制这些机器的零部件，往往需要根据整机重新设计，绘制图样，才能加工。任务虽然复杂而繁重，由于林中精通机械加工，王天民精通电器技术，两人配合默契，使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部队送来修理的机器很快就能送回前方。同时，在修复手摇发电机的技术基础上，积极筹划生产 15 瓦发报机用的手摇发电机的工作，至 1946 年 9 月，共试生产了 15 部。

## 2. 工厂向阜平转移

正当工厂逐步恢复发展之时，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傅作义部队占领张北，逼近张家口。1946 年 9 月中旬，工厂奉命转移。林中、姜彬组织动员了一辆汽车和十几辆大车装载机器设备分两路出发，装运设备的车队由姜彬带领，经宣化西河营往涞源走，林中带领着工厂职员和部分老工人共 20 多人，经完县杨家台往涞源走。9 月下旬，人员和设备齐集涞源三甲村待命。刚安装好设备，又奉命转移到河北阜平县栗园庄。就在此时，军区通信联络处决定，技术室与工厂合并，任命傅英豪为厂长，林中、姜彬为副厂长。同时，还把电训队、广播电台、“亚州电器”的部分人员以及部队来的一些战士调到通信材料厂。1946 年 10 月，工厂人员和物资全部安全地到在阜平县栗园庄。

## 3. 在阜平栗园庄

阜平是位于五台山附近的一个小县城。这一带是抗日战争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到处是山沟，有利于隐蔽。栗园庄是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山村，坐落在胭脂河畔。军区通信联络处、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都驻后村，通信材料厂驻前村。工厂借了老百姓的几间房子做试验室和女职工宿舍。林中领着工人和 3 名日本人在村边空地上搭起大蓬，在大蓬下安装了机器设备，作为机加工车间，锻铸、翻砂、木工等活都在露天里干。工厂的男职工便分散居住在栗园庄附近两三里地的老乡家中。工厂就在这样既无厂房，又无宿舍，器材供应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工生产了。

## 4. 人员及组织情况

工厂的物资条件虽然很差，但力量大大加强了，已经扩大到 170 -

180人，最后发展到200多人。组织机构也比张家口时期更正规和健全了。厂长傅英豪，副厂长林中、姜彬，政治协理员郝光（1947年9月到厂）。技师王天民、顾中直、金鑫。工厂的厂部，有秘书邢耀宏、管理员王佐、文化教员鲁夫、文书谭广文、会计高立山，还有通信员、勤务员、炊事员等20余人。主管生产、技术的，主要是工务室和实验室，在业务上指导各组的工作。

工务室，主任王天民，负责生产调度、统计和派工。各生产组分为材料组（组长于恕理，副组长张俊义）、车工组（组长王作新）、钳工组（组长王致中）、动力组（组长黄保安）、锻铸组（组长刘广礼）、木工油漆组（组长张贵清）、线工组（组长戈焰、副组长王化）、电镀组（组长姚申、副组长张建国）。

实验室，主任唐旦，承担产品设计、试验、装配、修理以及质量检查等任务。做这方面工作的还有两个组：试验组（组长姚太林）、装配组（组长齐子清）。此外，工厂还代管一个有七八人的干电池厂。

#### 5. 工厂的设备状况

工厂的设备，主要还是从张家口带出来的老式皮带床子，有车、刨、钻床共30多台，25千瓦发电机一台，以及少量仪表。

生产中常用的工具，除各类钳子是缴获来的，其他如起子、电烙铁、榔头、木工钻等都靠自己制造。常用的仪器是三用表，只有几台战利品，不够用，工人为了使用方便，就自己动手制造。

#### 6. 千方百计开辟料源

通信联络处处长钟夫翔很重视原材料的供应工作，在撤离张家口时，他要求工厂尽可能把各种物资运走，还亲自抓了这项工作。到阜平后，他还利用机会，和傅英豪一道，乘坐军调处执行部的飞机，去北平采购过电子管等紧缺物资。

1947年下半年，在清风店战役中，击落国民党一架B-24轰炸机，军区司令部派人去拆点生产需要的材料。工厂派王天民带领杨川、李可夫、刘广礼等20多人去拆。因国民党飞机不停地扫射轰炸，只好在夜间拆。拆下的东西有铝皮，有机玻璃、三角架、无线电零件、小电机等。总之全是用得着的东西，边拆边往回运。这次意外的收获，大大地充实了工厂的材料库，对解决工厂的材料紧缺起了很大的作用。

工厂所用的钢材也没有来源，经常派人到铁路沿线动员群众帮助挖

铁轨。工厂使用的铜材，一部分是通过各种途径从国民党统治区搞来的，一部分是材料组长张俊义身背褡裢，走街串巷，从老百姓家点点滴滴收购来的。

一切材料都来之不易，人人都把材料当“宝贝”，一节线头、一个螺丝钉、一个小电阻，掉在地上赶紧拾起来，领料时要事先计算好，用多少领多少，浪费一点也不行，爱惜和节约原材料已成了人们的自觉行动。

### 7. 自己动手解决电源

栗园庄是个偏僻的山村，祖辈没有用过电。工厂撤离张家口时，只带出了一台 25 千瓦的发电机，用汽车头带动发电，只能供机床和调试机器用。广播电台没有电，不能播音。解决用电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了。于是，想到了胭脂河里的水磨。河水流量虽不大，老百姓装的水磨，磨面很方便，能不能用它发电呢？傅英豪访问了制造水磨的巧工匠（这个工匠木工技术极精），并委托他画出改造水磨的草图，后来就用他的设计把水磨安装在栗园的村头。这样一来，群众不能用水磨磨面了，对群众利益有影响。栗园庄是老区，群众觉悟高，当时又是一切为了支援前线，群众也能拥护和谅解。

在改装水磨的过程中，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不分男女，不辞辛劳，半个多月日夜奋战在工地上。时值隆冬，天气严寒，河水结冰，要砸开厚厚的冰层施工，困难不小，同志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日本人伊东也表现得很积极。他跳进带冰渣的河里干活，成了“冰人”还继续干。土法的水力发电成功后，不单解决了广播电台用电、工厂生产用电，偏僻的栗园庄村也第一次有了电灯，电压也比较稳定，用电问题就这样成功地解决了。

为了鼓励先进，表彰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1947 年工厂在栗园庄召开了评功大会，林中、王天民因研制成功“林中式”手摇发电机评为大功，晋察冀军区发给大功奖章。伊东、于恕理、戈焰等也立了功。

### 8. 工厂在栗园庄期间的主要成果

通信材料厂在栗园庄的时间较长，环境较安全，各方面的条件也有所改善，所以，在这一阶段，成果也出得比较多。首先是，自行设计并生产了手摇发电机，在维修和改制的技术基础上，林中、王天民等设计试制成功 15 瓦发报机用的手摇发电机。机器制成后，派人送往前方部

队使用，经试验机器性能较好，重量轻、体积小、便于携带，受部队欢迎。当时大家称它为“林中式手摇发电机”。这种机器，一共生产了200台左右。再就是生产了供团以上部队使用的15瓦哈特莱主振放大式短波电台约100部，还进一步研究改进了小型超短波无线电话机（步谈机），改进后进行小批量生产，产量约40部。

当时装机使用的无线电元件和机械零件，如双联可变电容器、线圈、开关、度盘、木制旋组、固定电容、变压器、接线柱、木制接板、木制线圈架、弹簧插头、线绕电阻、高周扼流圈等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自己制造的。

工厂重新组装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从张家口撤出时，设在宁远10千瓦短波电台，因体积太大无法转移而炸毁了。设在市内的3千瓦中波电台，拆成零件装箱运到栗园庄。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夜以继日地赶着重新组装，使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在停播两个月之后，于1947年元旦继续播音，还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准备了备用电台。1947年春，国民党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曾要求几个有条件的大军区，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装制备用电台，一旦需要就能接替延安台的工作。晋察冀军区领导责成通信材料厂进行此项工作。由傅英豪组织有关人员装成一台200瓦的广播发射机，由于晋冀鲁豫军区装制的电台已用于接替延安台的工作，这部机器未能使用。

1948年8月，晋察冀军区通信材料厂（北厂）奉命与晋察冀鲁豫军区通信材料厂（南厂）合并，同时迁往山西阳泉，合并后的工厂称为“华北通信材料厂”，对外称“兴隆工厂”。

## 二、晋察冀边区广播电台

关于边区广播电台的情况，林爽同志在回忆中写道：“1945年8月，第一次解放张家口之后，我们接收了日本人在宁远建设的10千瓦的蒙疆广播电台和100瓦以下的若干通信发射机。我们利用这个广播电台改为晋察冀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张家口撤退时，我们将300瓦以下的备用小发射机带走了。当时用的发射机因保证与延安的通信联络到最后一刻，来不及拆迁而销毁了。回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之后，利用了两台日本的300瓦小发射机的架子，由林爽、郑还、陈平等同志重新设计改装成1000瓦的广播电台，作为晋察冀的新华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党中央在撤出延安前，中央曾通知晋察冀军区准备用晋察

冀新华广播电台接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免中断广播影响中外视听。后来，因晋冀鲁豫军区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美制归航台，经王仕光、吴本毅等同志改装调整后，质量较晋察冀的广播电台更好些，接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国外广播的任务就由晋冀鲁豫的广播电台承担了。”

## 第七章

### 八路军前总、一二九师无线电教导队，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边区广播电台

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明确了我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实行由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会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代表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组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治委员罗荣恒；第一二〇师，以原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委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

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1938年1月，由邓小平同志接任政委。

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八路军主力在朱德等率领下挺进华北抗日前线，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一五师在晋东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开展抗日活动。10月，一一五师开创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开创晋西北根据地；11月，129师开创晋冀豫边区根据地。八路军主力出征后，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

## 第一节 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无线电教导队

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青壮年纷纷参军，八路军的队伍迅速扩大，旅下的团也增至一两千人。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中，通信联络十分困难，急需扩大无线电通信。延安通信学校培养的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八路军前总决定自力更生，自己训练，自己培养无线电通信人员。

前总司令部三科科长刘鹏，无线电大队长海风阁，副大队长朱虚之。不久海风阁任三科科长兼无线电大队队长。一一五师中队长张瑞，一二〇师中队长龙静轩，政委江文，一二九师中队长周维。当时师以下的旅，配备一部电台。

### 一、第一期

1938年4月，在山西屯留、潞城一带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20余人，是从部队中有一定文化的文书、通信员、警卫员、战士

中选拔的，年龄在16~20岁。训练班开学后，由无线电副大队长兼分队长朱虚之兼任领导，电台一分队报务员范元纪任报务教员，海风阁也亲自上课。上课内容主要有：抄收中文、英文电报，手键发报，机上英语会话，电学常识。电学常识包括收发机使用调整，各种零件的作用，电源等。当时部队使用的三管收报机、发报机有5瓦干电池的，有15瓦手摇发电机的，50瓦发电机，前总只有一部电台。

由于教师教得认真，学员学习刻苦，至1938年底即分配到各电台实习，3个月后即可顶班工作。

这一期学员有李汉臣、高宪魁、张应孝、任敦玉、陈登峰、钱刚、邓宗德、万兆连、史萍等。

## 二、第二期

1938年底，在山西潞城南村，举办了第二期，学员30人左右，这一期学员在1939年6月毕业。海风阁兼任这一期负责人，陈×任指导员，他还兼政治教员。兼任教员有吴子云、黄子坤、叶云璋、邹念先、罗璋、李仕俊、范元纪、王兴。

学员有张丁三、刘智、毛继仁、冯长庆、高云保、陈金良、刘留、胡学琛、杨林全、田贵和、彭佩令、延立华、张连达、王斌武、申建辛、李春光、李连福、滑奎达、张乃健、白崇元、张文德等。

## 三、第三期

1939年7月举办第三期，学员也是30余人，这时因日寇扫荡，在中间迁到山西武乡县史家嘴村，至1939年12月毕业。负责人仍为海风阁，专职指导员兼政治教员苏戈，专职教员张芝荪。通信股长叶云章，材料股长吴子云，电台一分队李仕俊、罗璋、黄子坤、范元纪、韩黎等同志均兼课。学员有赵会文、房秉玉、张谔、何让、刘强、靳景年、左仲秋、王华芳、郭完元、李文英、傅刚、袁国昌、冯晶阳等。

## 四、第四期

1940年春举办第四期，从这一期开始叫无线电教导队，单独成立伙食单位，驻武乡县南上河村，不久迁辽县桐峪镇。学员50余人，从这一期开始，学员中有了女同志。教导队队长吴元亮，指导员康君健，教务主任张芝荪。教员有黄达、何暇、郭守道等。在这一期我军开展“百团大战”，接着进行三次反“扫荡”，学习时间延长，至1940年底



毕业。

第四期学员有任宗昌、刘森、韩昌树、吴万全、陈希贤、刘锡光、冯应正、黎岗、郭凌云、荆树芝、杨有山、牛惠青（女）、刘展平（女）、绿惠卿（女）、连景、袁森林、陈文、李强、郭兰田等。

以前四期共培训 120 名左右的无线电报务人员。

### 五、巡视团机务训练班

1940 年反扫荡以后，朱德总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傅钟回延安，在延安组成总部。前方司令部改成野战司令部，左权同志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这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根据地一时不能扩大，部队没有大量增加，对通信人员的需求量也不太迫切，因此教导队暂时停办。通信股长叶云章随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到冀南冀鲁豫军区视察，由电台一分队马然同志代理通信股长。

叶云章同志任巡视团电台队长，机务员兼报务员吴本毅，报务员李文英。1941 年 5~6 月，由叶云章举办第一期机务训练班，吴本毅任教员。学员都是由电台抽调的一些老通信人员，目的是提高对哈特莱机的装配、维修水平。学习半年时间，于 1941 年 10 月中旬结束。

学员有冀南军区挺进支队电台赵步云、李桂庭、徐豪、刘国贤；冀鲁豫电台李汉臣、李国枢、王玉洁（女）；三四三旅电台杜明、郝利和；冀南军区新四旅电台的一些同志。他们中有些人是电台队长，共 20 余人。

### 六、第五期

1941 年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上级决定继续举办无线电教导队。三科派马然同志到抗大六分校去选调学员。校长刘忠同志对此大力支持。当时六分校有一青年队，有一定文化，年龄多在 20 岁以下，从中选调近 50 名学员，又从直属机关和警卫团选调 20 名，共计近 70 名学员。地址在辽县苏公村。因学员人数增多，从这一期教导队与电台一分队分开，搬到电台所在地苏公村北五六里的东安村。

第五期队长马然，指导员康君健，教员杜若、何暇、李映潭、韦尧夫。这一期于 1942 年 1 月 1 日开学，开学时海风阁到会讲话。

这一期开学不久，日寇开始扫荡，学员人数减少，上级决定将一二九师的无线电教导队与前总教导队合并。当时一二九师的教导队住在河南涉县赤岸，离东安村 70 余里。第四期的一个区队与前总第五期合并，学员达 100 余人。反扫荡后教导队迁至山西黎城看后村，队长马然，副

队长赵伟。因粮食困难，提前于1943年11月在黎城看后村毕业。此后，前总未再办训练班，1945年开始筹建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1945年通信学校开学。

大扫荡以后，前总又迁回麻田，因在大扫荡中左权同志牺牲，任命滕代远为前总参谋长，调一二九师三科科长周维任前总三科科长，前总一科股长林伟同志任副科长，教导队长马然，调一二九师三科贺伯升同志任教导队指导员，赵伟任副队长，教员又增加从抗大调来的何家琪同志，教务主任赵传壁。

从1942年1月1日开始学习至1943年11月毕业，除其中反扫荡延误了一些时间。当时领导上主要考虑这一期学员文化水平整齐，增加了文化基础课。韦尧夫教数学，李雁心教语文，赵传壁教英语。由于基础课学得扎实，后来在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反扫荡中教导队指导员康君健同志牺牲，杜若同志失踪，教员何暇同志、学员扈毅峰、郭疆同志负伤。康君健同志遗体安葬在清漳河东岸石门烈士墓。

这一期的学员有史成明、田士甫、吴培业、乔天惠、邓济川、宋瑄、王风林、米金堂、原创全、陈文、扈毅峰、王绍禹、姚家政、郭疆、李天佑、邵俊杰、亢元、刘光云、张芝桂、张喜庆、段学英、李康、刘德胜、秦淑兰、刘实、曾繁起、曾帆（王好本）、张恒生、傅宝华、白庆丰、王振祥、杜金仲、王玉山、李桂元、黄冠升、石鸣（女）、冯烨（女）、晓微（女）、宋珍（女）、丁宏（女）、黄玉文（女）、邵长会、秦法武等。

在战争年代办教育是十分艰苦的，下面摘引马然同志的回忆材料。

“第五期教导队，1942年春节的前两天，敌人又来扫荡了。前几期都遇到敌人‘扫荡’。第一期赶上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第二期赶上敌人‘扫荡’，从屯留迁潞城，第三期赶上敌人占领长治，第四期碰上‘百团大战’和三次反‘扫荡’，我们这一期开学就碰上了。我们教导队在黑龙洞东面数里的小山庄度过除夕，在偏城村过了初一，电台一分队管理员杀了一头猪，大家吃了一顿肉菜，虽然是小米饭，也都很满意了。我们跟随着司令部一直转到邢台的浆水镇，又回到原来的苏公村，敌人扑了个空。这时的学习和前四期一样，大的庙宇当教室，找些门板或木板搭起来当桌子，从河滩里搬些石头当凳子，自己用油印机印点教材，教员就可以上课了。粮食由同志们自己去背，伙食费不够，组织学员上山打柴，开荒种菜。”

“1942年5月敌人又来扫荡了，司令部指挥各单位转移，第一天教导队住谷卓村。当天，教导队把带枪的20多个年龄较大、身体强壮的学生组成战斗队，由康君健同志带领。我因大病初愈，身体尚未康复，由我带领徒手的学员和所有的女同学。半夜里放哨的同学听到河里有人行动，隐约可见有一群人从西往东而来，哨兵喊口令，他们回答的是以前的代号，接着就开了枪，康君健率战斗队上去打了一阵，这些敌人就转移了。天亮以后，海科长召集电台、教导队全体同志在村西山脚下一块平地上讲话，西面山上突然有人开枪，三科教导员范成铭带两个通信员上去，走到山坡上，范成铭同志被山上的敌人一枪打倒，当场牺牲了。我们立即转移，当晚住黑龙洞一带。第二天，又转到姚门口一带，几路敌人占领四面山头，这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集中在一起好几千人，绝大多数是徒手的，又有公文箱、电台等比较重的东西，行动不便，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中午时分敌人的飞机又来扫射，学员扈毅峰负了伤。下午2时周围山上都被敌人占领，敌人的活动用眼睛都可以看得见。司令部传下突围的命令，有枪的打掩护，边打边走。彭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在一个山头指挥突围撤退，一面指挥警卫连作战。彭副总指挥在警卫员的督促下乘马向西走去，敌人居高临下向指挥人员开炮，敌人对准左权参谋长发射了三发炮弹，左权参谋长中弹牺牲。”

“电台和教导队随海科长向东北方向突出重围，后面山上敌人用枪炮射击，我背的皮包被子弹打了一个洞。太阳落山时，三科的队伍爬上了东北面的大山，敌人的飞机在头上盘旋，投了两颗炸弹，炸起来的土扑了我一身，身边不远三科的一个饲养员被炸死，掉下山沟里去了。飞机走后，海科长整理队伍，共有两三百人，都是直属通信部队，有枪的约40人，教导队杜若同志在突围中失踪，很可能牺牲了。我们继续往东北方向转移，大概走了三天，有一天到了武安北部山区的大山上，天下起雨来，2000多人挤在几户人家的小窝铺里。第二天又往北走，大概到沙河县最西的蝉房村，东北一些村镇已被敌人占领，海科长决定往回走。夜间行军，教导队徒手队走在最后面，在一个三叉路口，教导队的武装队与徒手队脱了节，大队走了偏东的一条路，徒手队走了偏西的一条路，从此我们与海风阁、康君健分开，后来知道海风阁、康君健与敌人遭遇英勇牺牲了。”

“天亮时，我们这些徒手人员上山一看，东西北三面村子里都有敌人，太阳旗、大洋马，清晰可见，敌人正在放火烧房子。我带队向南面大山走去。我们正上山时，隔着一条山沟后面的山坡的小路上有一队骑

马的敌军走过。因为我是队长，身上背了一个皮包，走在最前面，敌人又见我们是徒手，便向我们开枪，走在我身后的学员郭疆的腿肚上挨了一枪，幸好没伤骨头。我真想和敌人拼一下，但是我们没有武器。这时碰上抗大一部分带武器的同志，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敌情，并且说人数多很难通过敌人封锁，少数人可以穿空迂回。我根据这些情况，便决定化整为零，分小组活动，将学员四五人分为一组，每组给一点伙食钱，要求在敌人扫荡之后，到辽县安东村集合。我自己带一个组，有教务主任赵传壁，女学员黄玉文、晓微，年纪小的学员刘光元、乔天惠、邓济川。下午我们这一组向北方向下山，晚上在两三尺高的野草丛中过夜。这几天我们在敌人的缝隙中穿插，每天吃一点炒面，喝一些凉水。几天过后，敌人的扫荡接近尾声，我们便决定向辽县方向行动。白天一边了望一边行军，晚上在树林或山沟里休息，沿途收容了一些同志，到白草坪已经有40余人了。走到黑龙洞一带，死人死马到处可见，天气炎热，都已腐烂，惨不忍睹。又走了三天我们回到东安村，分散活动的学员都又回来了。”

“过了几天，三科派韦尧夫带人把海风阁、康君健的遗体运回，开了追悼会。会后把遗体送到清漳河东岸石门烈士墓，和左权参谋长安葬在一块了。”

“1943年4月，敌人又来‘扫荡’，这时机关已精简，我们转到太岳区转了几天，敌人扑了空。这一年天旱灾荒，每人供应由每天1斤减为4两，20多岁的小伙子怎么够吃。我们住在看后村，村西是大山，我们上山采榆树、椴树叶，晒干背回村里磨成面，和杂粮和在一起蒸窝窝头，贴饼子。平时挖地里的‘扫帚苗’、‘马耳菜’、‘刺菜’、‘惠惠菜’当菜吃。有一次滕代远参谋长召开司政机关干部会，报告节衣缩食度荒问题，主要介绍哪些野菜可以吃，有什么营养。到了秋天，教导队种的土豆成熟了，萝卜、茄子、豆角、白菜也收获了，生活渐渐有了改善。生活虽然艰苦，精神都很好，20多岁的青年整天活蹦乱跳。”

## 第二节 一二九师无线电教导队

1937年八路军主力到达华北，11月中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根据地的任务，该师在晋冀豫广大地区，配合地方党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开创了根据地。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1939年由罗瑞卿同志率领，从延安转移到晋东南的太行区。抗大中有一个不大的班子，集中了一些会无线电、有线电话、电报、旗语信号人员。这个班子先驻在黄烟洞一带，带了一部分学员研究和学习除了无线电以外的部队通信问题，后归一二九师三科领导。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军队人员增加，司令部决定举办无线电教导队。

### 一、第一期

1938年12月，在冀南威县北刘居小理海村举办了第一期，后转至辽县武金寺。教导队队长张有年（兼），指导员王之清，专职教员只有杨义，电台的同志均兼任教员。当时开设4门课，有通报英语、收发报、电学、政治。这一期因学员水平不一，学习进度不一，到1939年12月陆续毕业。

学员有50余人，分4个班，已知的有杨博、高清波、金志洪、高贯一、杨民先、吴惠民、彭恒、高泉恩、田增树、金坦（金朝吾）、王恒彬、胡坤元、曾玉光、张超、曹泽远、孙祥宗、史长河、邱顺（邱南禹）、贺贤保、高义、王明三、李宪坤、高迅。学员编为3个队，队下设班。

### 二、第二期

1939年12月，一二九师无线电教导队招收第二期学员，地址在山西辽县桐峪镇，毕业时迁至河南涉县索堡镇。教导队队长王之清，指导员贺伯升。三科长周维兼教收发报，王之清兼教电学，赵传壁教报务及英语。贺伯升教政治课。这一期到1940年7月毕业。

学员约50人，分编为3个排。一排是机务区队，约10人，有秦怀舒、王俊义等。二排是报务区队，16人，有刘逢晨（刘凤城）、刘兰印（刘敏）、郭保印等。三排是有线区队，约30人。机务队学习9个月，报务队学习6个月，有线队学习3个月。

### 三、第三期

1940年11月，招收第三期学员，这一期与第一期干部轮训班同时在教导队学习。地点先在桐峪镇，后迁至涉县会理村。队长王之清，指导员贺伯升，教员有赵传壁、李雁心、徐书洪等。

学员约50人。机务班有孙瑞武、王兆义、延步魁、阎火发；报务

班有咎绍西、刘园、张谦、杨虎英、娄和楠、师勇、宋吉更、杜立芝、孙兴华、高和枕、刘秋喜、杨鸿儒；有线班学员有郑鸿士等。

这一期于1941年4月毕业。

#### 四、第四期

1942年4月教导队招收第四期学员，地址在河南涉县会理标。队长赵伟、指导员贺伯升。教员有赵传壁、李有桂、徐书洪。因敌人扫荡，原定半年时间有所延长。

学员200余人，分编为3个队。一队队长王之清，学员70余人，学习报务；二队队长崔琪，学员70余人，学习机务；三队队长戴其尊，学习有线通信，学员60余人。

1943年初，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大部分学员毕业，尚余一个区队，根据前总指示，由赵传壁带领与前总第五期合并。

#### 五、干部轮训班（高训班）

1. 为了提高在职报务员的业务水平，1940年12月招收了第一期轮训班，地点在河南涉县会理村。这一期与教导队第二期同时在校学习。主要学习两门课，一是电学，二是政治。王之清讲无线电通信理论，贺伯升讲《论共产党员修养》。学员都是有实践经验的报务员，很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学会装配、维修收发报机、发电机。

参加轮训班的共10人。班长曹泽远，学员有陈试航、常纹、陈大义、罗振云、李春光、吴玉来、申健章、王子荣、袁增林。

这一期于1941年4月毕业。紧接着又招收第二期学员。

2. 第二期高训班于1941年8月开学，地址在河南涉县河南店村。学员由太行、太岳、冀南各部队抽调，负责人王之清。高训班讲授无线电原理、装配收发报机、维修电动机等。

学员20余人，分两个班。已知的有高义、高飞（高静普）、张春生、钟月林等。

这一期于1942年4月毕业。

赵传壁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39年年底到一二九师的，这时无线电教导队已办到第二期。我参军前学过无线电技术，所以调我到无线电教导队。1942年年初，一二九师无线电教导队第四期大部分已毕业，我带一个区队到八路军前总与第五期合并。左权同志说，教导队要利用抗日战争敌我相持阶段，多学点文化，把基础打好，以备大反攻时使

用。因此教导队增设了语文、算术、英文等课程。1942年5月日寇大‘扫荡’，前总教导队正在学习，敌人包围了八路军前总。在突围时，教导队伤亡不小，当时三科科长海风阁及康君健牺牲了，教员杜若失踪了，何暇同志背部受伤，‘挂彩’的有20多人。突围后又继续学习，直到1943年。到1943年10月，我与赵伟、李常春等4人到延安，分到延安通信学校。”

刘逢晨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39年冬到一二九师无线电教导队学习，当时住在山西辽县桐峪镇，以后又随一二九师部转移到黎城的一个农村。大约在1940年4月，我们又转移到河南涉县索堡镇，1940年夏在索堡镇毕业。我们是第二期，我们入学时，第一期还没毕业。这一期队长王之清，指导员贺伯升。教导队分3个排，一排学报务，二排学机务，三排培养有线电技师。全队大约八九十人。王之清教电学，赵传壁教英文及收发报，贺伯升教政治，三科长周维有时也来教课。”

常纹同志在回忆中说：“我开始没进教导队，是在电台上边工作边学习报务的。1940年11月底先随一二九师司令部通信科驻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附近的上吴村，后随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到河南涉县（今属河北省），轮训班住会理村。这个轮训班属无线电教导队，队长王之清，指导员贺伯升，教员有李雁心、赵传壁等。教导队正办第三期，主要培训报务员，此外还有机务班和有线电轮训班，两个班都是十来个人。”

“这期轮训班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4月，最初是10个人，都是电台在职的报务人员，有曹泽远、罗振云、陈大义、陈试航、吴玉来、申健章、李春光、王子荣、袁增林、常纹。有两个提前调走，结业时只有8人。”

“学校附近有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活动，轮训班学员与教导队的学员晚上轮流持枪放哨。当时生活很苦，我们曾到武安、阳邑等地背粮，往返一次需要两天多时间。但学员心情愉快，1941年春节晚会的欢乐情况，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这一期毕业后，随即办第二期，第二期学员比我们略多一些。我记得高义是第二期的。我们这一期与教导队第二期同一个党支部，一个伙食单位，毕业时间相差不远。”

### 第三节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晋冀鲁豫军区从日伪手中收复了邢

台、邯郸、菏泽、济宁、聊城、大名、长治、焦作等城市，使被分割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地区，西至同浦路南段，东至津浦路，北至石太和石德线，南到黄河的陇海线，这一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中央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辖一、二、三、四、六、七共6个野战纵队。根据这一变化的形势，需要改变由原来各地区培养无线电通信人员的情况，军区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统一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1945年10月，在河南武安县（现属河北）城南同会村，成立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学校的任务是为军区及所属各部队培训通信人员。军区任命军区三局局长吴泽光兼校长，三局政委林伟兼政委，梁骥任副校长，贺伯升任副政委。学校设教务处、政治处、总务处。

第一期学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0月入学30人，11月入学20人，这50人编为一队，称一、二班。他们有20人来自太行区，4人来自太岳区，还有从国民党十七师起义部队中选调来的，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1945年11月，又由太行、冀南地区调选学员60人，编为二队，12月又从各军区调来报务学员60人，编为三队，同时又调来学习电话的学员50人，编为有线队。这样，第一期共有4个队，有学员300余人。

干部来源是一二九师教导队的班底。而主要领导人是来自延安通信学校，还有一部分来自抗大总校附设陆军中学以及各军区。

学校设党总支，各队建立支部。各队有队长、指导员。

学制为半年至一年，课程设置有政治、收发通报、通报英语及电学常识。有线电队学习电话机原理及线路架设。

学校继承抗大及延安通信学校的作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学习上刻苦认真，情绪饱满，文化生活也十分活跃。1946年元旦春节之间，学校组织演出队，排练歌剧《血泪仇》、《周子山》及话剧《李有福回家》。全校人员都参加秧歌队，还编了一些小节目到农村演出。1946年2月2日，大年初一，全校师生在梁骥、贺伯升同志的率领下，到军区所在地伯延村向军区及中央分局首长拜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大家，军区副政委张际春讲了话。正月初二大家又组织化妆秧歌队到龙泉村，向边区政府拜年，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伍胜（戎子和）接见了大家，戎伍胜同志对大家讲了话，观看了学校的演出，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1946年2月4日校长吴泽光同志因病逝世，享年36岁。军区三局



在同会村召开了追悼会，刘伯承同志讲了话。遗体安葬于邯郸烈士陵园。陵园中记载其简历如下：

吴泽光同志，广东潮阳籍，学生出身，幼时曾务农，当过店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大革命时期，即深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影响，曾于汕头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失去联系。19岁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后入第二十五路军电台工作，因看不惯军中腐化逢迎现象，请假离去，到商船电台工作，未几失业。21岁考入常州中国工艺学校学机械一年，22岁考取伪交通部无线电报务员，先后在安徽芜湖、浙江定海等电台工作。1934年调陕西延长县油矿任台长。1935年5月红军进入该城时，率领所部加入当时之陕北红军。泽光同志到红军后，工作异常积极，对当时陕北红军无线电技术方面贡献甚大。是年在瓦窑堡即任我党中央军委通信学校校长，不久参加抗战东征。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任前总无线电总队报务主任。西渡后回校继任校长，直到1942年春调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秋回三局仍任通信学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分局局长。1946年吴泽光同志因劳累成疾，医治无效，不幸于2月4日与世长逝，享年36岁。泽光同志为人勤俭朴素，工作埋头苦干，以身作则，对人关心备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工作困难，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革命通信技术人员的模范。

吴泽光逝世后，由梁骥同志任校长。同年11月梁调离，由叶云章任校长。1947年8月叶调任军区通信分局副局长，由秦华礼任校长，贺伯升为政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政府迁至邯郸，通信学校于1946年3月也迁至邯郸，住城外东庄、刘家场、春厂。全校师生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修建飞机场烈士陵园，因此学习期限推迟了两个月。

1946年6月底，一队50名学员毕业，7月二队60人毕业，8月三队60人毕业。当时正值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所以毕业学员大部分到军区直属台及下属各军区电台、野战纵队或旅的电台工作。

1946年7月，刘邓大军进军鲁西南，向开封徐州地区的敌军出击，为避开敌人向根据地进攻，驻邯郸的机关向武安转移，通信学校又迁回同会村。

1946年8月，通信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学员共300余人，分编为3个队。第二期学员分别在1947年1月、2月毕业。

1947年6月，刘邓率7个纵队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开始战略反攻。8月太岳兵团二个纵队及一个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分别建立中原及豫陕鄂解放区。因部队主力已分散，通信学校的培训任务相对减少，于是保留校名，学员改编为一个大队，秦华礼任政委，贺伯升任副校长，张振文为副政委，赵传壁为教务主任，邢中里为副教务主任。1947年12月，学校迁至离三局所在地固镇只有三里的百官村。1946年梁调离，叶云章任校长。

1947年12月，学校招收第三期学员，共160余人，分编为3个队。学校在百官村进行“整党”及“三查”。1948年2月，学生增到350人，4月增至400人。

1948年5月9日，中央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地区所有通信训练单位均至河北获鹿县，与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1948年5月上旬，通信学校第一批学员300人到达获鹿李家庄，7月第二批共200人到达获鹿。

秦华礼同志在回忆中说：“通信学校大约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下半年成立，地址在河北省武安县同会镇。校长是吴泽光兼任，副校长梁骥，副政委贺伯升，政治处主任常乐，教务主任赵传壁，教育科长徐书洪，行政科长邵成有，我是政委。”

“共招过3期学生，即1945、1946、1947年各招一期，每期约300~400人。学生来源主要是地方保送的高小及初中学生。学生编为队，每队六七十人。队有队长、指导员，都是专职的。一个队一个伙食单位，有司务长一人。”

“学制是一年，训练目的是培养无线电报务人员。课程有英语，主要是上机通话用短语，也学拼音、读音、简单的会话。例如，‘我这里有一份特急电报请你先抄收’，‘请你立即回电’，‘某号电报有错误，请重发’，‘马上出发，请你发快些’等。此外有收发报课、电学、政治、军事课。”

“1947年下半年，因精简，对外还叫通信学校，实际上只有一个队，170人左右，机构也精简。学校只有3个文印员，一个文书，一个管理员，一个司务长。1947年12月，由同会镇迁至武安县百官村。1949年3月从百官村出发，经过13天行军到达获鹿，与晋察冀电专合并，叫华北军区电专。”

## 第四节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参谋训练队、机务训练队

### 一、通信参谋训练队

1948年1月，军区为了培养一批通信参谋，充实作战部队，从

各单位抽调一批老通信员、警卫员、侦察员和基层干部，集中加以训练，学习通信参谋业务。训练队于1948年1月在武安县西冶陶镇固村成立。学员有70余人，队长何轰，指导员贾×伍。学习的课程有电工常识、线路架设、电话修理、政治。训练队成立后不久，1948年5月，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急需架设由邯郸至石家庄的有线电路。这项任务交由通信学校有线电队与参训队共同去完成。学员学习没多久，即参加施工任务。到6月施工任务完成，奉令调至河北获鹿，与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合并继续学习。

## 二、机务训练队

1947年3月，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为了对付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要军区赶装一部广播电台，以便在必要时接替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这项任务由军区三局政委林伟、副局长王仕光以及钱文极等同志负责完成。机器从哪里来呢？想起以往的一件事：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扩大内战，迅速将军队向华北运送物资，在空运之前要在新乡、石家庄、北平设置导航台，一天一架美制C-13型运输机载6名技术人员及导航台从重庆飞往新乡。飞过黄河天色已晚，把已被我军占领的焦作误认为是新乡便降落了，我们得到一部完整的导航台。这部导航台一直未利用，于是决定将它改装为广播电台。1947年4月1日，和陕北广播电台一样，先播送《兄妹开荒》前奏，然后播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

在改制电台中，为了培养维修人员，决定办一期机务维修人员培训班，地址在河北涉县沙河村，队长钱文极，副队长王新生（女），由钱文极负责上课，学员50人。训练队成立不久，1948年5月，奉上级指示并入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 第五节 晋冀鲁豫边区广播电台

关于晋冀鲁豫军区通信材料厂的简况及广播电台的试制过程，林伟、钱文极同志都写有回忆文章。下面摘要选登钱文极同志的回忆文章。

“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的1945年9月中旬被分配到太行山

晋冀鲁豫大军区工作的，一起由延安出发的有 20 多位同志，领队是吴泽光同志（他是准备去晋冀鲁豫大军区司令部通信局任局长的，不幸他到目的地后不久因患破伤风病逝），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到达太行山区的山西省黎城县麻田镇。这是原八路军司令部的驻址，当时的八路军司令部通信科材料股就在麻田镇附近的看后村，我和丁古、张俊三同志就分配到材料股工作。”

“那时材料股工作人员约有 30 人，股长是王仕光同志，另有机务员吴本毅、王昭义、徐继泉、刘月桂、祝敬涯、李兴旺、张生意等同志。当时通信科的机关已搬到河南省武安县的同会镇。材料股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生产供部队使用的干电池，改装修理缴获的敌人电台，自己试制了电子并联式发射机和主振放大式发射机，并研制成功我军第一个地雷探测器。”

“我们在看后村住了四五个月，到 1946 年 2—3 月，因局势安定，搬到河北省冀中平原边上的邯郸峰峰矿区街儿庄。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进行了新的编组，成立了通信局，由于吴泽光局长已去世，由林伟政委兼任局长。局下设处，第一处是通信处，第二处是工程处。王仕光同志任工程处处长，处下设科，有器材科，科长黄风午同志，他是老红军，是和我们从延安来的。还有装配科，我任科长，另有一个工厂，厂长是丁古同志，也是和我们一起从延安来的。”

“这时虽编有一个工厂，但是厂内没有一部机器，只有少数制造干电池的工人，是个空架子。军区滕代远司令员、后勤部长杨立三同志非常支持通信工厂建设，从煤矿调集了一些车床和工人，丁古同志又到冀中平原一些新解放的县城去搜集机器和招收工人，工厂才逐步建立起来。”

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了抢占日占区和进攻解放区，想利用空运，很快把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运到华北前线。为此，他要把华北各地已被破坏的飞机场早日修复，以便尽快运送军队。有一次，派了一架运输机载了两套归航台飞往河南的新乡，为恢复新乡机场做准备。飞机过黄河时天色已晚，而飞行员又不熟悉地形，加之地面没有导航设备，他们看到地面有一大片灯火，误以为到了新乡，于是下降着陆，殊不知这儿不是新乡，而是解放区焦作！这样就连机带人一起被俘，这两套归航台亦为我所有。这是两套全新的，而且带有汽油发电机的全套归航设备，是美国 RCA 公司的产品。”

“除此以外，在抗战期间我们曾派人到天津，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买到过一批电讯器材，其中有大功率的真空管、硅钢片、漆包线等。”

“经过对以上物质条件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用这两部归航台改装成广播电台或大功率通信电台都是可行的，而改装成广播电台（一部短波、一部中波）即可转播陕北广播电台节目，又可增加对蒋军宣传的节目，意义更大。我们的意见上报后，军区领导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而且在麻田的看后村完成了短波和中波广播电台的设计工作。”

“把归航台改装为广播电台的任务，在看后村时大体上只定了技术方案，改制工作并没有展开，到峰峰矿就全面展开了。改制工作从技术上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把高频部分由中波、长波改为短波和中波的广播波段；二是增加语言的调幅部分的播控设备；三是电源整流部分要增加功率；四是设计制造短波、中波两种天线调谐电路。所以说原机的绝大部分都要拆掉后加以改制，并要增添新的东西。原机内的零部件很多都要改制，只是机箱的机板是用它原来的。但由于机内零件安装位置变动，因此面板的外形也与原机不同。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改制工作量还是相当大的，那时大家都没有搞过这样大功率机器的经验，人员又少，所以困难是不少的。”

“我们所需要的钢铁都是用破坏铁路得到的铁轨，所需要的铜材，只能采用铜线、铜钱，绝缘材料是用磁县产的瓷土烧制，铝板是先由张思宽同志（一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翻砂工人）用飞机残骸熔炼后铸成板材，再用刨床刨成。所需电表则是从飞机残骸中选出来改装的。没有适合的调制管做中波台的调制器，不得不选用仅有的两只814型高频速射四极管代用，这就需要自己选择适当的工作条件，并采取抑制寄生振荡的措施。”

“5月初这两部电台都已改装完毕，开始试验播音。1946年夏，通信局改为军区司令部三处，张永年同志任处长，林伟同志任政委，王仕光同志任副处长。”

“在沙河村安顿好以后，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除了架设新的发射天线以外，还要准备播音室和机房，实际上是进行一个广播电台的全部建设工作。为了安全，播音室和机房都设置在窑洞内。1946年8月底这些工作大体都已完成，开始试播，到9月初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始广播，电台就安装在我们的驻地沙河村。”

“电台开始广播后，工作一直比较正常，当时即听到外地的反映，说邯郸广播电台的播音质量较好，我们感到十分高兴！以后为了确保电

源供应的可靠性，把汽油发动机改装为烧煤气代替汽油，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工厂厂长丁古同志和电台动力负责人祝敬涯同志主持进行的。电台正式工作后，即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台长是常振玉同志，在工作上，他们和我们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1946年8月以前，全处的工作主要是改制广播电台和筹建工厂，装一般军用电台的任务较少，到8月以后就转到以生产一般军用电台为主了，共生产了两批用电子并联式的发报机组成的电台和15部自己研制的地雷探测器。”

“1946年12月，中央来电指示，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挽救败局，召开了伪国大并准备进攻延安，中央要求晋冀鲁豫军区尽快做好接替陕北广播电台的准备工作。我们当即研制了改为陕北广播电台频率的晶体，准备随时把邯郸广播电台（短波台）改变频率供陕北台使用。”

“到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又来电要我们做好接替陕北广播电台的充分准备，我们为保持邯郸的短波台播音不致中断，立即决定将邯郸广播电台的中波台改为短波台来接替陕北台的任务。”

“我们奋战了约一个月，在1947年1月电台已全部改装完毕（包括架设一个大天线和布置一个新的播音室），发射机和邯郸台放在一起，天线架好后一调试，全部顺利通过，没有任何返修工作，说明我们的工作质量还是很好的。汽油发电机用油过多，改用烧木炭的旧汽车发动机又不稳定，因此杨立三部长调给我们一台锅炉和蒸汽机，我们盖了一个地下机房，较好地解决了电源问题。3月中旬，锅炉和蒸汽机也都安装完毕，试车成功。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都监听着陕北广播电台的播音情况，就在我们胜利完成动力建设后不久，大约是3月21日，听不到陕北台的播音了。等了15分钟，仍听不到陕北台的声音，我们十分焦急，真希望立即接替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广播稿子，只能开机以陕北台的呼号呼叫，并广播说由于机器发生故障，明日再播音。”

“随后，我们立即把听不到陕北广播的情况向通信局领导作了汇报，并希望上级把广播稿转来让我们早日接替陕北台的工作。经请示中央后，就在第二天，广播稿转来了。我们提出立即接替工作的要求完全是出于一股激情，果真来了稿子，才发现没有广播员，怎么办？邯郸台是有广播员，但不能共用，因为别人一听就知道不是陕北台而是邯郸台。临时要上级单位派广播员又不是几天内能到的。最后只好在我们单位内选普通话说得较好的女同志来临时充任，结果就找到徐路同志，她勇敢

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即拿过稿子练习。当天晚上7点开始广播时，我们这一套人马从油机员、调配员、播音员以至处的领导，全部上阵，全神贯注地坚守着各自的岗位，把广播稿顺利地播了出去。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欢呼庆贺，到处充满着欢歌笑语。我们为保证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在天空中不间断地传播做出了贡献，为此同志们感到自豪，感到光荣！”

“我们这样坚持工作一个月左右，新华社领导人廖承志同志带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到达了太行山，驻地就离我们沙河村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他们很快就把我们临时承担的任务全部接过去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就在太行山里扎了根，工作转入正常状态。陕北广播电台在播音结束以后，还接替了新华社的文字广播任务。廖承志同志代表中央对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样一件工作任务表示祝贺和慰问，还请我们二处的几位负责同志吃了一顿饭。”

“1947年7月，我军缴获了两部美制BC-610型400瓦报话机，通话时输出功率可达到250~300瓦，其中一部比较完整，另一部在运输中损坏严重，经过整修，我们总算有了一部备用发射机。”

“经过一段试用比较，原有两部发射机广播效果较好，分别为陕北台、邯郸台使用，美制40瓦报话机发报功率较大，则用于文字广播。这样3台发射机又用又备，保证了工作的正常进行。”

## 第八章

### 新四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 8 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在南方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1937 年 10 月 12 日，根据国共双方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宣布，南方 8 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

新四军军部 1937 年 12 月 25 日在汉口成立。1938 年 1 月 4 日至 6 日，由武汉移驻南昌。2 月至 5 月新四军集中皖南岩寺进行整编，4 月 5 日军部离南昌到安徽省歙县岩寺，将南方游击队编为 4 个支队 1 个特务营。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以后建立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豫皖挺进支队司令员李先念。

1940 年 11 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陈毅为正副总指挥。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央军委重新组建新四军，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 月 28 日新编新四军在苏北盐城成立，将全军整编为 7 个师及一个独立旅。



1942 年和 1943 年，新四军进行两次整编：一师兼苏中军区，师长粟裕，政委钟期光；二师兼淮南军区，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三师兼苏北军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四师兼淮北军区，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皖南军区司令员赖毅，军区政委刘子文；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

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下辖苏浙军区、苏中军区、二师兼淮南军区、三师兼苏北军区、四师兼淮北军区、七师兼皖南军区。

新四军还在各地设办事处，驻河南竹沟设留守处，彭雪枫兼主任。

军部当时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一科作战，二科侦察，三科通信，四科行政、后勤。三科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杜剑秋，无线电总队队长胡立教（兼），副队长吴志恒。

军部设总台、二台、四台、新闻台。1~4 支队各有电台，设电台中队长。

总台（一台）住茶里张家，队长袁德钧，后曹丹辉（兼），报务员有温凤山、张克南、陈达云、冯飞、何军、陈向心、郭隆辉、李树政等；二台住东山，队长罗兴英，报务员龙杰、黄立强、江克斌等；三台住岗上李家，队长温亮彰，报务员有赖平、廖希贤、吴茂达（吴群）、李仕毅；四台住丁家山，队长袁德钧，副队长王振芳，报务员陈家和；新闻台队长陈文全，报务员吴定潮、谢佩玉等。

一支队中队长李景瑞，区队长廖昌林；二支队中队长江如枝，报务员周光华、韩迅、王克进、翟宗和；三支队队长温凤山以后秦焕臣、郑家璜、郭全海、王振芳等，报务员孙洪、秦贤成等；四支队队长颜吉连、罗映清；以后又成立五支队，队长罗映清；六支队队长颜吉连。1939 年 5 月成立江北指挥部，地点在东汤池，队长黄荣。皖南事变后，

江北指挥部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

## 第一节 新四军军部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一、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军部通信人员培养情况

#### 1. 第一期

1938年4月，军部在安徽歙县岩寺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主任由军无线电通信大队副大队长吴志恒负责，教员由电台人员轮流担任。

学员有向瑞桃（班长）、郭日忠、邹日先、郑敏、钟子良、钟显润、肖朝桂等10余人。这一期于9月18日毕业。

#### 2. 第二期

1938年5月，在安徽太平举办第二期。班主任先为吴志恒，后为曹维廉，教员仍由电台人员兼任。

学员40余人，分为甲乙班。学员有王大鉴、邱登龙、郭全海、李炳祥、黄志炳、于圣和、徐翔、郑家璜、郑承振、谢吉奎、胡正伦、周志华、汪质彬、朱启明等。这一期于10月毕业。

#### 3. 第三期

1938年9月，在皖南云岭举办第三期，班主任曹维廉。

学员10余人，有程希道、郭继姜、刘家福、许家和、陈达云、罗兴英、刘恋、刘生雄、李斌祥、杨恩肖、杨石伦、何军、刘灿群、冯灿、金振文等。这一期于1939年2月毕业。

#### 4. 第四、第五期

1938年2月，军部举办第四、第五期训练班，班主任曹维廉。学员50余人，学习一月后，经过考试分为甲、乙班。甲班为第四期，乙班为第五期。

学员有邱永裳、林荫、颜飞、张翼、洪飞、汪志祥、陈宝远（陈超）、吴兴、禹文东、王启智等10余人。这一期于1939年6、7月毕业。

1937年12月至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共办五期，培养学员125人。

关于新四军初建时的通信工作，《新四军通信兵回忆史料选编》中有一综述，摘录如下：

我军成立初期，通信人员特别是无线电报务人员十分缺乏。为加强我军通信建设，中央军委三局仅1937年底到1938年底的一年中，就从

延安派出 20 名通信人员到新四军。同时，军委三局还在延安举办了一个 40 多人的机务训练班，为新四军培养机务人员。机务训练班开训时，王诤局长到会作了指示并亲自讲授电学和机务知识课。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新四军从事机务工作。

我军为发展无线电通信，以适应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的需要，除军委三局派来部分通信干部外，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各类通信人员。

军部在南昌时，就开始筹办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简称电训班），从各单位选调学员。军部第一期电训班于 1938 年 4 月在岩寺开训，有学员 10 余人，第二期电训班于 5 月在太平开训，组织初期训练，如背记电码、符号等。真正开始训练，还是在军部进驻云岭以后。军部在岩寺成立电训班时，由军无线电台通信大队副大队长负责电训班工作。电训班还设有政治指导员。由于通信干部缺乏，电训班的教员大多是兼任的，吴志恒教收发报课，曹维廉兼授英文通报和机务课，收发报训练的教员由军部电台技术好的报务员轮流担任。只是到第四期，才将英文较好的学员彭××改为专业英文教员，但他只教了两期就去世了。电训班学员大多来自作战部队，也有从机关抽调的和入伍的学生兵，文化程度一般是小学、初中。

电训班的训练，从当时部队迅速发展急需无线电通信人员出发，学制一般半年，采用突击速成的办法，急用先学，以收发技术为主兼顾学习军事、政治。学习的主要课程有：①收发报课，主要练习字码、阿拉伯数码的抄收与后发。②英语会话，要求熟记和正确使用通报勤务用语。③机务课，学习无线电基础知识，包括电台的使用和简单故障的排除。④政治教育课，主要讲授我军的光荣传统和时事政治。在专业训练中，电训班提出的总的要求是：“准”、“清”、“快”。“准”就是指拍发和抄收电报要准确无误；“清”就是电报要发的清楚，抄收的也要清楚；“快”就是收发报要快，通报速度要快，处理电台勤务要快。

军部电训班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训练的。首先是没有教材，只好采用教员讲、学员记的方法，曹维廉负责电训班工作后，自编了《英文 30 课》和《机务 30 课》等教材。其次是物质条件很差，照明用油灯，借来的桌凳也残缺不全。再次是缺少训练器材，蜂鸣器只有几个，有的耳机只剩下半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部电训班仍为全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无线电报务人员。

电训班的训练，每期之间是交叉进行的，前一期刚开始一两个月，后一期训练又开始了。学员从电训班毕业后，一般先到军部电台见习一

段时间，然后再分配到全军各个单位。仅1938年到1939年底，军部电训班就办了5期，培养了报务员143名。

军部在大力培养无线台通信人员时，还十分重视对有线电等其他类通信人员的培养。1938年底，三科组织各支队电话员及军部电话排的战士进行集训，由军部电话排排长黄宛年主讲电磁学和电话机的结构、原理及维修，沈阿明指导架设外线和爬杆。同时还采取师傅带徒弟等方法，培养了部分司号员和徒步通信员。

我新四军所属各支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也积极克服困难，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各类通信人员。

1938年底，中原局便在竹沟举办了有30余名学员的电训班。主任颜吉连，支部书记史干。无线电学由缪伦讲授，颜吉连讲授通报勤务课，收发报基础训练由颜吉连、史干和张起信担任。3月上旬，陈士吾大队长由延安到达竹沟后，有时亲自给学员上发报课。6月，电训班结束训练，学员大部分分配到中原局所属各部队。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与先期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地区。8月，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苏北指挥部在黄桥镇成立了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简称电训班）。学员10余人，来自司令部侦察连、挺纵文工团和抗大五分校等单位。指挥部电台中队长李景瑞任教务主任并兼收发报教员，三科长陈旺讲授电学原理。11月，华中总指挥部在盐城成立，苏北指挥部电训班与中原局电训班、江北指挥部抽调的部分学员，合在一起训练，共40余人。

皖南事变后，军部三科将苏北指挥部电训班、中原局电训班等合编为军部重建后的第一期电训班。电训班主任黄子坤，后曹维廉，教员孟勇、廖年，学员排长任希文。后因工作需要，将原苏北指挥部电训班的10余人定为速成班，于1941年4月先期毕业，其余30多人为大班，于5月毕业。

1940年10月军部转移到阜宁西南的停翅港后，又开办了新军部成立后的第二期电训班。学员30多人，大多来自抗大五分校，编为4个班（其中一个女生班）。电训班主任曹维廉，政治指导员郭力军，文化教员陶植，报务教员孟勇、刘恋、胡莹，英文通报和电学原理由曹维廉兼教。该电训班于1942年5月毕业。

新军部成立后所办的两期电训班，学制均为8个月，较皖南事变前军部电训班学习时间长一些。主要课程政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英语（英语通报用语）、电学（电工基础和无线电原理）、收发报

及电台实习。训练条件也十分艰苦,由于电讯器材缺乏,每个班只能发两三个蜂鸣器,发报练习是换人不停键的。经过刻苦努力,到毕业时,大多数学员发报达60~80字每分钟,数码抄报也能达到120字每分钟。

电训班的学员年龄多在20岁左右,主要来自部队和学校。他们经过了反“扫荡”作战的锻炼和抗大严格的军政教育,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较丰富的军事生活经验,素质较好。在军部三科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下,电训班也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曹维廉。电训班党支部十分注意对全体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家不断提高对通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激励学员刻苦学习技术。在寒冷的冬天,学员们穿着单薄的衣裳,上课时常冷得打战,手指冻肿得像胡萝卜一样红,拿不住铅笔,只能抓在手里抄写,但学员们不仅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点不叫苦,而且还要求教员发得快一点,以期早日学好报务技术,为打败日本鬼子做贡献。电训班党支部还采用上大课和个别谈话等方法,经常对全体学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教育,有不少学员在毕业前因工作表现好,学习成绩优异而被吸收入党。

从1941年1月到1943年底,因敌人“扫荡”,战斗频繁,部队精简整编,军部电训班只办了两期就暂停了,由各师自己培训人员。军部三科派出电训报务教员孟勇到各师轮流教学,在二师、三师和七师各办了一期电训班,后因敌人封锁,没有能够到其他各师去,孟勇同志就留在七师工作了。

军部三科在大力培训无线电报务人员的同时,还注意指导各师通信部门采取师傅带徒弟等方法培养各类通信人员。

一师1941年开办了第一期电训班,培训学员10余人。二师于3月开办第一期电训班,学员22人。三师在1941年共办电训班3期,培养报务员40余人。四师1941年共办电训班3期培养报务员60余人;办司号员训练班一期,培养司号员10人;1942年,师部三科抽调各旅、团电台队长及老报务员进行轮训,时间一个月;集中营以上通信班长进行轮训,统一旗语,交流经验;由各旅集中号长轮训两个星期。七师1941—1942年,由师电台中队长李树政带出两批报务员共6人。

1944年秋,为迎接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到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军部三科从所属一、二、三、四、六师及军直属队选调了65人,并在淮北中学和其他学校选调了8人,共计73人办了电训队(含机务班学员11人)。在这批学员中,有政治指导员、文化教员、专职党支部书记、排长和书记等排以上干部11名,班长级(班长、文书)人员占绝大

多数；学员中党员有 56 名，占总人数的 86%；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占总人数的 60%，小学占 40%；年龄大多在 17~21 岁。他们无论在政治素质、文化程度和身体状况上都是很好的，这在当时对敌斗争十分尖锐、干部和骨干十分缺乏的条件下，能够抽调这批质量较好的人员来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充分体现了各级领导对通信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由于各师被日伪分割，交通困难，直到 12 月中旬，学员才陆续到齐。先到的学员在距黄花塘 10 多里的电训队驻地岗村，着手修建房屋，建造“干打垒”式的简易校舍，自筹粮草。成立了军人俱乐部，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组织文艺演出，向驻地群众做抗日宣传。

12 月底，电训队正式开学。军部三科副科长黄荣作了动员，机务室主任曹维廉讲了话，王殿春主持会议并宣布训练计划。电训班班主任王殿春兼教收发报和英文通报课程，政治指导员李志侠，教员李果负责收发报课和器材物资保障。教员胡莹，管理员梁多，会计李保和，军医周超，司务长、饲养员、通信员各 1 名。

开训后，电训队的学员首先参加了整风学习运动。1945 年 2 月上旬，日军准备向我军部所在地黄花塘地区进行“扫荡”，根据军部指示，电训队于农历正月初五凌晨冒着严寒，随军部向西南来安县方向转移。为摆脱日伪主力追击，军部几乎每天黄昏行军，半夜宿营，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转移，电训队随军部到达来安县半塔一带，通过天长县的汉涧，最后转移到天长县葛家巷庄，电训队驻在离军部不远的大苏庄。由于这一时期对敌斗争的需要，整风学习是利用间隙进行的。5 月初，形势相对稳定，电训队由大苏庄转移到天长县的大通镇后，便开始了紧张的业务训练。8 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失败已成定局，日伪蒋合流反共，电训队随军部分水、陆两路北上，经一周的行军，9 月中旬到达苏北淮阴城东关慈云寺扎营。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电训队业务训练进一步加紧，增加了上机实习时间，少数技术较好的学员直接上工作电台实习。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江南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三师、四师的一部调往东北，并同时成立了以陈毅同志为首的津浦前线指挥部。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军部电训队结束了训练，学员于 9~10 月陆续分配到各部队，奔向祖国解放的战场。

我军坚持华中敌后游击战争，没有安定的驻地和稳固的后方。因此，通信人才的培养只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采取上下结合，培训、集训与在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军部在南昌时，就开始筹办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从各单位选调学员。我军第一期电训班于

1938年4月在皖南岩寺开始训练，参训学员10多人。截至1944年8月，我军培训的机报人员就达552名。除了开办训练班培养人才，七师第一和第二期电训班的6名学员都是师无线电台中队长李树政带出来的。1941年夏，四师三科从师部40多名电话员中选了20人，组织在职学习，培养为电话技师和电话排长，分配到所属部队，解决了电话技术人员的不足。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全国广大爱国青年纷纷参军，立志抗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曾经在大城市学习过通信技术。我军根据中央指示，对他们采取了“容”（争取其成为抗战干部）、“化”（使其革命化）、“用”（发挥其特长）的方法，进行培养，使之迅速成长为我军优秀通信人才。为争取一切力量进行抗战，新四军还吸收了国民党军队和伪军中的一些通信技术人员，使他们在党的教育下，不断转变思想，成为我军通信专业队伍的一分子。

向瑞桃在回忆中说：“1938年1月2日，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去学报务，由江渭清同志带领我和另一个学机务的同志一同走。到了军部（南昌市三眼井左侧巷13号），分配我到电台，电台队长袁德钧，见习报务员刘发海。电台功率是15瓦的用手摇发电机。他们工作很忙，我去后就帮他们送送电报，打扫卫生，摇马达。袁队长叫我背电码符号和英文字母。”

“1938年4月，军部从南昌向岩寺开进，袁德钧和他带的电台留下了，袁让我随军部走，到岩寺去学报务。到了岩寺，我看见一部50瓦的电台，用的充电器，曹丹辉同志在那里，曹找我谈了话，让我到电训班去当班长。我们那期是新四军第一期训练班，是在岩寺成立的，有20名学员。电训班设有政治指导员，名字记不清了。收发报教员吴志恒，是从三战区来的。1938年8月，曹维廉同志到了电训班任主任。第一期于1938年9月18日结业。后很快又办了第二期和第三期。”

“1943年，一师二旅旅部有通信连、电话排、司号排。我未到旅部之前就开办了一个电训班，学员有13人，我去后接着办，于1943年初结业。”

徐翔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38年4月从新四军二支队教导队选调至军部电训班学报务的。从二支队调去的有郭全海、邱登龙、李炳祥。电训班共17人，编成两个班。一班有向瑞桃、郭日忠、黄志炳、肖开桂、郑家璜等8人，由向瑞桃任班长。二班除二支队来的5人外，还有王大鉴、刘家福、周辉华共9人。电训班主任曹维廉兼教英语、机务，军部二台队长吴志恒兼收发报教员。学习条件很艰苦，没有课堂，

没有桌凳，也没有教材。英语和机务教材都是曹维廉自己编写的。向瑞桃一班为第一期，1938年8月毕业。我们二班为第二期，1938年10月毕业。”

“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将部队整编为7个师，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司令部三科长李景瑞……师部第一期电训班主任由廖昌林兼，报务教员由一台报务员朱隼亚兼，机务课由机务房兼。第二期电训班编到抗大九分队去了，由王惠霆同志负责。”

邱永裳同志在回忆中说：“1938年10月参加新四军，那时部队驻在皖南云岭。我先在军部教导队学习3个月，毕业分配工作时，我提出想学习无线电技术。因为，我在家时业余学过一点，有一些基础。同时，军部正在开办电训班，曹维廉同志到教导队招生，他了解我的情况后说，你学过一点无线电知识更好。隔了几天，我就接到去电训班学习的通知。军部驻云岭时，三科也驻云岭，无线电大队驻罗里张家，电训班就在罗里张家的祠堂里，我们这期电训班是军部第五期，有四五个教员，负责教报务、电学、英语和政治课。有3个学员班，我担任一个班的班长。3个班不是同期开学的，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学员大多数是从教导队选来的，也有一部分从部队选来的。我们这期结业后还办过5期，每期间隔一两个月。”

张翼同志在回忆中说：“1939年3月，我从新四军教导队二大队（政治大队）选调到新四军军部电训班学习无线电报务，当时军司令部三科长胡立教，无线电总队长曹丹辉。电训班隶属无线电总队建制，训练班主任袁德钧（兼教收发报课），曹维廉教英语、电学和收发报原理，报务教员李树政，还教收发报和英语通报会话缩语等业务课，政治文化教员王××。此外，还从第一期学员中留下的陈定远任排长，负责生活管理等行政事务，景国良任政治战士，协助作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电训班的组织非常精干，工作分工具体明确，工作作风深入踏实，干部与学员吃住在一起，工作效率很高。训练班的训词同军政大学校训一样，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训练班住在安徽泾县云岭镇东面山林深处的一座祠堂里，房舍总计约三四百平方米，课堂和宿舍挤在一起，教学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第一期开了一个班，学员10多人，我们是第二期，学员人数约40人左右。起初也是开一个班，由于学员有的是从教导总队政治队和从青年妇女中选调来的，他们是从上海等城市参军的青年学生，有的是从前线部队选来的青年战



士。因此学员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有很大差别，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训练，便分为甲、乙两个班进行训练。当时教学条件极其艰苦，学习十分紧张，每天要学习 10 多小时，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废寝忘食，苦学苦练，盼望早日结业奔赴杀敌战场，承担起通信联络的光荣使命。第二期甲班约 20 人左右。”

## 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情况

### 1. 第一期

1941 年 2 月，军部三科在盐城，将苏北指挥部电训班、中原局电训班合并，组成第一期报务训练班，班主任曹维廉，支书兼队长任希文，教员黄子坤。学员 40 余人，于 1941 年 4、5 月毕业。关于苏北指挥部、中原局电训班的情况，另有记述。

### 2. 第二期

1941 年 10 月，军部在苏北阜宁停翅港举办第二期训练班。班主任曹维廉，指导员郭力军，教员有陶植、孟勇、刘恋等。

学员 38 人，编为 4 个班，其中有一女生班。一班：周平、杨彤、王俊臣、陈伦、王兴、张滚、刘华、潘文。二班：张福康、屠勇斌、廖亚生、朱华山、王振山、张明忠、葛顺华、乐更新、范铮。三班：傅志义、韩光、蒋启明、娄辉、潘希敏、周邦、彭俊、罗超群、冯刚。四班：吴秀丽、方贞、袁文、徐义宁、李仁秋、孙企英、王瑞芬、郭瑛、汤翠娣、吴文华、林伯英、爱群。

这一期于 1942 年 5 月毕业。

### 3. 第三期

1944 年 10 月军部举办第三期报务训练班，地址在淮南黄花塘附近的岗村。班主任王殿春，政指李志侠。开学后，学员首先参加整风学习，1945 年 4 月底结束，5 月开始训练，9 月在江苏淮阴毕业。

学员 73 人（含机务班 11 人），刘兴、田磊、徐寒、张荣才、张志伟、周传洪、薛勇、鲍其才、张锡官、王子堂、王学成、吴广华、徐家龙、顾祝南、顾登华、顾普、袁述、闵杰、陈自金、廖永进、魏浩、魏建国、瞿中义、何勇、丁振邦、江超、张继光、朱连光、单延举、陆启祥、孙耀春、王会祥、王素慧（女）、孟西微（女）、田文、俞清雅、金泉、周勋、张永玉、芮连宝、夏福礼、王子金、张松、韩保荣、陈世恒、王镇江、方保寅、王文金、石明先、张建勋、冯萌楠、周信臣、肖××、徐××、吴春满等。

机务学员有徐刚、张光正、王传华、金成浩、韩松、韩连城、杨云山、王高明、宋琴、张启尧、冯允光。

## 第二节 新四军一师、苏北指挥部、苏中军区、苏浙军区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新四军一师，是由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合编发展演变而成的。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构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任正副指挥。1940年7月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苏北指挥部编为第一师。1941年3月，苏中军区成立，第一师领导机关兼苏中军区。1942年1月，第六师并到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兼司令员粟裕，副师长叶飞。

为执行党中央向华南敌后发展的方针，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一师主力渡江南下，1945年1月在苏浙边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

1940年11月，为了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陈毅为正、副总指挥。所属有苏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鄂豫挺进纵队、八路军四纵队、五纵队。

华中指挥部无线电大队长陈士吾，政委李景瑞，一区队长张翼，二区队长廖昌林。

1941年一师成立后，一师三科科长李景瑞，电台中队队长李景瑞兼，副中队队长廖昌林，1942年廖昌林任中队长。一台台长温诤，二台台长廖辉，三台台长朱隽亚。报务主任陈向心、程希道、徐翔等。

### 一、苏北指挥部与新四军一师电训班

#### 1. 苏北指挥部电训班

1940年8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苏北黄桥举办第一期电训班。班主任李景瑞。

学员18人，班长徐整（又名文忠），学习组长朱隽亚，学员：龙臣、季金龙、王惠霖、刘颖水、余家东、王乃坚（女）、孔令华、徐炳全、张景签、唐泳海。

皖南事变后，与新四军军部电训班合并，住盐城中山街14号。这一期于1941年5月毕业。

## 2. 华中总指挥部无线电大队训练班

1940年12月，华中指挥部无线电大队举办训练班，班主任黄子坤，后为曹维廉。学员30人，如陆延年等。1941年夏毕业。

## 3. 新四军一师电训班（第一期）

1940年10月在盐城至泰（州）东地区举办第一期电训班，负责人曹维廉、俞炎白、廖昌林，教员有陆延年。学员由各旅及直属队抽调。

学员大约40人，他为3个班。已知的有朱振国、杨明达、汤聿文、宋根传、张乃宜（来一）、虞俊杰、周鹤林、王立人、陈超雄、金欣（女）、谢倩（女）、张逸秋（女）、应仁浩、汪文辉、刘颖水、唐炳海、徐炳泉、王惠霆、季登龙、张平。排长任希文。

这一期学员分两批毕业。1941年6—7月全部分配到电台工作。

## 4. 新四军一师电训班（第二期，又称民众学校）

1941年8月，一师举办第二期电训班，因日寇对苏中地区进行“扫荡”，电训班迁至海安以东李堡、唐洋、角斜地区，对外以“民众学校”名义做掩护。校长李景瑞，教务主任陆延年，教员有吴坚、余春舫等。

学员24人，有3名女同志。他们是：斯简、干一（管永）、常纪明、张继良、胡健、樊邦协、左汉民、王模、包新成、汪波、张克、秦基、陈友堂、朱撤、管朝彦、黎明（女）、高俊（女）、易民生、黄耀东、顾时特、司徒志、周慕蓉（女）等。

这一期于1942年元旦毕业。

## 5. 新四军一师电训班（第三期）

1942年2月举办第三期电训班，负责人朱隽亚，教员余春舫，陆延年在机务室工作，也兼任教员。

学员24人，有：曹彬、诸琦、陈有渊、张宫强、李忠、朱安庆、董坤、应础、陈峰、吴醒、沈惟白、王光跃、谢轲、周坚泉、蔡华勤、季凌、汪弘、周坚泉、陆戍（女）陈露（女）、郑惠英（女）、陈碧（女）等。

这一期开学不久，随抗大九分校活动，于1942年8月毕业。

## 二、苏中军区电训班

1941年3月，成立苏中军区，1942年11月，六师合并于一师。第一师领导机关兼管苏中军区。

### 1. 苏中军区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

1944年11月，苏中军区成立电训班，队长郭日忠，支部书记解

决，教员王惠霆、杨觉非等。学员约 50 人。

因学员学习进度不同，1945 年 5 月至年底，陆续毕业。5 月毕业的有赵碧、王鼎、史雷（女）等 3 人。8 月毕业 15 人，有金应成、林芝根、常任佐、李苹等。1945 年底毕业 30 人，有朱壁、周文海、丁文海、金育才、周中正、黄杰（女）等。

## 2. 苏中军区第二期电训班，华中雪枫大学三大队十中队

1946 年 1 月，招收第二期学员，地址在苏北东台县城内（司令部所在地），以后搬到界首苏家嘴。

队长廖昌林（兼），副队长王惠霆，政指王维善，副政指施政，支部书记冷敏，教员有陈金瑞、杨觉非、张汶、刘华（女）、肖克贵、阎永甫、彭太连，干事张平。

学员共 132 人，如施亚寒、平凡等（详见同学录，本文从略）。

学员分机务班、报务班、速成班。1946 年 4 月速成班 10 人毕业，机务班 10 人留苏中军区，其余报务班全体学员并入华中雪枫大学第三大队第十中队。队长余永明，教务主任王惠霆，政指王维善，副政指施政（后阎宪章），支书冷敏（后张平）。教员有杨觉非、严更生、彭太连、李大愚（李冰宿）、陈金瑞、张汶。

这一期学员是分批毕业的。1946 年 6 月下旬，苏中自卫战开始，电训班由界首向兴化转移。9 月 6 日，第一批 32 人在距淮安不远的苏家咀毕业。第二批学员于 11 月 9 日在陈桥毕业，共 49 人。12 月 3 日第三批 23 人毕业。

1946 年 12 月部队进入山东，电训队归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三科领导，进入沂蒙山区。1947 年 5 月在杭崖村第四批学员 28 人毕业。

1947 年 5 月，余永明调离，王惠霆任队长，张平任支部书记。

1948 年 4 月，在濮阳西辛店，第五批学员 50 人毕业，8 月第六批学员 20 人毕业（从胶东调来）。后转移到山东曲阜，10 月第七批 7 人毕业，其余 40 余人在渡长江前毕业。

## 三、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浙南特委、苏浙军区、上海地下党通信人员培养情况

### 1. 浙东游击队电训班

1944 年 1 月 5 日，为了创建浙东敌后根据地，成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委兼党委书记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电台区队长钱刚，副区队长颜飞，设有一联络台及新闻台，另外有一侦听台。

松沪支队电台队长王光，金萧支队电台队长冯凌，宁波地区电台队长彭××，山南地委电台队长陈国良。当时报务员很缺，于是决定举办电训班。

1945年3月9日，在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梁弄镇举办电训班。班主任杨晋，指导员刘嵩（女）。杨晋兼课，此外还有朱良。

学员23人，学习5个月，7月20日在上虞县辛家埠毕业。学员有邹德华、同平凯、马根生、康棣、姜峻梅、赵士敏、陆泉海、何柏成等。

## 2. 苏浙军区电训班

1944年底，粟裕率一师主力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抗日根据地。1945年1月13日在长兴地区温塘村成立苏浙军区。《双十协定》后，部队北撤，编为华中军区，一部分力量仍在浙南坚持斗争。

1945年4月，苏浙军区在浙江长兴县仰峰卡村，举办电训班。负责人徐炳泉，副队长张炳生，教务主任余春舫，教员顾舜等。抗战胜利后，部队北撤，并入山东军区通信学校，于1945年底毕业。

学员有乔义富、丁文焕、周仁、朱元庆、黄清云、毛之光、季斌、刘向荣、礼杰、环明等。

## 3. 浙南特委电训班

新四军一师主力北撤后，留下的人员决定建立电台。徐炳全同志后来到了浙南，经过努力，于1947年1月，建立起电台。同年9月，特委决定办电训班。

### ① 第一期

1947年9月，学员4人，他们是李尔宽、关策、叶善龄、林存球。训练班负责人及教员均为徐炳全。

### ② 第二期

1948年1月举办第二期，学员6人，有陈先觉、郑修良、施立松、方家溪、王庆罔、李仁达等。1948年秋毕业。

### ③ 第三期

1949年4月，为了迎接大军南下，迎接浙南解放，举办第三期，学员13人，有朱国荣、邓孙馥、蔡杨蒙、李志庄、陈根秋、林思韬等。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学员即参加接管城市工作。

## 四、三野电训大队

1947年2月成立华东军区，将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下辖鲁

中、鲁南、胶东、渤海、苏中、苏北等军区。1948年3月14日，苏北、苏中军区合并为苏北军区。

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各部队按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第四野战军。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十兵团兼苏北军区。

1949年3月，三野司令部三科组建电训大队，陈国材任大队长，阎宪章任教导员，余永明任副大队长。下属3个中队；一中队长王惠霆；二中队队长李大愚，政指徐步桢；三中队副队长奕尚荣。渡江后划归三野干校领导，编为一个直属大队，住徐州以东炮车地区。

### 五、三野电训大队合并到华东通信学校

1949年春，电训大队渡江进驻常熟地区。1949年秋，电训大队奉命到安徽马鞍山慈湖镇，与华东通信学校合并，以后迁南京。

### 六、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无线电训练班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了上海，地下党在上海成立难民工作委员会，加强对难民的领导。新四军在皖南成立后，要求上海地下党培养技术人才，输送物资，以支援战争。

1938年7月1日，地下党领导的慈联总会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学员主要是难童和少量年轻教师。他们经过语文（写一篇怎样做好公民的作文）和数学两门考试，合格后录取，全班共50人。

校址设在上海宁波路190号原川康实业银行三楼，不久慈联中学和报童学校校本部也设在该处。训练班的教室设在宁波路神州中学，对外称神州中学无线电班，校长许德良。

无线电教师李穆，每天下午5:00—7:00上课。机务课教师龚淡樵，是大同大学的学生，放学后兼课，内容有电工学、无线电学、收发信机线路与原理。政治课教师朱启銮，教授哲学、政治常识、社会科学基础。英语数学教师杨昌镛，音乐教师青浦，体育教师冷风。

学校行政管理由姜澄衷、陈正明负责，两人都是党员。慈联总会收容股主任赵朴初、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也关心无线电训练班。

全校学生中有6名党员，成立党小组，小组长王达行。

经过半年学习，全班大部分同学分3批毕业。第一批于1939年12

月乘船到宁波，徒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有王达行、严鸿英、朱讲诱、葛尚丰、胡龙兴、徐敏杰、谢佩玉（女）、翁履康、吴文学、陈如松、徐同福、李渐基 12 人。张官根、张仁祖从上海到皖南。第二批于 1940 年 1 月，到苏南常熟，参加江抗部队。有付兴发、赵椿生、张轩、樊峥嵘、刘卓甫、郁慧英（女）等 9 人，陆仁龙从上海到常熟参加革命。第三批于 1940 年 1 月中旬，到苏南参加新四军二团，有张士良、陆春林、王根发、冯健民、刘祖德、黄立人、吴广圻、徐根富、张美街、周贵玉、张泽丰等 14 人。

陆延年同志在回忆中说：“皖南事变后不久，我调到无线电大队训练班学习，当时训练班主任黄子坤，以后曹维廉负责。”

“1941 年 2—6 月，师部（一师）由盐城地区南下到达泰（州）东地区，开办了第一期电训班。学员由各旅及直属队调来，共 13 人，训练班由廖昌林负责，我当机务、报务教员。6 月苏德战争爆发，师部决定成立新闻台，指定我负责。我带领几个学员主要接收延安新华社新闻。”

“1941 年下半年，日军开始对苏中地区扫荡，部队经常行动。这时，上级决定开办第二期电训班。采取穿便衣，隐蔽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海安以东的李堡、唐洋、角斜地区，对外以‘民众学校’名称做掩护。校长由三科科长李景瑞兼，我任教务主任，还有一个机务主任吴坚，教员有余春舫，学员也是从各旅及直属队调来近 20 人。第二期训练班，因苏中环境紧张又远离师部，各方面比较艰苦。由于调来的大多是党员、青年团员等骨干，各方面表现皆好。学习时间也是 5 个月，到 1942 年春节前结业，成绩较好。”

“第三期电训班是 1942 年底开学，我在师部机务室工作，也兼了一段时间机务教员。以后训练班随抗大九分校活动。训练班由朱隽亚负责，教员还是余春舫，学员共 24 人，于当年 8 月毕业。”

斯简同志在回忆中说：“1941 年 7 月，我由地方转入部队，到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电训班学习报务。司令部三科科长李景瑞兼任我们班主任，电台中队长廖昌林也是领导，教员有陆延年等同志。电训班的学员，有从抗大调来的，也有地方输送来的，也有从各部队抽调来的，一共 24 人，其中有 3 个女同志。所有学员年轻英俊，朝气蓬勃，绝大多数人不超过 20 岁。据教员讲，我们这是第二期训练班，在此之前办的第一期，学员已分配到各部队去了。”

“电训班这一战斗集体，起初随师部行动，由于情况紧张，环境恶劣，师首长决定电训班移到江苏东台县、大丰县海边打埋伏。我们便到

三仓河、大中集一带老乡家里继续学习。后来形势不允许集中学习，只好隐蔽到海滩上的芦苇丛中，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坐在自己背包上，以两膝为课桌，坚持学习。有一次敌人出动数次兵力，对这一地区疯狂扫荡，在我们附近轮番来回搜捕，把所谓新四军嫌疑统统抓起来，有的遭到枪杀。电训班的同志义愤填膺，都想冲出去和敌人拼。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大家只有忍辱负重，蜷身在芦苇丛中，不能暴露，眼巴巴地望着鬼子耀武扬威地从海堤上巡逻过去。为了便于行动，李景瑞科长把我们编为4个小组，没有部队掩护，就由我们自己保卫自己，班上的男同志都有侦察、警戒和掩护的任务。李科长的一支左轮手枪，通信员一支骑步枪，还有十几个手榴弹，这些便是我们的全部武器装备了。那时，谁要能派去侦察敌情动态，是很荣幸的。我也曾三次参与侦察，了解当前敌情动态。电训练班的训练器材也很缺乏，每一组只能领到一只电键，一只蜂鸣器，组内轮流练习发报。由于干电池电力不足，蜂鸣器时响时停，差不多要用一半时间来调整，练习发报的时间就太少了。但大家的积极性很高，争先恐后，决不让蜂鸣器空闲下来。”

“经过半年的学习生活，1942年元旦前，我们学习结束，在东台县琼港镇与师部会合，又一次见到了一代名将粟裕师长……不久我们登上了粟裕师长的指挥船，扬帆南航，一夜间到如东县北坎镇海边……电训班的学员分配到师部及各部队。”

施亚寒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新四军一师十纵队苏中军区电训队第二期学员，1945年12月入学，到1946年4月并入雪枫大学技术大队，到1946年7月毕业。地点在司令部所在地苏北东台县城内，在界首苏家嘴毕业。”

关于苏北指挥部电训班情况，徐整同志在回忆中说：“为培养军政干部，成立军政干校，开办党员训练班，出版《抗敌报》（苏北报），我们苏北指挥部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也在这个时候宣告成立。”

“电训班的学员由挺纵服务团、教导队、各部队选调男女青年共10多人。学员班班长徐整（原名文忠），学习组长朱隽亚。学员有尤臣、季金龙、王惠霖、刘颖水、余家东、王乃坚（女）、孔令华、徐炳全、张景益、唐冰海（其中徐整、朱隽亚、王乃坚3人参军前在上海学过无线电报务，故在班内复习）。学员年龄在15~25岁，文化程度初小至高中。其中唐炳海15岁最小，文化也较低，从没有学过英文，故他学习遇到困难较多，于是大家都对他进行帮助，使他能跟上进度。”



“我们这个电训班由苏北指挥部电台中队长李景瑞同志直接领导，并由他任教务主任兼收发报教员，电学由通信科长陈旺代课，英文由通信参谋刘××代课。”

“电训班成立后，在黄桥镇授课很短，黄桥解放后，江苏省韩德勤顽军依仗他号称10万兵力，不久便组织了26个团近3万兵力，妄图进攻黄桥，准备与我苏北新四军‘决一死战’。我军也提出‘决战’，形势急趋恶化，根据形势，上级决定我们这一期电训班的学习时间为半年。”

“当时我们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都很艰苦，经常转移准备作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室和课堂，但只要一住下来，就坚持半日学习半日自习。每到一个驻地，就选个院子或堂房做课堂，没有课桌就用门板代替，背包一放就当凳子。上收发课只有1只用30电子管装的振荡器，AB电是用单个干电池焊接的。行军时这些简单的学习器材就分散给学员随身携带。学员都用白光纸做抄报本，为节约用纸，1张纸先用铅笔抄写，再用钢笔抄写，练习发报缺少电键，就用手指在自己大腿上模拟练习‘嘀嗒、嘀嗒、嘀嗒……’。上英文课、电学课时，因没有黑板，教员便事先在白纸上画图示教，有时还拿一些实物（如电子管、线圈、变压器等）示教。没有多久，黄桥决战即将开始，苏北指挥部在黄桥镇西北6公里处的严徐庄设立指挥部指挥全局，我们电训班也住在该庄，在激烈炮火声中，学员照样坚持学习，从未间断。”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原指挥部的电训班合编为新四军军部电训队，驻在盐城中山街14号，又重新招收男女青年学员120名，编为3个排9个班。原指挥部先期学习的定为速成班。”

姜峻海同志在回忆中说：“几十年前，抗日战争烽火连天。浙东四明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个僻静的山村，聚集着一群男女青年，大的不过20岁，小的才14岁。他们有时穿挂短打、旗袍花袄，有时一身灰色粗布单装，大都操浙东、浙南和上海口音。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电台报务人员训练班的23名同志，正在这里接受军事无线电通信专门技术训练。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紧张的学习，严峻地考验着大家，神圣的抗日战争，召唤他们早早地为民族解放事业奔赴战场，随时准备报效人民、献身祖国。”

“通信联络是保障作战指挥的根本手段，是军队的神经系统。无线

电通信在军队高度机动时，在复杂多变的战斗情况下，是保障作战指挥不间断的主要通信手段。而那时整个纵队的电台很少，报务人员更是奇缺，纵队司令部才配备两部上对下联络的军事台和一部新闻台。每台仅报务人员两三人。在所有使用的电台中，只有一部是从军部调来的，其他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功率小，机器质量差，经常发生故障。电台的数量和质量，报务人员的数量，都远远跟不上需求。”

“筹办电训班的决定飞快地传遍部队和地方，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前方部队、地方党和地下党组织输送介绍而来的同志，以及由干部推荐来的子弟，经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选择政治上可靠、脑子反应快的，经审查批准后，相继报到，于1945年3月9日在纵队司令部、政治部驻地梁弄镇开学了。这一天个个穿上崭新的粗布灰军装，绑腿整齐匀称，背包方正，原来是从部队来的学员事先传授过打绑腿、打背包的技巧。会场里，《你是灯塔》、《新四军军歌》歌声此起彼落。纵队电台中队长江刚同志宣布电训班领导成员：主任杨晋同志，政治指导员刘嵩同志，教员朱良同志。副中队长颜飞同志部署了教学计划。最后，区党委书记、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同志代表党委和何克希司令等纵队首长讲了话。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明了斗争任务，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的讲话声声入耳，启人心扉，多次被笑声和掌声所打断。”

“浙东面对的敌人有日、伪、顽，军事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战事一日几变。电训班在梁弄镇开学后才几天，就迁到了南面五里路的区党委所在地横坎来。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因大部队和有些机关开往前方，再移到东南三里路小山岙里的石码头，这里离开大路稍远，比较隐蔽。在日寇投降前一个多月，电训班经历了4个月的艰苦紧张的日日夜夜而宣告结业，奉命行军到达上虞县章家埠集结待命。紧接着，一些年龄稍大一点的分配到一旅、二旅和三、四、五支队及浦东、浦西、金肖几个支队的司令部，年龄小的和女同志分配到纵队司令部两部军事台和一部新闻台。我是电训班3人中最小的一个，分配在军事总台。行前，在一座山下拍了一张集体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至今大家还珍藏着。”

### 第三节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二师、淮南军区 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新四军第二师是由第四支队和军部特务营发展而来的。

1938年初，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皖中敌后，4月进入舒城、桐城庐

江、无为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5日，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徐海东任副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队、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

皖南事变后，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后为谭震林），下辖3个旅。

1942年3月，成立淮南军区，第二师兼管淮南军区，师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

新四军二师参谋处三科科长兼无线电大队长黄荣，机务主任郭季田。一台队长黄荣兼，报务主任吕广杰；二台队长陈超；三台队长（暂缺）；新闻台队长牟天；后郭季田、罗映清任三科领导。四旅电台区队长罗映清，五旅电台区队长郭继姜，六旅电台区队长王殿春。

### 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训班

1940年4月，江北指挥部举办电训班。学员由江北指挥部及五支队抽调人员组成，共20人，分为甲、乙两个班。电训班由大队长黄荣负责，教务主任鲍新泉。地址在来安县半塔集。这一期于1940年10月毕业。

### 二、新四军二师第一期电训班

1941年3月底，在天长县张公铺赵庄南约3里的一个小村里正式开学。第一期训练班负责人陈超，他也兼教员。

学员都是从前方部队调来，共30余人，经过半年学习，于1942年年初毕业，毕业时只有21人。他们是：吕绍卿、姜卓民、顾训民、陈德山、张继盛、徐景全、王友忠、祝宣祥、李杏、舒平（女）、王绍义、夏长海、周振民、凌云、丁其金、方书年、葛求财、刘国荣、陈荣福、沐浴泽、王国卿等。

### 三、新四军二师第二期电训班

1942年春，二师举办第二期训练班，负责人未变，教员有韩韬、崔东元等，学员10余人。这一期于1942年年底毕业。

### 四、淮南军区报训班

1945年8月，淮南军区与二师分开，军区机关住在天长县城，司

令员周骏鸣，司令部三科长廖辉，副科长聂鑫。一台队长江卓群，二台队长刘勃。

军区与二师分开后，举办一期报训班，学员30人，负责人顾舜兼教员，其余的教员均为电台工作人员。至1946年7月，学员毕业，学习时间一年。

凌云同志在回忆中说：“1941年3月底，无线电训练班在师部（二师师部在天长县张公铺赵庄）南约3里路的一个小村庄正式开学。我是从六旅特务营二连（支书）调来参加学习的。全班学员共30多人，编为3个班，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每人配有步枪一支，夜间警卫电台。每顿饭都是从一里之外的电台住处打回来吃，生活比较紧张、艰苦。训练班队长陈超，是刚从前方调回的电台队长，训练班只有他一个人负责，英文教员、电报收发教员也由他兼任。”

“训练班的学员大都来自前方战斗部队，文化程度不高，学习无线电技术困难很大。最难的是英语，除有个别人认得几个单词字母外，其余是一窍不通。而英语是通报中必不可少的，非学不可，我们就一边死记英文字母，一边背认电码符号，一天到晚都埋头在这个上面，有的同志睡觉还在那里‘嘀嗒！嘀嗒！’的念叨个不停。有的同学因英文实在难记，就用汉语注音，如紧急电报的英文字母是UGT、MSG，就用汉字注上‘今天、买色基’。在练习发音对话时，他却说成‘发津贴，买死鸡’闹出了笑话。为了发音准确，教员不准我们用汉语注音，但经过勤学苦练，逐步地掌握了标准读音及写法。在结业测验时，我们在一分钟内能抄收137个字。”

“那时敌后环境极其困难，我们训练班也很艰苦。野外是课堂，背包是桌凳，抄报时有个讲义夹搁在膝盖上就很不错了。铅笔像宝贝一样，用得剩一小节连手也捏不住都舍不得丢掉，还找来一节竹管插上再用。为了节约抄报纸总是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写，一张纸当两张纸用。有的同志在铅笔写过的纸上抹上一层黄泥，用铅笔再写，然后抖掉泥粉用钢笔继续写。”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艰苦学习，训练班于1941年初结业。因中途有些同志学习跟随不上，改做其他工作了，结业时只有21人。”

周志慎同志在回忆中说：“1940年，抗日战争已处于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野心很大，长驱直入，但其兵力不足，后方空虚，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八路军、新四军勇敢地向敌人后方挺进，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顽固派在这样

的形势面前，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处处制造摩擦，向我抗日军民进攻，我军也狠狠地给予回击。在淮南根据地的皖东地区（当时按津浦铁路分为东西两半，故又称为淮南路东地区），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8个团的兵力，趁我新四军五支队挥师西进之机，团团围住了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来安县的半塔集。激战10天，我守军抗住了10倍于我之敌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保卫战，路东根据地更加巩固。不久，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就迁到了半塔集。”

“当时，我在江北指挥部的教导大队学习，编在教导大队四队。经过3个月的军政训练和反顽战斗的考验，在路东毕业了。然后去无线电训练班继续学习。跟着指挥部无线电大队黄大队长来到了半塔集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成为电训班的正式学员。”

“电训班班部在街上一所三开间的瓦房内，我们学员则住在另一处的两家老百姓房子内，地上铺着门板和稻草。我们放下背包，整理内务，这时听到集合号响，就迅速跑到班部集合。教务主任兼教员鲍新泉宣布编班名单，我们江北指挥部教导队来的和五支队教导队来的共20位同学编成两个班，我被指定为第二班班长。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黄荣大队长做了开学动员，机务主任郭季田也讲了话，最后是教务主任鲍新泉讲了教学计划，训练时间半年。几位领导同志的讲话中，都勉励我们要不怕艰难困苦，努力完成学习任务，争取提前毕业，因为部队急需报务人员。典礼结束，中午还会了餐，下午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电训班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艰苦，一天训练十几个小时，有时一周只休息半天，忙着洗衣理发时间就过去了。生活相当艰苦，很少有粮食吃，拿黄豆、绿豆当饭吃，吃了不消化，大便拉的还是整粒的豆子，能吃上玉米馒头就是改善伙食了，偶尔能吃上一顿面条，荤油很少见到。由于营养不良，卫生又差，许多同学得了痢疾，拉得浑身乏力，但没有一个请病假的，都坚持带病学习。有的得了伤寒病，睡在地铺上，发高烧十几天没药吃，病刚好就参加上课，而且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我们始终愉快乐观，全班歌声嘹亮，在指挥部每次集体会上，唱歌总是名列前茅。”

“我们电训班跟随指挥机关一起走，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我们边行军，边学习，有时还参加战斗。整个反‘扫荡’作战中没有中断过学习，有时连吃饭都没时间，只好让炊事员将煮熟的面糊糊放在桶内挑着走，大家用小磁碗从桶内挖着面糊边走边吃。有天下午，机关正集结在一座小山前听邓子恢主任讲话，邓主任还未讲完，日本鬼子从山后打

上来了，山上我军政干校的同志们居高临下，阻击敌人，机关同志也上去支援，我们电训班的同志有一部分也上山去参战，阻止了敌人进攻。天黑后，我们才从青纱帐中转移出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反‘扫荡’作战取得了胜利，路东根据地的形势又平静下来。我们电训班抓紧时间又训练了半个多月，因为淮北、苏北根据地开辟了，形势发展需要电训班提前毕业，这样我们一共训练了5个半月就毕业了，离开了江北指挥部”

#### 第四节 八路军五纵一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三师、苏北军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新四军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1940年8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二纵队新二旅、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六支队的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下设3个旅。

1942年，为了统一党政军民的步调，第三师兼管苏北军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

1945年8月，三师免兼苏北军区，单独成立苏北军区机关，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

1945年10月，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

新四军三师通信科长赵宾玉。赵宾玉去世后，没有再成立科，改为股，股长王扶之，电台中队队长颜吉连，副中队长黄子昆。1942年通信股长李新宇。1942年3月改为通信大队，大队长黄子昆，政委颜吉连，副队长李新宇。

##### 一、八路军五纵一支队电训班

1940年12月，五纵一支队举办训练班。学员8人，有蒋英、盛德、张体善、冯凌元、范子侠、范动华、史超、史伟。于1941年毕业。

##### 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电训班

1940年1月，南进支队举办第一期电训班，共5人。有李圣书、马开瑾、朱少宣、王绍文、洛东选。教员由电台队长徐敏壮负责。

1940年8月，南进支队举办第二期电训班，学员10人。

### 三、新四军三师第一期电训班

1941年初在淮北盐埠地区举办第一期电训班。负责人赵宾玉并兼教员，李新宇教英文及政治，电台工作人员均兼课。后来迁到淮海地区（涟水、溧阳、淮阴），1941年冬学员在此毕业。

学员14人，有任其旺、方培泰、王业达（王进）、左克勤、原鸿连、张美汇、陵炳芝、甄兴善等。

### 四、新四军三师第二期电训班

1942—1943年，在盐埠地区举办第二期，颜吉连负责，李新宇及电台人员都有任课。

学员10多人，有江伟文、赵家珍、余光（女）、童杭、江海宽、孙宇、魏斌、葛嘉模、徐红、苗辅册、殷宗堂等。

### 五、新四军三师第三期电训班

1945年5月举办第三期，学员到齐开学不久，三师奉命到东北。先至山东沂水，然后赴东北，11月底到达锦州以西地区，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序列。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下辖七、八、十旅。1945年10月3日，中央批准成立东北军区司令部，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三师人员到西满，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黄克诚。三师第三期学员到东北后，在郑家屯成立“西满通信学校”。因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学校迁到齐齐哈尔、讷河，这一期1946年在黑龙江讷河毕业。西满通信学校校长颜吉连，副校长周志慎。以后西满通信学校并入梅河口的东北民主联军电讯专门学校。

三师第三期队长周至圣，指导员郭民科，教员有韩韬、琼波、王大可、王连东。

学员30余人，有朱在考、骆华宇、关喜春、谢志凌（女）、孙碧莲（女）、泮珍（女）、孙亚（女）、刘淑贞（女）、谈群（女）、郑兰珍（女）、夏剑清（女）、沈增夫、泮恒、周诚、崔和仁、陈奎元、王山红、季明钊、季印天、王贵云、曹殿启、李文波、朱自成、杜义龙、陆维诚、孙连康、周奎、王政治、徐俊等。

李新宇同志在回忆中说：“1941年，我们举办了第一期电台报务员训练班。训练工作是在一无师资、二无教材的情况下进行的。通信

科长、参谋、电台队长、报务主任都亲自任教，我当时兼任英文课和政治课教员。我们自己动手制作了电键、蜂鸣器等训练器材。1942 年环境比较稳定，我们又办了第二期。虽然两期人数不多（每期有 10 多人），但给部队解决了很大问题。1944 年情况更好了，我们就从各地区党委和抗大五分校选调了 30 名优秀的青年学生，开办了第三期训练班，经过 8 个月的训练后，分配到师的各个电台上去见习、工作。”

杜义龙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 年我进新四军三师电训班学习，到电训班不久，中央指示三师开赴东北，我们先到山东，部队在沂水刚刚打完沂水战役，部队到冬季还没有换装，陈毅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中央指示，三师到东北，这样我们就到了东北。从锦州到郑家屯，在那里成立西满通信学校，这时是 1945 年 11 月，通信学校校长由颜吉连兼，实际负责人周志慎，教员有韩韬、鞠文奎等。不久国民党大举向我进攻，为了争取主动，我军向北撤，学校到了洮南、北城子、齐齐哈尔，到黑龙江的讷河，1946 年我们在讷河毕业，也是西满通信学校的第一期毕业学员。以后学校又从讷河到了梅河口，并入东北民主联军电讯专门学校。”

### 第五节 新四军六支队、八路军第四纵队、 新四军第四师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新四军第四师是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的。1940 年 5 月，黄克诚率八路军二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第六支队，该纵队三四四旅 6 月 20 日在新兴集与新四军六支队会合，两者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四纵队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1941 年 7 月，四师进入津浦路东。9 月，十旅、九旅对换建制，原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三师任师长。

1941 年淮北军区成立，四师兼淮北军区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1944 年彭雪枫率四师主力西进，在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牺牲，调张爱萍任四师师长。

八路军四纵电台中队长赵宾玉，副中队长黄子坤，中队政委熊梦飞，不久中队长兼政委熊梦飞，四旅电台队长刘坤，五旅队长余清泉，六旅队长何永忠。

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后，三科长兼电台中队长熊梦飞。四、五、六



旅改为十、十一、十二旅，人员未变。不久何永忠任电台副中队长。

### 一、新四军六支队电训班第一期

1939年年初，在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四支队在永城县书案店，举办第一期训练班。由熊梦飞同志负责，这一期共有4名学员，即刘桂生、杨东生、马永新、李如朴。

学习3个月后，送到豫鄂挺进纵队学习机务，至10月结业返回书案店。

### 二、八路军第四纵队电训班第二期

1940年5月底，新四军六支队举办第二期电训班。6月20日黄克诚率八路军三四四旅及新二旅共5个团到达新兴集，与六支队会合，改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赵宾玉、黄子昆、熊梦飞等同志负责第二期电训班。

具体工作由电台中队报务主任李天明负责。开学时，师长彭雪枫、参谋长张震、秘书长岳夏到会讲话。彭雪枫为训练班题词：“精明强干，埋头苦干。”

学员18人，孟招敬、胡书安、叶本瑞、王幼卿、石磊、陈国良、崔子杰、周茂菊、王彦甫、傅宇、刘西庆、王学文、李子争、王永明、李振东、李西鹏、郭润义、马水泉等，他们均来自抗大四分校及随营中学。

### 三、新四军四师第三期电训班

1941年9月，四师在江苏淮阴县半城南祠堂举办第三期无线电训班。彭雪枫选定9月18日为开学时间，不忘日寇的侵略。开学时彭雪枫到会讲话。

这一期由无线电中队长何永忠兼负训练班工作。

学员共35人：陈佩亭、白广勋、潘伟、邹殿奇、庞桂芝、潘醒民、段绪伦、黄少先、张丁士、王善士、赵志清、余洪海、阎化成、林松、王文学、梁进功、刘学魁、刘德明、刘宇、徐世钧、张志祥、孙显扬、高玉贤、许世良、吴言良、越玉隆、张玲、高兴堂、张长胜、彭太廉、杨瑾（女）、张灿华、李萍（女）等。

### 四、新四军四师第四期电训班

1945年5月，在淮北桃窑举办训练班，班主任史文玠，指导员刘

若华，教员有严醒、张汶等。学员40余人，有邹洵、周善亨、王天吉、陈明、孟继衡、李凤阳、何国宪、周勋、木本金、胡松九、梁燕英、魏云法、陈树、潘群、阚乃士、沈明、毛修生、施先真、董礼智、张建堂、戴世春、宋经山、江峰、马桂英（女）、赵兰如（女）等。

这一期于1945年10月左右毕业。

### 五、新四军四师九旅（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共举办4期电训班

第一期：李圣书、马克锦、朱绍轩等。

第二期：陆西池、郭利群、潘东选、汝广田、焦东赞、郭大杰、景章。

第三期：冯季涛、李玉堂、胡兴兰、姚能。

第四期：40多人。

熊梦飞同志在回忆中说：“这几年来，四师除上级先后派来十几位同志外，共培训了4批报务员。第一期，1939年年初，在永新城书案店，只有4人，刘桂生、杨东生、马永新、李如朴。学了3个月之后，又送到豫鄂挺进队学习机务。第二期是1940年5月底开始，大概有20个人，大部分是经抗大分校选送来的学员，也有少数是机关选调的。第三期是1941年底在洪泽湖的半城，这一期学员水平较整齐，开学时34人，毕业时33人，只有一个人随爱人调动而中途退学。学习时间约半年。第四期是1945年6、7月份，40多人，住在淮河边上的店子附近。”

白广勋同志在回忆中说：“1941年9月，我在抗大学习结束时，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动员我去师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他说这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工作。我服从了组织决定，就这样到了师部电训班学习无线电通信了。”

“我们这期是四师第二期电训班，学员都是从部队挑选的，要求政治可靠，有一定文化程度，经过战斗考验的年轻同志。学员近40名，我当学员班长。电训班开学时，彭雪枫师长亲自来作指示，他在讲了做好通信工作重要性之后，要求我们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务必保守机密，细心谨慎，刻苦认真，为做一个好的通信工作者而努力学习。还讲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历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在半年多的训练过程中，彭师长多次来到我们驻地看望我们，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带着好的学习成绩走上工作岗位，顺利地完成任务。”

“那时训练条件很简陋，振荡器是用一只30型管，一个低频变压器与电键、电池、喇叭串联起来，能“咕咕”响就行了，不讲究音质好坏。抄报纸是缴获敌人的旧书报，反过来复过去，要抄上三四遍才舍得丢。上课没有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双膝上放个背包当桌子。打仗时缴获到一只好的电键大家拿它当宝贝，都抢着用，行军时也舍不得让运输员挑，而是装在口袋里随身带。”

## 第六节 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 鄂豫皖湘赣军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38年冬，党中央派李先念率一部分干部由延安出发向华中进发，1939年1月到达河南确山竹沟，与豫鄂区党委一起，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和七里坪留守处人员及地方党员为基础，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不久挺进豫鄂边敌后。

1939年6月成立新四军豫鄂游击独立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不久陶铸代政委，下辖一、二支队。

1940年1月，根据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将豫南、鄂东、鄂中的部队统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朱理治，下辖5个团。

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2月18日，委任李先念为师长兼政委，刘少卿为参谋长，下辖3个旅2个纵队。

1942年五师建立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鉴于五师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困难，1942年7月21日，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1944年10月19日，成立鄂豫湘赣军区，师长、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

1945年1月27日，五师与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大悟山会师，五师派四十、四十一团随南下支队挺进湘鄂赣地区。

1945年9月15日，五师建立野战军，辖十三、十四、十五3个旅。

1938年2月中旬，八路军总部作战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带领人员从临汾到河南竹沟时，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留守处只有4名报务员，有赖仰高、胡灿传等，不久熊梦飞到达。1938年彭雪枫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离开竹沟时，竹沟只有赵希忠与季青2人。白水河兵站电台队长颜吉连，政委何永忠。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电台鲍新泉，政治部电

台郭季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五师，司令部参谋处三科兼电台中队长缪伦。

### 一、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河南省委电训班第一期

1938年3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东进，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成立留守处，河南省委亦在此地。1938年春，刘少奇到竹沟，其余人员分到各部队，缪伦同志留在竹沟帮助工作。这时在竹沟电台负责人颜吉连。

为了适应部队扩大的需要，1938年7月，决定成立电训班，负责人颜吉连，史干负责筹建，从确山、唐河、随县、泌阳等县抽调十七八岁男、女学生31人，1938年12月开学。

学员共31人，有贾泽民、吴应华、应荣华、安祖轩、杨东生、吕广杰、赵兴民、赵清堂、张忠建、平凡、柏东生、刘桂生、马永新、李如朴、李炳旭、杜吉安、杜新安、刘王润（女）、李明远（女）、徐士英（女）、杨克（女）、杨振亚（女）、周瑞莲（女）、张国典、张云岐、周云章、安祖轩、姜宗义、贾开平、武占斌、许崇道（女）、任希文等。

教员有颜吉连、缪伦、史干、张飞信、潘流等。教材、教学方法均采用延安通信学校的一套。

由于形势不稳，训练班于1939年9月离开竹沟，大部分人员到金寨县（立煌县）白水河兵站，鄂东游击大队又送龙安、王学超、翁杰夫、林若超4人加入电训班。在白水河兵站由颜吉连、王殿春、黄衡、鲍新泉等任教。1940年在东汤池毕业。离开竹沟时，有9人到李先念支队，由邢中里、张平任教，不久毕业。

此外，在竹沟的四支队八团，1938年8月，挺进到津浦路西大马厂地区。八团在该地举办电训班。学员7人，有时烽、刘勃、曹邱川、张惠仁、宁守国、刘枕戈等，由鲍新泉任教，1939年年初毕业。

### 二、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电训班第二期

1940年春，在湖北鄂中地区举办第二期电训班，这一期主要为新闻台培训报务人员。

负责人魏如瑚，学员共七八人，已知的有刘甫（女）、刘进（女），大部分是女同志。这一期于1940年冬毕业。

### 三、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电训班第三期

1940年5月，在鄂东姚家举办第三期。队长陈国栋，指导员林琳，后张霞任区队长，教学工作由沙华夫负责。

教员有熊景钊、李庄、魏如瑚、张平。支部书记由学员担任，先为胡春辉，后为程迈。

学员21人，王骏（家骏）、宁义正（林一震）、刘杰、朱明（王斌）、朱炳臣、李兴堂、苏明、冯学文、林兆祥（孙永善）、岳琴、周肖燕、洪波、胡波、胡春辉、程迈、张伦、殷勇、徐结庭、董绍武（黄海燕）、熊东生、黎斌等。

学习9个月，1941年2月在安陆管家冲毕业。

### 四、新四军五师电训班第四期

皖南事变后，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五师。

1940年12月，在鄂中白乐兆山举办第四期电训班。由沙华夫负责，教员有熊景钊、魏如瑚、杜唐禄等。

学员有张明智、黄森、赵永华、李玲（女）、曹云（女）、周霞（女）、刘珍（女）等10余人。1941年5月毕业。

### 五、新四军五师电训班第五期

1942年2月，在鄂东地区举办第五期，负责人季青，教员有肖霞等。

学员共9人，毕业时6人，涂群先、周晓山、居国华、居正华、居绵昌、居四德。1942年5月8日毕业。

### 六、新四军五师电训班第六期

1942年11月，在鄂中大悟山肖家畈举办第六期，负责人吴志杰、程迈、邢中里，当时编入模范教导总队一队一区队，教员喇守钧。

学员40余人，有丁继兴、王家瑞、王友华、刘仁清、朱金贵、吕健攻、吴定和、李德兴、李继世、胡茂盛、张山如、敖子义、金子安、陈斌、陈克、段会元、崔国华、崔正、盛国华、杨子良、杨春、杨交林、雷闪、雪明、童世明、童万轩、冯成、郭传文、喻国柱、彭天明、熊焕、钱金辉、薛斌、魏敏智等。

1943年在敌人大扫荡中，学员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群众家中进

行训练，于1943年10月底毕业。

### 七、新四军五师电训班第七期

1944年12月5日，五师在大悟山白果树湾举办第七期，编入政训大队第四中队。中队长贾平，中队内设报务、机务两个队。报训队长魏如瑚，教员喇守钧，学员58人。毕业时只有44人。1944年12月至1945年2月，主要补习文化，春节后才学习有关业务。1945年12月随师部转移至新城，此时分为甲、乙班，1946年元月11日，在花山集毕业。

毕业学员有：万从一、王世德、刘万模、刘西理、朱洪涛、池仲雨、肖山、余其龙、余异民、苏守亮、汪志、易仲贤、杜荣光、严士富、吴子岗、杜精诚、吴俊美、杨德民、欧阳树强、李树堂、李念积、李传美、李良森、尚华、周立德、周又峰、胡志江、胡群才、涂解华、越德龙、马登云、姚宗健、黄文龙、夏正太、喻克、夏银凤、张永祥、冯萍、冯玉红、熊太庆、蒋茂松、孙文凤、徐学斌、李常山等。

### 八、新四军五师电训班第八期

1945年8月，在鄂中地区举办第八期，负责人黄静、程迈。学员共9人，1946年春毕业。

### 九、豫鄂边区党委新闻台电训班

1939年，边区出版《七七报》，同时成立新闻台。为了培养通信人才，举办训练班。负责人魏如瑚。学员6人，全为女同志：刘健、刘甫、郭鹏、陆光、薛坦、姜志诚。

学习时间半年，1940年上半年毕业。

### 十、河南第四军分区电训班

1945年8月，河南第四军分区在豫南举办电训班，负责人杜唐禄、颜斌。学员有七八人，有刘文性等。1946年春学员毕业。

### 十一、江汉军区电训班

1948年春江汉军区在洪山地区举办电训班。负责人周德显，学员10余人，有李承继等，1948年冬毕业。

## 十二、湖北军区电训班

1949年5月，湖北军区在武昌举办电训班，8月后由程迈同志负责。学员130余人，1949年冬学员毕业，毕业110余人。

## 十三、新四军五师材料厂

1941年，电台中队利用伪军杨金区投诚带来的兵工厂电讯器材，在湖北安陆县前冲设立师部修理站，沙华夫任站长。主要负责修理无线电收发报机。在修理站工作的有周晓燕、杨涛、雷闪等同志。1942年从安陆向京山八字门转移中，修理站解散。

1942年五师又决定成立师部直属电料厂，由电台中队队长领导，厂址在黄陂县梅店以东的黄嘴村，厂长先为邢中里，后为邓达平。工厂设马达股、修理股、电池股。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修理和试制手摇发电机，收发报机的装修，电池的制造。

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1945年12月，电料厂移到湖北随州天河口，将物资分散，电料厂告一段落。

颜吉连同志在回忆中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豫鄂边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建新四军的武装力量。这时，军委三局调集了一批人员，在延安开办了为期4个月的无线电机务训练班，为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通信工作准备力量。”

“1938年7月下旬，我们一批电台报务人员和一批译电员，还有护送我们的武装人员，跟随在延安开会的新四军的项英、罗炳辉和博古等领导同志，分乘3辆大卡车向西安前进”“在办事处（西安），当天三局朱道松副局长找我谈工作，将我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工作……以后我又被分配到新四军支队驻河南确山竹沟的留守处电台工作。”

“1938年7月，经我们研究，抽出史干同志筹备报务训练班的工作，拟制训练方案。经上级批准确定，学员除在机关抽调若干名额外，准备从确山、唐河、随县、泌阳、遂平等县选取十七八岁的初中男女学生30人。”

“学习时间为6个月，开始在竹沟训练时，教员都是由报务人员兼教员，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决定训练班转移到皖中，从金寨兵站电台专门抽出报务员王殿春同志负责施教。教材：一部分是由延安来的

同志带来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编的。学习内容收有收报、发报及英文用语，还有电学常识、政治课。这期训练班在河南竹沟或到安徽皖中时，物质条件如抄报纸、铅笔、电池、振荡器等都是有保证的。生活上（吃饭）同机关人员比较虽困难，但对我们训练班的学员都是有照顾的。因此，我们除了课堂、教学设备、实习器材简陋外，在教学环境、学员的政治条件、物质供应和生活保障方面都比红军时代的训练条件优越得多。由于学员情绪饱满，进取心强，文化生活都很活跃，学习成绩也很好。”

“1940年4月中旬，在东汤池地区，根据当时的紧急情况，我们对训练班的发报和通报进行突击性训练。学员毕业分配后，我就带着电台跟随郑位三同志到达皖中得胜集一带，同跟随刘少奇同志来到这里（江北指挥部所在地）的陈士吾大队长汇合。”

杜吉安同志在回忆中说：“1939年在白区入党后，组织上决定我和贾泽民、杜新安到金寨白水河新四军江北第一联络兵站教导队受训……结业后彭康同志找我们三人谈话，要我们去电训班好好学习报务。兵站电台负责人是何永安同志，报务员有王殿春、黄衡。王殿春负责电训班教学工作，学员有王学超、林若飞、翁杰夫、贾泽民、杜吉安、杜新安等。学习内容一是报务，即收发报、通报法则、报务英语；二是机务，即电学的一般原理，收发报机的故障排除等。后来张忠建、刘玉润（女）也到电训班学习。学习三四月以后金寨形势紧张，转移到东汤池。不久，河南竹沟中原局电台大队的电训班也因形势紧张转移至此，同我们合为一个电训班学习。新来的有吕广杰、李如朴、吴应华、应荣华、赵兴民、赵清堂、赵希忠、杨克（女）、徐士英（女）、李明远（女）、周瑞莲（女）。这批学员毕业后，多数分配到新四军二师、七师工作，少数分配到四师电台。”

## 第七节 新四军第七师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40年6月，江北游击队一部返回巢湖、无为地区，8月与三支队一个营合编为三支队挺进团。皖南事变后，1941年3月，在无为地区成立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1942年傅秋涛任第七师副师长，部队扩大为4个正规团，3个独立团。1943年成立皖中军区，第七师兼皖中军区，代师长谭震林，政委曾希圣。

第七师成立不久，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



### 一、第一期

1941年4月，第七师成立不久，由电台中队长李树政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第一批报务员。他们是郭金标、戴良、唐水华（女）。

### 二、第二期

1942年4月，举办第二期电训班，学员3人。黄家福、钱志宏、叶荣。教员有李树政、王振芳。1942年10月毕业。

### 三、第三期

1942年7月举办第三期电训班，学员8人。1942年底在整编中，学员全部改行，从事其他工作。

### 四、第四期

1944年12月，举办第四期电训班。开始时学员20人。1945年7月，皖南支队送来学员3人，共23人。负责人为乐更新，这一期于1945年8月15日毕业。

学员有徐光辉、陈耘、陶国材、俞志国、朱敏、李必明、陈亚民、胡绍泰、沈时贤、章太然、胡志鹄、何泽民、王远法、胡叶春、余海洋、宋昌富、李翼、张南林、高学政、许笙、文凯、范仪等。

## 第八节 中原军区电讯专科学校、二野军事政治大学电讯支队、西南通信学校、第二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通信学院

日本投降后，为了反对内战，坚持中原根据地。中央命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北返，同时令王树声、戴季英率河南军区所属从豫西南下，1945年10月，此两部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于桐柏，成立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第一副司令员王树声，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副政委任质斌。军区下辖第一、第二纵队。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10万部队向宣化店地区进攻，中原部队于6月27日突围，此时中原军区撤销。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进攻。8月7日分路向中原进军，8月27日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游击队会合。1948年5月9日，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张际春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下辖7个军分区。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以后进军西南，解放川黔康滇。1950年2月22日，以二野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陈赓、周士第、李达为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为副政委。

### 一、中原军区报务训练队

1945年10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返回，河南军区的部队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会合于桐柏，成立中原军区。

军区成立后，为了培训报务人员，1948年成立报训队。队长贾鹤龄，副队长王龙，协理员丁三。

学员70余人，大部分是从前方调来的连排干部和具有初中程度的战士。

### 二、中原军区电讯专科学校

1948年11月，中原军区司令部三局王时彦、李庄、苏明，到郑州筹办中原军区电讯专科学校。

1949年2月，学校正式成立。二野参谋长李达兼校长、政委，二野三局局长张有年兼副校长，后陈士吾为副校长，副政委王时彦。校址在郑州南郊五里堡。

学校设工程队，报务一、二中队，学员400余人，工作人员40余人。

1949年3月，学校奉命随军南下，4月20日学校在陈士吾率领下到蚌埠，4月27日到达南京，6月并入二野‘军政大学’。

### 三、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电讯支队

1949年5月，二野军大在南京招生，从郑州南下的电专，并入二野军大第四总队第十八大队，新招收的学员编为十六、十七大队。旷泉吉同志为总队长兼政委，十八大队大队长范元纪。

1949年6月，十六、十七大队开始进入预科学习，十八大队是郑

州南下的学员，仍按原计划进行本科学习。10月军大预科结束，以十八队为基础，抽调一批适合学习通信技术的学员，组成电讯支队。支队长江浩，政委王时彦。支队分为工程一、二、三中队、参谋四中队、报务五、六、七中队，学员共737人。

1949年11月，二野奉命进军西南，12月电讯支队向西南转移，1950年1月22日出发，3月10日到达重庆。到重庆后奉命编为西南通信学校。

#### 四、西南军区通信学校

电讯支队3月10日到重庆后，改编为西南军区通信学校，曾庆良兼校长，后王时彦任校长兼政委，范元纪为副校长，年底马克绍任副校长，李庄任教育长。学员编为3个无线电工程队，一个报务队，一个参谋队，一个政工队，共437人。

1951年1月，从西南、华东招收新生1600余人。

1951年6月，学校迁四川广安县，学员编为一大队（有线机务、报务、机务）、二大队（报务）及政工队。9月接收一批学员组成三大队，全校学员1900余人。7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

1950年10月1日，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通信学校”。

1952年邢元凯带长春无线电训练班与之合并。

#### 五、高级通信学校、通信兵学院

1952年4月，学校的一大队、二大队部分学员调往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一部分调往第一通信学校、雷达技术学校。

4月22日，第二通信学校奉命迁张家口，组成高级通信学校，在政委王时彦，副校长马克绍带领下，从广东出发，5月18日到张家口。校长陈外鸥，副校长马克绍，副政委王时彦，1953年贾士珍任副校长，1955年龙振彪任校长。

西南通信学校迁张家口后，在西南又成立通信学校，由邢绍孔、齐振亚负责。

1955年10月，高级通信学校部分干部及第四批、第五批学员到宣化，充实宣化通信学校。1957年高级通信学校迁沈阳与通信兵学院合并，后迁汉口。

李庄同志说：“1948年解放郑州后，正准备淮海战役。一天，通

知我和旷泉吉（二野通信处长）去司令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张际春、李达等首长都在。张际春、李达说：‘郑州解放了，现在缺少干部，需要办个学校。’接见我们以后，就开始筹建。从新华社中原分社调来孟兴田，从李先念部队调来杜唐禄，从郑州电讯局调来林风生、刘兴、蒯松年、蔡可恭。以郑州面粉厂新建的厂房作校址，然后贴广告开始招生。招生地点在新乡以南，洛阳以东，开封以西的地区。”

“新生入学生，编为机务队与报务队，校名为‘第二野战军中原电讯专科学校’（实际上是二、三野合办的），校长李达（兼），副校长陈士吾，我是教育长，政委王时彦。教员有李时俊、幸季先、郭建屏，还有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的。学生共700多人。”

“淮海战役后，学校准备过江。学校到南京后改为华东军大第四总队电讯支队，江涛为支队长，王时彦为政委，我是教育处长。1949年12月，二野向西南进军，学校迁重庆，范元纪为副校长，王时彦为政委，我是教育长，1951年3月我调通信部工作。”

马克绍同志说：“中原军区电台后来合并到二野军大四大队，以后又成立西南通信学校，校长曾庆良，我是副校长，教育长李庄。1951年改为第二通信学校。1952年5月1日成立高级通信学校，校长陈外鸥（没有到任），我是副校长，王时彦是副政委。1955年校长龙振标，政委江波。”

“1952年学校进行整顿，第二通信学校与长春无线电训练班合并。”

“华东通信学校迁武汉后，在720厂的地方改为雷达学校，后来成为空军雷达学院。四野的东北通信学校，后来到武汉，无线部分给了重庆，有线部分留武汉叫有线技校。华北通信学校是第六通信学校，后来合并到沈阳高级通信学校。西南通信学校到张家口时，学机务的调通信学院，其他成立高级通信学校。1955年迁沈阳，其中一部分到宣化，我到宣化通信学校任校长。”

郭建屏同志说：“我是1949年1月到中原电专的，副校长陈士吾，副政委王时彦，教育长李庄。学校报务班两三百人，机务班40多人，我是机务班教员。1949年学校南迁，行军到蚌埠时南京解放，学校到南京后并入军大电讯支队。在南京又招了一批学生，全支队有700多人，又成立一个机务班，约六七十人。机务班教员有李时钧、郭建屏、幸季先、王自忠等。以后又增加师和、王平、王先春、董立仁等。以后1949年12月，学校迁重庆，改为西南通信学校，学校分三个大队。一



大队为机务队，二大队为报务队，三大队进行思想教育，李保忱是三大队长。1952年5月，一大队两个机务班，以及郭建屏、幸季先、师和等并入军委工校，编为四十六、四十七区队，校机关及报务班学员组成高级通信学校。”

## 第九章

# 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华东军区 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37年10月，日寇大举向山东进攻，国民党军阀韩复榘向后溃退，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并派出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举行起义。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先后起义的有：1937年11月冀鲁边抗日起义，12月24日胶东文登天福起义，1938年鲁南起义。193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地区的第一～第八抗日游击支队和挺进支队、南进支队合编成山东纵队。经中央委任，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

1939年春，山东纵队进行整编，编为6个支队和南进支队及第四团。1940年9月，山东纵队又整编为5个旅、两个支队。

1939年5月4日，中共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7月1日由徐向前、朱瑞率一部分干部到达鲁南沂水，同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组成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为政委，下辖陈光、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一部，肖华率领的东进抗

日挺进纵队以及一些游击部队。8月9日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张经武等同志组成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为书记。

10月13日，为了便于指挥，一纵与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合并。因山东纵队在山东有历史意义，故其名义不取消。1940年5月，第一纵队番号撤销，由山东纵队指挥所属部队。

1940年9月，山东纵队编为5个旅、两个支队。

1941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指挥。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用山东军区名义，司令员罗荣桓，政委黎玉。山东纵队机关大部组成鲁中军区，第一旅改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第二旅改为滨海独立军分区，第三旅改为清河军区，第三旅改为鲁中第一军分区，第五旅属山东军区建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新四军军长陈毅率主力一部北上山东，10月15日，组成以陈毅、黎玉为领导的津浦前线指挥部，10月20日中央任命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2月3日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1947年1月7日，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调进山东的部队与山东军区开赴东北后，留下来的部队组成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委黎玉，下辖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七、第八师，共7万余人。

1946年年底，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7年1月下旬，取消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的番号，成立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粟裕，副政委谭震林。下辖一、二、四、六、七、八、九、十纵队，后来又组编十一、十二纵队。

1946年7月，由广东调往山东的原东江纵队，于1947年8月改称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1948年5月，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陈毅调中原局工作，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为第一副政委。野战军所属各纵队整编为军，分属4个兵团。

1949年6月中旬，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合并，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此时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下辖7个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震林、谭启龙、姬鹏飞。

1950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野战军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

1938年成立山东纵队后，司令部下设各科，闻述尧任三科科长，还兼山东分局电台队长。

1938年春，为了加强中央与山东地区的联络，闻述尧一面组织力量派遣电台，沟通与分散在各地游击队的联络；另一方面，着手培养通信人才，以满足建台的需要。到1938年年底，在训练班第一期结束时，即派出8个支队电台人员。1支队电台队长（不详），2支队电台队长何永禄，3支队电台队长张正者，4支队电台队长赵淳，5支队电台队长黄志才，6支队电台队长戴风鸣（后韩鏊），7支队电台队长（不详），8支队电台队长刘明南（后曹恬、于德甫），这时山东分局已基本沟通与各支队的通信联络。

闻述尧同志在回忆中说：“1938年春，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打电话把我叫到三局，办公室里就他一个人，他向我交代了新任务，叫我立即准备出发，到敌后苏鲁边区去，并带15瓦和3瓦电台两部，给我两名见习员和一名电话班长。当时我感到两部电台3个人太少，要求多给几个人。王诤局长对我解释说：‘现在是全面抗日战争的时候，各路军都开赴抗日前线，无线电通信设备和人员十分紧张，你到敌后自己去发展吧！’他接着说：‘我给你一本教材，你可以拿这本教材去培养学员扩大通信队伍。’临去时，他指示，出发时党内文件不许带，还要经过国民党统治区，并叫我路过西安时可买些电讯器材。次日，我带领小分队从延安出发，第一天在耀县过夜，第二天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西安后，我才知道有的是从抗大、陕北公学来的，有的是从延安党校来的，还有直属单位的各编一个组。在西安领了国民党行营护照，乘陇海铁路火车，到河南兰封，火车不再前进了，雇了两个手推车，运着一些



贵重物资，经过曹县直向山东的泰安西部走去。到了泰安只好等到夜晚才偷偷地在大汶口以南桥洞下潜伏通过。在泰安东部找到了八路军游击队第四支队，这个支队活动在沂蒙山区。”

“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通知我派一部电台随高锦纯、王文同志去胶东的蓬、黄、掖（蓬莱、黄县、掖县）一带的游击队，我们留下这部电台和陕北联系通报。机器架好后，发现手摇发电机不发电，只好改用干电池，由原来的400伏，改为180伏做屏压供电，电子管由71A改用31A，减少了发射功率，再把天线架高，方向对着陕北，经过多次呼叫，终于在夜间23时把延安叫通了。这一改革，使我们在游击区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树立了信心。”

“到游击区后，我先搜集通信器材，接着使用自己试装的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办报务训练班。到1938年冬，张经武同志带吴克华支队来山东，也带来一部电台，并给我带来一部手摇发电机。1939年徐向前、朱瑞同志到沂蒙山区，又带来一部电台，还带来吴德山、黄萍、曹义忠等电台人员，部队编为一纵队。这时队伍发展了，划分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路西6个军分区，徐向前和朱瑞分任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司令部成立参谋处，罗舜初同志任参谋长，我调到三科任科长。各军分区都成立了三股，有的设股长，有的设通信主任，并配上1~3部电台。”

高峻同志在回忆中说：“1938年8月，我奉命从延安带两部电台（各2.5瓦）随同张经武、黎玉同志带领的中央分配给山东的200多名干部，由延安出发，经西安、澠池到晋东南长治八路军前方总部。稍事休息后，跨越平汉路，经南宫到达山东聊城后，在莱芜地区的口镇同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廖容标率领的司令部汇合，后经两天的行军，于12月30日到达沂水南部岸堤镇，与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同志会合。”

“1938年12月成立山东纵队，司令部设各科，通信科长闻述尧同志兼分局电台队长，我任司令部电台队长。与我一起到山东的杨大奎同志带一部电台随吴克华同志去胶东。”

“1939年8月1日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山东纵队机关为基础成立鲁中军区，王建安任司令，罗舜初任政委，我任通信科长兼电台区队长。鲁中军区下辖4个军分区和一个主力旅。”

“1943—1944年，鲁中军区通信科举办了二期简易通信训练班，内容有口传电报、旗语等。”

## 第一节 山东纵队无线电训练队

### 一、第一期

1938年3月，山东纵队通信科在山东分局所在地山东沂水县南部岸堤镇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由通信科长闻述尧同志负责。他既是负责人，又担任教学工作。

学习的课程有通报英语、电工常识及政治课。电台报务人员亦兼课。

这一期的学员已知的有：徐斋、王子义、韩鏊、曹怡、陆克、叶凤川、王兴（女）、李民（女）等。

第一期于1938年12月30日毕业，学员毕业后，即分配到各支队电台工作。

### 二、第二期

1938年9月，在第一期尚未毕业时，即招收第二期学员，地址仍在岸堤。

新学员入学时，由闻述尧测验，共录取33人，因各种原因毕业时只有25人。第二期训练班由闻述尧教收发报课，赵淳、戴凤鸣也教收发报课，何浩（女）教英语，张荆山教机务、电工，赵需人教政治课。赵是训练班的指导员。

已知的学员有：李炯（李涤新）、李杰民、苏庆方（苏效方）、薛其宾、刘延光、董正伦、吕白、于皿、徐林、魏明杰、聂立言（聂民杰）、兀会川、王明轩、孙咸寿、黄珉轩、王文斌、李海、孙化勤、刘景林、陈铁、田培恒、李训等。学员分为3组，由张正者、吕白、李训分别担任组长。

学员中李少儒、孙寿亭、李训中途改做其他工作，唐严、杨×、王世忠、戴伯芝等4位女同志也改做其他工作。

这一期于1939年1、2月分两批毕业。

李涤新同志在回忆中说：“1939年7月，我经高光宇同志介绍，到沂水县岸堤镇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在该校民政运动工作队边学习边去乡村宣传和募集食粮。8月底，校宣传科长徐钟林同志说：‘山东分局招考无线电报务员，可志愿报名参加考试。’当时我与同来干校

学习的同乡同学薛其宾、苏庆方（苏效方）、孙威涛3人报了名。经通信队长闻述尧的口试后被录取，参加了山东纵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习。当时学习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在地主院内天井中，仅设一桌一凳供教员上课。3个组30多名学员，以木板复于砖、石上叠成的座位当课桌，学员坐在砖、石或木墩上，3列窄长的木板，便成了3个组的课桌。遇到大风、雨、雪，临时移于室内。教练器材也颇简陋，开始时用一个蜂鸣器，风雨时，如蜜蜂嗡嗡，其声甚小，学员伸长颈项，全神贯注，才勉强分辨。两个月后才弄到一个简单的振荡器，‘唧唧’之声充溢庭宇，教学员均颇满意。英语、电工常识等均无制式教材，教员临时自编、复写、油印，文字插图粗糙、模糊，也极简陋。英语内容是常用的会话知识，如QZ缩写。电工常识是常用基本知识，如欧姆定律、电池连接、测量等。”

“学员多数是初中一、二年级或高小毕业生，年龄多数在16~18岁，董正伦24岁，高中毕业生，在训练班中大家视他为高级知识分子。即使是初小学生，因年龄小聪明，接受能力强，学习进度上没有大的参差错落，当时的训练方针是以收发报训练为主，进行短促突击，要求全期训练不超过5个月。其他课程虽是辅助课业，也要求学好，教员视训练的进度的可能与必要，在收发电码训练中（如数码抄收至100~110个/分，英文字母抄收80~90个/分），适时要求学员开始练习发电码。教员穿插用慢速度的英语简语会话、QZ缩语及简单的通报手续，开始锻炼学员的应用能力。这样，既可以使学员不感到枯燥、单调，又可松弛一下过紧的神经，只要不过量地穿插，其效果是很好的。”

“大约1939年1月，山东分局直属机关由岸堤镇移防至沂水县王庄，闻述尧同志率通信科及电训班随分局移至王庄附近的垵上村。王庄与垵上村位于山岭峡谷中，生活条件较岸堤镇更苦些，募集粮食也不容易，经常一日两餐。主食募集到什么吃什么，常无蔬菜，只有咸菜、清汤，有时一天只吃一餐红薯煮绿豆汤。学习用的纸张，正反面抄写后，要用橡皮擦去字迹再用。铅笔用一两寸时设法插在子弹壳中再用。抗战伊始，山东地方政权仍处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或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还未组织政权，物资供应，财政经费都很困难。每人一月发很少的零用钱，衣服被褥等必需品，都是自备，强调越简单越好，动员学员靠家庭接济。青少年的情绪饱满，孜孜以求上进。就我追忆，其力量源泉来自对日寇的同仇敌忾。这时的政治教育，一是讲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树立对敌后游击战争的光明前途的信念；二是老同志讲述红军的

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吃草根，煮皮带，忍饥受寒，互助友爱，日行百里，以劣势的装备，边走边打，冲破敌人的重重堵截的万里长征的故事，启发、诱导、继承了红军十年内战中的艰苦卓绝的传统作风，从政治思想上培养青年一代，以迎接敌后游击战争赋予的艰难困苦的光荣任务。再就是歌唱抗日救亡歌曲，不断激励青年人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意志。一支革命歌曲，可以使人热血沸腾，心弦激荡，忘却一时的饥饿空肠，其功效胜似一堂政治课。”

“山东分局无线电训练班第二期的 25 人，以 5~7 个月的短期训练，虽然物质生活艰苦，教学条件差，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初步掌握了无线电通报技术，保障了与远在延安的党中央，与远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对山东纵队的指挥，沟通了山东、苏北的联络，在缜密的作战指挥神经中枢系列中，完成了无线电通信的使命。”

### 三、第三期

1939 年 7 月，招收第三期学员，地址在沂水县王庄。从这一期开始，训练班的负责人为孙虎。

学员共有 20 余人，排长刁岫生，副排长许克尧，学员有郑立中，姚洪申、吕会英、马维禄、石志庆、姚家城、王子璋、牟明斋、迟锐、迟生俊、刘运良、吕清、于松波、国丹城、张逢忠、孙玉英、邢佐午、王代宝、吴东鲁、毕可清、徐振明、李光等。

由于日寇扫荡，学习一直到 1940 年 6 月才毕业。

吕会英同志在回忆中说：“1939 年 7 月，我被送去山东纵队报训队学习。报训队属山东纵队司令部无线电大队领导。有学生 30 多人，都是十七八岁的中小學生。我们以专业训练为主，也学过政治军事。通信科长兼无线电大队长闻述尧，是宁都暴动时的报务员，长征时是电台台长。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是我们的表率。电台台长吴德山，报务主任黄萍都是老红军，技术水平高，给我们上收发报课，要求很严，进度较快。在课中休息时，就讲述红军长征中无线电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极端艰苦的行军作战中，爱护器械，保障工作，出色完成任务的情况，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使我们懂得了首长为什么关心电台人员，重视无线电工作，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

“教导主任孙虎，是个大学生，他负责制订教育计划，安排进度表，并教我们学英语，给我们上电工学、无线电课程，他在教学上讲得通俗易懂。”

#### 四、第四期

1940年6月，招收第四期学员，地址在沂水县青驼寺附近的冯家湖。领导人未变。刘鸣鸾教电工，孙虎教收发报课，政治课则是学习文件及听报告。学员在学习中除学习理论外，每个学员组装三管再生式收发报机，检修两管哈特莱电路的发报机。学生中成立党支部，在青年中成立“朱德青年队”，由王锡祥、陈泮溪负责。

学员30余人。

已知的学员有：赵金龙、冯西之、赵爱玺、陈泮溪（陈松）、于竹轩、吕鸿轩、高新、李汉清、崔道即、赵超、王亭、王锡祥、李×宝、何××、李××等，学员编为两个班。

这一期学员于1941年3月后陆续毕业。

王锡祥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们第四期，于1940年6月底开学。当时驻青驼寺附近的冯家湖。我们这一期的主要负责人是孙虎同志。设4门课。电工课教员是刘鸣鸾同志，他是机务员。电工课的主要内容除一般电的常识外，还要能组装三管再生式收发报机，能检修调整两管的哈特莱式电路的发报机；第二门是通报英文及通报手续，教员是孙虎；第三门是收发报技术，由电台报务员来任课，孙虎同志也来上课；第四门是政治课，与电台和三科同志一起听报告。”

“这个报训队，后来派来一个队长，是延安抗大毕业后分派来的，主要进行军事行政领导。报训队有党组织，有青年队的组织，当时叫朱德青年队，负责人是我与陈泮溪同志。”

“在冯家湖开学不久，日本鬼子就开始‘扫荡’，我们这一期是在行军打仗中完成学业的。当时学员每人背包上带一块硬纸板或木板，一个纸夹子，把练习抄报的纸夹在小板上。行军休息时，坐在背包上，小板放在膝盖上，就上起课来，练习收发报。1940年深秋，大约11月份，在莒南地区与‘扫荡’的敌人遭遇。在这次战斗中，有一姓翟的同学被敌人炮弹打中牺牲了。我们报训班还要负责电台的警卫任务，给军区电台站岗。当时因为器材困难，我们上课用的器材是一个30型电子管与一个变压器，一个喇叭组成的音频振荡器。电池是电台上不用的，一张抄报纸，先用硬铅笔，再用软铅笔，最后用自己泡的蓝紫墨水写，一张薄薄的粉连纸要用6遍。”

“1946年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时，在山东临沂附近，成立了华东通信学校，校长是黄荣同志兼，副校长是王殿春，学报务的有3个队共300

余人。还有一个工程（机务）队，也有 100 人左右。1946 年春开学，7、8 月由于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通信学校转移到莒南地区，后并入华东军政大学，成为军政大学第八队。”

## 五、第五期

1940 年招收第五期学员。当时通信科长闻述尧，电台队长赵信然，教员孙虎，马××、林师、张××。地址不固定，在岸堤、马沐池一带。

学习内容仍为 4 门课，即报务、电工、通报英语、政治。只有通报英语有一本书，其余均无课本。每个学员都学会装修再生式发报机和三管哈特莱发报机。

1942 年敌人大“扫荡”时，人员分散，有的到沂蒙山，有的到天宝山，有的学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原计划学习 8 个月，结果一年多以后于 1942 年 11 月在沂水县明水毕业。

学员共 80 余人，分为 4 个班，每班 10 余人。排长周桂，副排长戴文宣。一班长马清涛，程继孔（程江）；二班长陈德明；三班长孙明度；四班长周大兴。其他的有：于波、曹长兴、郑克军、刘宗人、高宏吉、魏广福、毕庶鲜、王佩贤、郑惠吾、王凤喜、刘兴隆、牛振海、徐本恒、李磨宝、李增芳、张汝耕、宫长吉、魏云飞、崔贤生、王继昌、薛秀梅（女）等。

陈德明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 1940 年到电训队的，一共 80 多人，队长赵信然，是个很好的干部，在大青山突围时，在孟良崮附近和敌人遭遇，一个学员负伤。他背起就走，这个同学因破伤风，后来牺牲了。孙虎教英语、QZ 缩略语，还教电工。孙虎是个大学生，近视眼严重，行军时大家经常逗他。学习很简单，每人一块木板、一个夹子，放在腿上就学习。发报时轮流练习，因为只有一个蜂鸣器，我们这一学期毕业分几次，第一次毕业是在大青山突围以后，反“扫荡”以后不久就毕业了。”

## 六、大众日报社电训班

山东大众日报社等单位也办过电训班。负责人刘永恕，学员有朱安、冯如意、吴清忠、查才生等。

## 第二节 山东通信学校、华东通信学校、第三通信学校

### 一、山东通信学校

1948 年 8 月，中央军委决定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指挥，1942 年 8

月1日，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山东纵队机关改为山东军区机关。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恒，政委黎玉，副司令员王建安，山东纵队机关的大部分组成了鲁中军区。第一旅改为一一五师教导旅，第二旅改为滨海独立军分区，第三旅改为清河军分区，第四旅改为鲁中第一军分区，第五旅属山东军区建制，归胶东军区指挥，第五支队改为胶东军区。

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后，纵队举办的无线电训练队，改为山东军区通信学校。通信学校开始由孙虎负责，1944年招收第一批学员60人，这时环境比较安定，学制加长。除报务班以外，还设有机务班等。

1945年8月，日军投降。9月由郑立中、孙虎同志带领通信学校尚未毕业的20余学员到东北。

## 二、华东通信学校

1945年10月，陈毅率新四军主力北上，10月20日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2月3日，中央命令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1946年1月，组成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委黎玉。

1946年6月，敌人对山东发起重点进攻。1947年1月，取消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番号，成立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

### 1. 华东通信学校的建立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上到达山东，年底，军部在山东临沂县田家黑墩建立通信学校。1945年9月，山东通信学校主要人员由郑立中、孙虎带领去东北后，余下人员与新四军通信学校合并。

1947年1月取消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因此通信学校又名为“华东军区通信学校”。

校长黄荣（兼），副校长王殿春，教务长王政，副教务长邢中里。下设4个中队。工程队队长郭继姜；报务一队队长刘力一；二队队长徐敏壮，指导员兼教员赵国栋；三队（女生队）队长杨克（王殿春夫人），支书舒平（黄荣夫人），教员刘竹林。学员300余人。

杨克（王殿春的夫人）同志回忆说：“我是在新四军学报务的，在新四军军部二师工作过。那时有报务训练班，王殿春是报务主任，也负责训练班。1945年我们到了山东。1946年3月临沂成立华东通信学校，当时还有个山东通信学校，两校召开了合并大会。校长黄荣，副校长王殿春，协理员的姓名忘了。我是三中队的中队长。不久华东通信学校与华东军大合并，编为八大队，人员没有变，地址在鲁南临沂县东。山东

通信学校所以与新四军的训练队合并成立华东通信学校，是因为新四军与山东的部队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

## 2. 华东军政大学第八大队

1946年7~8月，国民党大举向山东进攻，通信学校迁到莒南地区。这时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非战斗单位进行缩编，通信学校番号暂时取消，编入华东军大，编为第八大队。通信学校的机构人员均未变。

## 3. 恢复华东通信学校校名

1948年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后，我军开始战略反攻，于是恢复华东通信学校校名。

校长黄荣，副校长王殿春，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俗丁，副主任张明秀，教育长何锦文，副教育长刘竹林。

学校设3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刘力一，二大队队长平凡，三大队队长张文东，下设14个中队。各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副队长、副指导员、专职教员、司务长、炊事班。

1948年底，学校迁至山东昌乐县。

## 4. 华东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1948年9月，山东济南市解放。济南市有大量中学，人才集中。华东通信学校为了招收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以“华东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名义在济南招生。

招收无线电工程系、无线电报务系，共计百余人。1948年底开始上课，两个系分住两处。

1949年8月，电专全体乘车到了马鞍山，与华东通信学校合并，1950年迁南京。

华东通信学校在到南京以前，共招收3批学员。1946年招收第一批，学员300余人。一部分是胶东报训队转来的（山东通信学校），其次是由各地招收的，1947年夏，这些学员全部毕业。

1947年夏招收第二期，有400余人，分1个工程队，3个报务队，在掖县、益都、潍坊一带招收的。1948年秋，学员毕业。

1948年招收第三期学员，在济南的电专招收100余人，分电讯工程系、报务系，到南京后，这些学员先后毕业。

## 5. 华东通信学校迁南京

1949年初，华东通信学校在山东寿光，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学校规模要扩大，于是在潍坊、淄博、益都、胶东等地招生。3月上旬学生陆续到校，3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



不久学校领导变动，校长王殿春，副校长郭继田，教务处主任刘竹林。

1949年下半年，上级决定学校迁安徽马鞍山，10月下旬，全校师生在山东昌乐车站乘火车，到马鞍山慈湖镇。

这时，在济南招收的华东电专的学生、华东野战军电训大队的人员合在一起，规模扩大。

1950年初，通信学校迁南京，校部及一大队住大方巷，二、三大队住西康路。

学校领导又做了变更，校长郭继田，副校长薛元凯、王殿春，教育长平凡、余永明，政治处主任张明秀。

学校设3个大队，一大队为无线电工程队，二、三大队为无线电报务队，全校师生千余人。

一大队队长李幸，教导员丁彪，学员300余人。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长程继孔，二中队长陈德明，三中队队长马鸿兴；二大队长王惠霆，教导员蔡有成；三大队长周维亚，教导员周敏。

#### 6. 华东通信学校、第三通信学校、雷达技术学校

1950年，一大队由马鸿兴带领到张家口，并入军委工程学校第一部。

1951年第二批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到校后，又重建一大队。大队长李幸，副大队长陈德明，副教导员王鹤鸣、林安。

1951年华东通信学校更名为“第三通信学校”。以后陈德明带领一大队到西安长安县王曲镇的第一通信学校，第三通信学校其余人员迁汉口，成立雷达技术专科学校。雷达技校校长王殿春，政委丁彪，副校长李幸，训练部长王惠霆。

程继孔（程江）同志在回忆中说：“我是1948年到通信学校的，先在学校当了几个月参谋，后来到十四中队当队长。十一中队队长是孙明度，十四中队指导员李焕章，副队长曹锦章。济南解放时通信学校派人去招生，以华东电专的名义招收的，实际上与通信学校是一回事。在马鞍山时在济南招的新生来后编入通信学校，在马鞍山住了几个月就到了南京。”

陈德明同志在回忆中说：“1948年军区在益都县城南，军区从各部队抽调南下工作的干部，我去报到时，把我留到华东通信学校，军区用大车送我到昌乐县华东通信学校。我到华东通信学校时，学生近千人，共3个大队。我在一大队一中队当队长。不久学校到马鞍山，与华东电专的学生合并。我们一中队叫报话班，学习V101、V-284机器。”

“1950年又接收军大一部分学生，有大学本科的，也有高中生，这时一大队改为工程队，下设3个中队，一、二中队是无线电工程队，三中队是有线电工程队。不久这些同志由马鸿兴带领到了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1951年7月第二次参干的学生来了，学生大部分是福建学生，又重新编为一大队，改为报务队，300多人。这时一大队长于永明，副队长李幸，后来我是副大队长，副教导员王鹤鸣、林安。不久二、三大队学员毕业，1952年我带一大队的学生到了陕西长安县王曲镇的第一通信学校；华东通信学校的领导机构及其他人员迁汉口，成立空军雷达技术学校。”

马鸿兴同志在回忆中说：“济南快解放时，我到了通信学校，原来在军区三局当电话队长。到济南后通信学校在济南招收新生，后来我们带领这些新生到了马鞍山，不久到了南京，住大方巷。一大队队长余永明，副队长李幸，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队长程继孔，二中队队长陈德明，三中队队长是我。1950年我带一大队学生300多人，主要是学工程的到了张家口，编为第一部一班，我是队长，指导员刘墀。”

郭继姜同志在回忆中说：“我们4人到通信处后，就都分配到学校去工作。4月底，即到达学校所在地——临沂东郊田家黑墩报到。当时，学校只有两位领导和一些中层干部、教师及工作人员，招生工作刚刚开始进行。没多久赵国栋分到女生队任政治指导员，徐敏庄分到二队任队长，刘竹林到一队任教员（一队队长刘力一），我分到工程队任队长兼政指。1946年6月，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军区副司令员罗炳章到校讲了话，勉励教职工办好党的教育事业，期望学员刻苦学习，立志当好一名出色的通信兵。”

“学校名称和隶属关系，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而有所变动。成立初期，称‘山东交通学校’（开学典礼全校师生合影上就是这个名称），归军区直接领导。1946年冬，学校离开军区，合并到华东军政大学，改为军大第八大队，归军大领导。1948年2月，我们八大队离开军大，改为华东军区通信学校，又归军区直接领导（通信学校在到南京合并前，始终在益都东北的迟家庄），同年12月，校领导在济南又筹建一所学校，名叫华东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校长、副校长都是通信学校领导兼任。教学业务、人员调配、经费和物资供应均由通信学校负责。只是党的关系、政治思想工作，先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管，后归山东军区政治部管。电专，实际上是通信学校的一所分校。华东军区迁南京时，通信学校、电专未同时迁往，事后由山东军区代管了几个月。1949年秋，

通信学校、电专才一同迁到南京与三野电训大队合并为华东军区（三野）通信学校。”

蒋启明同志在回忆中说：“1949年春节过后没几天，华东军区通信局首长命我去通信学校工作，那时通信学校住山东寿光城东南，军区机关住益都城关。到校后我分配在二队任教员工作。

二队队长是肖×，政指杨安利，教员有朱华山、贺志健（女）、方嘉羲、刘××、王××、黄××。当时上一期的学员有一个男生班和一个女生班尚未结业。在我到队后不久，二队根据校领导很快要迎接新学员的指示，因此在2月底以前，经突击的方式，完成了训练任务，学员结业分配去部队工作了。”

“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华东军区首长指示：‘通信学校要扩大招生，积极地培养通信干部和技术人员，迎接解放全国的革命新形势。’为此，校党委制定了扩大招生、扩建学校的具体计划，并召开了全校干部工作会议。校长黄荣（华东军区通信局副局长兼），副校长王殿春，副政委俗丁在会议上作了动员和布置，确定全校扩大为3个大队、9个教学中队，所缺各级各类干部于最近期间陆续配齐，并要求在全校各大队、中队人员任命后即进入指定地点，进行具体准备工作事宜。”

“我当时任命为一大队（报务训练队）二队队长，政指是蒋炳奎同志，不久副政指于文保也调来了。教员孙茂泽同志。我们研究后即组织各项准备工作，并进驻胶济铁路寿光县尧沟车站，迎接新学员的到来。”

“一大队大队长是刘力一同志，政教是杨××。一队队长是陈德明，政指是汤琪，三队队长是李传苍，政指蒋惠民。他们两个队都在大队部附近住。”

“新学员来自江苏徐州，山东潍坊、淄博、益都、胶东等地区。并于3月上旬陆续到齐。我们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大队的具体要求，即进行入伍训练、政治教育、报务专业预科准备。当时学校完全和抗战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一样，没有校舍，没有教室，全部住老乡家里。我们选择了村上一个祠堂作为教室，叠砖垛架木板作为课桌，堆砖块加背包作为坐凳，开始了教学。并将9个班的学员分配在东西长600~700米街道的各个群众家里住宿。任命了区队长、各班班长、互助组组长，还规定了各项行政生活制度，制定出教学日程表，提出了具体要求。”

“20日左右，全校举行开学典礼，校首长均参加大会，并由何锦文教育长作了开学动员报告和时事讲话。各队回去后即分班召开表决心会，进一步端正学习态度，调动学习积极性。根据学校总的教学计划，

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内容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原则和历史使命。为了提高阶级觉悟，还结合进行了以控诉旧社会、旧制度罪行为内容的诉苦教育；学校领导还以文艺直观教育的形式，请剧团演出《白毛女》和《血泪仇》话剧进行配合，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同时校领导还深入各中队，现场讲“交代政策”以消除疑虑，使不少学员在党的感召下，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自觉地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阶级成分，并表示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到底。”

“8、9月份济南电讯专科学校合并到通信学校来。学校的教学队和部分干部进行了调整。我们二队改为二大队四队；一大队朱华山同志的那个中队改为五队；二队是杨波同志的队。二大队由平凡、李幸同志分别任正、副大队长，政治教导员由蔡××担任。校领导也做了调整，王殿春同志改任校长，郭季田、郭继姜任副校长，刘竹林同志任教务处主任。当时我华东野战军已解放了华东地区鲁、苏、皖、浙、闽各省大部国土。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通信学校决定南迁到安徽马鞍山。”

“学校在短期动员后，即组织乘车知识教育。同时我们考虑到学员绝大多数是山东省籍人，要离别故乡和父母亲人，专题进行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进一步巩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接受党和革命的考验。并要求每个学员不使其父母及亲属来校话别，本人不请假回家告别，以保证学校的军事行动。由于思想动员深入，组织工作严密，每个学员决心表态好，各班都写了保证书，因此没有发生一起离队事件。10月下旬即在昌乐车站集中登车南下，次日夜抵达浦口，轮渡过长江后，因没有车辆接送，即动员徒步自南京下关直奔中华门车站，拂晓到达稍稍休息后即上车西行，中午抵达新校址鞍山慈湖镇。在进行了转移总结、布置好教学场地后，即恢复教学。但由于新址教学场地不理想，加之军区司令部首长领导不便，军区首长又确定将学校迁入南京城内，不久进驻南京，校部和一大队住大方巷，二、三大队住西康路。这时黄肇庆同志调来我队任副队长，加强了领导力量。”

“学业结束后做了毕业鉴定和总结。鉴于我队学员学习成绩等各方面基础较好，军区首长决定将我队学员全部分配到华东军区空军工作。在毕业学员中，我们队党支部经上级党委批准吸收了谢圣泉同志为中共党员。长篇小说《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同志也是从我队调去空军工作的。4月，我即调华东军区司令部通联处工作了。过了一段时间通信学校改编为空军雷达学院。”

### 第三节 一一五师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37年1月，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开至陕西三原、泾阳县一带。8月25日，将红一方面军的一、十军团及陕南红军七十四师组成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0月聂任政委。1937年9月，一一五师开赴抗日前线，挺进晋东北，9月平型关首战告捷。10月，向晋东南太岳山脉和晋西南吕梁山脉转移。1937年11月7日，委任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8年2月，林彪在山西隰县受伤，后去延安养伤。1938年4月，一一五师的一部进入冀南，三四三旅于1938年9月到冀鲁边区，三四四旅在冀西平山一带。

1938年10月，肖华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队到山东。1938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一一五师率三四三旅进入山东及淮北的新老黄河间的广大地区，12月，师部率领六八六团从晋西出发向山东挺进，留下的人员坚持吕梁地区的抗日斗争。

1940年10月，进入山东地区的一一五师主力及地方武装发展到7万余人，1940年冬编为7个教导旅，山东纵队编为5个旅。

1941年8月，中央指示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1942年3月，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纵队司令部合署办公。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1943年3月，中央指示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旅番号一律撤销，山东军区下辖6个军区，即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军区。原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各旅改编为13个主力团。

在1943年一一五师各旅未改编之前，一一五师先后办了5期无线电训练班。

#### 一、第一期

1938年3月，在山西汾阳、孝义一带举办第一期电训班，一一五师司令部三科长张瑞同志负责。教员有黄奕棋、陈大孝（陈彬）、邢绍孔等。

学员12人，编为一个班。班长李光勋，学员有陈继龙、史瑞管（史萍）、陈仁达、邱明生、钟法华、赵东珂、匡左贤、罗文辉、张子华、联来泉等。

这一学期于1939年毕业。

## 二、第二期

1939年初，在山东临沂举办第二期，由陈彬负责，教员有何锦文等。

学员有20余人，已知的有：贺志道、闫来信、白建义、郭贤坤、邱希芳、王洪儒、陈增辉、辛应元、李岱岳、盛利、王述明、安清生、曹洪文、王明时、路灿锦（女）、王星（欣）、王玉洁（女）等。

这一期于1939年秋毕业。

## 三、第三期

1940年在山东举办第三期，学员20余人，已知的有：李周仕、陈月信、路佩珊、闻秀吉、徐霞、王锡生、袁明华、李跃文、楚金亭、安方合、黄元明、赵鹏尧、杨中照、李炳文、宋欣、武福斋、房业生、刘朗（女）等。

## 四、第四期

第四期入学及毕业时间不详，已知的学员有：范忠让、刘振武、郭民福、芦沫、岳宪庭、杨子祥、田振东、丁治华、宋茂荣、邢玉才、史华雨、张凤祥、刘鹏、陈敬同、刘克乾、黄涑、杨德才。

## 五、第五期

学员入学及毕业时间不详。已知的学员有：续登云、傅瑞芝、刘若、曹继章、陈俊三、潘光、陈铁、徐兴佩、任志、郑三、范淑琴（女）、许新培、程士忠、孔哲、孔祥月、李克林等。

## 第四节 华东军区三局通信材料厂

山东地区最早在胶东军区成立材料厂，1944年研制出5瓦手摇发电机和电池等产品。1946年10月，华东军区司令部三局决定将直属材料股扩充为通信材料厂，任命力一为厂长，材料股长郭风舞为副厂长。厂址在滨海地区莒南县东塔巷村。当时工厂的名称为山东军区司令部、新四军司令部通信联络局材料厂，又称“滨北通信材料厂”。

工厂的主要任务是研制与修理无线电器材，如修理手摇发电机、小

型发报机、三/四管收报机等，职工百余人。

1948年初迁至滨北五莲县石场村，军区三局曹丹辉局长指定力一、曹维廉研制无线电发报机，为组建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做准备。宋庆龄捐助给新四军的一部发报机，辗转运到山东解放区，以此为主要设备研究组装。

1948年底，因机构变化迁到博山。华东军区决定将滨北材料厂、济南电器修造厂、颜山铁工厂、胶东电器厂、胶东电池厂、诸城云母厂等工厂进行调整，组织专业集中化生产，委派曹维廉、刘名南负责并厂工作。1948年底至1949年6月，组成博山电器总厂，总厂厂长兼书记刘名南，副厂长仲均工，全厂600余人，下属4个分厂。

电机分厂，又称一分厂，以修理手摇发电机为主，有设备60余台，职工350人，厂址在博山大柳行，分厂厂长秦秉福。

电池分厂，又称二分厂：以生产干电池、蓄电池为主，也生产空气电池。全厂职工150人，各种设备10多台。厂长王屿，厂址在博山五龙庄。

济南电器修造厂，又称三分厂。厂长王子仪，厂址在济南火车站附近，主要修理收发报机，职工百余人，设备30余台。

1950年曹维廉到南京考察，决定将济南电器修造厂迁南京，人员设备分别到南京无线电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照厂和南京电磁厂。

诸城云母厂，又称四分厂。厂址在诸城，厂长林基础，主要生产云母。

上述工厂，在战争年代作出了重大贡献。

## 第十章

# 东北地区及广东东江纵队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 第一节 东北地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简况

“九一八”事变后，1932—1933年，我党先后在盘石、海龙、延吉、珲春、汤原、密山、饶河等地建立抗日游击队。队员发展到1 000多人，开辟20余县的游击区。

1935年秋，东北反日总会成立，将人民革命军改为抗日联军一至六军。1936年1月28日，在汤原县召开各军首脑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反日联军总司令部，选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2月10日，中央决定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合会司令部，于是东北抗日联军各军相继正式成立。此后东北联军发展到11个军，分为一、二、三路军，总兵力45 000人。

第一路军由抗联第一、二军合编而成，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



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以后又编为3个方面军，周耀东、金日成、曹亚范分别为一、二、三方面军军长。

第二路军是由抗联第三、四、七、八、十军合编而成的。四军军长李延禄，五军军长周保中，七军军长陈荣久，八军军长谢文东，政委刘曙华，十军军长汪雅臣。

抗联第三路军由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合编而成。三军军长赵尚志，六军军长夏云阶，九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政委李照山，十一军军长祁宝堂，政委金正国。

1938年冬，日军大举增兵，进入东北，抗联损失较大。1939年冬，南满、北满、吉林三省省委负责人在苏联伯力集会，决定把第三路军缩编为10个支队，1941年冬抗联人员锐减。1942年8月1日，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各支队转移到中苏边境，抗联主力编成东北军教导旅（又称国际红军特别独立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崔庸健）任参谋长，由周保中、李兆麟、崔石泉、金日成、安吉、姜信泰、王效旺、王一知等组成旅党委会，崔石泉任书记。教导旅下设4个教导营，约1700余人。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作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委命令我军进入东北，1945年8月中旬后到达东北的有：8月冀热辽军区的一部到达山海关、锦州；9月初肖华率山东军区先遣队到东北；10月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率山东主力（一、二、三、五、八、七师）到东北；10月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率全师到东北；陕甘宁、晋察冀及其他解放区都派人到东北。

1945年3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员林彪，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吕正操、李运昌、肖劲光、周保中为副司令员，程子华为副政委。

1946年1月4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政委彭真，先后组成5个纵队，到1947年底发展到9个纵队。

1948年8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辖12个纵队。

1948年9月，成立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28日，改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1949年5月22日，四野与中原军区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2月26日，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下辖12个兵团。不久，第四野战军和兵团机构撤销，军以下部队直属中南军区领导。

关于东北地区通信人员培养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

### 一、抗日战争时期

1935年以前，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1935年以后，东北人民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抗联队伍发展也很快，面临大发展的形势，急需建立无线电通信。

1935年冬，我抗联发现汤旺河上游伊春老钱柜，有300名伪军保护几个日军和一部电台。抗联六军远距离奔袭，全歼敌人，缴获了那部电台。有了电台，就有了培训人才的条件。

1936年夏，抗联的第一所电讯学校诞生。于保合曾在苏联学过无线电通信（在苏联用名为万内），于是任命他为校长兼教员。在临行前赵尚志司令员曾说：“让小万先到被服厂去，筹建电讯学校。部队在伊春木营缴获了一台无线电，可以作为学校的器材，以后再抽人去学习，我们不仅为了现在战争需要学习先进电讯技术，而且培养一批技术人才是一项战略任务。”李兆麟同志对于保同志讲：“现在形势很好，部队发展很快，只是联络困难，再用两条腿跑交通是不行的，必须靠电台来联系，你必须很快培养出一批报务员。”于保合接受任务后，即在小兴安岭原始森林里举办了抗联三军的电讯学校。

校长教员只于保合一人，学员8人，他们是马玺贵（19岁）、史治国（18岁）、宋秉华（17岁）、李云龙（朝鲜族，17岁）、曲××（17岁）等。此外，还有六军的孙国权，独立三师还有3人，吕文海（18

岁)、张××(19岁)、李××(17岁)。炊事员叫王把头。

学校筹建工作第一项是修建宿舍,全用松木盖成木楞房子,用石头垒成火炕。然后往返百余里背粮食,到8月下旬,正式开课。

课程有军事和政治课,主要是技术课,学生都相当初小程度,首先补习文化课。在上技术课时,三分之一时间上电工常识课,三分之二时间上收发报课,政治课每天一小时。

开学3个月后,赵尚志指示与抗联总部军政学校合并,1936年12月,行军8天到伊春军政学校,学校直到1937年2月结束。

于保同志在回忆中说:“1936年春,我到了依兰县东北人民军第三军,赵尚志司令员要我到三军被服厂去筹备成立三军电讯学校。以在伊春缴获的一部电台作为教具。经过筹备于1936年7月就办起了‘第三军司令部电讯学校’,校址开始在浪河(即巴兰河)以东70公里。我化名万内任校长,当时22岁。学员由三军司令部调来的有马玺贵、史治国、宋秉华、李云龙、曲××,由六军调来的是孙国权,由独立师调来的有吕文海、张××、李××、共9名学员。他们的年龄都是十七八岁,相当于初小文化,有的只识少数字。使用自编的电学及报务教材,发报的练习器材也是自制的。课程设置三分之一讲电学和电工原理,三分之二练习收发报和国际电报,每天还有一小时政治课。我除负责党支部工作以及讲授业务课外,还和学员一起去沟外背米背菜,盖房子、盘火炕等劳动活也和学员一起干。干部、学员为了抗日救国,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都能吃苦耐劳,甚至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赵尚志司令员考虑我们的安全,让我们搬到伊春与军政学校合并。合并后教学力量加强了,军事课和政治课都是共同上,业务课分开讲。这时的校长由赵司令兼任,教育长第一任是李兆麟,第二任是侯启刚,秘书长是张文远。我记得当时的政治课内容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巴黎救国时报,中国及东北游击活动材料,莫斯科印的中国书如《共产国际》等刊物。还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联系形势检查自己的思想变化,以坚定革命必胜信心,树立以苦为荣,为革命牺牲是最大光荣的思想,还有诉苦教育。此外,文娱活动开展得也不错。”

“1936年冬,省委来信说:斗争形势发展很快,抗联三军由4个团扩大成7个师,六军也由4个团扩大成4个师,部队迫切需要加强通信联络。要我们加快速度,赶紧学好技术。”

“到1937年初,学员除掌握了基本的电学知识外,都达到了每分钟发报十一二组(每组5字)、收报十五六组的要求。接着省委指示,学

员立即结业分配工作。”

“1937年2月以后，我被任命为留守一团政治部主任。”

1938年日寇向东北大量增兵，抗联受到了很大损失，1942年按共产国际的决定，抗联主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共编5个营，第一营营长金日成，第二营营长王效旺，第三营营长王旺贵，第四营营长姜信泰，无线电营营长奥斯特洛夫（苏联人）。这个教导旅到了中苏边境，有时住在苏联境内。

其中，无线电营在当时进行过训练，但未正式办学校。

## 二、解放战争时期

日本投降后，我军派出大批人员到东北。1945年9月16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乘飞机从延安到山海关，改乘火车到沈阳。同去的有军委三局副局长段子俊同志，以及徐明德、莫春和同志。冀热辽地区陈云东同志带领一批通信人员到锦州，后到沈阳。山东通信学校郑立中、孙虎同志带一批同志到丹东，山东地区张瑞同志带一批通信干部到阜新，原新四军三师颜吉连同志带一批同志到东北西满地区。不久延安又派程明升、张可曾同志到东北，冀东地区江文同志也带一批通信人员到东北。当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时，段子俊同志任三局局长。

### 1. 西满通信学校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三师由苏北转移到山东，沂水战役后，根据上级指示，三师由山东到东北西满地区。三师电训队第三期在江苏盐埠地区刚刚开学，因之也随之转移到东北。

1945年10月，原三师电训队在东北郑家屯成立“西满通信学校”。校长颜吉连（兼）、副校长周志慎，教员有韩韬、鞠文奎等。不久学校由郑家屯迁洮南，到白城子，到齐齐哈尔，到讷河。从苏北到东北的原电训队第三期学员，为西满通信学校第一期学员，这一期在讷河毕业。毕业时有学员30余人。这一期毕业后，西满通信学校招收第二期，1946年迁至梅河口，与电讯专门学校合并。

### 2. 东南满军区通信学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东地区的山东通信学校有20余名学员，由郑立中、孙虎同志带领，随山东的部队到东北丹东市。到丹东后，原山东抗大分校一部分学员约20人与通信学校人员合并，于1945年10月在丹东东坎子建立“东南满军区通信学校”。校长郑立中，教务主任孙虎。1946年1月，东南满军区与辽西军区合并，学校随军区到本溪，

1949年2月迁梅河口，并入电讯专门学校。

郑立中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年9月，我带山东通信学校的20多名快毕业的学员，随同罗荣桓、肖华去东北，通信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涌同志。在丹东又与从胶东调来的20多男女青年合并，在丹东不久，就到了梅河口电讯专门学校。”

“电专一共办了4期，第一期有张文芝，第二期有姜朴（女），第三期有周敬欣、左文普，第四期有孟铁之。后来电专改为东北通信学校，以后迁汉口。”

张文芝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一部分同学从山东抗大分校调出，随肖华挺进东北到了丹东，成立东南满军区通信学校。队长是郑立中，教务主任孙虎。学员约40余人，10月下旬开学。校址开始在东坎子造纸厂内，后搬到满铁医院宿舍，在镇江山下一座二层楼内上课。1946年1月，与辽西军区合并，学校也随军区司令部迁至本溪。不久学校归东北军区建制，改名为东北军区电讯专门学校，校址在梅河口镇。校长张可曾，教务主任孙虎，政委朱虚之，政治协理员姓张。学员分两个队，我在一队，队长郑立中，下设3个区队，学员70多人，1946年3月15日毕业。第二队队长是曾美若，学生约40人，他们5月毕业。”

田昭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年8月，我在山东军区抗大二分校学习，地址在莱阳水沟头。刚学了两个月，组织上要抽一部分人去学无线电，一共抽调30人。我们到了通信学校，刚刚学习，组织上决定我们去东北。我们从莱阳出发，从黄县龙口上船到了东北，先到庄河一个小码头上岸，后来到了丹东，到丹东后编为3个区队。这时从部队调来一些连排干部，合起来40多人。到丹东归南满军区通信科领导，由郑立中上课，电台报务员也兼课，当时不算正式上课，只学了一点英语，上级决定我们迁往梅河口。我们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郑中立，下面分两个区队、6个班。”

“1946年4月20日毕业，我们是电讯专门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我们毕业那天，正是长春解放的前10天。我们到长春报到，分到东满军区做通信工作。”

## 第二节 东北民主联军电讯专门学校、东北通信学校、第四通信学校、汉口机务学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段子俊同志率部分电台人员随彭真同志到了

东北，不久程明升、冀东江文同志都到了东北。段子俊同志任民主联军三局局长。

1945年9月，延安军委三局派张可曾同志去东北，在阜新市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见到张瑞、段子俊同志，当时民主联军三局正准备建立一所培养通信人才的学校，经张瑞与张可曾同志研究，定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电讯专门学校”。报经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批准，正式登报招生，并任命段子俊兼校长，张可曾任副校长，政委朱虚之（兼），教务主任孙虎，协理员张××。联军总部的任命于1946年2月7日正式下达，校址在梅河口。

经过筹备，学校很快开学，开始只有1个队，以后扩为3个队，又扩为4个队，每队百余人。在开始，学校人员由3部分组成：一是在沈阳等地招收的新生；二是新四军三师电训队第三期，经山东到东北西满，成立西满通信学校，1946年并于电讯专门学校；三是郑立中、孙虎同志带领山东通信学校部分学员到安东后，成立东南满军区通信学校，1946年并于电气专门学校。

学校以培养报务员为主，所学课程类似抗日战争时期电训队所教内容，学制6~8个月。

1948年，学校改称“东北军区通信学校”并迁往沈阳，不久冀东军区电训大队李砚田带领电训大队的学员并入通信学校。1950年学校迁至汉口，1951年改为解放军第四通信学校，这时已有1000余名学员。学校分为4个大队，一至三大队学报务，四大队学机务。报务队于1951年毕业，机务队于1952年毕业。

1953年，学校改为解放军通信机务学校，校长赵伟，政委刘强，副校长刘兆生。

1954年，学校中学无线机务的学员迁往重庆，成立解放军重庆通信机务学校；学有线机务的学员仍留汉口，建成汉口通信机务学校。

东北通信学校进关前共培训8期学员，第一期的学员是原山东通信学校到东北的学员，此外还专为蒙古、朝鲜各培养一期学员。

张可曾同志在回忆中说：“1945年9月，我在延安工作，军委三局派我到东北去接收电讯方面的有关设施。这时段子俊、程明升已去东北，冀中的江文也到了东北。我去以前，叶剑英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到东北后见林彪、彭真同志。我到东北后，先到前总所在地阜新，我见到林彪，他看叶剑英同志的信后说：“很好，正缺这方面的人，你认识张瑞吗？让他向你介绍一下情况”。我说认识张瑞。我找到张瑞，

他说东北已有了变化，接收电讯设备先不忙，最好先办学校。我等了几  
天，他说已与段子俊同志谈好，先办学校吧！于是我到抚顺去见段子  
俊，他当时是东北民主联军三局局长。我们商量学校起什么名字，他说  
叫通信学校不好招生，东北人喜欢叫专门学校，于是我们起了个校名叫  
‘东北民主联军电讯专门学校’，并登报招生。我们写的报告，经民主  
联军总部批准，学校就正式成立了，校长是段子俊，我是副校长，任  
命的时间是1946年2月7日。”

“这个学校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黄克诚从山东到东北时，把渤海地  
区的一个电训队带过来，队长叫郑立中，教务主任孙虎，学生都是胶东  
地区保送的，男的二三十人，女的十多人。1946年1月，他们搬到了  
梅河口，分甲、乙班，学校成立时，甲班快毕业了，张瑞同志的夫人江  
林就是那一期学生。学校的第二部分是招收的新生，都是初中程度。第  
三部分是西满通信学校来的。此外还为蒙古、朝鲜培训的通信人员，毕  
业后都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了。”

“学校开始在梅河口，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后，学校搬到吉林长春，  
又到哈尔滨，又到佳木斯，又到汤原，又到东安（密山）。我军开始反  
攻后，又从东安到沈阳。1948年改为东北通信学校，以后到汉口，叫  
第四通信学校。”

“入关前，冀东有个通信队，队长李砚田，他们并到学校，我们南  
下时，他们留下来，他们在学校只合并了两三个月，以后他们又组成东  
北通信学校。在入关前，共办8期，包括山东过来的同志。”

### 第三节 关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 大连大学电讯工程专修科

#### 一、关东电专的建立与变迁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驻旅顺、大连，苏军将发电、动  
力系统及市内较大的工厂，组成中苏远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北民主  
联军派段玉明（段子俊）任董事长，苏方派副董事长。当时一切单位  
常用“关东”的名称。

为了培养通信人才，1946年冬筹建关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并于  
1946年底开学。校长段子俊（兼），副校长罗若遐。

学校设报务系、机务系、工程系。

1949年,关东电专、关东工专、关东医学院、俄专、科学研究所、生物制品所合并为大连大学。大连大学下设工学院、医学院、俄语专科学校、化学研究所、生物制品研究所。其中,工学院由大连工业专科学校和关东电专组成,关东电专的学员编为无线电系的电讯工程专修科。工学院设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工系、机械系、土木系、电讯系、电机系、冶金系8个系。无线电系主任毕德显。

大连大学校长李一氓(不久为吕振羽),秘书长段子俊,教务长孙廷烈(后为范大因),总务处长姚志健,党委组织部长罗若遐,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医学院院长沈其震,俄专主任兼支书记孙文彬。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吕振羽,副书记段子俊。

1950年,大连大学撤销,工学院、医学院、俄专均分别建立学校。工学院改为大连工学院,在校学生1135人,教职工443人。

1952年,大连工学院电讯系全体师生,在系主任毕德显教授带领下到张家口,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后迁西安,即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二、规模、机构、教师、学员

关东电专成立时,除校长外,设教务处、训育处和工程、机务、报务3个系。训育主任肖陈人,教务主任郭东霖,后为范大因。关东电专与光华电器公司组成一个党总支,关东电专设分总支,由段子俊、罗若遐任正、副书记。

工程系主任戈明、范四夫;机务系主任邹亚平、顾维明;报务系主任郭显(女)。

关东电专全校师生340人,其中学生260人,教师45人,其他职工约36人。

在教师队伍中,中国籍教师有郭东霖、姜兆仁、郭建新、高亚平、苏德明、王英烈等。1948年冬,大连大学医院沈其震院长到香港聘请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如毕德显、王大衍、吴式枢、解俊民等,1949年陆续到校。这时电讯方面的教授、讲师、助教有二十人。

日籍教师有山下敬治(理学博士,原旅顺工大教授)、永井种次郎(数学博士,原旅顺工大代校长)、富冢(工学博士)、锡岛敏(工学博士)、加藤芳雄(理学博士)、冢本(工学博士)等10余人。

关东电专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大部来自军政大学辽南分校,大连警察学校和各部队;一小部分来自建国学院、丹东电政学校,以及老解



放区来的干部子弟。

### 三、教育方针及教学计划

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不可能按部就班从低到高慢慢学习，当时的教育方针是：“为革命战争服务。”培养的目标是：“将进步的知识青年训练成为具有初步觉悟的符合我军实际需要的通信机要干部。”学校按抗大精神办事，教学中急用先学，为用而学，为实战需要而学。

工程系原计划3年到3年半，机务2年到2年半，报务系原计划一年。后因工作需要，没有全部按计划实施。工程系实际教学3710学时，166周，机务系各班不同，2120~3110学时。

工程系设数学、物理、化学、数理电工、电子工学、电波传播、网络理论、电工材料、电机学、交流理论、有线电讯电话原理、俄语、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革命人生观、时事、党史等。

机务系设数学、物理、化学、电气磁气学、交流理论、电磁测定、电子管学、电机原理、有线电话原理、天线理论、接收机原理综述、发射机原理设计、英语、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修养等。

### 四、政治思想工作与生活管理

关东电专在政治思想教育、生活管理上，完全是抗大式的，每日有军事训练，生活战斗化。每班45人左右，设班主任1人，政治辅导员1人，班干部对学生思想情况了如指掌。

每天上课5小时，其余是实习、实验，共11小时；星期日有半天文体活动，半天自由活动。当时的口号是：“提高信心，安心学习，掉队的赶上去。”全校师生生气勃勃，团结活泼，奋发向上。

大连地区遭受国民党封锁，生活困难，每人每月22斤玉米以维持生活。为了团结日籍教师，专家、教授每人每月21斤玉米，外加大米15~20斤，工资关东币（苏军币）1.8万元，外加技术津贴5万元。讲师为关东币1.8万元，包括技术津贴5000元。

生活虽然困难，但是大家团结一致，朝气蓬勃，学习成绩很好，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 五、毕业人数

报务系共培养77人。机务一期（1946.12—1948.5）32人；机务

二期（1947.9—1949.6）在大连大学电讯专修科毕业，34人；机务三期（1947.9—1948.4为预科）1949年9月在大连大学工学院电讯专科毕业，37人。工程系（1948—1950），毕业24人。以上报务77人，机务138人，工程系24人，共239人。

#### 第四节 东江纵队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1938年秋，广东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雷州半岛）人民抗日游击队，统称华南抗日游击队，部队发展到2万人。

1938年，曾生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在东江一带活动，有5个游击小队，曾生为大队长，王作尧部队编为第五大队，王为大队长，林平任两个大队的政委。1942年成立军政委员会，林平为书记，两个支队合并成立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为总队长，林平为政委，王作尧为参谋长，杨康华为政治部主任。1943年2月，决定对外仍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长曾生，副总队长王作尧，参谋长梁鸿钧，副政委兼政治部长任虞焕章。

1939年下半年，惠宝游击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着手建立电台，电台工作人员有王彦云、戴机、王春江、吴竞波4人。当时虽然建立电台，并未沟通联络，后来部队被迫东移，电台即停止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时又由戴机建立电台，在原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电台人员刘澄清同志的协助下，用办事处原来的呼号及波长，与延安党中央沟通了联系。

电台建立后，十分需要报务人员，开始在电台上以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训了一批人员，他们是：伦觉、潘雪琼、何太、韩继元、梁葆葆（梁静君）。

1943年12月，正式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副参谋长梁鸿钧。这时人数增多，于是开始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先后办了4期。

1945年7月，成立粤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江南指挥部、东进指挥部。

1946年6月，与国民党达成协议，部队北撤到山东。

## 一、第一期

1942年1月，在广东宝安县大鹏湾的西涌村，举办第一期电台人员训练班。训练班负责人是电台台长戴机，正式学员6人，他们是丘海生、张娥玲（张小章）、吴文辉、余绿波、李子芬、梁小玲等。学习内容主要是收报、发报、通报技术及无线电机务知识。原来早已参加工作的同志，为了提高理论水平，学习无线电原理及修理技术，一部分同志也跟训练班学习机务知识，如江群好、伦觉、潘雪琼、韩继元、何太、王强等。报务教员由戴机、江群好兼任，机务教员张楚。训练班开学不久，为了加强领导，陈志华（又名严重、张志诚）被派到电台任政委，负责训练班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教学组织工作。这一期于1944年7月毕业，学习时间半年。

## 二、第二期

1944年8月，在大鹏湾半岛的油草棚村举办第二期训练班，负责人戴机，政委陈志华，报务教员戴机、江群好，机务教员张楚。学员共12人，他们是戴昌华、李育平（李文）、邹顺平、黄作材、卢毅、卢侃、陈伦（陈绍伦）、相碧群、刘宛、黄楚珊、文群乐（文健）、伍惠珍等。这一期于1944年12月结业。

## 三、第三期

1944年12月继续举办第三期，地址开始在大鹏半岛，1945年初随司令部转移到东江北崖罗浮山地区。负责人除戴机外，又增加了杨兆麟（文星辉），他也兼任机务教员。学员共16人，他们是杨钊、黄兰峰、温健、杨白云、王国华、陈真、关旭华、方新、陈大征、高安、王春、李健、潘淑均、施斌、黄梅、高宪文等，于1945年5~6月毕业。

## 四、第四期

1945年7月，筹备举办第四期，9月1日正式开学。负责人为杨兆麟（电讯科机务股长），政委陈志华。日本投降后，部队转移精简，所以这一期提前毕业，有的同志到电台上继续完成了所学的课程。第四期学员约40~50人，已知的学员有邓基、陈焕楷、曾文光、黄文尧、杨文伟、罗醒中、曾荣基、唐竹、郑波、李凡、李葆、陈基、叶茂丽、钟

扬、梁辰光、郑萍、李瑛、王莫、邓庄、高飞、李坚、刘素菲等。这一期于1945年11月毕业。

以上4期学员除在东江纵队各部队工作外，不少被派往粤桂边、桂滇黔边等根据地电台工作。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解放区，这时有的电台工作人员留在广东继续工作，有的派往香港、海外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回到部队，成为电台的骨干。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粤赣湘边区无线电通信人员培养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华南我军开始部分北撤。1946年6月29日，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一部分留下继续斗争。内战开始，华南武装斗争又开展起来。

华南地区先后成立琼崖独立纵队、桂滇黔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统称华南游击队。

1947年开始，以原东江纵队没有北撤的电台工作人员为基础，又建立了电台，同时培训电台人员。

### 一、九连山工委（东江二支队）电台，在河源、龙川、和平、连平一带，举办报务人员训练班

第一期：1947年7月至1948年2月，负责人钟应时、张小章。学员有4人，曾长、郑波、钟坚、邓基。

第二期：1948年2月至6月，班主任张小章，报务教员钟应时，学员16人，刘振东、钟声、钟勇、吴越、林渭章、李彬、陈飞、胡青、游立群、黄文、曾裕廷、曾雄、罗岗、骆国赐、骆启南、刘志文。

第三期：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由丘海生负责，学员6人，陈锦化、叶飞、郑韶、欧阳仔、叶醒华、兰蔚。

### 二、江南支队（江东支队）电台，由曾光、张明负责，在惠阳、紫金、海丰地区办过2期训练班

第一期：1948年6月—1949年1月，学员2人，林沛然，葛曙。

第二期：1949年3—7月，学员3人，马宝媛、马丽娥等。

### 三、江北支队（东江三支队）电台，由台长陈焕楷负责，在从化、增城、博罗等地办过4期训练班

第一期：1947年冬至1948年春，学员2人，郑葆、余峰。

第二期：1948年夏至1948年秋，学员6人，白瑞正、陈忠、路华、潘豪、潘日、黄木。

第三期：1948年秋至1949年春，学员有宋远平、黄汝显、周济、宋学联等20人。

第四期：1949年初至1949年夏，学员有温秋平、黄清、邓立民、何荣、胡木儒、李燕等20人。

### 四、粤北第一支队电台，由李文负责，办过4期训练班

第一期：1947年6月至1947年底，学员6人，温则厚、胡继尧、何寿如、张若子、高飞、刘克培。

第二期：1947年8月至1949年初，学员3人，肖敏坚、林火、陈伦。

第三期：1949年5月至1949年秋，由曾长负责，学员有陈才、范武、肖波萍、刘光麟、钟祥奎等15人。

第四期：1949年8月至年底，学员有黄武山、陈浩、黄官胜、黄松成、张汉三、罗成、李坚、黄伦知、赖添、李森、郭福、张国厚等15人。

### 五、粤北第二支队电台，电台长容康负责办过3期训练班

第一期：1947年夏至1947年底，学员3人，林克、罗荣、朱基。

第二期：1947年底到1948年夏，学员7人，陈因、李华、陈光、王堤、刘秀英、刘烈裕、欧阳干戈。

第三期：1949年5月至秋天，学员有陈如标、黄明炎、邓国全等4人。

### 六、粤赣湘边区纵队于1949年1月成立，由原来东江二支队电台作为纵队电台总台

纵队成立后，于1949年5月，在龙川县老龙镇举办了一期报务训练班。由总台丘海生负责，班主任陈焕楷，学员20余人。广州解放后，并入华南分局电讯科。

# 附录 A 旧中国无线电史话（节录）

陈 章

作者简介：陈章教授是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名誉系主任。他从1921年起，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工学院（解放后改为南京大学工学院，1952年改为南京工学院）连续从事教学工作，迄今已有60多年，陈先生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是无线电教育事业的老前辈。

“无线电”作为一门学科，在旧中国，几乎是一个空白。从1911—1949年近40年中，无线电有一些进展。虽则比之先进国家，远远落后，但还是有一些史实，值得记叙。本人就回忆所得，作此短文，或为读者所乐闻。由于手头缺乏资料，下述内容可能很不完整，请读者原谅。

## 一、无线电教育

先谈教育。无线电学科起源于电工。提到我国的电工教育，不能不追溯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后来又改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唐文治。他是前清政府的翰林出身，江苏太仓人，善长中国文史。在前清皇朝后期，官拜邮传部侍郎（相当于今日的邮电部副部长），后弃官办学，大约在1913年他到上海任校长，力主把学校办成工科大学。当时该校在唐的主持下，创办了四年制大学本科的土木工程和电机工程科（即现在的所称的系），该校还有附中、附小（即现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前身）。在此之前，我国只有唐山的路矿专门学校设有矿冶科及土木科，堪称我国最早的工科大学，但没有电机工程科。同时各国在中国所办的教会大学不少，它们的专业有神学、文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极少数的还有化学和物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校办工程

学科的。不言而喻，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深怕中国人民掌握了工程技术知识，有了反侵略的本领，会使它们扩张掠夺的野心难以得逞。所以，唐文治于1914年在上海南洋公学除办土木工程科外，首先创办了电机工程科。其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才有浙江大学，中期才有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相继办了电机系，30年代南京金陵大学办了电机系，上海圣约翰大学办了土木系。在此，我们不能不钦佩唐文治的高瞻远瞩，并且对他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我们的怀念。他在任校长期间，兢兢业业，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校工作上，以后积劳成疾，几乎双目失明，遂于1921年夏辞职，先后共8年，全校师生对唐先生是无不爱戴的。

就在1921年秋季，交通部将其所属上海、北京、唐山三校合并为交通大学，并委叶恭绰为校长。上海学校主任为张铸，副主任张廷金（又名张贡九）。但不久，三校又各自独立，在上海的称“上海交通大学”至今。

电机工程科创办初期，担任教授的几乎全是美国人，甚至讲基础课如化学、物理、力学等课也是美国教授。电机系的主任是美国人谢尔顿（S. R. Sheldon），他的服务年限最长，约20年之久，他与美国人汤姆生（G. V. Thompson）两人分别讲授系内重点课程（交、直流电路与电机）。到1916年以后，才先后有陆续归国的中国留美学生来校担任教授。张廷金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是振荡理论权威皮尔斯（Pierce）教授的学生，又是中国人参加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RE）的早期会员之一。张在校工作达30年之久，他除讲授微积分课程外，还在电机系开设无线电报课程。所以，他是第一个在我国大学开设无线电课程的教师。当时无线电通信是用火花发报机和矿石晶体接收机，我记得他的讲课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减幅波振荡在单回路和耦合回路不同状态的理论，数学推导极为详密。这在当时甚至直到今日，也是属于经典基本理论范畴。但所用教材是德国芮纳克（Zenneck）所著《无线电报》德文英译本，繁杂难懂，学生们称之为“天书”。张并不照书讲课，仅作为参考书，其讲稿内容却另成体系。到1921年上半年，在课程将结束时，张从当时英文杂志上摘译了属于真空二极管和三极管的资料作为教材，但内容非常简略。因为，虽则二、三极管早于1904年和1908年相继问世，但那时技术发展缓慢，及至1914年还没有多大进展，各国仍沿用火花发报和矿石接收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战国双方都感觉火花发报机体积笨重，干扰厉害，不宜军用，才竞相发

展真空管来改善军事通信。但由于军事用途必须相互保密，关于真空管用于无线电通信的资料，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陆续发表于各种科技刊物上公布于世。至于正式出版有系统的文献和教材，则还在以后几年。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一直到 30 年代初期的七八年间，国内各大学这门课程所用的教材，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马亚克洛夫脱（Morecroft）教授所著的《无线电通信》，其内容一部分仍为火花发报机理论与应用，而对真空管的叙述，枝节零落，不易掌握，这是因为当时真空管虽已大量应用，但作为一门有系统而完整的学科，则正处于形成之中，还来不及整理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书刊。到 30 年代中期，情况就大有改进。各国图书出版机构所发行的关于无线电学科的书刊，犹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其中，以美国斯丹福大学特尔曼（F. E. Terman）教授所著的《无线电工程》最受欢迎。每隔三五年修订一次，共有 4 个版本。每版内容均随无线电技术的发展而加以增删，内容取舍，理论与实际的比例亦甚适当。我国各大学纷纷采用此书作为教材，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而止。

也就是这个阶段内，无线电技术的应用已远远超越了纯属通信的范围，而逐渐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因而，这门学科与其说是“无线电”不如称之为“无线电电子学”更为确切。当时，国外已有许多学校把《无线电工程》这门课分设为“无线电”和“电子学”两门课程，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1943 年，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采纳美国麦克米伦（F. O. Macmillan）教授的建议，开始在“无线电工程”课程外开设了“电子学”课程。不久，国内各大学电机系也相继开出这门新课。这里，还须指出，即使在这个阶段，我国各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的培养目标，限于历史传统和条件，还是注重电力机械，为电力厂和电机制造输送技术人才，而无线电所占比例极小。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人们对无线电的重要性有所认识，情况才开始改变。

在这个阶段，国内与无线电教学有关的出版书刊是极少的。最初的一本名为《无线电学》的书系倪尚达所编写。他自印自销，不下数千册。其后陈章编写的《无线电工程学》中技教科书，由商务书馆作为每日一书出版，行销全国。曾修订 3 次。后来又翻译了特尔曼著《无线电工程》作为大学教材之一。还有何治垓等 2 人从英文翻译的《无线电物理》一书，通俗易懂，很受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欢迎。此外，两个学会所发行的《工程》及《电工》刊物，经常有关于无线电的论著，这



里就不多述了。

无线电实验课，也是张廷金于1921年下半年，首先在交通大学电机系开设的。当时我是助教，当他的助手。实验内容主要是高频耦合电路。由于没有真空管信号发生器，采用干电池电源和蜂鸣器去激励，电路输出是极其微弱的减幅振荡波，再用耳机听录。当转动可变电容器改变回路谐振频率时，声音非常弱，因为信号太弱，如偶有一个接触点不正常时，就会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到次年，才弄到一些真空二极管和三极管，开始做些电子管伏安特性测试。以后逐步开出三极管放大、检波和振荡等实验。从此以后，随着新元件、新仪器、新设备的大量添置，无线电实验才日趋完善。

关于无线电人才的培养，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无线电报务员的培训。从发报技术方面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线电报务员犹如有线电一样，是用手指按电键来发报的。在接收方面由于信号强弱悬殊，有线电报的接收可用纸条上的符号判别字码，而无线电报则须用耳机听收抄录。因此，无线电报务员需要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训练。我国最早举办报务员训练的是海军在南京设立的，后来北京交通部设立的邮电传习所，也是训练这种人才的场所。当然也有不少无线电报务员是有线方面转过来的，及至轻便型短波通信机盛行时，银行、报社等各个系统，纷纷成立各自独立的通信网，不受交通部管辖的军用或民用培训报务员的学校约束，蓬勃兴起，培养了一大批不仅专长收发电讯技术，而且对机器工作原理略有所知，对机器维护修理有所掌握的技术人员。他们是我国无线电技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人才。

1927年曾于广州黄埔军校设立高级班训练军事通信人员。1928年初革命军已在宁沪立足，准备渡江继续北伐，军队通信人员奇缺，遂于南京成立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培养有线、无线报务及交通技术人员，即招收高中毕业生500名，期限为2年，以无线通信为主，另外有铁道、汽车各50人，有相当规模，校长为李范一。学校成立于3月初，7个月后为中央军校接办，改为该校的交通大队作为军校六期的一部分，教师纷纷离去。改组的原因大约因李非正式军人出身，不外乎人事派别之争，这个班只办了一期，未继续办。后在军政部下开设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性质与前相同，办了多期，直到抗战前，改组为通信兵学校。抗战开始后迁贵州麻江，并附设工厂。至于这批人员，最初目标为北伐（后来于1928年5月30日北伐军被日寇阻击于济南，即“五卅”惨案），不久被派到江西与红军作战，其中有不少起义，加入红军。“七

七”事变后又参加抗日。当时时局变化，情况复杂，就这些人来说，对民族利益有过也有功，不可一概而论。

## 二、无线电设施

其次，来谈谈关于无线电的设施。民国初年，先由英国人用 9 部 5kW 同步旋转式空隙火花发射机，分设于北京、上海、喀什、库伦等地。后又在天津、上海、福州等地设立专为海上船舶服务的长波无线电台。1929 年改名为交通部上海海岸电台，仍用 XSG 呼号，嗣即增添设备与航行于各大洋的船舶通信。

同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无线电事业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与垄断的对象。日本在北京郊区双桥划地几千亩，投资数万，以好几年的时间，建造了一长波 50 千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台，但由于建造时间拖延过长，建成时短波通信已普遍使用，很快就被淘汰。美国也曾企图在上海郊区建造一长波 1 000 千瓦的大功率越洋大型发射台，终因列强争夺，军阀政府又办事无能，拖延不决，未能动工。至 1927 年华盛顿国际无线电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对外国在华擅自设立电台提出抗议，此事遂未能得逞。其他如英、法帝国主义也都跃跃欲试，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竟成了各国争夺无线电霸权的战场。

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一直到 20 年代初期，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火花式发报机占了独霸的地位，因为其他如高频发电机和电弧等，均以其种种缺点而未能立足于世。1922 年上海交通大学张廷金在实验室里装置了一台小功率长波火花式发射机。虽然天线上所用电流表是热线式电表，动作迟钝，但是它却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无线电发射机。该机配上进口的真空管接收机，可与国内近距离地区进行通信。当时报务员收录的新闻送去上海最著名的报社“申报”刊登，比之其他渠道来的消息，提前了一两天，曾引起各界注意。在同一时期，上海“法租界”当局建立了一个强力长波火花发射台，因其功率强大，且又谐振性能差劣，竟致上海所有接收机的度盘的一部分受其侵扰，该台又为沿海各大洋行收发各种电报，真是横行霸道！但由于当时政府既无能又无知，面对这种严重侵犯我国主权非法行为，竟然听之任之，熟视无睹。

人们自发明无线电以来，一直认为波长越长则通信距离越远，这是鉴于地面波所受损耗长波比短波要小，所以，通常采用波长达几千米甚至几万米的长波，来实现跨越大洋的远距离通信。直到 1923 年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这就是由美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发现的一个奇

迹——利用短波实现了远距离通信。他们用当时被人们认为在通信上是无用的而波长小于200米的短波，依靠高出地面几百公里的电离层的反射，以极小的功率和很短小的天线，实现了几百至几千公里的远距离通信，与此同时，意大利的马可尼（G. Marconi）利用游艇作远距离短波通信的试验获得成功，这是在无线电发展史上继真空管之后的又一次革命。

1926—1928年，北伐军正乘胜进军两湖江南之际，在其后方广州北部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由德国 Lorenty 公司建造。它的工作机理是：用一个快速齿轮旋转于一个带电感线圈的空隙之间，从而产生一系列高频脉冲群，提取其基波频率，最后加以放大、倍频送入天线而发射出去。该机功率为10kW，所用波为2000~4000米。由于受气候影响，与上海通报时通时断，极不稳定，且因独立采用柴油机发电机，成本昂贵，不久就被短波所淘汰。在同一时期内，广州长堤有一个长波火花台，专与香港通电，商用业务繁忙，收入甚丰（那时的公用电报以及军用均不收费）。1927年初，北伐军在汉口成立了政府，由交通部派员去接收，而电台当局因有利可图，又有强硬的后台，竟然拒不交出。可见当时虽已树立了革命旗帜，但顽固的军伐作风依然未改，国民党政府的必败，在这件事上已见端倪。

由于波长短可以大大简化通信设备而减少资金，宜于军事通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进行北伐战争，从广东出发，从武汉直指江南，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彻底打垮。这固然是人心所向，作战有方，但也与当时北伐革命采用了短波通信设备，军情迅速而准确，不无关系。例如在1927年初，孙传芳从苏北反攻江南，占据了镇江到龙潭一带，切断了沪宁线铁路和电报线路，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就是凭借轻便的短波无线电通信，使沪宁两地及时联络，以致孙传芳反被左右夹攻，卒至大败，退往江北。这是短波无线电在中国革命史上立下的一次大功。

当时所用的真空管发射机，大都采用谐屏谐栅（TPTG）振荡电路，也有用哈特莱（Hariley）振荡器电路的。因为这两种电路比较容易起振。但它输送给天线的功率极小，仅几十瓦，工作波长通常为40~80米，对于相距几百公里的两地可以畅通。当时的真空管接收是高放式的，先用一、二级高频放大，再行检波，然后经一级音频放大。一般要随时间和距离的不同而调节最佳工作波长，以便收听音清晰确切。所用天线是具有定向特性的中心馈电式短波长天线，装架与拆除均甚简便。

所用电源有两类：固定电台使用直流发电机；移动电台使用由手摇发电机或内燃发动的发电充电的蓄电池。全部收发机和天线以及电源装置总共 200 ~ 300 千克，用几个人手携背负，随军使用很方便。

1928 年国民党政府到达江南后，为了扩大短波无线电通信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大量装配短波收发报机的工厂以应继续北伐之需。但所遗憾者，不久这些设备却被用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阎冯（阎锡山、冯玉祥）军阀内战，竟使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制造成的先进设备，用做残杀自己同胞的工具，这不可谓我国无线电通信史上的一场悲剧。

短波远距离通信从 1923 年发明后，不到两三年，各国无线电公司纷纷着手制造跨越大洋通信的国际商用收发报机，天线装置也有明显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短波天线。用波长为 15 ~ 60 米，功率为 5 ~ 40kW 的短波发射机，配上方向性很强的天线阵，经过电离层的反射和折射，可以把信息传递到地球上的任一地方，以致使投资巨大的海底电缆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不久，我国也在上海郊区真茹和刘行，分别着手建造短波国际发报台，于 1929 年建成，开始与东南亚各国通信，1930 年又与欧美各国和香港通信，从此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上海所建立的海底电缆垄断我国国际通信的局面。抗日战争开始前，又与美国开通了国际无线电直通电话业务。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至后方四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我国及西太平洋地区与世界各地保持通信的唯一通道。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恢复国际通信，全部取代海底线缆的业务。1948 年又开通了与英国的国际无线电直达电话业务。而在日寇占领上海期间，在上海郊区南翔和七宝建立了无线电发信电台和收信电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和长征途中，由于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器材被封锁，缺乏军用通信设施，一度处于劣势。但在战争中缴获了不少无线电器材和设备，并有许多专业的人员起义，参加了红军，逐步建立了短波通信系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装备与人员不断得到发展。不仅在战场上，而且还在与各沦陷区地下党的联系中，这个系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领导这项工作的有王诤、刘寅、王子纲等。解放前，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建成，它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全国人民的工作方面，有其不朽的功勋。同时在敌人后方与党中央和秘密的短波通信，取得了联系。在这个工作中，李强等做出卓越的贡献。

关于无线电广播则另有一段历史。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电

广播电台是美国威斯汀豪司（Westinghouse）公司建造的 KDKA 电台。1925 年以后，商用真空管超外差收音机问世。在我国上海于 1922 年由美商凯洛格（Kellogg）公司设立了一个小功率广播电台于英租界，播送唱片。当时我在交通大学无线电实验室，第一次在听筒中听到音乐，印象极为深刻。但由于收报机的谐路特性太尖锐，声音严重失真。不久有苏氏兄弟在上海开设业余无线电器材商店，出售矿石机零件。后来逐渐有真空管收音机进口。各方面先后建立了许多中、小功率的广播电台。仅在上海一地，除了国民党官办的上海广播电台外，民营商业电台就有亚美、麟记、国华等许多小电台，同时竟然还设有法国广播电台、华美广播电台、德国广播电台等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外国电台。直到 1930 年左右，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拥有 75kW 发射机的中央广播电台，号称东亚最大。解放前不久，曾从美国进口一部 100kW 发射机，因未及安装而被劫运到台湾去了。至于我国的广播收音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前后几乎全是洋货。开始以日制再生四管机为多，也有美、德、荷兰的高放式，后来有不少美国超外差收音机涌入市场。但据 1948 年不完全统计，如此大国，全国仅拥有 5 万台各式收音机，几乎是万人一机，旧中国广播事业之落后状况，可见一斑。（下略）

（摘自《电子工业史料》第三辑）

# 附录 B 1928—1949 年 军队通信人员培养情况统计

表 B-1 共产国际代培人员统计

名 称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人员姓名
国际无线电训练班	6	1928. 6 – 1930. 10	莫斯科	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 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
伏龙芝军事通信 联络学校	4	1929. 1 – 1930. 9	列宁格勒	涂作潮、宋濂、 谭献犹、刘希吾
国际无线电学校	2	1932 – 1933. 10	莫斯科	林凯、龚荣生
国际交通部无线电 学校	5	1932. 6 – 1933. 12	莫斯科	周子帧，等
国际交通部无线电 学校	5	1933. 2 – 1934	莫斯科	段子俊、王东、 李春田、加夫、子清
国际无线电训练班	7	1934. 11 – 1935. 10	莫斯科 郊外	马丽、柔沙、于保合（万内）、 巴沙、郭力亚、谢尼、 苏钦臣（有的是苏联名字）
国际外语学校	8	1934. 11 – 1936. 1	莫斯科 郊外	肖希明、柏沙（女）、华里亚、 沃罗加、苏拉、华沙（女）、 谢尔基、丹那
无线电学校	1	1936 – 1937. 8		秦鸿枢（钧）
国际交通部无线电 学校	10	1936. 9 – 1937. 12		黄志才（关常有）、毛诚（女）、 张有衡、王金禄、张成、 白川、甘风琴（女）、于振东、 川顺、王庆才、孙福生
国际无线电训练班	3	1936. 12 – 1937. 9	莫斯科	叶莲那（女）、日呃拉、 安得利（周百川）
苏联工农红军中央 军官学校	3	1936. 10 – 1937. 12	莫斯科	刘子汉、周同、韩肖义

表 B-2 上海地下党

名 称	人 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单独训练	10	1930.3 - 1930.7	上海	张 沈 川
单独训练	10	1930.4 - 1930.9	上海	王 子 纲
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	16	1930.10 - 1930.12	上海	李 强
电机维修人员	5	1931		陈寿昌、毛齐华
单独培训报务人员	5	1931		陈寿昌、毛齐华

表 B-3 红一方面军电训班、军委无线电学校、红军通信学校

名 称	期次	人 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一方面军电训班	1	12	1931.2 - 1931.5	宁都小布	王 诤、冯文彬
一方面军电训班	2	20	1931.6 - 1931.10	于都康都镇	王 诤、冯文彬
军委无线电学校	3	36	1931.11 - 1932.4.5	长汀瑞金	刘光甫、曾三
红三军团电训班	1	4	1931.4 - 1931.9	会 昌	吴汝生、杨光池
红三军团电训班	2	7	1931.9 - 1932.3	会 昌	吴汝生、杨光池
红三军团电训班	3	12	1932.2 - 并入通信学校	上 饶	吴汝生、杨光池
军委无线电学校	4	30	1932.5 - 1933.2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军委无线电学校	5	20	1932.6 - 1933.4	洋 溪	刘光甫、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6	70	1933.3 - 1933.9.10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7	70	1933.7 - 1933.12 1934.2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8	20	1934.2 - 1934.6.8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9		1934.3 - 1934.12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10	16	1934.3 - 1934.12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11		1934.3 - 1934.12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高级班)		5	1934.7 - 1934.10	瑞 金	刘光甫、曾三
红星三大队、通信学校			1935.12	四川懋功	刘光甫、曾三

表 B-4 湘赣军区，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电训班

名 称	期次	人 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湘赣军区电训班	1	10	1932.12 - 1933.7	江西永新	闫侃斋、江文
红二、六军团电训班	2	7	1933.10 - 1934.4	江西永新	闫侃斋、江文
红二、六军团电训班	3	8	1934.12 - 1935	永 顺	闫侃斋、江文
红二十五军电训班	1	10	1935.7 - 1935.9	陕 南	钱 钧

表 B-5 红四方面军电训班

名 称	期 次	人 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鄂豫皖时期	1	10	1931.9 - 1932.2	湖北新集	孙光明
鄂豫皖时期	2	30	1932.5 - 1932.12	湖北新集	蔡威
川陕时期	1	15	1933.9 - 1934.6	通 江	沈侃夫、王子纲、蔡 威
川陕时期	2	29	1934.4 - 1935.6	通 江	沈侃夫、王子纲、蔡 威
新疆新兵营	1	24	1937.5 - 1938.4	新疆迪化	刘寅、荆振昌
新疆新兵营	2	20	1938.4 - 1940.6	新疆迪化	荆振昌

表 B-6 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延安通信学校）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领 导 人
陕北红军电训班	1	7	1935.7 - 1936.1	延长永坪	吴泽光
陕北红军电训班	2	6	1935.9 - 1936.3	延长永坪	吴泽光、钱钧
军委通信学校	3	3	1935.11 - 1936.4	瓦窑堡	吴泽光、曾三
军委通信学校		3	1936.1 - 1936.2	瓦窑堡	吴泽光、曾三
军委通信学校	4	22	1936.4 - 1936.6	瓦窑堡	吴泽光、曾三
军委通信学校	5	20	1936.5 - 1936.8	保 安	吴泽光、曾三
军委通信学校	6	26	1936.6 - 1936.10	保 安	吴泽光
军委通信学校	7	18	1937.1 - 1937.2.6	延 安	吴泽光、杨毓卿
军委通信学校	8	32	1936.11 - 1937.10 1938.1	云 阳	吴泽光、杨毓卿
军委通信学校	9	9	1937.6 - 1938.1	延 安	吴泽光、魏洪亮
军委通信学校	10	42	1937.12 - 1938.5	富县东村	吴泽光、魏洪亮
军委通信学校	11	60	1938.3 - 1938.8.9	富县督河村	吴泽光、杨毓卿
军委通信学校	12	66	1938.5 - 1938.11	富县督河村	吴泽光、张振球
军委通信学校	13	220	1938.12 - 1939.12	保安 - 延安	吴泽光、张振球
军委通信学校（高级班）		100	1938.8 - 1939.8	保安 - 延安	杨迪哲、邹剑秋
军委通信学校（高级班）	14	80	1940.6 - 1941.12	延 安	吴泽光、邓典挑
军委通信学校（干训班）		13	1940.6 - 1940.12	延 安	吴泽光、邓典挑
军委通信学校（干训班）	15	14	1940.12 - 1942.4.5	延安川口	吴泽光、邓典挑
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16	30	1943 - 1945	川口 - 盐店子	程明升
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干训班）	17	30	1944.3 - 1945.12 (1946.1)	川口 - 盐店子	刘洪涛



续表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陕甘宁晋绥联司通信队干训班	1	70	1944. 3 - 1944. 12	延 安	曾庆良
陕甘宁晋绥联司通信队新生队	1	60	1944. 3 - 1944. 12	延 安	曾庆良
陕甘宁晋绥联司通信队干训班	2	100	1944. 12 - 1945. 8	延安	曾庆良
陕甘宁晋绥联司通信队新生队	2	70	1945. 9 - 1945. 9	延 安	严成钦、朱仕朴
陕甘宁晋绥联司通信队新生队	3	40	1946. 5 - 1946. 12	延 安	严成钦、朱仕朴
西北电讯学校	1	200	1946. 12 - 1947. 3	延 安	刘克东、朱仕朴
联司通信队气象队	1	21	1945. 3 - 1945. 5	延 安	张乃召
晋绥通信学校		200	1947. 5	山西临汾	曾庆良
西北通信学校		200	1948	山西临汾	曾庆良、李明松
第一通信学校		220	1950	西安王曲	陈外欧、江波
工委通信队		120	1948	平山县 西黄泥	高飞、柳仁甫

表 B-7 一二〇师西北地区电训班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一二〇师电训班	1	10	1938. 4 - 1938. 11	山西岚县	龙静轩
一二〇师电训班	2	20	1939. 1 - 1939. 8	冀中	何 基
一二〇师机务班	1	10	1939		靳子云
一二〇师新军报训班	1		1940. 3 - 1940. 9	晋西北	
晋西北区党委电训班	1	8	1940. 2 - 1940. 10		何 基
一二〇电训班	3	40	1940. 3 - 1940. 12	兴县	何 基
一二〇机务班	2		1941. 5 - 1941. 8	兴县	
一二〇机务班	3		1942. 4 - 1942. 7	兴县	靳子云
新军报训班	1	3	1938. 2 - 1939. 12		丁克强
新军报训班	2	10	1939. 2 - 1939. 12		刘振中
新军报训班	3	10	1940. 2 - 1940. 9	兴县	刘永福、李益民
新军电台队长班	1	5	1940. 9 - 1940. 12	兴县	
区党委电训班乙班	2	16	1939. 4 - 1940. 2	山西岚县	李益民
绥蒙军区报训队	1	20	1949	集宁	李泽民
晋绥军区通信队	1		1943 - 1944		孙道会、路丁一
三五八旅报训班	1	8	1938. 7 - 1939. 5	临县	彭洪志、齐振兴
吕梁军区报训班	1	15	1945. 11 - 1946. 3	山西离石	马连科
吕梁报训班	2	20	1946. 6 - 1946. 12	山西汾阳	马连科

续表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吕梁区报训班	3	40	1947. 4 - 1947. 11	山西中阳	马连科
三五九旅电训班	1	13	1938. 10 - 1939. 3	山西灵邱	黎东汉
三五九旅电训班	2		1940. 9 - 1941. 2	绥德	黎东汉
三五九旅电训班	3	20	1945. 2 - 1946. 5	湖南平江	龚才华
三五九旅电训班	4		1947 - 1948. 7	山东渤海	吕 淮

表 B-8 晋察冀军区电训班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 止 时 间	地 址	负 责 人
军区电训班	1	23	1937. 11 - 1938. 4	阜平	钟夫翔
军区电训班	2	92	1939. 9 - 1939. 8	瓦渣地	钟夫翔、 刘常真
军区高训班	1	20	1939. 6 - 1938. 9	姜家沟	钟夫翔
军区电训班	三期半	12	1939. 6 - 1940. 2	姜家沟、石堂	钟夫翔
军区电训班	4	40	1939. 11 - 1940. 11	姜家沟、石堂	钟夫翔
高训班	2	20	1939. 11 - 1940. 5	姜家沟、石堂	钟夫翔
电训班	5	60	1941. 2 - 1941. 9	平山石古洞	钟夫翔、 徐守恒
高训班	3	20	1940. 3 - 1940. 9	吊儿	钟夫翔
高训班	4	100	1942. 12 - 1943. 3	吊儿	钟夫翔
高训班	5	30	1943. 4 - 1943. 7	猪头沟、白叉	旷泉吉、 任汉章
电训班	6	108	1945. 3 - 1945. 9	双庙 - 张家口	周石夫
电训班	7	100	1945. 11 - 1946. 7	张家口、涞源	周石夫
电训班	8	100	1946. 7 - 并入电专	涞源上下店	周石夫
军区研究班		26	1941. 3 - 1944. 11	阜平	钟夫翔、 王仕光
冀热辽地区干训班	1	5	1942. 11 - 1943. 1	迁西、兴隆	陈云东
报训班	1	15	1942. 12 - 1943. 5	兴隆	陈云东
干训班	2		1944. 6 - 1944. 8	迁西正沟峪	陈云东
报训班	2	30	1945. 5 - 1945. 11	迁西正沟峪	吕进
十七分区报训队		30	1945. 8 - 到东北	迁西正沟峪	李砚田
报训班	3	50	1945. 10 - 到东北	王田	赵东升
冀热察地区电训队	1	30	1941. 2 - 1941. 12		梁骥

续表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 止 时 间	地 址	负 责 人
冀中地区电训队	1	23	1938. 2 – 1939. 9	任邱青塔	刘文粟、崔炳南
冀中地区电训班	2	50	1938. 10 – 1939. 4	博野城关	商祯祥、崔炳南
冀中地区电训班	3	40	1939. 12 – 1940. 7	安平大王各庄	韩重仁、张碧侠
冀中地区电训班	4	30	1939. 8 – 1940. 8	武强	江文、韩克树
冀中地区电训班	5	40	1940. 4 – 1941. 1	唐县北清醒村	韩重仁、张碧侠
冀中地区电训班	6	30	1940. 11 – 1941. 7	唐县北清醒村	韩重仁、张碧侠
冀中地区电训班	7	80	1941. 5 – 1942. 2	唐县姚家湾	韩重仁、张碧侠
冀中地区电训班	8	100	1942. 2 – 1942. 6	深、武、饶安地区	刘文粟、张碧侠
冀中地区电训班	9	60	1944. 12 – 1945. 5	唐县慈家台	张凯、齐木西
冀中地区电训班	10	110	1945. 8 – 1946. 1	县	张凯、齐木西
六分区报训队	1	3	1944. 10 – 1945. 3	宁晋县	李文昌、关恒寿
七分区报训队	1	20	1938. 11	博野	商祯祥、吴恒寿
七分区报训队	2	8	1945. 7 – 1945. 11	安国	赵志合、赵文海
九分区报训队	1	20	1938. 6 – 1939. 1	任邱	张文穆
九分区报训队	2	3	1945. 2 – 1946. 3		赵荣萱
十分区报训队	1	60	1938. 4 – 1938. 10	具县	阎钧
十分区报训队	2	10	1945		
南进支队报训队	1	3			
区党委报训队	1	6			
区党委报训队	2	8	1941. 6 – 1942. 2		
晋察冀电专		400	1947. 3 – 1948. 5	阜平 – 获鹿	曾涌泉
华北电专		1400	1948. 5 – 1949. 5	获鹿	王净
军委工校		4 000	1949 – 1952	张家口	曹祥仁、李涛

表 B-9 八路军前总、一二〇师、晋冀鲁豫军区电训队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前总电训队	1	20	1938. 4 – 1938. 12	山西屯留	朱虚之
前总电训队	2	30	1938. 12 – 1939. 6	山西路城	海凤阁
前总电训队	3	30	1939. 7 – 1939. 12	山西武乡	海凤阁
前总电训队	4	50	1940. 3 – 1940. 12	辽县桐峪	吴元亮、康君健
巡视团机务班	1	20	1941. 5 – 1941. 10		叶云章

续表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前总电训队	5	100	1942. 1 - 1943. 11	辽县苏公村	马然、康君健
一二九师教导队	1	50	1938. 12 - 1939. 12	威县北刘居	张有年、王之清
一二九师教导队	2	50	1939. 12 - 1940. 7	辽县桐峪	王之清、贺伯升
一二九师教导队	3	50	1940. 11 - 1941. 4	辽县桐峪	王之清、贺伯升
一二九师教导队	4	200	1942. 4 - 并入前总 5 期	涉县会理	赵伟、贺伯升
高训班	1	10	1940. 12 - 1941. 4	涉县会理	王之清
高训班	2	20	1941. 8 - 1942. 4	涉县河南店	王之清
晋冀鲁豫军区通信学校	1 - 3		1945. 10 - 1948. 6	武安一获鹿	吴泽光、林伟
军区参谋训练队	1	70	1948. 1 - 1948. 6	武安一获鹿	何 轰
军区机务训练队	1	50	1948. 3 - 1948. 5	涉县沙河	钱文极
鄂豫挺进纵队电训班	2	8	1940. 3 - 1940. 11	鄂中地区	魏如湖
鄂豫挺进纵队电训班	3	20	1940. 5 - 1940. 12	豫鄂地区	沙华夫
新四军五师电训班	4	10	1941. 3 - 1941. 11	豫鄂地区	沙华夫
新四军五师电训班	5	10	1942. 5 - 1942. 11	鄂东地区	委青
新四军五师电训班	6	40	1943. 9 - 1944. 2	鄂中地区	吴志杰、程迈、邢中里
新四军五师电训班	7	100	1944. 8 - 1945. 3	鄂中地区	魏如湖
新四军五师电训班	8	9	1945. 8 - 1946. 2	鄂中地区	黄静、程迈
河南四军分区电训班	1	8	1945. 8 - 1946. 2	豫南	杜唐禄
江汉军区电训班	1	10	1948. 3 - 1948. 10	洪山地区	周德显
湖北军区电训班	1	130	1949. 5 - 1949. 11	武昌	程 迈
浙东游击纵队电训班		23	1945. 3 - 1945. 7	上虞	杨 晋
浙南特委电训班	1	4	1947. 9 - 1948. 1	浙南	徐炳全
浙南特委电训班	2	6	1948. 1 - 1948. 8	浙南	徐炳全
浙南特委电训班	3	13	1949. 4 - 解放温州	浙南	徐炳全

表 B - 10 新四军电训班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皖南军部电训班	1	20	1938. 4 - 1938. 9	安徽	吴志恒、曹维廉

续表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皖南军部电训班	2	30	1939. 1 – 1939. 7	云岭	曹维廉
皖南军部电训班	3		不 详		
新四军华中总指挥电训班	1	30	1940. 12 – 1941. 7		黄子坤
新四军一师	1	40	1940. 10 – 1946. 6	苏北泰东地区	曹维廉
新四军一师（民众学校）	2	24	1941. 7 – 1942. 1	苏北泰东地区	李景瑞
新四军一师（民众学校）	3	24	1942. 2 – 1942. 8	苏北泰东地区	朱隽亚
苏中军区电训班	1	50	1944. 11 – 1945. 5	台东	郭日忠
苏中军区电训班	2	132	1946. 1 – 并入雪枫大学	东台	廖昌林
雪枫大学三大队十中队		132	1946. 4 – 1948 年年底	东台	余永明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8	师傅带徒弟		王殿春
新四军二师	1	30	1941. 3 – 1942. 2	天长县	陈超
新四军二师	2	10	1942. 3 – 1942. 11	天长县	陈超
淮南军区报训班	1	30	1945. 8 – 1946. 7	天长县	顾舜
新四军三师电训班	1	14	1941. 2 – 1941. 11	盐埠	赵宾玉
新四军三师电训班	2	10	1942 – 1943	盐埠	颜吉连
新四军三师电训班	3	30	1945. 5 – 东北西满	江苏、 山东、东北	颜吉连
新四军六支队	1	4	1939. 2 – 1939. 10	永城	熊梦飞
八路军四纵电训班	2	20	1940. 5 – 1940. 12	新集	熊梦飞
新四军四师电训班	3	33	1941. 12 – 1942. 7	湖泽湖半城	熊梦飞
新四军四师	4	40	1945. 6 – 1945. 12	上店子	熊梦飞
新四军四支队 留守处电训班	1	30	1938. 7 – 1939. 3	竹沟	史干

表 B – 11 中原军区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中原军区报训队	1	70	1948 – 1949	桐 柏	贾鹤龄
中原电专		400	1949. 2	郑 州	李达、张有年
二野军政大学电讯支队		400	1949. 5	南 京	泉吉、范元纪
西南通信学校		437	1950	重庆 – 广安	王时彦

表 B-12 山东纵队一一五师电训班

名 称	期次	人 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山东纵队电训队	1	8	1938.3 - 1938.12	沂水崖堤	闻述尧
山东纵队电训队	2	25	1938.9 - 1939.1	沂水崖堤	闻述尧
山东纵队电训队	3	20	1939.7 - 1940.6	沂水王庄	孙虎
山东纵队电训队	4	30	1940.6 - 1941.3	沂水冯家湖	孙虎
山东纵队电训队	5	80	1940.8 - 1942.11	岸堤 马沐池	赵信然
大众日报电训队	1	5			刘永恕
一一五师电训队	1	12	1938.3 - 1939.4	山西汾阳、孝义	张瑞
一一五师电训队	2	20	1939.4 - 1939.10	山东临沂	陈林
一一五师电训队	3	20			
一一五师电训队	4	20			
一一五师电训队	5	20			
山东通信学校	1	60	1944 - 1945.8	临沂	郑立中 孙虎
华东通信学校			1946.3 - 1951	临沂 - 南京	黄荣等
华东野战军电训队			1948.4 - 1949 并入华东通信学校		王惠霆
三野电训大队					陈国栋 余永明

表 B-13 东北地区

名 称	期 次	人 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抗联三军通信学校			1936.7 - 1937.3	小兴安岭	于保合
西满通信学校			1945 - 1945.12	郑家屯	颜吉连、周志慎
西满通信学校			1945.12 - 1946 并入电专	郑家屯	颜吉连、周志慎
东南满通信学校			1945.10 - 1946 并入电专	安东	郑立中、孙虎
民主联军电讯专门学校 东北通信学校	先后 8 期	1 000 余人	1946.2 - 1950	梅河口 沈阳	段子俊、张可普
关东电专 大连大学电讯专修科	报务系 机务系 工程系	239	1946.12 - 1950	大连	段子俊、罗若暇

表 B-14 广东两江地区电训班

名 称	期次	人数	起止时间	地 址	负 责 人
东江纵队		5	1941. 12	惠 安	戴 机
东江纵队	1	6	1942. 1 - 1944. 7	宝安大鹏岛	戴 机
东江纵队	2	12	1944. 8 - 1944. 12	宝安大鹏岛	戴 机 陈志华
东江纵队	3	16	1944. 12 - 1945. 5	宝安大鹏岛	戴 机 杨兆麟
东江纵队	4	40 - 50	1945. 9 - 1945. 11	宝安大鹏岛	杨兆麟 陈志华
东江一支队	1	2	1948. 6 - 1949. 1	惠 阳	曾光、张明
东江一支队	2	3	1949. 3 - 1949. 7	惠 阳	曾光、张明
东江二支队	1	4	1947. 7 - 1948. 2	河 源	钟应时 张小章
东江二支队	2	16	1948. 2 - 1948. 6	河 源	钟应时 张小章
东江二支队	3	6	1948. 9 - 1949. 1	河 源	钟应时 张小章
东江三支队	1	2	1947. 11 - 1948. 5	从 化	陈焕章
东江三支队	2	6	1948. 6 - 1948. 10	从 化	陈焕章
东江三支队	3	20	1948. 10 - 1949. 3	从 化	陈焕章
东江三支队	4	20	1949. 3 - 1949. 8	从 化	陈焕章
粤北一支队	1	6	1947. 6 - 1949. 12		李 文
粤北一支队	2	3	1947. 8 - 1949. 1		李 文
粤北一支队	3	15	1949. 5 - 1949. 10		李 文
粤北一支队	4	15	1949. 8 - 1949. 12		李 文
粤北二支队	1	3	1947. 7 - 1947. 11		容 康
粤北二支队	2	7	1947. 11 - 1948. 7		容 康
粤北二支队	3	4	1949. 5 - 1949. 10		容 康
粤赣湘边纵队	1	20	1949. 5 - 1949. 11	龙 川	丘海生

## 后 记

本书史料有些选自《党内交通史料》、《难忘的战斗岁月》、《鄂豫皖 1931 年历史档案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选编》、《中央军委历史档案选编》、《电子工业史料》、《通信兵文献资料汇编》、《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回忆史料选编》、《新华社回忆录》、《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料》、《延安时期气象史料》、《冀热辽地区大事记》，何太同志提供东江纵队电训班史料，其余大部分均为编者的采访记录。

本书史料多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口述，年代久远，涉及面广，从搜集资料到编辑出版工作量颇大，实非一两人之力所能成事。

众志成城。本书由朱仕朴主编，刘嘉相主笔，在完成书稿过程中，得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总参谋部通信部、兰州军区通信部、南京军区通信部、电子工业部史料办等众多单位的大力协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许多老同志为此书的编校审读做了大量工作。主编朱仕朴的夫人王铭慈也是军队通信战线的一位老同志，为搜集史料提供了不少帮助。电子工业出版社为此书与读者见面完成了圆满的句号。特此一一致谢。